HISTORY Students

中国读本

战国史话

谢齐 彭邦炯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历史特级教师鼎力推荐

《中国读本（史话分卷）》丛书是目前所见学生历史读物中最好的。一是丛书的各单本作者都是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这保证了内容的专业性；二是丛书的内容深浅适中，既体现了大纲要求，又有所拓展，可以作为课内知识的有效补充，很适合学生阅读。同时，本书也适合老师们作为资源来储备。

——白幼蒂（北师大附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市高级中学实验课本编委）

本套丛书是按照新课标要求进行编辑的，扣住了教学大纲，既体现了教学重点，又有适当的延伸，对拓展学生知识面很有必要，是一套质量很高的学生课外读物。

——李明赞（北京四中历史特级教师，国家新课标高中历史教材编撰者之一）

此书最大特点就是将知识、学术融为一体，既有严谨治学态度、科学辩证唯物史观，又能够栩栩如生描述再现一个过去，语言表达通俗易懂，人生哲理深入浅出，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层面要求，更有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和知识的拓展。对于青少年学习、探究历史，《中国读本（史话分卷）》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范桂英（北京十五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

ISBN 978-7-5078-3077-4



定价：24.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史话 / 谢齐，彭邦炯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10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077-4

Ⅰ. 战… Ⅱ. ①谢… ②彭… Ⅲ. 中国—古代史—战国时代—通俗读物 Ⅳ. K23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4333号

战国史话

著　　者	谢　齐　彭邦炯
责任编辑	凭　林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6.5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7-5078-3077-4 / G · 1275
定　　价	24.00 元

出 版 说 明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这是半个世纪前我们祭祀轩辕始祖——黄帝时留下的华美篇章。

我国是有着6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不懈的考古挖掘，还在不断延伸着她的历史源头。放眼全球，我泱泱中华，江山多娇；检点历史，我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周易》到《诗经》，自《天问》而《警世钟》，六七千年，流淌不息。这里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浩然博大，也有“何必马革裹尸还”的坦荡豪壮；既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贞刚烈，也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忠奸判定。曾经长时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的进步无私贡献出了自己无数的珍藏。

曾几何时，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打倒孔家店”的激愤一度让很多人盯上了西方的月亮。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让媚外的思潮重新暗流涌动。但与之同时，过度物质化了的西方国家，却把他们的目光重新投向东方文明的古邦，试图从中找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方。为此，我们曾一度犹豫彷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

说不清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曾经徘徊在一些人心头的迷茫逐渐扫去，重视传统，回归本源，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持续进步的动力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她的真实面貌，发扬她的优秀传统，规划她的锦绣前程，是当代中国人既严肃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脉络者，我们的历史是最应珍视的一笔遗产。但中国历史博大精深，古籍文献、文书档案浩如烟海，一部中国史，真不知从何处说起！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社约请、组织在史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一辈历史学家，精心编撰了这套《中国读本》丛书（中国历史史话分卷）。本分卷共16分册，分别是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上、下）、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上、下）、五代、宋朝、元朝、明朝、清前期和晚清。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作者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以大手笔撰写小文章，在各分册中，对该断代的重大事件、经济发展、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社会生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发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既有专业的厚度，又不乏诙谐和幽默，文笔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历史是一个辉煌的存在，历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启迪之学，我们衷心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能从这套丛书中寻到灵感，从6000年历史积淀中汲得智慧，熔铸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崭新的智慧王国。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年6月1日

开 头 语

——略说战国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战国”作为时代的专名，是后来的事，当时的战国，指交战各国。汉代刘向编《战国策》后，战国才成了这个时代的专名。

战国的起迄年代有多种说法。公元前403年，魏、赵、韩列为诸侯，本书采此年为战国开始之年，但叙事兼及以前。

战国已广泛使用铁器，《管子》、《孟子》书中有使用铁农具和手工工具的记载，考古发掘证实铁农具已普遍使用。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已逐渐普遍。耕地面积扩大，深耕、施肥、灌溉、除虫等耕作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农作物的种类有黍、稷、稻、麦、菽等，林木和经济作物有木、竹、桑、麻、桐、漆、果等。战国水利事业有长足发展，兴修了郑国渠、都江堰等著名水利工程。

战国时期打破了西周春秋以来“工商食官”的局面，私营工商业有很大的发展。手工业有采矿、冶炼、青铜制造、纺织、木器、漆器、制陶、盐业等部门。《周礼·考工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生产情况，官府手工业分攻木工、攻金工、攻皮工、设色工、刮磨工、陶工等不同工种，各工种又分若干专业。战国铁农具有犁、耙、锄、镰、锸等，铁工具有刀、斧、锯、凿、锤等，铁兵器有矛、戟、刀、剑等，现今河北、河南、辽宁、山东、陕西、湖南等省的考古发掘都有铁兵器和铁农具出土。战国时已掌握热铸

技术，后期学会将纯铁加热掺炭制成钢。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兵器、日用器等种类，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发现过一处春秋战国时期规模宏大、开采时间长的采矿炼铜遗址。

战国时期人口增加，商业、城市有很大发展，出现了白圭、吕不韦等大商人，猗顿、郭纵等大手工业主。有临淄、邯郸、大梁、郢等一批人口众多、商业繁荣的城市，交通也有了发展。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繁荣、战国已普遍使用货币，主要有4种货币：燕、齐的刀币，魏、韩、赵的布币，周、秦的圆钱，楚的贝币（蚁鼻钱）。

春秋末到战国时期，各国相继确立了封建制度。魏、赵、韩"三家分晋"，齐国"田氏代齐"，新兴地主阶级夺取了政权。楚国、燕国也建立了封建制度。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于公元前356年、前350年两次下变法令，通过变法，秦国成为封建制国家，商鞅变法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有意义的社会变革，秦国日益强大。战国初，魏王任用李悝进行改革，封建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魏成为战国前期的强国。齐威王招贤纳士，整顿吏治，成为东方强国。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进行变革，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的社会变革，都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各国最高统治者是国王，中央设立相和将，此外还有负责专门事务的官职，如尉、御史、廷尉、郎中、太仆、太傅、太祝等。中原各国等级爵位有卿和大夫。战国还有封君。地方设郡、县，郡的长官为守，县为令。春秋时开始设县，战国各国普遍设县，县以下设乡、里、邑、聚、亭等。

战国争战激烈，各国拥有数十万以至百万军队。战国前期，魏国最强，魏攻取秦河西地、伐齐伐楚，首先称王，并召集了"逢泽之会"。齐、魏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齐胜魏，发起"徐州相王"，继魏之后称王，成为强国。秦占领魏河西郡、上郡，灭巴蜀，攻占韩、赵、楚地，成为强国。楚土地广大，与北方各国时有征战，也是战国以来的强国。战国中后期发生过齐攻入燕都、五国合纵攻齐、燕军入临淄并占领齐大片国土的战争，秦攻占楚都郢，

五国合纵攻秦，秦、赵长平之战、邯郸之战等著名战争。战国后期，秦成为最强大国家，终于灭六国、统一中国。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对后来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

战国游说之士，奔走各国之间，合纵连横。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生动地记载了一次五国合纵攻秦的经过。合纵连横是战国中后期对秦和六国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宋代司马光把三晋比成齐、楚的“藩蔽”，把齐、楚比成三晋的“根柢”，他认为如六国合纵成功，秦何以得灭六国？

七国与少数民族相邻，与少数民族时有战争，各国不断扩大边境地域建郡。秦在边地新建陇西郡、北地郡，燕新建上谷郡、渔阳郡、辽西郡、辽东郡、右北平郡，赵新建雁门郡、云中郡。辽宁、内蒙古考古发现东胡遗物，广东、广西、浙江出土文物受楚文化影响，云南受中原文化影响，内蒙古、宁夏发现受中原文化影响和来自中原地区的遗物。

战国是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和繁荣的时代。战国养士之风很盛，有养士著名的“四公子”。

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他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大主张，他的“三表法”把认识和社会效果联系起来，是认识论的很大进步。后期墨家扬弃了墨子“天”“鬼”的宗教迷信思想，发展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并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稷下黄老学派分三个支派：一是宋钘、尹文派，宋、尹学说属道家向法家的过渡。二是田骈、慎到派，从道家转变而成法家，慎到更强调法和势，韩非继承了慎到“势”的学说。三是环渊派，环渊真正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庄子是道家的重要学派，庄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宿命论，他把生死、贫富、祸福、饥渴等说成是“命之行也”。他的哲学思想是相对主义，“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客观真理是没有的。庄子的庞大哲学体系中又有万物“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辩证思想。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行“仁政”，实行“制民之产”、“省刑罚、薄赋敛”。他宣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维护封建制度。他主张性善论，认为仁、义、礼、智是从性善发端的。他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荀子是战国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他主张礼治，又重刑，他主张性恶论，他的天道观宣传了“天人相分”，是唯物主义的光辉思想。

韩非是著名法家，他提出以法为本的法治，同时要求法、术、势的结合，他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孙膑是战国著名的兵家，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证实了他的学说确实存在。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说，是著名的阴阳五行家。惠施、公孙龙以逻辑与认识论为讨论内容的名辩思想，是著名的名家。《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是各家学说兼而有之的杂家。

战国的天文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已通用四分历。著名医学家扁鹊把中医的诊断、治疗，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战国取得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墨家的《墨经》在力学、声学、光学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战国诸子书和历史书都是散文，章学诚说战国散文“长于讽喻”、“深于比兴”，善于运用比喻和讽喻的描写。庄子的文章，想象力丰富，文字生动，是散文的杰作。屈原是伟大的诗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楚辞多是屈原的作品，《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感人至深。战国音乐有很大发展，见于文献和出土文物的乐器有钟、磬、琴、笛、箫、笙、筝、筑、钲、鼓、錞等。战国的绘画艺术也有很大发展，出土的铜器纹饰、漆器纹绘和帛画有充分反映。铜器纹饰、漆器纹绘描写人和鸟兽动物生动写实，形象逼真。

以上是战国史简介，中国历史从此步入秦汉时代。

目　　录

第四章　商业和城市、交通的发达

第五章　七雄并立　变法图强

第六章　大国逐雄　秦齐崛起

第七章　诸侯削弱　秦并六国

第八章　政治制度、阶级关系、民族关系

第九章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第十章　科技、文艺与物质文化生活

第一章　卷首三题

一、何谓战国

战国史讲的是我国春秋以后到秦统一前的一段历史。为什么要把这段历史叫做“战国”呢？让我们从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用“战国”命名的书讲起好了。这部书就是《战国策》。它是西汉人刘向根据秦以前列国策术士们的言行记录选辑的一部文献汇编，主要记载了当时的策士、谋臣游说各国或互相诘辩时的一些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了当时各国政治、军事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原来先秦列国都有史官或策术士们辑录的《国事》、《国策》、《事语》、《短长》等不同名称的书流传。后来由于秦朝焚书坑儒以及秦汉间的剧烈战火，古文献的保存和流传受到极大的破坏。这类古文献到刘向时已所剩无几，待他编定《战国策》后，原来那些《国策》、《事语》、《短长》之类的书逐渐湮没，他的这部书则成了2000余年来独传于世的列国策术士们的言行专辑。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部类似《战国策》的帛书。全书共有27章，其中有10章见于传世的《战国策》，有8章被司马迁的《史记》引录过。除去两书的重见部分，剩下的则是2000多年来不为世人所知的秘籍。据研究，很有可能是那时流传过的《国策》、《国事》、《事语》、《短长》一类的书；刘向编选《战国策》时或许参考过，或许选取了其中部分篇章。这部帛书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后取名《战国纵横家书》出版，从此打破了

《战国策》独传于世的局面，给研究战国史增加了一项宝贵的新史料。

“战国”二字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专称，应是刘向用此二字为书名以后的事。虽然这个词不是他的首创，而是秦统一前就有人用了，但当时并不具有一个历史时代的特定含义。如《战国策·燕策》记载的苏代与燕王的谈话，其中有“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赵策》记马服君赵奢说的“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从这些言谈中可以知道，“战国”一词，原来只是指秦统一前列国中的韩、赵、魏、秦、楚、齐、燕所谓“七雄”，还没有作为特定历史时代的专有名词。

司马迁写《史记》时，也用了这个词。《史记·平准书》说：“魏用李悝，尽地力，为彊（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显然也是指秦统一前的列国“七雄”，但还是没有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代名词。历史上把秦统一前的七雄征战不休的时期称为“战国时代”，将这段历史称为战国史，应该是从刘向编定《战国策》以后。

秦王政（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将王贲攻入齐国，俘虏了齐王，七雄中与秦对峙的最后一雄灭亡了，七雄分裂割据的局面到此归于一统。这是古往今来的学者所公认的战国历史结束之年。但它的起始之年，历来却有不同的主张。我们认为，根据战国时代人们自己的看法和司马迁所讲的魏用李悝之后天下才“争于战国”看，似应以韩、赵、魏三家分晋作为战国历史的起始较为合适①。

但是，这需要追溯一下与之相关的历史，否则就和春秋时代脱

---

① 战国起始之年，历来就有不同划法。司马迁写《史记》将周元王元年（前476）作为战国的开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作为战国的开端。后世学者除有从《史记》的（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和从《通鉴》的（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外，还有以453年作为开端的。杨宽新修订的《战国史》又以公元前481年《春秋》绝笔作为进入战国的开始。

节了。

秦所灭的六国，以及它本身在内，原来都是周王朝下面的诸侯小国。相传周初约有大大小小 800 个诸侯国。那时虽是小国林立，但因王权强大，仍然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全国归于一统，各诸侯也能相安无事，共屏周室，社会生产也有一定发展，还出现过所谓“成康之治”的太平盛世。但到西周幽王时代，由于社会矛盾尖锐，加上周王荒淫无道，结果酿成了严重的内忧外患。周幽王被犬戎族所攻杀。其后幸得各国诸侯相助，赶跑了犬戎，继立太子宜臼，称为周平王，算是保持了周朝的大一统天下。然而，经过这番变乱以后，周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了，犬戎族也继续为患宗周。平王不得不放弃祖宗长期经营的丰镐（今西安长安县境）古都，东迁到洛邑（今洛阳地方）。历史上把那以前称为西周，平王东迁后称为东周。

平王东迁后，王权日衰，诸侯的势力渐渐强大起来，周王也随之失去了控制的力量，各国之间互相侵伐。于是，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史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大国争霸中原，相互攻伐不休，各诸侯国的势力此涨彼落。在此过程中，各诸侯下面的卿大夫又逐渐膨胀起来，出现了“政自大夫出”的局面。一些诸侯国的政权，先后落到了少数强大的卿大夫手里，其中以晋国尤为典型。

春秋后期的晋，君权旁落，大权主要操纵在六家卿大夫之手，史称“六卿专政”。后来六卿之间不断斗争，就只剩下知氏和韩、赵、魏四家。到了公元前 453 年，韩、赵、魏又灭了知氏，于是在晋国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50 年后，即公元前 403 年，三家正式得到周天子承认立为诸侯。从此，韩、赵、魏加上原来的秦、齐、楚、燕一共七国，这就是所谓战国七雄。七雄之间又经过长期斗争，一直到公元前 221 年秦灭六国，这种征战不休的分裂局面才告结束。

我们这本书，就是以七雄正式形成之年作为战国历史的正式起

年的。最早采用这一说法的是司马光，在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这部大型编年史里就是从韩、赵、魏正式列为诸侯的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的。近世学者一般也多用此说。但考虑到三家分晋的实际历史，早在公元前453年就形成了，虽然三家尚未得到周天子的承认，但晋国已名存实亡，三家已成了事实上的三个独立王国。所以，我们在具体讲战国史时，也不可忘记这段历史。

二、战国社会性质种种

战国时代的社会性质，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学习战国历史必然遇到的一个难题。

战国这200年左右的历史，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这是谁都承认的事实。但对这段时期的社会性质的分析，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对战国社会性质的讨论，算起来也有半个多世纪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就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1949年以后也随着古史分期问题在史学界一再讨论过。

几十年来，关于战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各种看法，归纳起来不外两大派五种看法。

一派是战国封建论。持这种观点的又可分为两种主要看法。

战国封建论者认为，春秋战国间社会变动的实质是封建社会内部领主制向地主制的转变。他们把鲁宣公十五年（前594）的“初税亩”，看成是领主制的劳役地租开始转变为地主制实物地租的重要标志，到战国时代，各国已先后完成了这种转变。战国时代虽然还有奴隶存在，但不是生产劳动的主要负担者，从事主要生产的已是农民，他们主要是由西周春秋时的农奴转变来的，而主要剥削者则是封建地主。因此，战国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当时社会变革的推动者的“法家”，是反映

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春秋战国间那种下层向上层的夺权，是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取代旧的封建领主阶级的表现。持这种看法的结论是：战国时代的社会，已由封建领主制转变为封建地主制社会。

另一种，可以叫做初期封建论，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着眼于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以及主要生产者身份的改变。他们认为：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是井田制。春秋时代，铁器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一些下层奴隶主，为了超额榨取耕种的奴隶们的剩余劳力，就设法开垦井田以外的空地。时间久了，私田增加了，私门也就富于公室，形成了上下相克的局面。在这种上下相克的斗争中，下层尽力争取民众作为自己的战斗员，故民众的身份也就逐渐改变了，原来“力于农穑”的庶人，在周初是人民中的最低等级，春秋以后逐渐提高到家内奴隶之上。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从最下层的奴隶地位解放出来，这就意味着奴隶制度的崩溃。持这种论点者，也很注意“初税亩”，认为那是公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是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井田制瓦解的表现，它表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第一次登上了舞台。他们还认为，春秋战国之际两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是分别以革命和变法两种形式，先后在各国完成的。战国时代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变而进入了封建社会。

在我们看来，这两种封建论，虽有不同之处，但在战国这段历史上分歧不大，可以认为只不过是起点不同：前者起于领主制，后者起于奴隶制。但结论却基本相同。

再一派是战国奴隶制度论。主张战国时代是奴隶社会的人，主要有如下三种看法：

一种认为：战国时代是奴隶制社会的末期，秦统一六国，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从春秋开始，总的情况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这反映了奴

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步步由上层向下层转移。整个奴隶制度从经济、政治、宗法以及礼治等各个方面看，都在随之衰颓下去，而封建制的因素，则逐渐成长壮大。在这个相互消长的历史过程中，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儒法之争，恰是反映了新与旧、进步与落后、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战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矛盾，是地主阶级与腐朽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虽然这时期的奴隶主阶级，经过春秋以来本阶级内部的斗争和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与斗争，势力已大大削弱了，但战国时代，地主阶级还在形成中，尚未取得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奴隶主阶级。因而，他们认为，战国时代还没有完全进入封建社会，仍然是奴隶制社会，只不过是奴隶制社会的末世。


铜象灯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战国时代是由不发达的奴隶制开始进入发达的奴隶制社会。他们认为，战国时代是农村公社解体，土地兼并和奴隶买卖盛行的时代。私有奴隶和生产奴隶增多了，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起来，这是氏族贵族奴隶主让位给工商业奴隶主的时期。他们说，战国时代那种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商业经济的繁荣，都不是早期封建社会所应有的现象。在意识形态上的诸子“蜂起并作”形成的“百家争鸣”，正好和奴隶制经济获得发展的情况是相适合的。所以，战国时代是由不发达的奴隶制过渡到发达奴隶制的时代。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战国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开始时期，即由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制社会。持这种看法的人，主要是从生产工具的发展和使用情况去考虑的。他们认为，生产工具是人类劳动过程发展的指示器。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人类由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是由于铁器的使用，铁器工具敲开了文明的大门。我国的铁器出现于春秋时代后期，所以在战国时代才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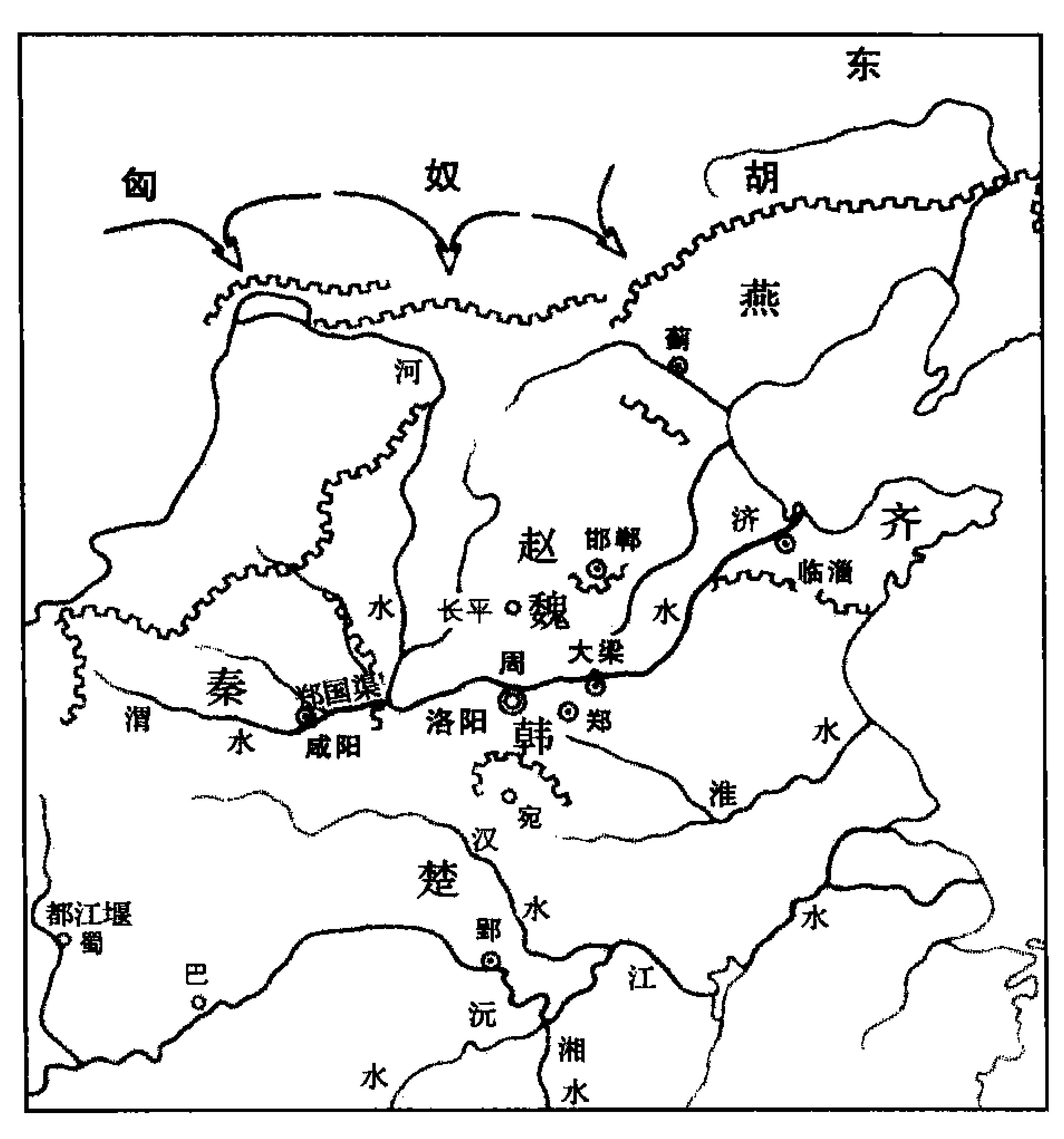
始进入奴隶制社会。

上举对战国社会性质的几种不同看法，都是就其主要论点而言，实际上，在每种看法之中，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就不一一细述了。

我们同意战国封建论。

三、战国形势览要

先说七雄地理形势。



战国时期形势图

春秋以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还有近百个小国。这些小国，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到战国时，见于文献记载的，除了韩、赵、魏、秦、齐、楚、燕所谓七雄外，还有周、鲁、卫、宋、滕、邹、中山和越国等，以及四周围的一些兄弟民族，如北方的匈奴、

林胡、东胡，南边的百越，西南的巴、蜀等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先后为七雄所兼并。这七个大国的地理位置是：东面是齐，南面是楚，西面是秦，北面是燕和赵，韩、魏则居中原腹地。如果以战国中期的形势看，具体一些说：

齐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东滨大海；南有泰山，与鲁、宋为邻（后来齐灭宋而占有其地）；西有清河（河北省清河县西），与赵国为邻；北有渤海，与燕为邻。就今日地域讲，主要占有山东省偏北的大部分与河北省的东南部分地区。

楚国，都郢（今湖北江陵），东到大海；南有苍梧（即湖南省南部的九嶷山）与百越为邻；西至巴、黔而与秦为邻；北达中原，与韩、魏、宋、齐相接。主要在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势力先后曾达四川、贵州、云南、陕南、山东南部及两广等部分地区，是七雄中土地最广的国家。其力量所及，几乎遍布整个南部中国。

秦国，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到黄河、函谷而与三晋为邻；南有巴、蜀与楚国为邻；西及西北与西戎和匈奴诸部为邻。主要在今日的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以及四川、青海、宁夏等部分地区。

燕国，都蓟（今北京东南），东有辽东与朝鲜为邻；南与齐国交界；西有云中、九原与赵国为邻；北边与东胡、林胡、楼烦诸部为邻。主要在今天河北省的北部、山西省东北部以及辽宁、吉林等部分地区。

赵国，都邯郸（今河北邯郸），东有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西）与齐为邻；南有漳河与魏为界；西有黄河与秦相望；北与燕国以易水为界；西北与匈奴为邻。主要在今山西省的中部、陕西省的东北部、河北东南部和山东西部、河南北部，以及内蒙古的南部等地区。

韩国，都郑（今河南新郑），夹在魏与秦、楚之间，周围都是比它强大的国家。就今日地区讲，主要在山西省的东南部、河南省

的中部、西部等地方。

魏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东有淮、颍与齐和宋国相邻；南部有鸿沟与楚国为邻；西及黄河西岸与秦为邻（河西地在公元前328年入秦）；西南还与韩为邻；北部与赵国为邻。就今天的地区看，主要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所谓河内一带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

不过，七国疆域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战国时代各国占有的地方，由于各国间你争我夺，前后多有变化；特别是相互邻近的地方，常常是“土无定主”的。我们这里只就其大概情况而言。

战国历史极为纷繁，尤其是政治形势的变幻，对于一般读者来讲，确有难于把握的感觉。因此，这里再把战国时代总的政治形势作一简单介绍。

根据历史发展的持续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在战国这200年左右的时间里，从那时的社会政治发展变化来看，我们可以大致把它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从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知伯，经公元前403年韩、赵、魏正式列为诸侯，至公元前338年商鞅之死，我们把这段作为战国的前期。

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旧贵族的统治秩序逐渐崩溃。到战国时代，新兴封建势力以不同方式先后在各国取得了统治权。其中，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正式取得诸侯头衔，算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段时期，总的说是新兴封建势力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时期。当然，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各国的具体情况也不一样，所以新兴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的时机和表现形式上也不相同。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都是新兴的卿大夫经过长期反复斗争才取代了世卿世禄的旧贵族统治的代表——“公室”的权力。他们由卿大夫变成了新国君，表面看他们是从旧的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部分新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边远地区时间较晚点，那里的

新兴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利用励精图治的国君，集结在国君的周围和旧的世卿贵族作斗争，实行一些改革，打击和剥夺旧势力的特权，来实现新兴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的统治。所以，在此期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改革和变法活动。

战国前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有：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魏李悝的尽地力，楚国吴起的改革，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等。从这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里，我们看到七雄形成后，各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内部整顿上，都在设法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清除旧势力的影响，削弱各国内部的分裂割据势力，把权力集中于国君之手。这时期，可以说新兴封建势力已经在中原各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为巩固这种胜利而努力奋斗。七国之间则表现为相对的平衡和稳定。

从公元前 338 年，秦孝公死、商鞅被车裂身亡，一直到齐、秦相约称帝（前 288）、六国合纵攻齐的公元前 284 年，这一时期可称作战国中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各国在前一阶段巩固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了剧烈的竞争和角逐。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并扩大本国的势力，许多国家一方面继续改革图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前阶段的成果；另方面，在外交上频繁地争取与国，相互抬高称王。战国有名的“合纵”、“连横”（实为当时外交和军事活动的结合）运动，主要就发生在这段时期。当时各国都致力于发展军备，相互之间加紧了力量较量，进行着更加剧烈的兼并战争。所谓战国的“战”字，这段时间表现得特别突出。从春秋以来的那种“国无宁日，岁无宁日”，“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邦无定交，土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的混乱局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相互角逐兼并的过程中，有的国家削弱了，原来的小国先后被七雄吞灭了，而七雄，到后来只剩下了秦、齐、楚、魏四国可以称雄了。

公元前 288 年齐、秦称东、西帝，实际表明只有西方的秦国和东方的齐国才能称雄中原，而 4 年后（前 284）六国攻齐，则说明

齐国也不行了，唯有秦国可以独雄天下。就当时的整个趋势看，虽然七国仍然存在，然而割据称雄的分散局面却日益走向集中了。

战国后期，是以秦国为中心舞台的60余年。这时期，秦在穰侯魏冉定出的“蚕食”六国之策后，于公元前266年又用范雎的“远交近攻”之计，一步步翦灭邻国。起初虽也偶有强敌，如赵国在蔺相如、廉颇、赵奢等人的辅佐下，还能与秦国抗衡一下，但也是回光返照，接着便只有四处求援，没有招架之力。事实证明，只有秦国才有力量称雄，完成最后的统一。从此以后，秦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东方六国扫除以尽，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于是秦王政自称皇帝（史称秦始皇），建立起了封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大帝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第二章　农业的发展

一、“宗庙之牲为畎亩之勤”

春秋战国间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突出表现在当时农业的发展上。让我们先从农耕的故事说起吧。《国语·晋语》讲，晋国范中行氏的子孙，因祸逃亡出国，“将耕于齐”，准备在齐国当普通老百姓自耕而食。有人就说这是“宗庙之牲为畎（quǎn）亩之勤”，意思是说，把原来宗庙祭祀作牺牲的牛，用于田间的耕作上了。这个故事透露了我国农业耕作技术，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过去的人力耦耕开始向牛耕发展了。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人们生活在社会上，离不开衣、食、住、行。进入农业社会的人们，衣、食之源主要就靠农业生产。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业著称的古老民族，已有六七千年左右的农业发展史①。

在古代，我们的祖先把农业生产活动叫做“稼穑”或简称“稼”。嫁和稼古通用，后世指女子出嫁，又才有女字旁的嫁。意思是农业生产有如女子出嫁，繁衍子女，这是非常形象而又含义深刻的叫法。《吕氏春秋·审时篇》讲得好：“夫稼，为之者人也，

---

① 从仰韶文化开始，我国开始进入了原始的农业社会。西安半坡曾出土过约 6000 年前的粟粒；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距今约 6900 年的大量稻米；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过 7000 多年前的粟子，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石、骨农具出土。可见，我国农业生产已有大约 7000 年左右的悠久历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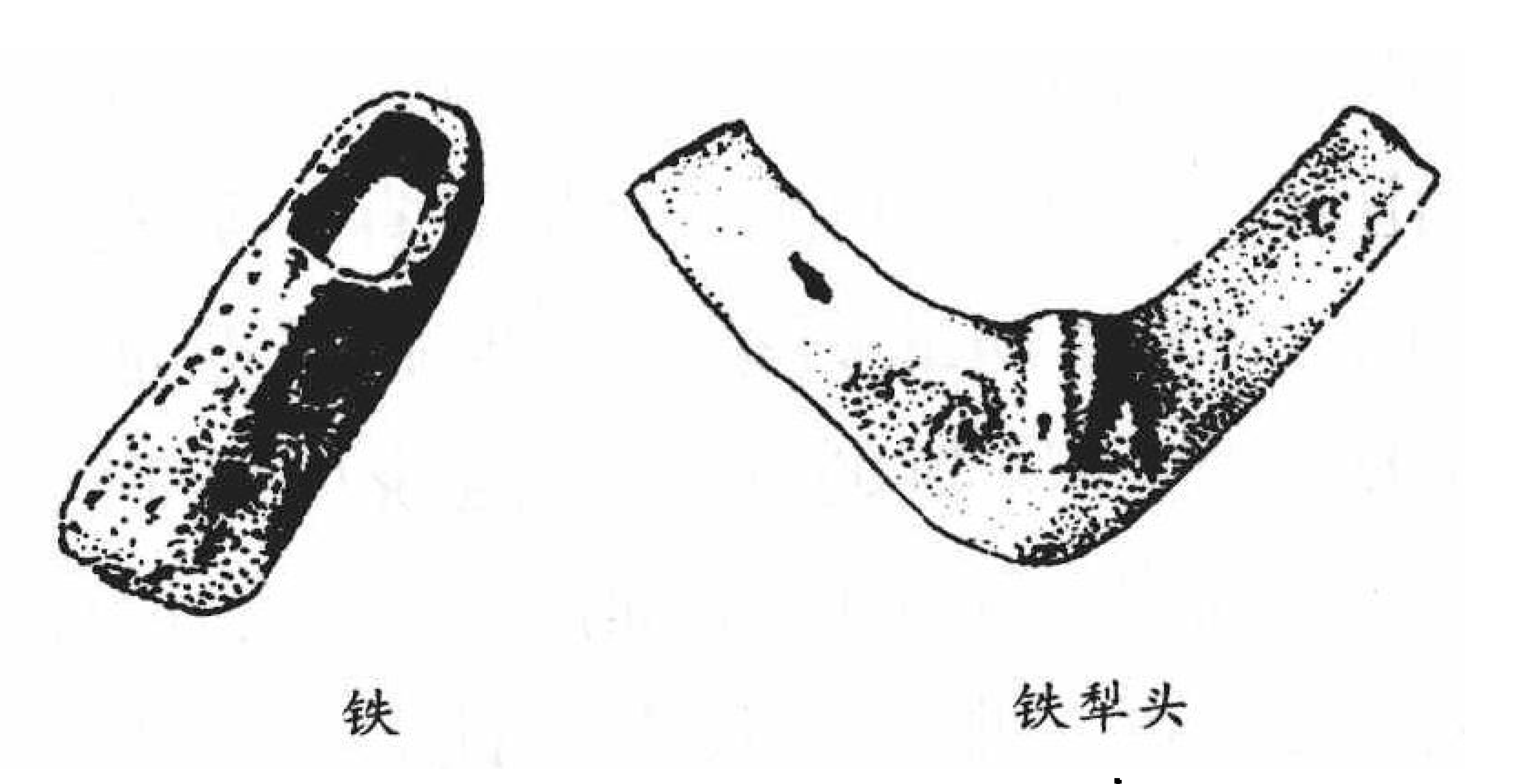
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搞农业生产本是人的事，通过人的努力耕作，加上对土地本身的利用，以及天时——阳光雨露和空气的滋养，只要播下种子就会有收获。要获得好的收成，最根本的还在人为。

农业民族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后，人工的耕作是农事活动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正如战国时人所说，若耕得好，可以使“硬土”变“柔”，“柔土”变“硬”（《吕氏春秋·任地》），使瘠土变为肥沃的土地，也可使过于坚硬或肥沃之地变成适宜于作物正常生长的土地。这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者，已经认识到人工耕作对改良土壤的物理性状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只要发挥了人的力量，通过耕作就能熟化土壤，达到蓄水保墒，调养地力，为农作物的种植和生长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的目的。我们要考察一个社会的农业生产是否发达，首先要看当时的农业耕作技术水平如何，特别是人们对耕作工具和方法的改进，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看，春秋战国时代，是由青铜器进到铁器的时代。特别是在战国时代，铁器在生产中已取代了铜器生产工具的作用。各地出土的铁器，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分布广。毫无疑问，战国时代是铁器时代。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已广泛使用铁器；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上，铁农具就更为普遍。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等省，都先后发现了战国时代的铁农具。以 1955 年河北石家庄市原赵国遗址发现的农具看，其中铁制的农具占各种质料的 60%，这说明铁制农具在当时农业生产中是占主导地位的。正因为铁制农具广泛使用，所以战国时代的农业才得以巨大发展。那时不仅有了铁农具，更重要的是还把家畜作为动力应用到了农业上。以家畜作引力、以铁质作铧尖的犁头，使大规模地深翻精耕土地成为可能，从而使农业生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人类对畜力的利用是很早的，起初总是利用畜力代步、载重、

拉车等等，然后才是把畜力运用到农业生产上拉犁翻地。考古发现表明，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便有了石犁，不过那时是靠人去拉的，不见得就用牲畜去拉。据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讲，后稷之孙叔均是我国“始作牛耕”的人，这我们可以看作传说，不必尽信。但是，当人们发明畜力车子后，一个农业民族就可能由这里得到启发，从而考虑把车子改作犁。犁和车子有着密切的关系。车辕和犁辕，是一致的；特别是我国古代的车子都是单辕，这点更与翻耕土地的犁有着天然的联系。把车辕后面带动的两个轮子换成犁尖，就成了起土翻地的农具了。这对古人来说，虽不一定一下子得到启发而发明出畜力拉的犁来，但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了解，是不难发明出畜拉犁的；又何况我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早就有了人拉的石犁呢。在古代，许多民族都是在发明了车子后，也随之发明了畜拉的犁。据外国史的材料看，古代的埃及人就是这样。在我国，相传夏仲造车，商的先人王亥服牛或作牛车，周人叔均“始作牛耕”，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透露出了这方面的消息。再证之考古材料，商代已确实有了马拉的车子，而用畜力拉犁耕地，虽没有直接的考古材料，但从上述种种迹象看，商代是可能开始有牛耕的。甲骨文中有“勿”字，像耒翻土，土粒着于刃上。晚期甲骨文中又有从牛从“勿”作“犁”形，像牛拉着耒翻耕土地。看来，我国牛耕的起源是比较早的，可能在春秋以前牛耕并不普遍，因为当时的奴隶劳动力非常贱，奴隶王可以利用廉价的奴隶劳动，加之奴隶主们迷信，把大量的牲畜，特别是牛，用作了祭祀鬼神的牺牲。


铁　　铁犁头

到春秋战国时代，牛耕逐渐普遍起来。晋国范中行氏子孙将耕于齐，以宗庙之牲用于农耕的事，就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实际历史情况。

由于当时人已用牛耕于农业，所以孔子弟子中出现有牛与耕相关的名字，如大家所熟悉的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等等。

到战国时，农业上使用牛耕就更为普遍了，这从考古学的成果可以得到说明。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南辉县、河北易县等地的战国墓葬中，发现过 V 字形的铁犁铧。以河南辉县出土的为例，它的重量约有 1 市斤，斜边长 17.9 厘米，夹角为 120°左右。有人以为这不大可能是牛耕用的犁铧。经过考古工作者和有关方面的反复研究与鉴定，它确实是当时牛耕用的铁犁铧。如果我们把这种形状的铁器再与考古工作者曾在甘肃古浪发现的汉代铁犁作一个比较，更不难看出，考古所得战国 V 形铁器定是牛耕用的铁铧。

在牛拉的铁犁发明和使用以前，翻地是靠人力，这就是所谓的“耦耕”，即二人相配合使用一种歧头的铲子来翻整土地。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翻耕土地的方法，自然不可能提高工效，也不可能深耕。有了牛耕，加上锐利的铁制犁具，就可以大大提高功效，并保证翻地的质量。再加上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铁农具，必然把当时的农业生产推进到精耕细作的阶段，从而使生产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农产品也可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到战国后期，据《吕氏春秋》讲，上等之田一人耕种即可供九个人食用，下等之田也可以一人耕种养活五口了；如果搞得好的话，还可以“一人治之（即一人耕种），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不仅一人耕种可养活十口，而且马、牛、羊、鸡、犬、豕这些家畜的饲料也有了。这是相当可观的生产水平了。我国已发现的古代最大粮仓，也是战国时期的。江西新干县就曾发现了四座战国大型粮仓，每座面积达 600 平方米左右，仓内尚保存着大量的粳米（已炭化）。新干县地处今江西省中部偏西，在战国时代属于楚国。《荀子·富国》篇说，战国时代一些地方已是一年两熟，在江南地方当是可信的。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农业生产确实是相当发达了。无怪乎，战国时代战争如此频繁，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战争，一些国家都还有大批粮食储存，有的可供几年，甚至上十年的军需，自然，这都是从劳动人民

那里搜刮去的。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生产水平和较高的产量，统治者又从哪里去搜刮那样多的粮食呢？

二、“正行通风”、“粪种”、“灭虫”

有了用畜力做动力的铁犁，只是搞好农业生产的第一步。接下去还必须播种和一系列的田间管理。

正确把握耕翻时节，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特别注意的。夏商以来，我国历法的进步情况充分说明了这点。从《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的有关文字来看，战国时代的人对于什么季节是什么天象，生物的生长变化情况如何，观察得很细致，掌握得比较清楚。《吕氏春秋·审时》一开始就说“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这意思就是强调种庄稼要适于时令，时令对农家来说就是宝贝。甚至还认为耕作的及时，比水、肥还重要。统治阶级虽然为了战争和享乐的需要，也不得不提出“不违农时”（《孟子·梁惠王》），以便保证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使农产品有可能满足国家的基本需要。

在播种的方法上，我国农民在数千年的农活实践中，虽然也逐渐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但在春秋战国以前，总的说还是比较粗放的。对于种植，一般只能把种子撒播在土里，或点播在土里，到收获季节便去收取了事。少数比较先进的农业区，可能已较早的注意到播种的行款、间隔和距离，注意到了作物的通风和光照等问题，像《诗经·齐风·南山》中写的那时种麻的情况，“艺麻如之何？横纵其亩”（种麻怎样种？横竖成行在田亩里），看来已注意到株距行款。但春秋及以前并不是普遍如此。从现有的史料看，这种比较先进的方法，主要还是在大河中下游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可是春秋以后，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这种为保证作物通风、吸收阳光、促进作物的健康成长的先进耕作方法，差不多已为当时农民所普遍重视，而且很讲究。如《吕氏春秋·辩土》所讲的：“茎生

于地者五分之以地（农作物的行宽间距约占一亩地的1/5）。茎生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衡（横）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意思是说，农作物的行距适当，互相就不会受影响，这样就长得快，长得好；行距适当，便于通风，使农作物能舒舒展展地生长发育，这样也就可以得到好的收成了。可见，战国时代的人，对于农作物种植的行款、株距是很注意的。

种子播下后，不等于收成就有了保证。为了确保有好收成，施肥、除草、灭虫等一系列田间管理是不能缺少的。对于这些农事活动，从有关史料看，春秋以前的农业生产者是很少进行的。以田间施肥来说，虽有学者认为商代就有农田施肥，可是直到春秋以前，都没有直接的记载。春秋以后，尤其是进入战国后，别的暂且不谈，单从先秦诸子的言谈话语之间，我们就可以知道，那时从政府官吏到农业生产者，都很注意积肥、造肥和庄稼的施肥。荀子讲：“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这是说，当时的士人把种庄稼施肥当作农民必须要做的一项重要农活。这反映了那时种庄稼施肥是很普遍的。

施肥是改良土壤、保持地力、促进农作物生长的一项重要措施。一年四季的时间不同，各种土质的不同，农作物的种类和生长阶段的不同，对肥料的要求也不相同。这方面的问题，战国时代的人已经很重视了。《周礼·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就告诉我们“草人”是掌管改良土壤，按照不同的土质播种适宜的庄稼的政府小官吏。紧接下去就讲，什么样的土质，该使用什么样的粪便作肥料，才能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这种做法，就是所谓的“粪种”。从前一些人根据郑康成（又叫郑玄，东汉人）等人的说法，以为是下种前用肥汁浸泡种子，以便促使种子更好地发芽成长。其实，从《周礼》所说的看，是指用不同粪肥改良土壤的事。原话是：“凡粪种：骍刚（骍，xīn，或作牸，赤色，骍刚，即赤色而坚硬的土质）用牛，赤缇（tǐ，赤缇，指浅于绛而深于红的土质）用羊，坟壤（指较润湿而肥的土质）用

麋（mí，鹿类动物），渴泽用鹿（干涸的沼泽土宜用鹿粪），咸潟（xī，即盐碱地）用貆（huán，动物名），……”一口气举了九种不同土质所宜使用的动物粪肥，我们这里就不全引了。很显然，所谓“粪种”并不是郑玄等人所说的用肥汁浸泡种子的事。《周礼》中讲的这些用现代的眼光去看虽不一定很科学，但它说明了施肥要根据不同的土质有所选择，这就是很了不起的。

为了保证对各种肥类的需求，当时已注意积造各种肥料。《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夏季纪》，都讲到了积肥造肥的问题，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到，大致当时除施用各种粪肥外，还比较普遍地盛行在夏天把野草割下来晒干烧成灰，或是浇上水使其腐烂沤成有机肥料。除此而外，还把油渣也用做肥料。战国时已经开辟了多种肥料的来源。这些积肥造肥的方法，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我国广大农民都还在使用。

这儿必须指出，我国农民对施肥的重视，若从商代起，要比西欧早3000年左右。若从战国时起，也要早一千三四百年左右。而西欧直到10—11世纪时，一些比较先进的庄园，才懂得施肥对于保持地力、增加产量的重要性。而我国，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对施肥已如此重视，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是不简单的，它是我国古代农民的伟大创造。

对于除草和治理病虫害，战国时代的农民也注意到了。

先说除草。春秋以前由于缺乏史料，情况我们还不大清楚，大致到春秋时是注意除草了。春秋以后，从有关记载看，已有一种专门用作除草的农具，当时人称为耨（即鎒）。《国语·齐语》有：“挟其抢、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据《吕氏春秋·辩土》讲，耨是一种用以间苗锄草的农具，全长为1尺（约合23厘米），宽约6寸（约合13.8厘米）。大概有如今天流行于山东半岛北部农民在谷子地里间苗锄草的小锄一样的农具。这种农具的使用，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已开始达到精耕细作的地步。

至于灭虫保苗，从《诗经》中有关的描述看，春秋时代的人

对害虫已有比较细致的观察了解。当时把吃苗心的害虫叫做“螟”，吃叶片的害虫叫做“螣”，吃根的虫叫做“蟊”，吃节的虫叫做“贼”。《春秋》一书中记载螟灾的更是不少。然而，如何消灭这些害虫呢？我们从文献上看到的，很多还是祈求神灵的保佑，希望“田祖”（土地神）驱杀这些害虫；希望太阳大大的，能把害虫晒死。这些只是迷信活动。到了战国时代，农民群众从生产实践中已得到了教训，靠求神是不行的，必须通过自己的双手把害虫消灭，才能保苗获丰收。所以《吕氏春秋·不屈》讲，战国时期的农民见了害虫不再光靠求神，而是“蝗螟，农夫得而杀之”了。这反映了战国时代在消灭病虫害，确保庄稼好收成方面已大大向前进了一步。

从以上这些，我们不难了解到，战国时代的农民对于农业生产，已有一套包括耕、种、管理的切实可行而又比较符合科学原理的措施，从而使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有了相当的保障。

三、由“凿井抱瓮”到“开渠筑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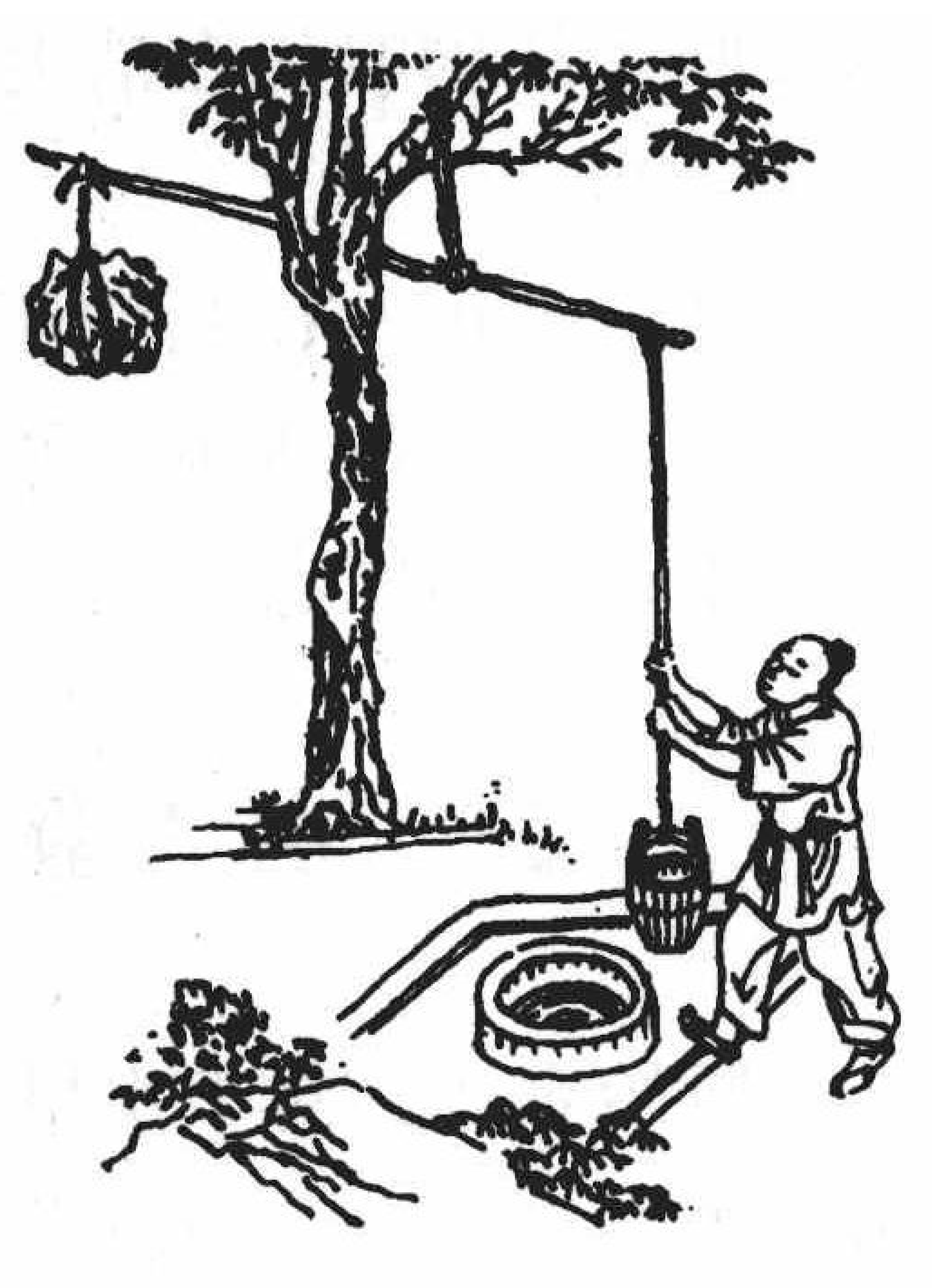
原始农业，对于水旱是无能为力的，收获的丰歉全凭自然的恩赐。所以只能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不要降下灾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然力和人类自身力量的认识深刻了，逐渐认识到：通过人的努力，可以改变自然。这便是战国时代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即人定胜天）的思想产生的基础。为了使农业能旱涝都有收成，不致完全听天由命，发展水利灌溉是非常重要的。是否有发达的人工水利灌溉事业，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方面。

我国人工水利灌溉的历史，传说的有夏禹“尽力乎沟洫”和汤命伊尹教民在地头凿井溉田，但那毕竟是传说。就可靠的史料来考察，春秋后期，中原各国的人工水利灌溉事业才算得上真正发展起来。

春秋以前，一些比较发达的农业区有井灌，其法比较原始，大

概是掘地为井，然后用陶罐把水打上来浇灌庄稼，当时人称作“凿井抱瓮而灌”。直到春秋后期，在晋国、郑国这样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诸侯王国内，才开始有所改变，出现了“桔槔”（jí gāo）灌溉的方法。

“桔槔”古时也称作“桥”，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汲水浇灌方法。它由两根直木组成，一根竖立河边或井边，一根用绳横挂在竖立的直木的顶上。横木上，一端系重物（大石块），一端系长绳，挂上水桶。它是利用杠杆原理来汲水的，汲水时，把长绳下拉，让水桶浸入水中，水满把绳一放，由于一端结着石块，水桶就升上来了。即所谓“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庄子·天运篇》）。从有关记载看，这种方法大概是春秋后期才有的。最先可能出现在中原部分地区。有两个故事可以看出这种灌溉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推广的过程。


桔槔

《庄子·天地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南游楚国返回晋国的途中，于汉水南岸某地，看见一个农夫用瓦罐子吃力地从井下打水上来浇地。子贡看见这种情况就向这位农夫建议，改用“桔槔”浇地。据说，这种“桔槔”是“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一天可灌百畦。为便于耕作管理，古时把田地分成若干区域，即分划成若干块；一畦就是田间的一区地，也即一块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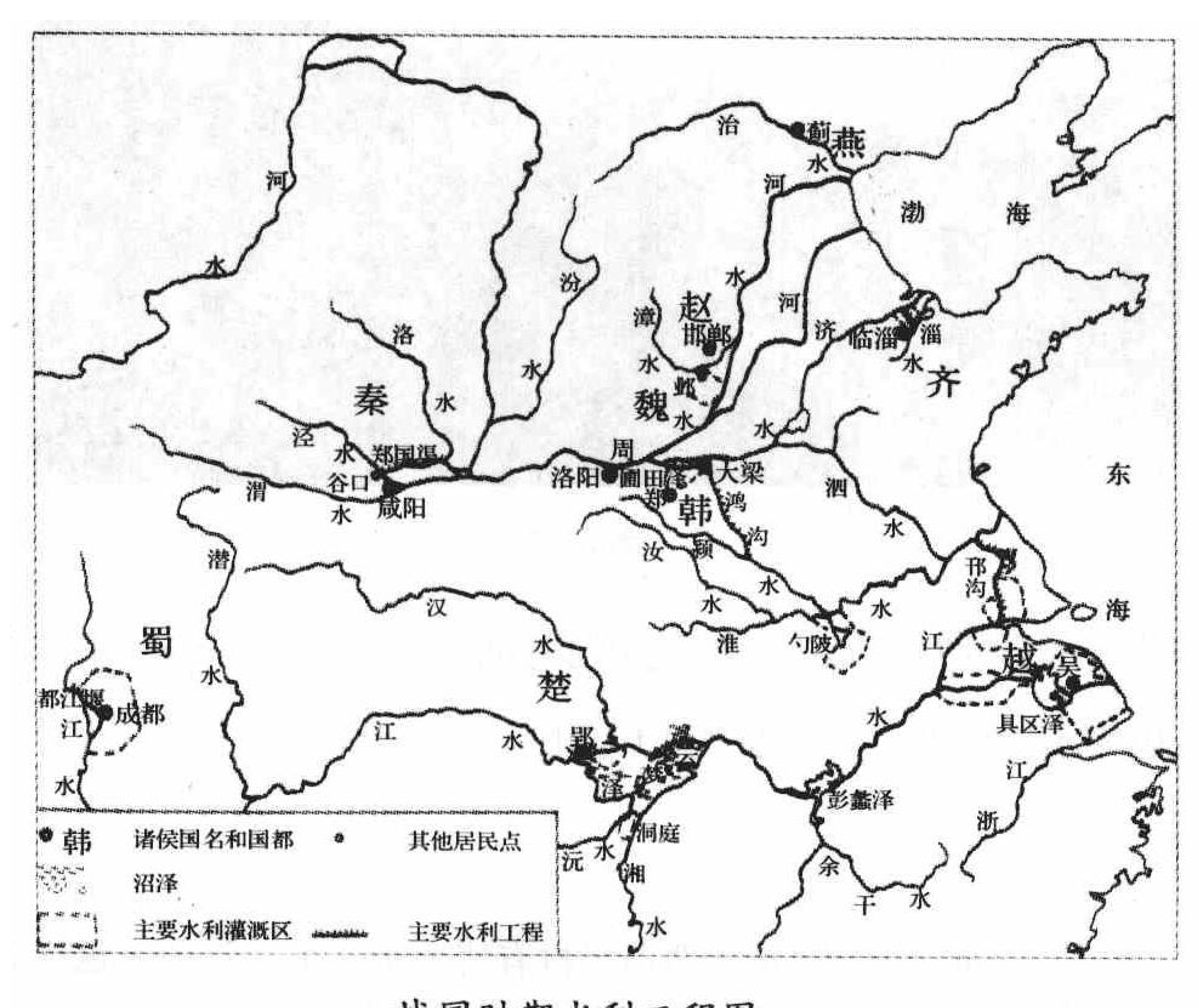
曾编辑《战国策》的刘向，收集古代轶闻琐事编纂过一本叫做《说苑》的书，书中也讲了一个有关使用“桔槔”的故事。说的是春秋后期郑国的邓析，在卫国曾看到5个农夫一天抱瓮而灌，只能灌一区之地。邓析劝这几位农夫改用“桥”，结果一天之内可以灌一百区之地而不感到劳累。这里的所谓“桥”，也就是“桔槔”。

这两个故事讲的都是春秋后期的事，说明当时正由落后的凿井抱瓮而灌，向比较先进的桔槔打水浇灌方式过渡。到了战国时代，这种既省力又可提高功效的简单机械灌溉办法，毋庸置疑是得到了广泛推广。

在春秋末至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也很重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战国初魏惠王的大臣白圭（名丹），不但善于商业经济，而且擅长水利，自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下》）。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荀卿也讲：“修堤渠，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耕耘，司空之事也。”（《荀子·王制》）这就是说，兴修水利是各国政府应该办的事。

大面积的水利工程的出现，是农业发展的要求。它本身就表明耕地面积的扩大。从有关文献看，这种大型水利的兴修，大致最先在楚国的江淮地区出现，因为这些地区农业比较发达。据记载，春秋时代，楚庄王（前613—前593）的令尹孙叔敖，曾开凿勺陂（今安徽省寿县南），这是我国淮水流域有名的水利工程，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水库工程。据说直到赵宋时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年久失修才淤积荒废的。

引漳灌邺工程，大致从魏惠王（前370—前335）时代西门豹开始，后来又经过魏襄王（惠王子，前334—前319）时的史起，才最后完成。西门豹任邺令时，破除旧的恶习，改革了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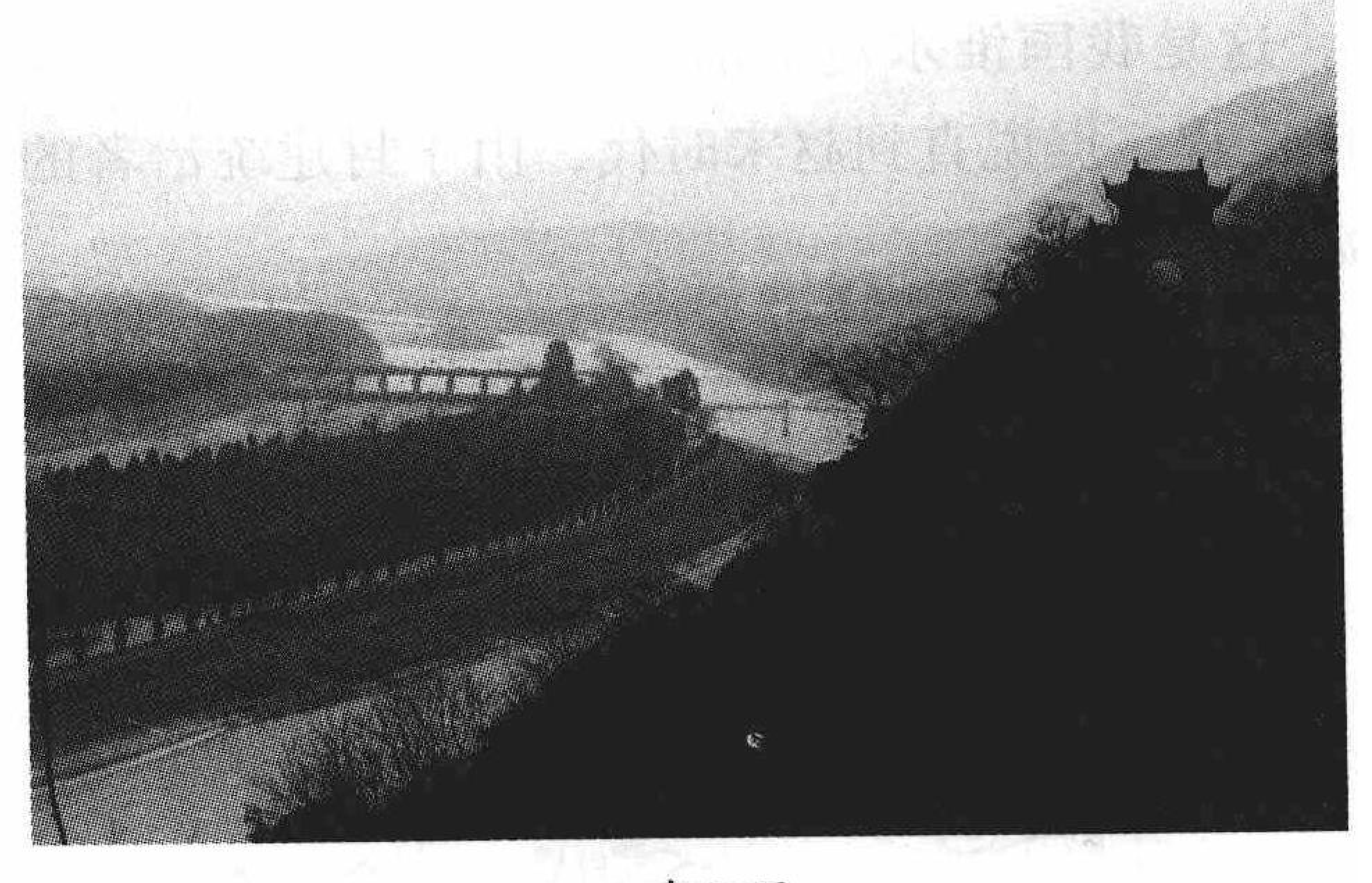


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图

政，发动群众兴修水利，为改变邺地的面貌打开了局面，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但从《吕氏春秋》、班固的《汉书》以及明代的碑文①等有关记载看，魏襄王时的史起，在完成引漳灌邺的最后工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渠道竣工后，人民群众曾歌颂道：

邺有贤令兮，为史公！
（邺地有位贤明的长官啊，叫史起！）
决漳水兮，灌邺旁；
（开凿漳水啊，灌溉邺地；）
千古写卤兮，生稻粱。
（改造千年来的盐碱地啊，使长稻粱。）

魏国的水利工程见于记载的还有鸿沟，历史上有时又称作“大沟”。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有关记载，这一工程大致是在梁惠王十年（前360）或三十一年（前339）间进行的。鸿沟据传就是后来楚（项羽）汉（刘邦）相争时，楚汉分界的那条河，即今天河南省中部的贾鲁河（因元代贾鲁领导修浚过此河而取名）。战国时魏在这条河上游某处修过水利，具体地点今已不能详知了。



都江堰

① 今河南安阳县曲沟西高平村有明万历二十二年的《邑侯苍门重修万金渠闸记》碑说：“邺旧有万金渠，实西门、史起二公遗迹在焉。”

除魏国外，要算秦国的都江堰和郑国渠最有名了。

在今四川灌县西北，岷江流经这里，由于山势陡峭，水流湍急，河水常把大量泥沙冲刷下来。岷江经这里后即进入平原地区，水势又忽然变得缓慢起来，于是大量泥沙就在今灌县一带河段沉积下来。长年累月，这段河床就升高了，这样就使平原地区常受水患的威胁。为了和水患作斗争，这里的劳动人民早在巴蜀并入秦以前，就开始了水利建设。巴蜀入秦建立蜀郡，秦昭王（前306—前251）以李冰为郡守。李冰是一位注重水利又重视劳动人民治水经验的人。他亲自察访岷江水势，然后制订出可行的治水方案。

据研究，李冰的办法是，先在今灌县城西北的江上修筑一条长堤，称作“百丈堤”，用以保护河岸免被湍急的江水冲坏；在“百丈堤”不远的江心修筑鱼嘴形堤坝，世称“都江鱼嘴”。鱼嘴下再修筑内外“金刚堤”，内外江各沿内外“金刚堤”而下流。在内江紧靠“金刚堤”处又修筑所谓“飞沙堰”，以便在江水上涨时，让多余的水越过此堤而流入外江，这样就可以免除内江流域地区的水患。内江这边，还在今灌县城西南方附近开凿“宝瓶口”，使内江水从此口而下，分出许多大小支渠流入今成都平原，形成一完整的水利自流灌溉系统。外江是岷江的正道，也同时开辟大小河道，组成航运和另外的灌溉系统。



李冰父子雕像

据记载，在秦时，江心还立有石人，用以测量水位；水枯竭时不过石人脚，涨时不没石人肩。到汉代，人们为了纪念李冰，把江中的石人刻成李冰的巨像。这就是1974年3月，整修都江堰工程时，发掘出的一尊高达2.9米的完好无损的李冰石像。像作袖手直立形，意态雍容，面目衣着均清晰犹存。石像上除刻有李冰的名字外，还可以得知这尊石像造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这是现存都江堰水利工程最早的文物。这一重要文物的发现，不仅表明从古以来，人民群众对李冰的尊敬，而且证明了在秦代江心立石人测水的记载是有根据的。

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免除了岷江对川西平原的危害，而且使之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造福于子孙后代。唐代诗人岑参，把李冰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圣人大禹相比，"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知"，认为其功胜过大禹。

秦国的另一大型水利工程是关中的郑国渠。郑国原是韩国的一位水利专家（"水工"）。韩国为了消耗秦的力量，使其无力东向扩张，于是在秦王政元年（前246）派郑国到秦游说，劝秦国凿一条运河引泾水东流入洛河，即从现今的陕西礼泉东北谷口（又叫瓠口）地方起，引泾水往东到今天的三原县北汇合浊水及石川河道，再引向东经过今富平、蒲城等而后导入洛水。1973年6月，有关方面曾实地调查测量，干渠长约126公里多。

郑国渠的干道，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它充分利用了自然的地形特点，把渠道开凿在高处。这样就可形成一套自流灌溉系统，最大限度地发挥渠道的作用，扩大灌溉面积。估计整个灌溉面积可达4万多顷，约合今天的120多万亩左右。

在修筑过程中，秦王发现了韩国的阴谋，要杀掉郑国。郑国说："起初我为韩国来故意消耗秦国力量，使秦无力东向，我只能为韩国延迟数年不受攻击，但渠修成后，对秦国却有万代之功。"秦王听了后就让他继续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渠成后，人们就称作"郑国渠"。

郑国渠的兴建，不只使关中地区战胜了干旱，而且改良了土壤。据古代地理研究，远古的关中地区本为通海湖泊，后来地壳变迁，湖水干涸成为内陆，但土带盐碱不利于农业生产。通过引河流水浇灌，起到了洗除盐碱的作用，达到了改良土壤的效果。从而使关中地区成为“无荒年”的“沃野”之地，亩产粟可达1钟（6斛4斗）的高水平。自然为秦最后统一六国，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四、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

春秋战国期间，农业生产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出现了对农业生产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的农学著作。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有一家叫“农家”。农家的代表人物除人们常讲的许行外，不少人是不见经传的无名学者。这些无名学者，在农业科学上的重大贡献在于把农业生产技术的零散知识系统化，上升到理论，写成专著留给后代，成为千古丰碑。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农家来源于农官。相传种植谷物的发明人是周人的祖先后稷，后稷做过夏朝的农官，所以农家多托于后稷。进入阶级社会后就有农官，这是可能的。我们看到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耤臣”、“小耤臣”一类农官活动的记载。但战国的农官，很大的可能是从那些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士人中发展起来的。当然，其中也有部分来自农官。据《汉书·艺文志》所著录，战国诸子中的农家，为提倡农业而假托神农的著作有《神农》20篇，《野老》17篇。这两部作品，班固可能亲眼见过，大概后来佚亡了，我们只能从《艺文志》中知道篇名。现今所能见到的农家作品，学者公认的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几篇专讲农业生产的专题论文。有人研究，这4篇农学著作，可能是采自《汉书·艺文志》所未著录的佚书《后稷农书》，而这部书可能是战国时代较早的作品。《吕氏春秋》采录时，大致吸收了战国时代农业生产的新

经验。因此，从这4篇农学著作中，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代农业发展的水平。

《上农》，这个标题就是重农的意思。它提出了重农的理论，着重阐明了农业与政治的重要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讲农业政策的问题。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农家重农的理论和战国时期法家的重农政策是一致的。这篇之后是《任地》、《辩土》、《审时》，是从技术上讲如何发展农业生产。

《任地》一开端就提出了十大问题。这些问题十分耐人寻味，它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国时代农业发展的水平，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农业知识也是一个测验。现将十大问题抄录于下：

“子能以窐为突乎?”（你能把洼地当作突起来的高地利用吗?）

“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你能把干燥的土地撇在一边，而让出湿润的土地来吗?）

“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你能使土地不含过多的盐碱，而用沟甽改变吗?）

“子能使〔吾土〕保湿安地而处乎?”（你能使土地内部保持湿润吗?）

“子能使雚（guàn）夷毋淫乎?”（你能使雚夷这种小的野草不蔓延为害农田吗?）

“子能使子之野尽为冷风乎?” （你能使庄稼做到通风良好吗?）

“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你能使庄稼不要长得细长，而要长得强壮吗?）

“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你能使穗长得大而结实均匀吗?）

“子能使粟圆而薄糠乎?”（你能使籽粒饱满而皮薄吗?）

“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你能使米粒长得有油性，吃起来有劲吗?）

这10个问题，从整理土地、利用和改良土壤一直讲到耕作保墒、除草通风，从而达到庄稼长势好，籽粒饱满收获多又好吃；实际上总结了精耕细作的十大要求。紧接下去又提出了五项辩证的耕作基本原则，即土壤的“柔”与“力”（粘和坚硬）、“息”与“劳”（休耕和连作）、“棘”与“肥”（贫瘠与肥沃）、“急”与“缓”（紧密和疏松）、“湿”和“燥”（湿润和干燥）。这五项是相互矛盾的，但又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人们通过辛勤耕耘，使之达到适宜而不过分，就能得到好的收成。

《辩土》篇，对上面《任地》篇中提出的问题做了具体的回答，主要讲使用土地，以人力改变土质的问题。首先对性质不同的土地要在耕作时间上有所不同；接着又讲了耕作不好而产生的三大弊害。作者把种得过稀、缺苗少株、杂草多比作“三盗”，因为那不能很好利用土地，不利于作物生长，影响产量，有如收到的粮食被盗窃了。对耕地、作畦畤，作物的行距，下种保墒等等一系列重要农活技术的原理都有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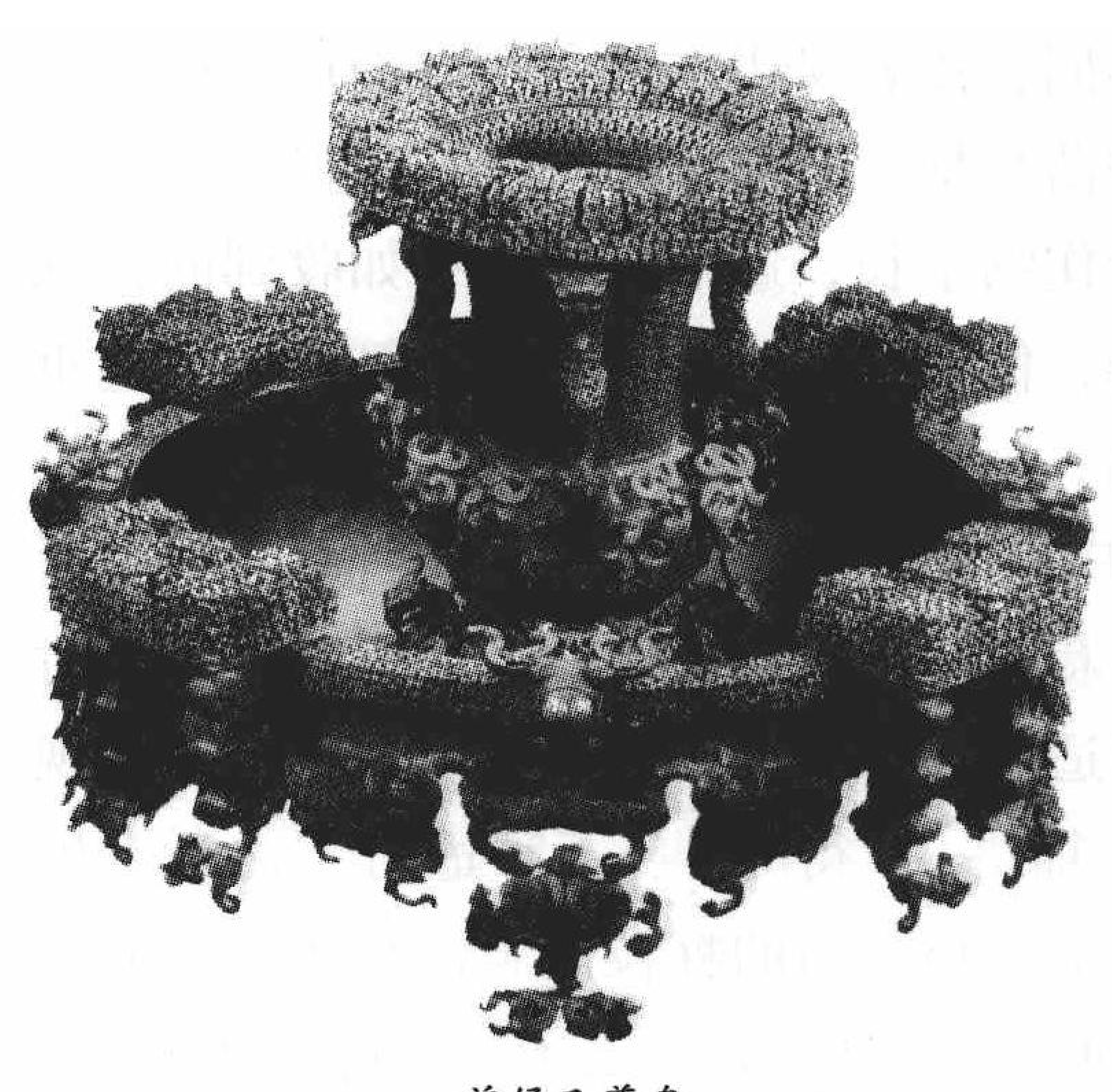
《审时》篇重点讲各种庄稼与时节的关系。文章列举了当时通常见到的禾、黍、稻、麻、菽、麦等主要农作物，一一论述耕作时节，把握得及时的好处，不适时的害处。比如说“禾”（即我们现在一般说的小米），《审时》篇讲，“得时”（下种适时）之禾，穗长得长而壮，禾秆长得坚实不疯长，结的籽粒饱满，吃起来有油性有劲好吃，味道纯正。“先时”（下种过早）之禾，茎叶长得细弱，整个穗短小光秃，籽粒不满，打出的米也不香。“后时”（下种晚）之禾，茎叶长得细弱，穗不大而且还不成熟就零落了，打下的籽粒不饱满而糠壳多。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对农作物的播种时节是相当讲究的。

对于其他作物，也都一一讲了“得时”、“先时”、“后时”的不同，对生长与收获的不同影响。用《审时》中的原话说就是“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约有减产的意思）。只有适时播种才有好的收获，否则便不会有好的收成。

由上不难看出，战国时代对主要农作物的栽培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了。

除了《吕氏春秋》中保存的这些关于农业科学的专题论文外，在先秦典籍中还可看到一些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专讲水、肥、土壤的一些零散著述。像《尚书》中的《禹贡》、《管子》中的《地员》，以及《周礼》中的某些章节，虽然这些文献中各篇的成书年代不见得是可靠的，但从有关文献所反映的情况看，当是春秋或战国（主要是战国）时代的实际情况。

在《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大概有人对全国的土质、肥力，适宜种植什么都作过一定的考察研究。《禹贡》列举了当时全国九大地区的土质、肥力和田赋的情况，分别不同情况划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比如说：冀州（主要在今河北省，还有山西、内蒙古、辽宁、河南的部分地区），土壤是白色的（厥土惟白壤），肥力是第五等（厥田惟中中），田赋是第一等间或至第二等（厥赋为上上错）。冀州，据《周礼·职方》讲，其地宜种植黍、稷。再比如兖州（主要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交界一带），土带黑色，并显得很松软（厥土黑愤），肥力属于第六等（厥田中下）；应收的赋税是第九级（厥赋贞，什三载乃同）。本来土肥应多收赋税，大概是因为这一带地处大河下游，常有水患，地广人稀，可能要13年后才能使土地复原而和其他州一样收取田赋（什三载乃同）。这


曾侯乙尊盘

一带地方宜于蚕桑和种植黍、稷、稻、麦。

上面举的这些，自然有些是过于理想化的，但是，我们从上述文献中讲的不少情况考察，还是和实际情况比较接近。这说明在战国时代，有人对全国土壤的整个面貌——从土质、色泽、肥力、水分以及适合种植哪些作物等等做过比较全面的研究分析。

如果我们把这些关于农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和差不多与之同时的古罗马农业和土壤学家伽图（Cato，前234—前149）等人的有关著作加以比较的话，我国学者（不少是当时的无名氏）的这些论述无疑要深刻得多，精辟得多！

五、农业劳动中的新生产关系

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春秋战国时代整个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分不开。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我们就先从农业劳动中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情况讲起吧。

《诗经·小雅·北山》有这样的诗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意思是说，普天之下的土地和臣民没有不属于周天子所有。诗句反映了春秋战国以前土地、民众与奴隶主之间的关系。周代奴隶主阶级内部分赃的办法是由周天子出面，将土地及其附着在土地上的劳动者，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将一定数量的土地赏赐给卿大夫等贵族。土地也有转手易主的时候，但不能买卖，而是由于政治权力变化的结果。掌握有土地的奴隶主，将土地划成若干豆腐干似的方块，这就是历史上所讲的“井田”。“井田”上的直接生产者是“庶人”。庶人的身份和地位，学术界多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庶人就是一种农业奴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有段铭文：“锡

（赐）汝邦司四百，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可以看出“庶人”地位是很低下的，他们可以被用来赏赐给下级奴隶主。这些人，平时聚居在村邑，农忙时被赶到田野去为主人耕种劳动。《汉书·食货志》对于这种情况有比较生动的描述，说：“春，令民毕出在野（春天农忙了把庶人赶到田野）；冬则毕入于邑”（冬天农闲季节把农民赶回聚居点），出入都有坐于邑门左右的“里胥”、“邻长”之类的奴隶主的代理人监视，到了田野里又有“田畯”直接监督指挥劳动生产。这种包括广大土地在内的邑，实际上就是一座奴隶制大庄园。农业劳动者世世代代被禁锢在这种“邑”中，没有迁徙的自由，至老死也不得出乡，这正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里所讲的“民不迁，农不移”，“农子之恒为农”。他们除了耕种土地外，还有各种劳役负担。这样的农业劳动者，连自身都是属于主人的，没有人身自由，过着牛马般的生活，显然与奴隶无别。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也就可想而知。

春秋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论语·季氏》中所说的那种“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各国统治者必须扩大财源和兵源，以适应这种频繁的战争所急需。于是在春秋后期出现了鲁国的“初税亩”（前594）；楚国的“量入修赋”（前548）；郑国的“作丘赋”（前538）。秦国也搞过“初租禾”（前408），到战国时又进一步实行“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奖励耕战，等等。各国统治者实行这些办法，目的都在于扩大财源和兵源。同时，也是统治者被迫承认土地私有为合法的一种反映。

另一方面，有的诸侯国家，为了扩大兵源，以适应战争的急需，还搞了“作爰田”、“作州兵”（晋国），楚国也在公元前548年行“量入修赋”的同时行“赋车籍马，赋甲兵徒卒，甲楯之数”。这些军制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战争的需要。

春秋至战国以前，打仗多用车，所以，说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如何，往往是说它拥有战车多少乘。比如“千乘之国”、“万乘之

国”。据《司马法》等古籍所讲，古时兵车1乘，有甲士3人，步卒72人。打仗时，甲士3人立于车上，1人居中驾车，2人左右执兵器以战；步卒随车前进。甲士都是由贵族出身的武士充任的，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也是战场上的基层指挥官。武士是贵族，住在国邑之内，所以有的地方也称作“国人”或“国士”。步卒是由前面讲过的那种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庶人”充任的。庶人从事农业生产，住在鄙野（国邑之外叫郊，郊外叫野），所以也被称为野人。由于春秋以来的战争频繁多变，步卒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主要的兵种。公元前541年晋国首先出现了所谓“毁车为卒”，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样一来，庶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增加，地位也更加重要。为了更充分发挥庶人的战斗力，晋国的赵鞅在作战前的誓师词中提出了：“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里的意思是说，假如作战有了功，庶人包括工商也都可以晋升而为士。到战国时代，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也都先后实行了奖励军功的政策。这样的结果，在春秋以来社会经济剧烈变化的基础上，使社会各阶层进一步发生变化。不仅一些士大夫变成了新兴的大土地所有者，庶人也有了上升晋级的机会；就是原来处在最下层的“人臣隶圉”，也可成为自由民了。社会上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地主、自耕农和雇农。

大土地占有者，战国时称为“豪民”。他们来源于旧贵族或因军功受赏的士以上的军功新贵族。他们有的从国君那里直接得到赏赐的土地，也有用赏赐的金、帛、货币买进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讲的赵括，就曾用赵王赏赐给他的金、帛、货币“日视便利田宅而买之”。另外，也有因经商致富而购买田宅变为豪民的。这些“豪民”，都占有大量土地，他们除采用旧式的奴隶制剥削外，主要是把土地出租给没有或缺少土地的农民耕种，向他们收取“太半之赋”，这些农民成了《食货志》中所讲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佃农”。大土地所有者“豪民”也不把土地租

出，而采取雇请“庸客”为自己耕种土地，即后世所谓的“长工”、“短工”之类。

战国时代的自耕农，有的是旧有贵族下降来的士人，有的则是庶人上升来的。《韩非子·外储说》讲的中牟之人，见到学文有利，纷纷卖掉自己的“宅圃”去学文。这种有“宅圃”的人家，显然就是一种自耕农民。像李悝讲的那种一夫百亩之家者，当是指普通的小自耕农。从《汉书·食货志》所记李悝讲的情况看，他们没有向“豪民”交纳租税，而只向国家交纳“什一之税”。自耕小农是农民中很不稳定的一个阶层，虽然他们“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管子·乘马》），但是，当他们因统治者繁重的赋税力役或天灾人祸而生活不下去时，只好把自己的小块土地出卖或抵押给高利贷者，去耕种“豪民”之田，成为佃农或雇农。小自耕农，到战国时代，当为数不少，所以李悝才举作代表。

雇农，战国时叫做“庸客”。他们一部分是上面那种自耕小农破产后转变来的，另一部分是因军功而免去奴隶身份的“人臣隶圉”之类。他们在战争中立有军功，人身得到了解放，可以自由迁徙。但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只好靠出卖自己的劳力，忍受沉重的压迫剥削。

自耕农、佃农、庸客这些农业劳动者，是战国时代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他们比起从前禁锢在村邑里为贵族们种地的“庶民”来，身份已经改变了，人身是自由的，劳动积极性也要高些。正如《墨子·非命》所说的那样：“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特别是自耕农，他们有了一块可以自己支配的土地，自然劳动热情更高。从李悝讲的情况估计，战国时代的自耕农可能比较普遍。而占有大量土地的“豪民”们也认识到，如果再用旧的方法剥削劳动者，已经得不到多少好处，还不如改变过去的方式，把土地分佃给无地的劳动者，或者出报酬雇请“庸客”来耕种获利多。正如《吕氏春秋·审分》所讲：“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

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这说明那时剥削阶级已经认识到了，如果他们仍然照旧的方式进行剥削，农民就不愿出力，只有把土地分租给无地者耕种，收取租税，才会使劳动者肯出力，干得好。如果是让有人身自由的“庸客”来耕种，他们也设法用物质刺激的方法诱使劳动者发挥出更大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庸客”有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他们在生产中可以“量酬付劳”，报酬高就多干，不高则少出力或不干，不再像从前处于奴隶地位那样非干不可。所以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只好被迫出高酬雇请。这就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讲的“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钱易者”的情况。主人这样做的目的，是“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不是爱护雇佣者，只有这样，雇佣者才会耕耘得又快又好）。由此，我们既看到土地占有者如何设法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看到了劳动者地位变化后的劳动概况。春秋以来至于战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新的生产关系又反过来推动生产力更加发展了。

第三章　手工业的进步

一、从《周礼·冬官》说起

《周礼》一书原名《周官》，也叫《周官经》。成书的年代大致在春秋战国间，本来是一部讲述周代官制的书。旧说是周公所作，我们认为它有可能是儒家根据西周春秋时代的有关材料，加以整理而成的。从其所讲官制的整齐完备来看，其中有不少理想成分。全书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6篇。这6篇中的《冬官》和全书内容很不协调，别的都讲官制，它却讲的是手工业生产的情况，这就是《考工记》。《周官》中原本没有这篇，汉代河间献王（汉景帝之子，封为河间王，死后谥号献）从民间收集到《周官》后，因看到书中缺少《冬官》一篇，于是就把另外收到的《考工记》放进去作为替补。从此，这篇专讲手工业生产的宝贵文献挤进了儒家经典的行列，并为历代经学大师们所重视，不少学者为它作注释疏证，或据以研究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情况。也正因为它有这样偶然的命运，所以能得到传播，一直保存到今天。

据研究，《考工记》这篇文献，大概是春秋战国间的知识分子（士人），依据当时齐国手工业工匠们的生产实践经验，经过许多人不断加工整理成文的，并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有可能是齐国人，因之所记述的主要是那时齐国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生产的情况。它比较详细真实地记述了手工业生产内部的分工、主要产品的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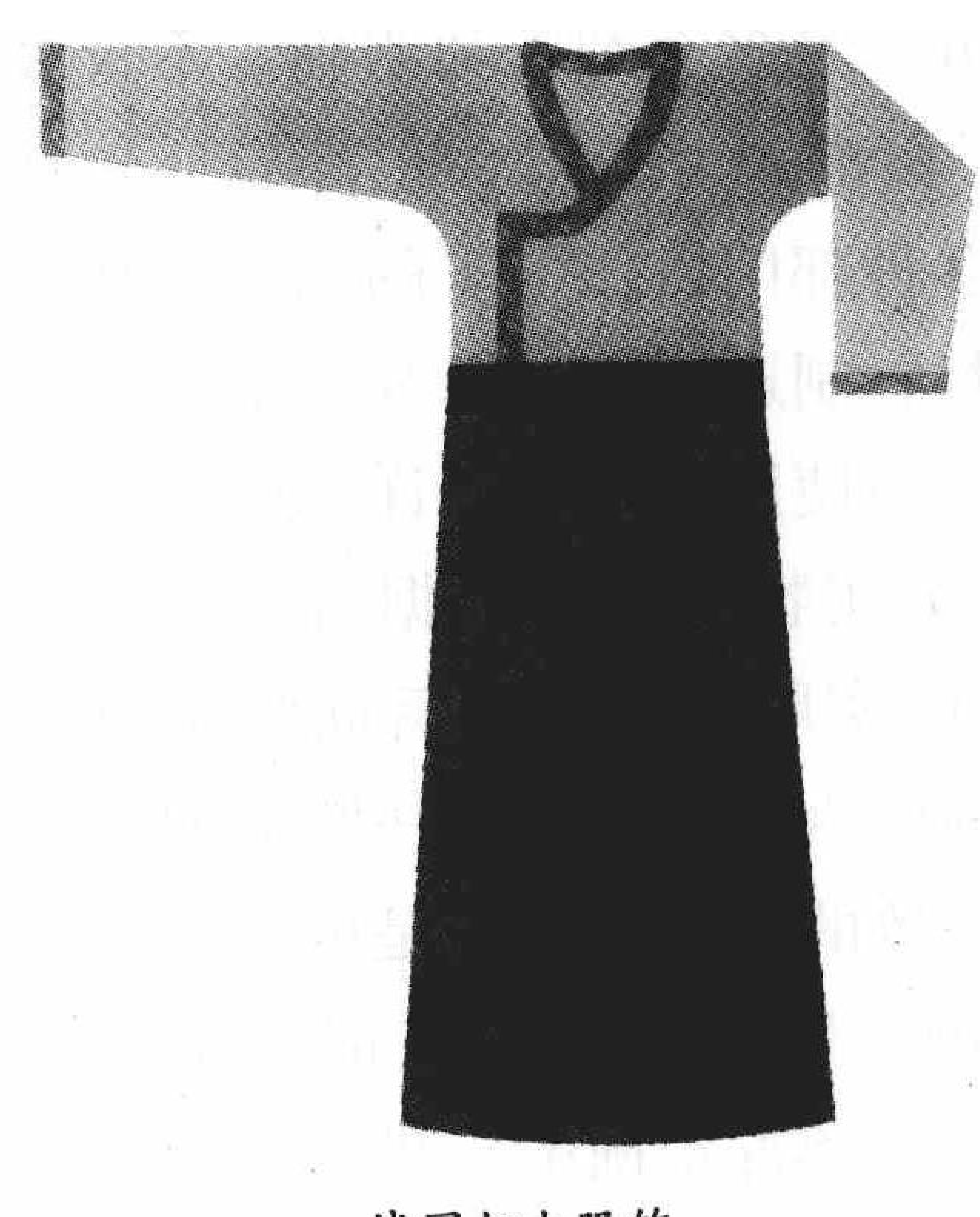
制造的规格标准，以及成品的检验等情况。这些也是所有手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因而，这篇文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我们研究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手工业生产情况所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

《考工记》使我们看到，当时的手工业生产的部门已经比较繁复，分工也比较细密。就文中所讲的木工、金属工、皮革工、上色工、刮磨工、陶工等来看，每种又分为若干部。比如，“攻木之工”分为七部，“攻金之工”分为六部，“攻皮之工”分为五部，“设色”（即上色）、“刮磨”都分为五部，“抟埴之工”（即陶工）分为二部。而每一部又都有特定的名称和范围。以“攻木之工”为例，它包括了“轮、舆、弓、庐、匠、车、梓”七部。“轮”即“轮人”，主造车轮和车盖；“舆”又叫“舆人”，专管造车舆（即车床）；“弓”又称“弓人”，是专门主造兵器弯弓的；“庐”也称“庐人”，负责制造兵器的把柄；“匠”即“匠人”，除主管营造宫室城郭外，还管制造农具；“车”就是主造各种车辆的，也管制造农具；“梓”，也叫“梓人”，主要制造木质饮食用具和乐器的架座之类。由这些不难看出，其内部的分工是多么细密和明确。不仅如此，《考工记》对所造器物的要求、标准尺寸等等，也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像当时比较复杂、需要多种部门协作的车的制造，从不同用途的车子的规格要求、选材用料、制造原理，以及每个零件的制造工艺到一辆车整个的完成、检验与使用等，都有详细论述。根据近代考古所得的春秋战国时代有关实物的实测数据看，《考工记》中所讲的有关标准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后面将论及的关于青铜合金的不同比例，以及刀削的六枚合起来成一圆形的器物等等记载，与出土实物的实测都是一致的，可见所记是可靠的。

春秋战国时代的手工业生产情况，除了在《考工记》中有比较集中的反映外，在其他文献以及近代考古发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各种手工业生产，确实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花色品种、质量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从采矿冶炼等大型手工业生产到与人民日常生活极为密切的日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如

煮盐、纺织、日用竹木漆器等等，都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达景象。有关矿冶方面的问题下面将有专门介绍，这里主要讲煮盐、纺织、竹木、漆器等和人民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手工业生产情况。

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据学者研究，人类嗜盐是从猿人就开始的。历史考古学者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天然产盐地有着重要的关系。但人类什么时候开始食盐生产，却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们看到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有很发达的盐业生产，并且分为海盐、池盐和井盐。据《华阳国志》（晋常璩撰）记，大约从李冰做蜀守时，四川就开始有了井盐。主要海盐产地在东部沿海地区，池盐产地在西北地区。《管子》一书中所讲的“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这辽东之煮指的就是煮盐。宋人王应麟在《玉海》中曾说，“碣石在海旁，雁门有盐泽，故云‘碣石、雁门之饶’。”碣石在渤海边上，雁门在西北。这些说明了当时的主要盐产地是东部沿海和西北地区。魏国的河东地区，也是当时盛产池盐的地方。又据《战国策·齐策》记载，张仪为秦国连横说服了齐国，于是齐王“献鱼盐之地300里于秦”。这“鱼盐之地”，具体所指尚难考定，但它却说明了当时齐国确实是盛产盐的重要地区。那时还有专门贩运食盐的商贾，把盐从产地运销到其他不出产食盐的地方去。


战国妇女服饰

纺织业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有了丝麻纺织。从文献上可知，战国时代在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丝织业很发达，形成了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纺织品。比如，兖州出一种染色的丝织品叫做“织文”；青州出产的柞蚕丝织品叫做“檿（yǎn）丝”；徐州出一种黑

而细的“玄纤缟”；扬州的染色丝织品称为“织贝”；荆州有一种黑黄赤色的丝织品叫“玄纁”；豫州出一种细的丝绵絮称为“纤纩”（《尚书·禹贡》）。有的纺织品更是闻名海内，誉满天下。齐鲁之地史称“冠带衣履天下”，意思是说各国人身上穿戴的都有齐鲁地方出产的纺织品。这里的产品，畅销各地，工艺水平高，所以有“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一说，说明鲁地生产的素白细丝织物是非常轻薄精细，但又是很结实耐用。当然，精细的丝麻织品是一般人穿不起的，特别是名贵的丝织品，主要是统治阶级以及富豪人家才能享用，普通人都是用粗麻织品。但是，这时不管是丝或是麻织物，都已普遍地染成五颜六色，织成五彩缤纷的布帛了，花色品种比从前丰富多彩。

竹木漆器等手工业品的生产，战国时代更是普遍发展起来。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铁器工具已被广泛使用到手工业生产的各个部门。铁工具是一种其坚固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因而它为手工业的飞跃发展，尤其是需要使用金属工具的竹、木、漆器手工业部门的飞跃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由于使用了铁器工具，我们看到考古发现的竹席、竹笥（sī）、木案木箱、木棺椁等远比春秋时代精致美观，结构更加严实耐用。

这里要特别讲讲战国时代的漆器手工业生产。漆器是我国劳动人民的重大发明和创造。它的历史，大致和纺织品一样悠久。相传早在尧、舜、禹之时，已开始用做食具和祭器。距今约六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就出土过生漆制品。商到西周春秋，实物出土更多。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出过无数的精美漆器，特别是在南方的战国墓葬中，近30年来，发现了不少保存完好、色泽如新的漆制品，其中有当时的兵器（如盾牌、戈、矛、戟的把柄、刀剑的鞘壳），日用杂品如杯、盘、奁、盒，以及乐器和士大夫们的棺椁等等。这些物件的表面都施有各色彩漆，描绘有细腻的人物、鸟兽等花纹。这些实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漆器颜色种类非常齐全，而且，从它繁复细致的彩绘中，了解到战国时代对于油漆工艺的重大改进和创

新。据有关方面研究判断，当时的人已经采用桐油作稀释剂。桐油是我国特产的一种桐树果实榨出的干性植物油，直到近现代都还使用它作为漆料的稀释剂和配料。将桐油掺进漆料中可以改善漆液的性能，从而调配成更多更便于描绘细致图案花纹的彩色漆料。

在漆器的胎质方面，战国时代也有所创新和发展。当时已能根据不同器物和特点创造出不同的胎质。除一般的木质施漆外，有的还采用了薄木加裱麻布，还有皮的、夹纻的，然后在表面上漆和绘制各种美丽的图案。这样一来，不仅外表美观，而且更加结实、坚固耐用，虽然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有的出土后仍然和新的一般。

除上举这些外，在玉石雕刻、金银骨器的加工制造，以及酿酒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生产和工艺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古矿井的再现与青铜手工业

有关战国时代的矿业开采情况，文献记载非常贫乏。《禹贡》、《管子》、《山海经》等古籍中虽有关于矿藏方面的分布、勘测的零星记载，但也非常简略。我们要真正了解当时的矿业开采实况，这些书面上的记录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利用考古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到古代的采矿实况和技术水平。

春秋战国时代的采矿遗迹，近年来陆续有所发现，其中以湖北大冶铜绿山和湖南麻阳发现的战国铜矿遗址最有名。铜绿山古矿遗迹，1965年就有所发现。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探测和发掘。湖南麻阳古矿遗址是1979年发现的，1982年考古工作者进行了调查、清理，先后发现古矿井有14处，但是分布面积不如铜绿山大，遗物也不如铜绿山丰富。因此，我们以湖北铜绿山为例来看战国时代的矿业开采情况。

铜绿山古遗址面积相当广，南北长约2公里，宽约1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发现了当时的矿井支架、坑道，出土了不少采矿用具。

同时还发现了大小炼炉数座和十多块饼状的铜锭，不少地方堆积着古代的大量矿渣，有的约数米厚，估计约有 40 万吨左右。根据这 40 万吨的炼渣计算，当时提炼出来的铜当在万吨以上。如果用来铸造青铜生产工具和武器，平均每件以 2 公斤计算，即可制造 500 万件。根据当时人口推算，则可为全国每家铸造一件青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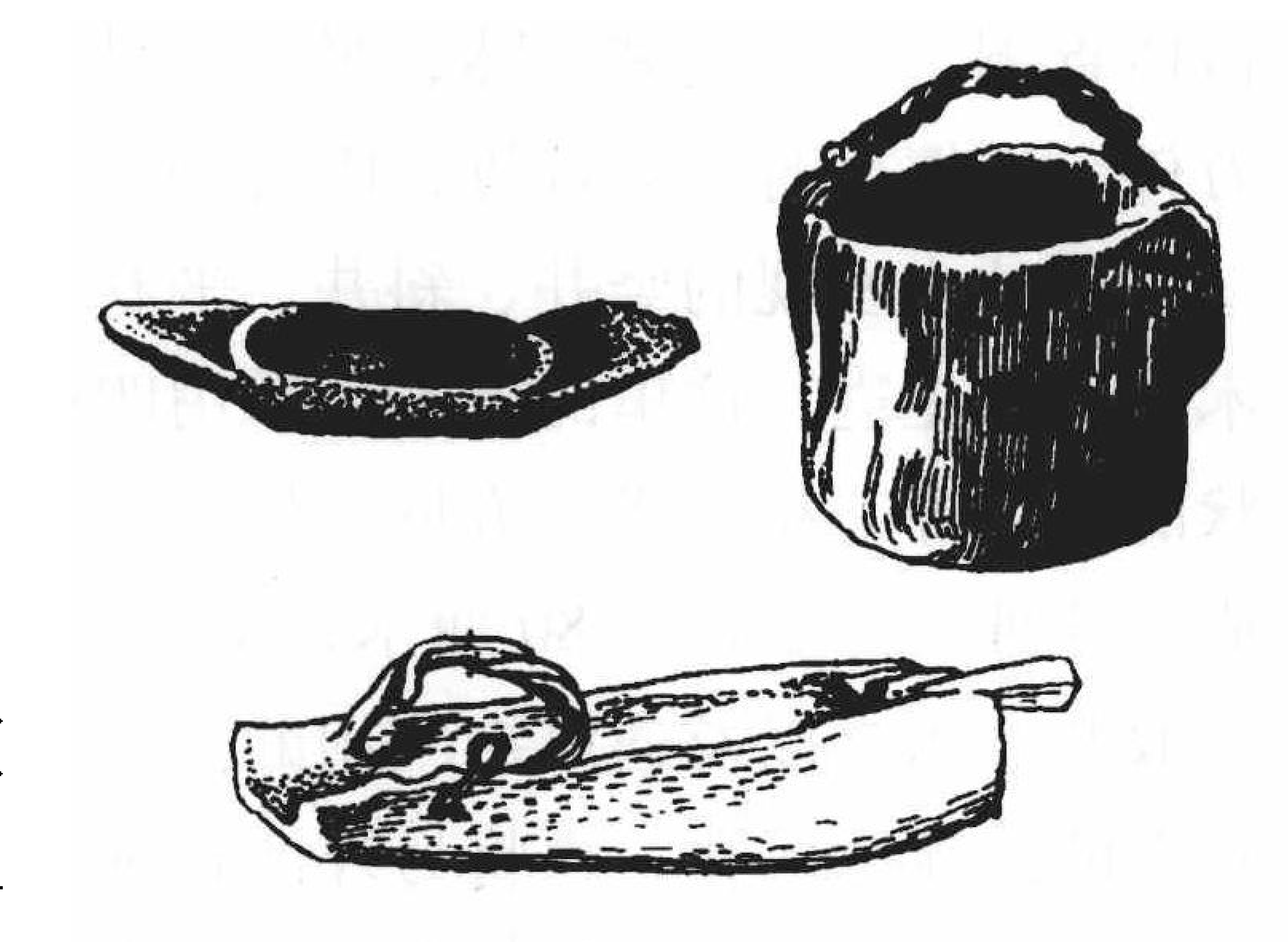
遗址中发现的竖井、斜井、平巷、斜巷等表明，当时的采矿技术已非常先进。这里的竖井，采用四根圆木，每根的两端砍成台阶状的搭口榫，相互搭成方框支架，然后用这种无数方框层层迭压构成。这种竖井直径约 80 厘米，主要是供采矿工人上下和运取矿石、提取井下积水以及通风换气用的。斜井也用圆木构成，它是把两根圆木的两端凿成孔，再将另外两根圆木的两端劈成榫头，穿接成一个方框；然后用这些方框若干，沿着矿层的倾斜走向，由浅入深，节节伸延到需要的位置。在这些框形支架外面——左右和上方，又用小树棍排成一片，以便防止矿井坍塌。从这种结构来看，当时已经很好地解决了井下的支护问题。

发掘的情况还告诉我们：当时已经把矿井挖掘到了地下 50 多米深的地方，而且初步解决了井下的通风、排水、提升、照明等复杂技术问题。在通风方面，当时的矿工们已知道利用井口内外自然形成的不同气压，封闭已经废弃的巷道，使空气沿着采掘方向前进。这样就可以在没有鼓风设备给井下送风的情况下，也能使空气到达工作地方，从而保证采掘工人对空气的需要。从发掘的坑道和辘轳看，当时对地下水的排除方法是，将水先引到积水坑，然后通过竖井，用辘轳把水提上地面。

在这儿还发现了不少当时遗留下来的采矿工具和生活用具。已发现的采掘工具有铜斧、铜锄、木锤、筐篓、木铲等等，属于战国中后期的工具有铁斧、铁锤、铁耙、铁锄等，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船形“木斗”。生活用具主要是简陋的陶制饮食用具。从上面这些主要遗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采矿工人是箪食瓢饮，粗菜淡饭。矿工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将土和矿石一点一点地用锄和铲挖

下来；遇到坚硬的岩层和矿石，又用斧、凿一点点地劈砍敲打成碎块，然后再一铲一铲地装进筐中运到竖井下，用辘轳提出矿井。不难想象，当时矿工们的劳动强度该是多大！

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那个独特的船形“木斗”。它是用一大块整木挖凿成的。其形似船，全长约36.2厘米、宽14厘米、高7厘米，中间挖凿有深3厘米、长20厘米、宽12.5厘米的“舱”，两头伸出成平板状。这件东西是作什么用的呢？后世民间掏沙金时，有一种“掏金斗”，为了把金子从泥沙中提选出来，就把含金泥沙装在木斗中入水淘洗。金的比重较泥沙重，在淘洗过程中泥沙被水冲走，金粒就沉积下来了。大冶铜绿山古矿井中出土的这只船形木斗，看来也是有这作用的。为了选择矿砂的品位，确定采掘的具体方向和地点，在采掘到一定时候，就将矿砂装进这种船形木斗中用水淘洗，比重大的金属矿砂积沉在“船舱”中。类似于今天的“重力选矿法”。这样就可以确定矿的品位，便于采取“舍贫矿，取富矿”的办法进行采掘。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发现的采掘工具
船形木斗、木桶、木撮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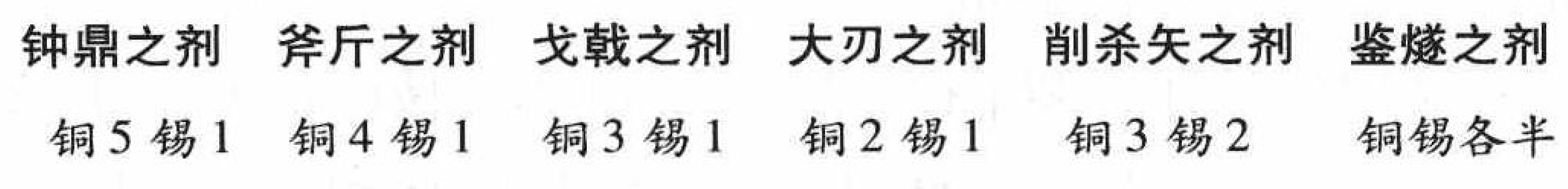
我们从冶炼遗物铜块、炼渣等，还可以得知，这处古矿井是开采铜矿的。目前尚未发现春秋战国时代铁矿的开采遗址。就战国时代铁器的普及看，一定还有铁矿开采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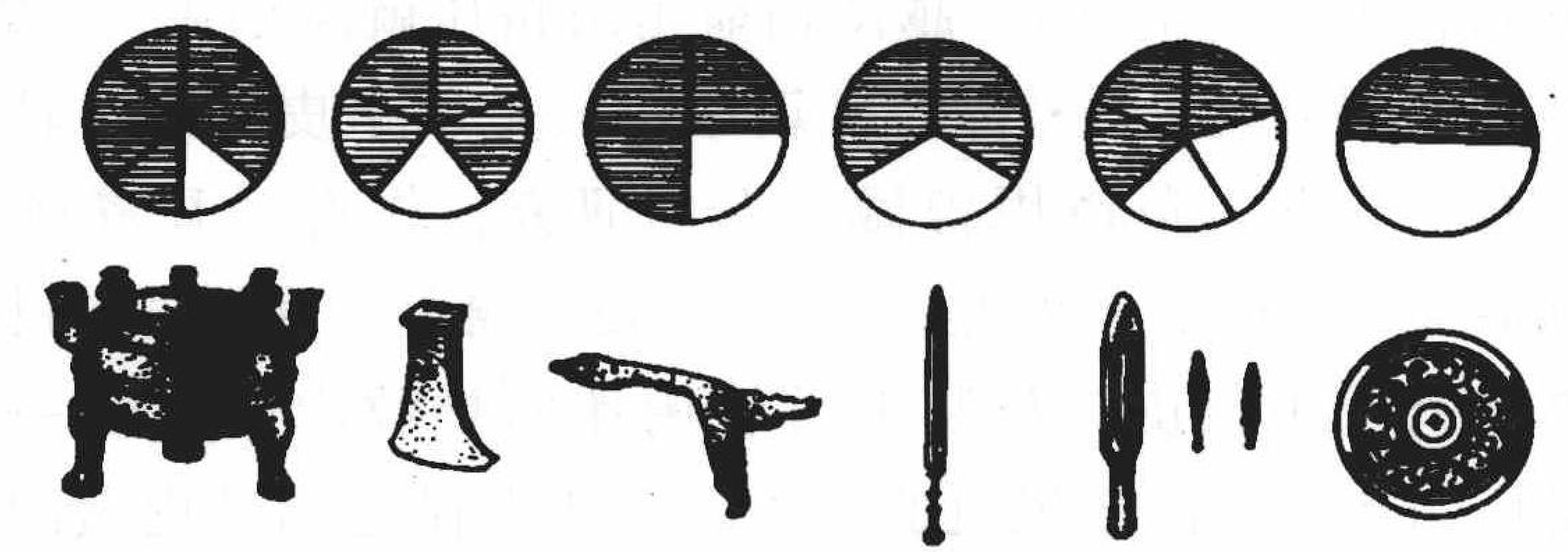
铜绿山遗址的大小炼炉和铜块还告诉我们，这儿是就地开采就地冶炼的。在矿山附近先炼出粗铜，然后将粗铜再运到手工业作坊进行加工，由铜器作坊根据所铸器物的不同需要，按一定铜锡比例炼成青铜，铸造成各种器物。

我国的青铜铸造业，商代就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当时的青铜器，

铜质优良，造型优美，花纹极为精细工巧，这是见过商周青铜器的人都知道的，由此不难想见那时的冶铸技术和工艺水平。但有关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使我们知道，战国时代已进入铁器时代，青铜一般都只铸造礼器和兵器；就是礼器也有铜与铁的混合结构品，如出土的战国鼎，就有铁脚的鼎。这说明铁在当时是确实已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青铜的冶铸并没有因此荒废，而是继承和发扬了商周以来的优良传统。在前人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已经大大向前推进，虽然作为青铜时代它是尾声了，但科学技术和工艺水平却达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用当时的话说是："范型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则莫邪也。"从而也就为铁器的大规模发展准备了技术条件。

春秋战国时代对青铜的取材、配料等，都已经有了相当精密的分析记录，总结归纳出了一套科学的理论。不少论述用今天的科学方法去验证，也是符合科学道理的。有关情况在《周礼·考工记》中反映得特别清楚。比如，各种青铜器中铜与锡的比例问题就有这样的记录："金有六齐（金即铜，在化学上称铜锡合金为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就是说，各种不同用途的青铜器，铜与锡的比例是各不相同的。据近人实验研究，上面的这种比例是十分科学的。





"金六剂"示意图（配制青铜的六种方剂）

在冶炼熔铸过程中，对不同火候的辨认与掌握，当时也有了精细的记录。如说，“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

上面的种种情况告诉我们：青铜器在战国时代虽然已是尾声，但对于青铜的冶铸技术，从科学的角度去考察，确实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橐籥”与铁的冶铸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社会经济飞跃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铁器的应用和普及，它是当时社会生产力中的新因素之一。铁器取代青铜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虽然两者都是金属，也都要经过采矿和冶炼，但要求的技术水平却不一样。青铜冶铸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之前，是不可能有铁的冶铸出现的。青铜的熔点低，铁的熔点远比它高。怎样才能在传统的青铜冶铸技术上，创造出冶铸铁器的条件呢？我们得从提高冶炼温度的鼓风设备讲起。

道家的祖师爷老子，是春秋时代一位富有想象力又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大思想家。他曾把望不尽、摸不着、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及其运动，形象地比作“橐籥（tuó yuè）”。原话是：“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意思是说，天地间之空阔，不是像个大的“橐籥”么？胀鼓鼓的好像什么也没有，你压它感到有东西（空气），越使劲地用力挤压就越出来。“橐籥”是什么东西呢。《墨子·备穴》篇中讲，是用牛皮做的，具体构造却没有讲。清人黄以周曾做过专门研究，作有《释橐籥》一文。橐籥又叫排橐，橐就是一个大口袋；籥是一种吹气的竹管。所谓橐籥就是用大皮口袋装上竹管用作向炉膛内鼓风的一种设备，是风箱和今天的鼓风机的祖先。汉代人说是用马皮做的，其实牛皮、马皮都可以。我们从汉代画像石中的鼓风图看，很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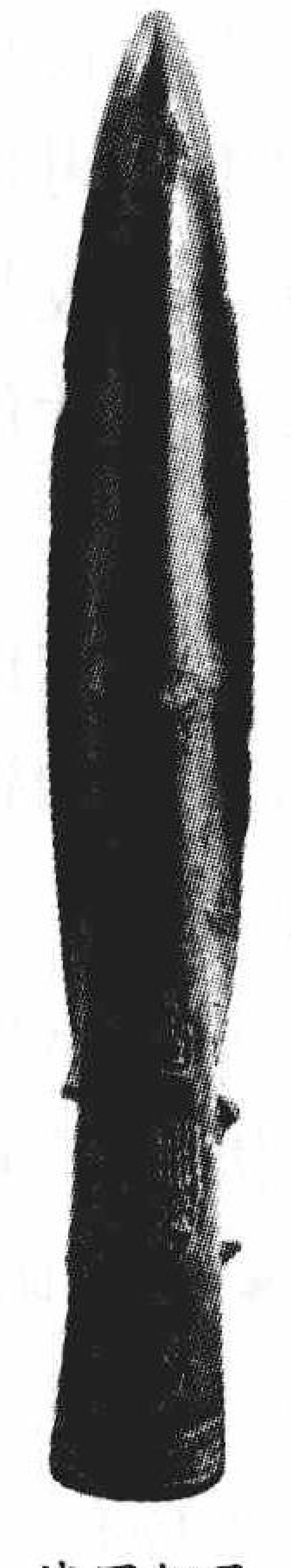
具马皮。皮口袋做好后，在旁边安装上管子通到炉中。当用力压迫皮口袋时，里面的空气就沿着管子通到炉膛内，促使炉中炭火充分燃烧，炉温升高。为了有效地提高炉温，往往一个大的炼炉不止一个橐，而同时有几个。据《墨子》书中所讲，当时有的已使用四个橐同时往炉膛内送风。老子用“橐籥”比作大而运动的宇宙空间，说明春秋战国时代冶炼过程中已经普遍使用橐籥鼓风了。

据《吴越春秋》讲，吴王阖闾造“干将”、“莫邪”之剑，曾用300童男童女“鼓橐装炭”熔化“金铁”。金指青铜。这个传说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冶炼规模之大，也说明当时的炼炉不仅可以冶铸青铜，还可以用来冶铸铁。特别是橐籥广泛用于冶炼，不仅提高了铜的冶铸工效，更重要的是，炉温升高后，使得要求高温才能熔炼的新金属——铁的普遍冶炼有了可能。

从考古发现的商代铁刃铜钺看，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对铁的认识是比较早的，但那时并不知道铁的冶炼，虽然那时的青铜冶铸水平已相当高。我国对铁的冶炼，看来还是春秋时代才开始的。考古中曾发现从商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冶铜遗址中，铜矿与赤铁矿常常相伴出现，在炼铜渣中，发现氧化铁的含量很高，据分析有的达40%。前面讲的湖北铜绿山古矿井遗址，是今天的一处露天铁矿，虽然发现的是铜矿遗址，也正好说明铜与铁确实相伴而存。文献中也透露出铜与铁的伴生情况，比如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就多次提及。这样，在原料上就有了炼铁的可能。但铁的熔点比青铜高，而橐籥的使用，提高温度的可能也实现了。

我们从有关材料考察，上述铁器出现的前提条件的具备，大致是在春秋中期以前。所以春秋中期以后的材料中我们见到很多关于铁的记载。《诗经·秦风》有《驷驖》一诗，据说是东周初年的，诗中已用铁来形容马的颜色（马的颜色如铁故名驖，有的本子也直接写作铁）。《国语·齐语》又提到“恶金”铸造农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记有晋赵鞅“赋一鼓铁，以铸刑鼎”，把

范宣子的刑书刻铸在上面。[1]《越绝书》虽然是一部晚出的书，但里面所讲的某些佚闻轶事，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这书的卷十一记载了楚惠王（前488—前432）要越国的干将、欧冶子造铁剑的事，曾说，黄帝以石器作兵，禹开始以铜作兵，当时（春秋末）是以铁作兵。《越绝书》说的不同时代使用不同质的兵器的情况，和考古学上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所有这些材料，虽然有人持怀疑态度，但我们认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出春秋时代确实出现了冶铁的事实。考古资料也证明，春秋后期确实有了铁制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楚墓发现铁器起，60年代又在江苏六合发现过春秋晚期吴国墓中的铁器，70年代更在长沙发现了春秋后期楚国的钢制剑。事实确证，春秋时代，我国铁的冶铸不仅出现，而且已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所以，到战国时代，铁器能普遍流行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战国铜矛

从现有材料看，在春秋战国之间，我国人民便发明了“可锻铸铁”（又称展性铸铁，是把硬度强而易碎断的生铁入火烧至一定程度，让它氧化脱碳得到的。这种铁就变得比较易于延展而可以锻打不碎了），而欧洲直到1722年才记载有可锻铸铁，美国到1831年才有。我国比欧美大约要早2000年左右。我国的铁器冶铸走着一条和外国不同的独立发展的道路。按照一般冶铁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先炼得熟铁，即通常讲的块炼铁，它不像炼生铁那样要求的温度高。这种块炼铁出炉时是一种含杂质较多的海绵状铁块，从炉中取出，往往会影响炉膛，这样就不可能连续冶炼。生铁则不然，它是把铁熔成了液体。这样，不仅不影响炉

① 关于这条史料历史上有过不同意见。如《孔子家语·正论》引《左传》此节，“铁”作“钟”，宋到清代的一些学者认为“钟”字是正确的。但我们以为，《孔子家语》出于魏王肃之手，而《左传正义》曾引东汉服虔注就作“取晋一鼓铁以铸之”。如果我们再联系其他文献和考古材料来考虑，春秋时以铁铸刑鼎当有可能。

子，还能接二连三地持续冶炼，而且可以进行铸造。这是十分有利于铁器的使用和推广的。根据有关记载，在国外，生铁的冶炼大约直到 14 世纪，才用熟铁渗碳的办法炼得。在我国，根据对战国时代的一些铁工具的分析研究，当时已经能够对生铁进行不同工艺的柔化处理。生铁铸品含碳量高，质脆易坏，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就要对它做脱碳处理。这样进行过加工处理的铸铁工具，就可以使之既坚硬又不容易发脆了。

这些，都充分表明：我国古代冶铁技术已经十分先进。我国之所以在发展冶铁技术方面走着一条独创的先进道路，是和我国古代的冶炼工人的勤劳智慧，有着长期冶铜经验，以及发明和使用鼓风设备——橐籥，从而提高了炉温等分不开的。

也正因为我国早在春秋时代已有了一定的冶铁技术水平，所以，到战国时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和铁直接发生了关系。铁这种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重要的一种，在战国时代，已经在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了；从生产工具的发展历史讲，战国确实已进入了铁器时代。

战国时代，已经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些远近驰名的铁器生产地。赵国的邯郸，楚国的宛地，韩国的冥山、墨阳、合膊等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铁器冶铸中心。历年来，全国不少地方都发现了战国时代的铁工具和冶铁遗址。如河北兴隆、磁县、易县；河南辉县、新郑等地，都是近 30 年发现战国冶铸铁器最有名的地方。尤其是河北兴隆，曾发现了铸造铁工具的大量模具，计有 70 件之多。河南辉县发现的铁器更为惊人，解放后曾在一处战国墓地，发掘出大小 5 座墓，获得了铁制生产工具 90 多件、兵器 70 多件。从有关文献记载和历年各地考古发现所见的材料看，铁农具有耒、耜、犁、铫、鎒、铚、锄等；铁制手工业工具有刀、斧、凿、锯、锥、锤等；铁兵器有杖、矛、剑、甲胄等。礼器中也有用铁做的，甚至在人们的装饰品中，也有用铁做的。铁制品确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

四、“食官”手工业生产的改变

西周春秋时代，我国的主要手工业生产，都是官家经营的。齐桓公时代，也还是“处工就官府”，在晋国叫做“工贾食官”，说法虽不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当时的官府手工业，设有专人管理，这种官吏一般称作“工正”。田完从陈国逃到齐国时，就做过齐国的“工正”。这种专管手工业生产的官吏，大概地位没有卿大夫那样高。工正下面有许多手工业作坊，如铜器作坊、骨器作坊、玉石器作坊、兵器作坊等等。当然，手工业生产并不限于生产器用，还包括原材料的采集和开发。像铜、铁矿山的开发，盐的烧煮之类，都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特别是春秋以前），但不属于工正管辖的范围。从有关记载看，山林川泽，另外设有专人管理，《周礼》中有“卝（guàn）人”和“山虞”、“泽虞”，大致就是主管山林川泽及其与之有关的铜、铁、金、锡、玉石、盐等等开发的官职。

那时在各种作坊、矿山、盐场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主要是手工业“徒隶”，包括世代相袭的手工业奴隶和罪犯。后来大致还有定期服役的自由民中的手工工匠。公元前478年和公元前470年，卫国先后两次工匠暴动，其中一次的直接起因，就是“公使匠久”，引起了工匠们的不满，起而围攻“公宫”。从“公使匠久”推测，可能是抽调的自由民工匠。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特别是各国相继实行“初税亩”、“初租禾”之类的改革，政府承认土地私有为合法以后，原有“就官府”、“食官”的官营手工业生产，也就起了变化，从中分化出了各种不同的私人手工业。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新兴封建势力的发展，封建政权的建立，私有土地的进一步发展，地主、自耕农等的普遍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性质也起了变化，成为封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在从前，只有官

府直接控制的手工业生产，而这时，除了仍由官府（但已是封建政府）直接掌握的部分手工业生产外，还有“豪民”（大地主）们经营的大规模私营手工业、个体的小手工业以及不脱离农业生产的小农家内手工业等存在。

战国官营手工业生产的范围，主要是兵器、礼器以及专供新贵族和官僚们使用的部分消费品。如果从表面看，它与从前的官府手工业相似。战国时，各国政府也设有专管手工业生产的官吏，分属在行政长官相国、郡守、县令之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官营手工业管理体制。我们从出土的一些手工业产品的铭文中尚可见其大概。尽管各国的名称不一样，然而，管理体制却大体差不多。1971年，在韩国故城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出土了大批兵器，兵器上的铭文常见有“司寇”、“工师”、“冶尹”等官名，别的地方所出的战国器物上，也都发现过类似的一些官名。从铭文看，在韩国大概中央政府是由司寇管理手工业生产，至少兵器生产在韩国是由司寇主管的，下面设有“工师”，再下面有“尹”；有的国家叫“丞”或“佐”，其职能差不多。像“冶尹”大致是直接主管合金配料的，和《考工记》中讲的“冶氏执上齐”的“冶氏”差不多，冶氏下面就是“百工”，他们是直接生产者。

在官府手工业工场中，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大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奴隶和刑徒，比如考古发现的云梦秦简中就讲到城旦、鬼薪一类刑徒。《墨子》一书中也讲到官奴隶和刑徒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事情。另一部分是征调或雇请的私人手工业工匠，这部分人大致有一定的期限。从铜器铭文可知，在楚国这种被官府手工业工场雇请或征用的工匠被称为“铸客”。

私营手工业包括了私营大手工业主和不脱离农业生产的家庭手工业、个体手工工匠等。现在我们简要介绍如下：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时代有些很有名的私营手工业主。比如赵地邯郸的郭纵，他是以冶铁成业，其富可与王侯相比。还有以煮盐起家的猗顿。更有一位女手工业主，她就是秦始皇

为之修筑“怀清台”的寡妇清。她的先人是开采丹砂的，她一直守着这个丹矿的开采，因而成为有名的巨富人家。此外，像蜀卓氏的先人、宛孔氏的先人等等，他们都是原来战国时代赵国和魏国的私人冶铁手工业主，秦灭六国后才把他们迁到新的地方去的。

除大型的私人手工业者外，战国时代大量存在的，当是个体小手工业者和普通农户家庭手工业。在封建社会，家庭手工业应当是为数最多的，它是农业生产的一种补充。中国古代传统的“男耕女织”，在战国的农村中是很普遍的。《考工记》中所谓“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表明妇女是纺织手工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在商业经济尚不发达的时候，她们主要是为满足自身需要和家庭的消费。到战国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部分产品已投入市场了。当时的统治者，在征收赋税时，除了征收谷物外，也开始有了布帛之征。加之当时封建政府提倡耕织，更促进了这种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一般农家除从事纺织外，还编制竹器、草鞋等。文物考古工作者曾经在湖南长沙发现过据认为是战国时代手工编制的麻鞋，和近代南方农村编的“麻莴子草鞋”差不多。这种手工业在那时不仅妇女干，男子也干，庄子就曾打过草鞋。“郑人买履”的故事，更反映了这些产品不仅是自身消费的，而且也投入市场了。

此外，战国时的个体小手工业者也有了新的发展。当时一般人使用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像农民使用的铁农具、木工使用的铁制工具等等，不少当是那时的小手工业者所生产供应的。这些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人，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以自己的手工业产品换取农民们生产的粮食。《孟子·滕文公上》讲的“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的情况，就反映了战国时代一般手工业生产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战国时代的这种个体手工业生产者为数不少。有的在都市里开店摆摊，一面生产，一面出售；有的在农村走乡串户。有打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的，有造车的，有生产炊具——锅、碗、缸、盆的，有盖房的，有做棺椁，以及其他手工业品的，等等。他们有人身的

自由。这在春秋以前可以说是没有的。它说明战国时代的手工业生产在生产关系方面也是进步了。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不仅有了和从前性质不同的官营手工业，而且有私人经营的大型手工业作坊，以及个体的小手工业者及大量的不脱离农业生产的家庭手工业。这一切，充分说明了手工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生产力得到解放的结果。

第四章　商业和城市、交通的发达

一、“垄断”与“债台高筑”

“垄断”是今天人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古书中有时写作“龙断”或“陇断”。它的本意是指田野间地势高的地方，后来才有操纵市场、独占利益、把持权柄这些意思。这个词最早应该算是从孟子那儿来的。《孟子·公孙丑下》有这样一段话：

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个叫季孙的说过，子叔疑真怪！自己要做官，别人不用他就算了，却又使自己的儿子兄弟来做卿大夫。谁不想当官发财？然而他在这方面却有一种垄断行为。这里的“垄断”已有独占利益的意思。孟子接下去对“垄断”有一番解释，告诉了我们“垄断”的本意，同时对我们认识古代的商业贸易发展过程很有帮助。孟子说：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孟子这里对垄断的解释，恰好反映了古代商业贸易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春秋战国间这个商业贸易发展史的历史转变过程。孟子所讲的“古之为市”，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由官府主管的情况，显然指春秋战国以前那种“工贾食官”情况，或者是更为古老原始的交换行为。后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私人工商业者，这便是孟子称作的“贱丈夫”。他们原来从事工商业活动是非法的，不能到官府设立的市场去交易，只好在乡间找个高地东张西望，窥测方向，寻找买卖的有利时机。由于这种私人的乡间贸易发展了，后来才有把商业交换地点称作“市井”的。所谓“井”即指井田，据《公羊传》讲，市井即“因井田以为市”。这是私人商贾起初确实在乡村民间出现的一个说明。

春秋以后的私营工商业者，不光为了自己的消费而生产和交换，而是为了通过交换获取利润发财致富。在春秋期间，我们已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些不再是“食官”的富商大贾。他们自由往来于各国间从事商业贸易，各国政府和公卿大夫也不能任意“强贾”他们的东西了。

另一方面，由于富商大贾的出现，“商贾食官”已成为历史的旧迹，政府不能直接掌握工贾为自己的需要服务，但商业交换又是块肥肉，成为一种重要的财源。所以春秋后期便出现了设关卡收取工商业税，以增加统治阶级的财政收入。有的诸侯国君还用工商业税作为赏赐，或像食邑那样作为一种臣下的俸禄。孟子讲的“纵而征之”、“征商至此始”，实际上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到春秋末战国初，由于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商人地位的显著上升，人们对从事工商业活动不仅不以为下贱，反以为荣，原来出身高贵的士大夫也干起过去低贱小人做的买卖来。像出身士人的孔门弟子子贡这些人，就连最讲尊卑贵贱等级的孔子，也丝毫不见有贬责之辞；相反，对向他“请学稼”的学生，却斥之为“小人”。子贡不但没有被上层统治者视为卑贱，而且“结驷连骑”聘问诸侯，所过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到后来，一些原来身居

显位的卿相，如曾帮助越王勾践雪过会稽之耻的大官僚范蠡，也弃官经商去了。史称他经商只十几年就“三致千金”。其后子孙继续经商，达到“富致巨万”。富商大贾不断涌现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只要能获利，商人们不惜一切，正像《墨子·贵义》篇中所说那样：“商人之四方，市贾倍蓰，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范，必为之。”

战国时卿大夫投入商业贸易行列的就更多了，有的一面当官，一面从事商业活动。魏惠王的大臣白圭，就是一个善于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从事倒卖谷物活动的人。他在丰年抛出丝漆，收进谷物，待到荒年歉收又售出谷物，收进手工业产品，从中牟取巨额利润。随着战国时代商业的发展，商人势力的增大，一些大商人更进一步谋取政治上的地位。战国末期的吕不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吕不韦以一个大珠宝商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在秦统一过程中大显身手。

春秋战国时代商业的活跃，还表现在商人经营范围的扩大，商品种类增多。从统治阶级的高级消费品和军需物资到礼乐祭器，以及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盐、铁、牲畜产品、竹木漆器等等，都成了重要的商品。

商人们为了获得厚利，不仅是积极奔走，往来贩运，而且，当时还出现了一些讲究生意经的商业理论著述。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工商业发达的重要反映。范蠡就是一位特别善于观察行情，掌握时机，具有一套经商经验和理论的大商人。他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物价涨到顶就必然下降，降到极低就又要上涨。做生意贵在把握好这种极限，勿失良机，贱时就大量收买，贵时及时卖出去。在商品的保存方面，范蠡也有一套理论，其原则就在“务完物”，即务必要使货物保存完好，否则便要亏本。据说范蠡还写有专门论述有关商业交换、盘算怎样才能获取高额利润的专著，叫做《计然》。由于他很善于做生意，又有一套理论，所以当时很多商人都很重视他。大盐业主猗顿就曾登门向他请教致富的

学问。战国初期的白圭，也有一套经商致富的生意经。他认为经商有很深的学问，有如伊尹、吕尚之善谋；孙子、吴起之用兵；商鞅的变法改革。他特别强调做生意要善于“权变”，要机智、果敢，掌握好时机，及时地做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如果犹豫不决，失去机会，就赚不了钱。在当时的社会上，认为一个善于做生意的商人，是不与别人争讨眼前买卖价格的，只要善于把握好时机就行。“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从这些片断的生意经中，已充分反映了当时商业交换的发达情况。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扩大，货币广泛流通起来，商人日益活跃。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富商大贾们从商业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润，掌握着大批货币，控制着当时社会上大量农副产品和其他手工业品，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到他们手里，一些商贾富比封君。而另一部分人，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由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和商贾们的盘剥，虽然一年到头辛勤劳作，也不得温饱，养活不了父母妻子，于是就只好靠借债度日“称贷而益之”了。这样，高利贷也就发展起来。齐国的孟尝君，就是一个有名的高利贷者。他家养着食客3 000人，食邑收入不足以供养这些食客，就向薛地的老百姓放债，他的门客冯谖见他这样剥削老百姓，必然要丧失民心，于是利用孟尝君派他去收债的机会，“矫命以责（债）赐诸民，因烧其卷”（假借孟尝君的名义，把借条全部烧了，表示不要老百姓还债）。到战国后期，高利贷更加发展，甚至堂堂的周天子——赧王（前314—前256）也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债。当时周赧王因欠债太多，无力偿还，害怕回宫居住，就造了一座高台，自己躲藏到上面去，人们称之为“逃债台”。后来的人就把负债多叫做“债台高筑”。从这儿更反映了当时高利贷商人势力的雄厚，就是周天子也逃不了高利贷的罗网。

高利贷是随着商业发展而出现的现象。我们从战国时代高利贷商人势力的强大情况中，更清楚地看到了那时商品交换发展的事实。

二、从货币的使用看战国商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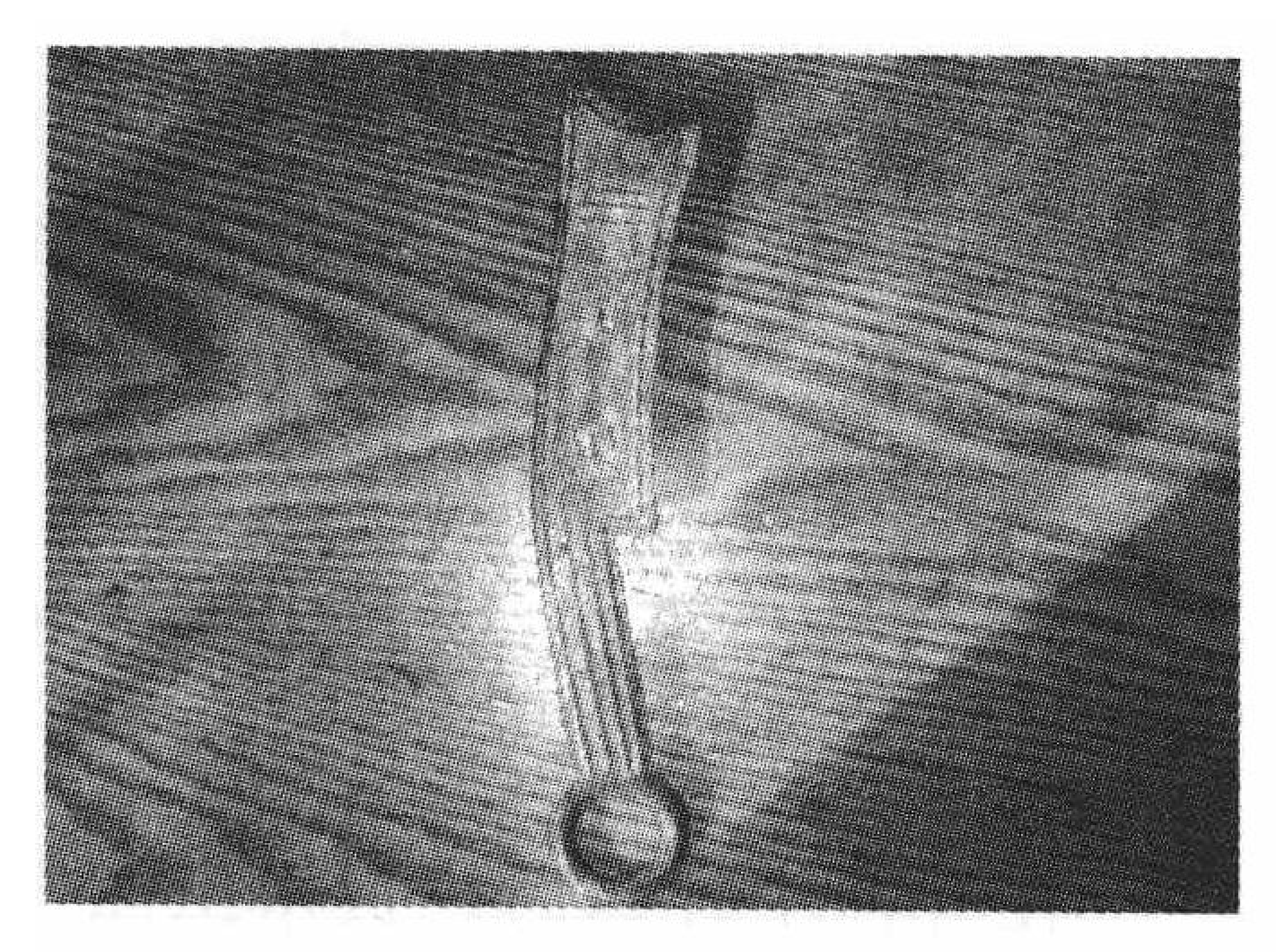
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事实作为前提的。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货币也就自发地产生出来。它的历史是和交换的历史分不开的。它的起源和发展水平，也是与交换的起源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因此，这里再从战国货币使用的情况，来看看战国时代商业的发展水平。

在我国历史上，大概在夏代以前还处在没有货币的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阶段。相传夏禹曾“以厉山之金铸币”，那就是说已经开始有金属铸造货币了。也有传说夏代是“以贝为币”的。看来后者近乎实际。从文献与考古材料看，我国古代最早起过货币作用，并为大家所承认的还是天然贝。但夏代贝币的实物还不能确指，商代确实发现不少。在商代早期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人工仿制的骨贝。在商代后期的遗址中发现贝的情况就更普遍了。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也有许多从贝的字，并有“得贝”、“易（赐）贝”之类的记载，还有一些作挑贝贩运货物到远方的形象刻在器物上。不难看出，商代的贝已不单纯是一种装饰品，而是具备货币的职能了。

西周仍以贝币为主，周金文中不但有许多“易（赐）贝”的记载，而且考古发现西周墓中还有不少天然贝和铜贝。辉县琉璃阁就发现过成堆（上千的）铜贝。在我国历史上，用贝作货币的历史是相当长的。南方的楚国，直到战国时，还通行一种“蚁鼻钱”，那就是一种仿贝形的金属铸造货币。在中原地方，作为货币的贝，据《史记·平准书》说的“及至秦……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锦宝藏，不为币”来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有此一说），一直到秦统一才由政府下令停止通行而退出历史舞台。

称量货币，比实物货币进步。在我国从西周开始出现，一直到

明清都和铸造货币相辅而行。西周金文中除有大量“易（赐）贝”多少“朋”外，还有“易（赐）金”若干“寽”（lù，即鋝字），如西周时代的《禽簋》有“易金百寽”。“寽”据研究就是后来的重量单位“锾”，也有简写作“爰”的。金文中的“锡金”若干“寽”都是作重量单位用的。这就透露出了：至少在西周时，已有以“寽”为重量单位的金属称量货币。



齐法化

春秋时代，称量货币与铸造货币已取得主导地位，以天然贝作货币的情况在中原各国已属罕见。

进入战国，贵金属黄金真正加入了货币的行列。以前所谓的赐“金”，一般都是指的铜而非黄金。贵金属作为货币流通，这是货币史上的又一进步。与此同时，铸造货币也更加广泛流行，并且走向定型化，成为中原各国的主要货币形态。战国时的铸造货币，一般都铸有铭文，或是标明价值重量，或是铸有造币地点，这是铸造货币定型化和成熟的重要标志。由于战国时代货币的成熟和定型，更适于储存和流通，从而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特殊财富。《管子·轻重篇》中讲的“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充分说明了这点，反映了当时商业交换的高度发展水平。

春秋时代，人们大多还以珍宝珠玉、车马布帛和谷物等实物作为财富的积聚手段。有人统计，《左传》中有关财货的记载，如贿赂、赔偿、赏赐、馈赠、献纳、犒聘等等，大都还是以实物而不是使用金钱。到了战国时代，就截然不同了。人们的财富观念一般不再只以实物计算了，而是以金钱货币为主。战国时代的货币，成了人们衡量财富和储存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历年的战国考古发掘中，发现过不少当时的窖藏货币，有的堆放在一处，有的成捆装在大瓮里，其数量有的达数千枚不等。战国时人荀子所说的“余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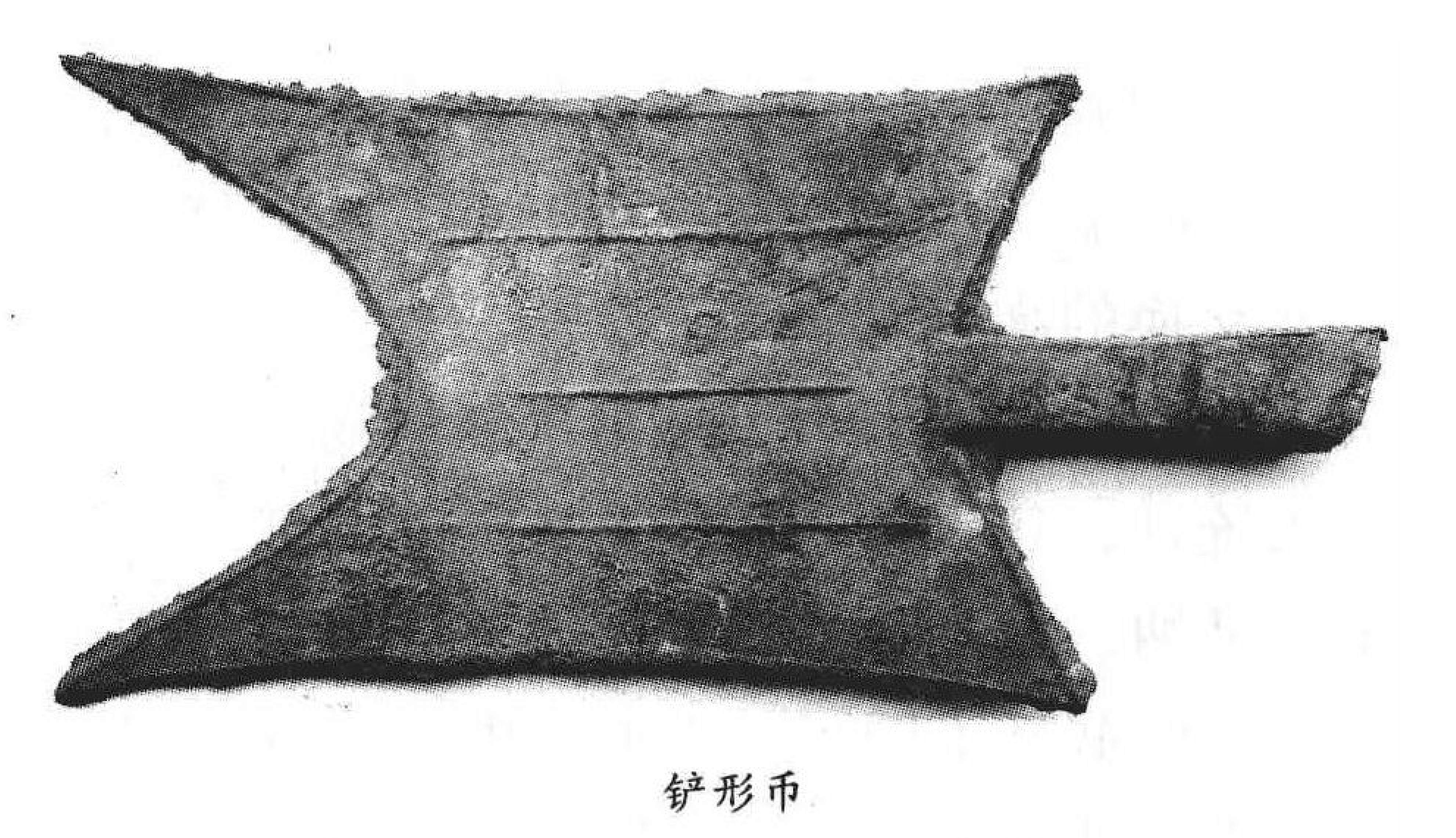
币，有囷窌（窖）”，储存货币的现象确实是当时常见的了。这一切都说明：战国时代，商业货币经济确确实实已在社会上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发达程度前所未有。

三、战国常见的几种主要铸币

在春秋中叶以后，货币虽然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有了金属铸造货币，但是，由于当时诸侯割据，政治分散，不仅是各国之间互不统率，就是各诸侯国内部，也是卿大夫各占一方。在这样的局面下，当然不可能有统一的币制。不仅不能统一，一些富商大贾也私自铸钱，各国政府并未完全掌握铸钱的大权。

战国时虽然各国相继把铸币权收归了政府，但各国之间还不统一，各国货币的形制、重量、单位各不相同。就形制看，大致可以分为铲形、贝形、版块形、刀形和环形几大种。

（1）铲形币。主要在三晋地区流行。其形似铲。它是从古代的铲形农具演变来的。古代有一种农具叫做耒。古文中的“耤”字就从一人手持耒起土形。这种农具上面有长柄，下面有一歧头铲形，可以刺土翻地。铲形货币又称作“布币”。为什么其形是铲而又称为“布”呢？推测是在我国古代的产品交换过程中，有的地区曾有一个时期，人们用生产工具铲子作为交换的媒介物，它是一种原始的实物货币。原来的铲子都是实用之物，后来为了交换过程中的方便起见，才由实物渐渐变小而成为一种象征形的铲，用它做通常的交



铲形币

换媒介。这样铲形就成了这种货币的形状。之所以叫布币，则和我国古代有的地方曾有以布帛作为交换媒介的历史事实有关。《诗经·卫风·氓》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有个人笑嘻嘻，抱着布帛来买丝）句，这告诉我们，当时的卫地（今河南省北部，黄河以北地区），确实曾有过以布帛作为货币使用的交换历史。后来金属铸造货币出现，就把古代这两种曾起过主要货币作用的实物结合起来了，其形取铲，其名取布。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讲：“古以布为币，后制泉（钱），即以名之。”后来不仅这种铲形币叫布币，也有把别的货币叫布币的，如后面我们要介绍的刀币，也称“刀布”。同时，作为农具的名称，也有保存在后起的货币中的。“钱”这个字，古代本来就是一种农具的名称。称货币为“布”，还有的说就是因为古代的农具有叫“钱镈”的[①]，布与镈为音近字，所以铲形币又叫布币。

铲形币本身又可分为不同形制，如有尖足的、方足的、圆足的，但其基本形状还是铲形。这类货币，主要在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范围内出土最多。近30年来，先后在山西省的原平、祁县、永济、侯马，内蒙古的包头等地发现过大量铲形币和铸造这种货币的模具。这种货币一般都有铭文，主要是当时的地名，目前发现已有好几十个地名，其中以“安阳”为最常见。安阳不是今天河南的安阳，而在现在内蒙古包头附近，曾经在这里发现了铸造“安阳”币的作坊和模具。这种货币估计是当时三晋地区的主要货币，流通范围也很广。除在山西、内蒙古等地发现过以外，在河北的徐水、石家庄、易县，河南的郑州，辽宁的朝阳、义县，吉林的辑安等地都曾出土过一些，说明三晋的货币流通广泛，已越出了一国一地的范围。

铲形货币在南方的楚国范围内，今江苏丹阳、浙江杭州等地也

① 《诗经·周颂臣工》有“命我众人，庤乃钱镈”，意思是命令我的众人（一种农业生产者），拿起你的钱（一种小铲）镈（一种锄）。

曾发现过。不过，它们与三晋的那些铲形币有所不同。从目前发现的实物看，这些地方的铲形币体形较长，首有穿孔，铭文一般常见“铢布当忻”、“十货”之类的字样。而不像三晋的铲形币那样多铸的是地名，显然是楚地所铸而不是三晋所造。但有可能是受三晋铲形货币的影响。

铲形币过去发现的都是铜质。1974 年 8 月，在河南扶沟县固城发现了银质的。据有关方面鉴定，其中除有春秋时代的以外，有的是战国初期的。

（2）贝形币和块形金版。这两种货币是楚国的主要流通货币。贝形币，又叫“蚁鼻钱”或“鬼脸钱”，这是因为它的腹部平面形状而得名。其实它是一种仿海贝形状的铜铸货币（上海博物馆藏有铸造楚铜贝的铜范两件，一全一残）。这种铸贝的背部凸起，腹部平而成椭圆形，顶端有穿孔，大小轻重不等，其实测重量约在1—5 克之间。这类货币，曾经先后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山东南部等原楚国势力范围内发现。1972 年，在山东曲阜董大城村，曾在一个陶罐中发现过 15 978 枚，重达 19.2 公斤。

其实，早在商代末和西周的墓葬中就已出土过铜铸的贝，但两者是不同的。楚国这种仿贝铜货币一般都有铭文，已知的有十来种，最多的是有“贝”字铭文①。商周铜贝上一直没有发现任何铭文，是一种很原始的铸造货币。

块形金版，又有称作“版金”的。历年来在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山东以及陕西都有发现。比较重要的是 1974 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和 1979 年安徽寿县门西两起。这种货币是由若干小块连在一起的，每一小块又打有方形或圆形印记。过去以为，方形的一块最多不过 22 小方块。1982 年 2 月，在江苏盱眙县穆店南窑庄，

① 依古文字学家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说释“贝”。

出土了一件战国铜壶，内装大量货币，其中有两块最大的楚金版，分别有46个和54个小方块在一起，小方块上都打有“郢爰”[①] 印记（现在一般印文多见是“郢爰”，目前还发现有少量的“陈爰”、“覃金”、“鄗”等，前一字多是地名）。这种货币具有称量货币的特点，使用时，大概是根据支付的需要切下若干块，再用天平称量支付。

在金版上打圆印记的货币，过去比较罕见。1979年8月9日，安徽寿县城南东津乡花园村的村民取土时发现了大批楚金币，其中打有圆印记的不少，一块上最多的打有21个。印文作“卢金”，据认为卢是炉的假借，意为炉火精炼之金；也有人认为卢为楚地名。使用方法和“郢爰”、“陈爰”金版差不多，也是截割下来用天平称量支付。因为楚国普遍使用这种需要称量的金币，所以，楚墓中曾发现不少天平和砝码，考古工作者曾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楚墓中发现过。1959年还在安徽凤台出土过制作砝码的铜范母。

（3）刀形币。主要是东方齐国的货币，因形状和古时通用的刀鞘一样，故得名。推测它的渊源，大概亦和铲形货币的来源差不多，最初大致是以手工业工具中的刀鞘作为交换媒介。有意思的是，据对山东海阳小纪出土的齐刀币进行金相分析看，齐国在铸造货币时不仅取像刀鞘之形，而且青铜的铜锡配料比例也和《考工记》所记载的铸造“大刃鞘杀”之器的铜锡成分一致。齐国是使用铸造货币比较早的国家，因为齐国是东方古代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据载姜太公初封于齐时，就注意“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目前发现的齐国刀币，已有早至春秋中期的，但以战国时代的“齐法化”刀币最常见。“法”有制造标准、准则的意思，“化”就是货字的简体。“法化”即“法货”，即标准货币的意思。在战国时代，齐国铸造货币的地方，从今天考古发现的遗迹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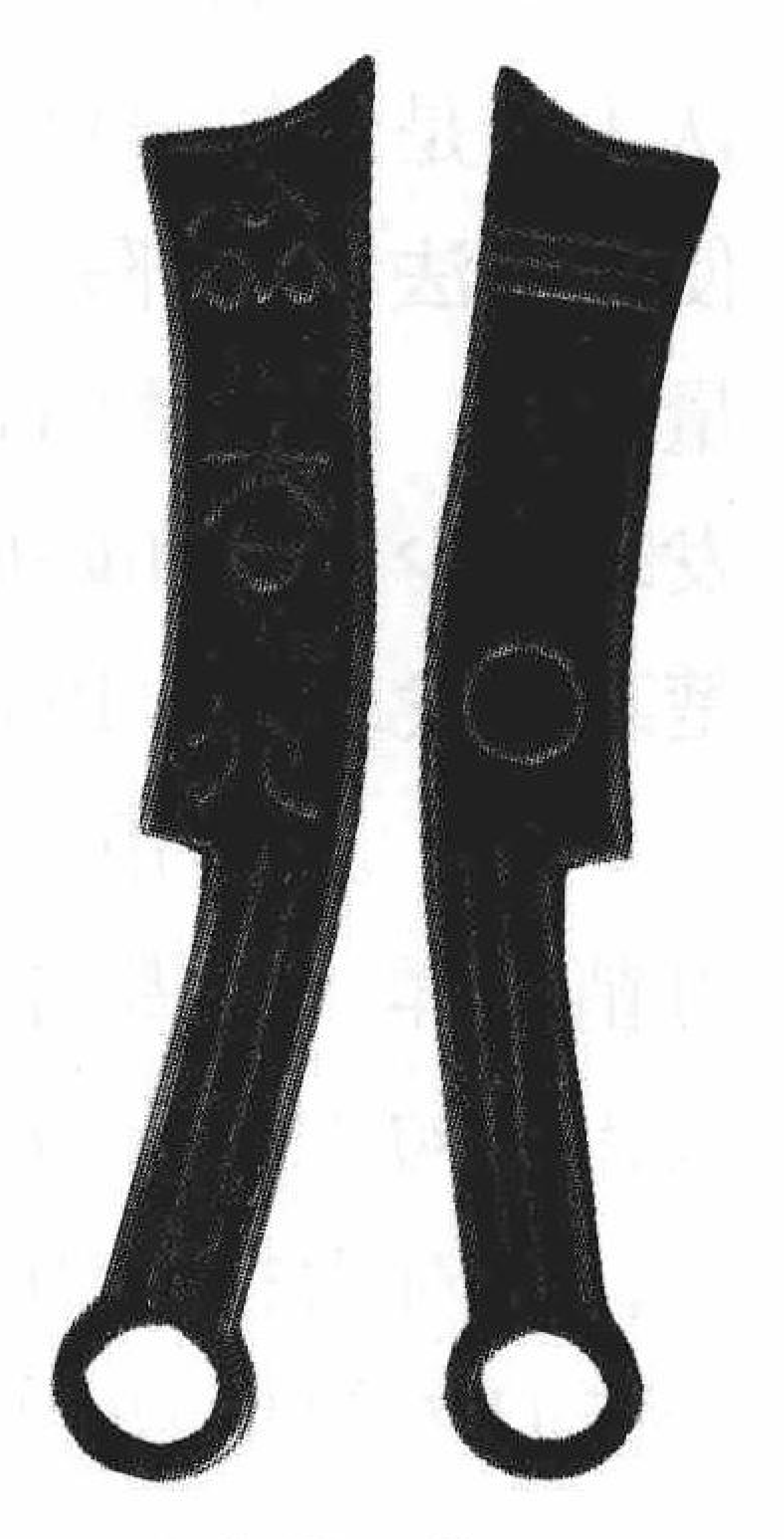
---

① 过去一般都把“爯”字释作“爰”，近有人依据汉初泥制金版印文，认为应释为“爯”。

止一处。但是，这些不同地方铸造的货币，都以“齐法化”作为统一的铭文，比如山东临淄所出的齐刀范与清朝时候在益都所出的齐刀范，虽然出在不同地方，但铭文都有这三个字。据有人研究，齐法化的购买力很强，大约一枚齐法化在粟价最贱时，约可购252.3斤粟（战国制），约合今天的115.4市斤；可购买食盐22.59斤（战国制），约合今天的10.39市斤。

还有一点有趣的是，“齐法化”刀币，任取六枚首尾相衔接都正好组成一个圆形环。这和《考工记》中说的刀鞘“合六而成规”是一致的。

刀币虽然主要是齐国的流通货币，但它的影响不小。与齐国西北为邻的燕国也通行过刀形货币。1949年以前和以后，都曾多次在燕下都发现过大量刀币。在今河北省承德地区，曾经在一处地方就发现过成捆的刀币放在瓮内，计有4 500多枚。但燕国的刀币铭文多作“明刀”字样，而且没有齐刀币那样精致规整。另外，在原赵国故地也曾发现过作直刀形的货币，也是比较粗糙的。


赵国刀币

（4）环形币。一般叫它做圆钱。早期的圆钱，都是圆形圆孔成环状，后来才多作圆形方孔。从这种货币的原始形状推测，可能是仿生产工具纺轮，或者是仿玉环或玉璧形。圆形货币主要流行于秦国，以及东、西周地区。东周与西周一般都作圆穿孔、有郭，铸造比较整齐美观，并铸有“东周”、“西周”字样。秦国的圆钱，早期多为圆形圆孔，铭文多作“重一两”、“十二铢”、“十三铢”、“十四铢”等字样。圆形方孔是秦国晚一些的流行货币，铭文多见有“半两”、“两甾”字样，这种货币可能是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钱”以后，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由各地官府铸造的，是流通最广的货币。随着秦国国势的强盛和对外的军事扩张，秦国这种圆形

方孔货币也影响到其他秦势力所及的广大地区。比如在西南的四川巴县就曾发现过这种货币。

东方的齐国，虽然主要是刀币，但也曾部分地使用过圆钱。1960年，在济南市区出土过一瓮古代铜币，其中除刀币外，内有600多枚圆钱，因上面有铭文“賹”字，所以多称为“賹化圆钱”。“賹”，有人认为是地名，也许是一种重量单位。《管子》书中讲的“黄金千賹”的“賹”，可能与此单位差不多。齐国这种圆形的货币，大致是受了秦国或东、西周圆形货币的影响后铸造的。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国时代的几种主要货币的特征和流通地区。从这些货币本身和考古发掘情况，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商业交换发展水平。

四、都市与交通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往来贩卖，必然促进都市的繁荣、交通的发达。都市成为商业的集散地点，交通要道就成了货物运输、加强各地经济联系的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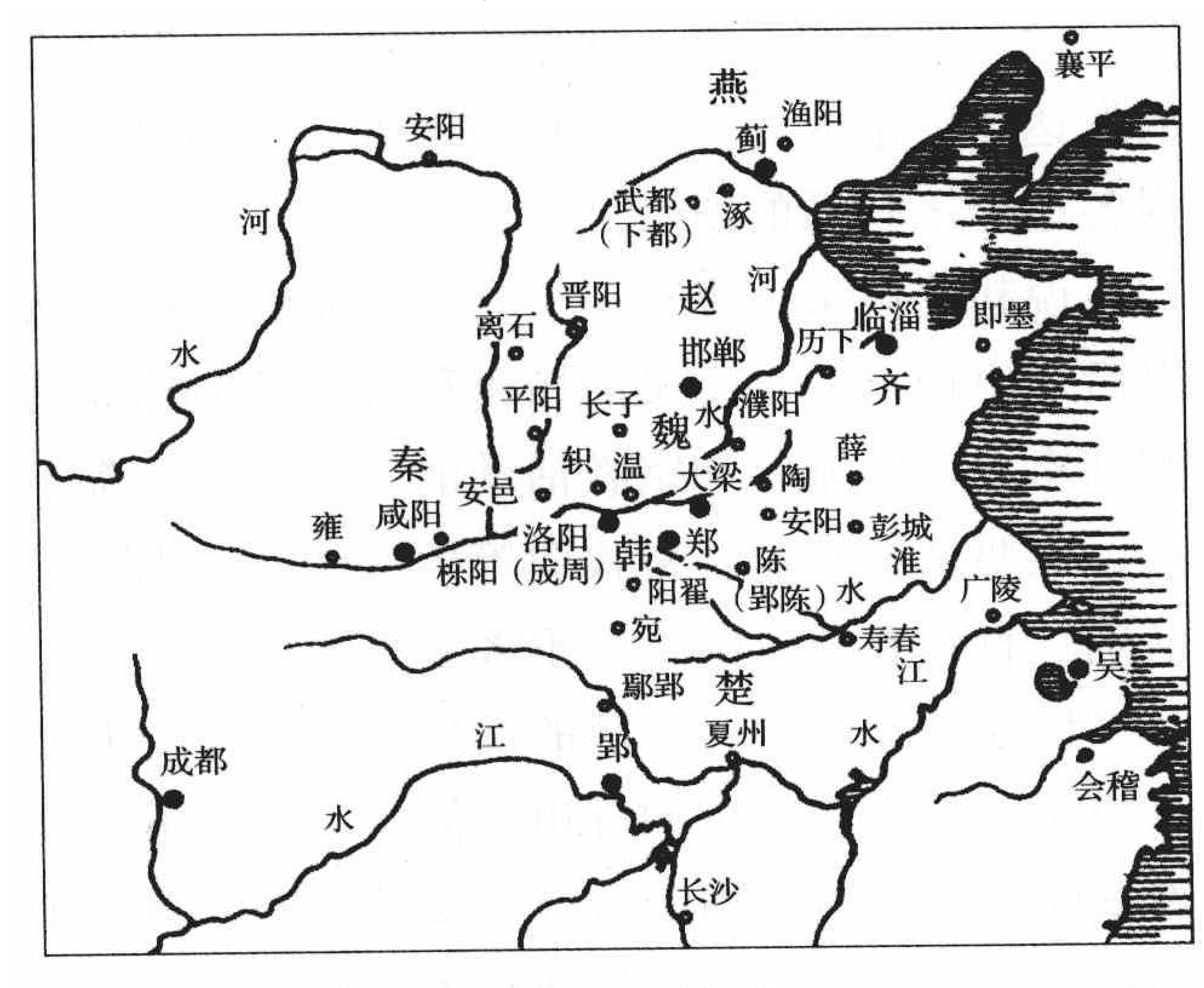
说起都市来，也有一个自身的发展历史。从有关材料看，夏商以后才出现了一定意义的城市和都邑。但那时的城邑主要还是王公们勒索贡赋的城堡和宗教活动的中心，一般都不大。城邑的一般居民，也要从事农业、畜牧业等生产活动，因此，它和乡村没有多大区别。直到春秋以前，差不多还是那样。

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有公卿大夫的都邑采地，逐渐变成了一些人口集中的都市，但也不是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直到春秋时代，那种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限制，对都市的发展也是很大的束缚。一般是：国都不过900丈，卿大夫的都邑只能有国都的1/3或1/5，甚至只能有1/9；如果越过了限度，则被认为是一种僭越行为。那时的城市范围那样小，人口也不可能集中得过多，上千家的邑就算是大邑了，一般的只有百来家，小的甚至只有十来家。要

是按每家5口计，大的不过5 000人，小的只有几十口。如果家室是指的一个家族、宗室，如所谓的“王室”、“公室”那样，那也不会有多少人口。后来随着宗法等级制度的不断瓦解，传统的等级观念的松弛，城市的建筑就起了变化。然而，战国以前，恐怕也只有像马服君赵奢所说的那样：“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

战国时代则和从前大不相同了，城邑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已经是“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就是一般的城邑，也远比从前的国都大多了。各国除国都外，还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有名的都市。据《盐铁论》所讲：战国时“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天下之名都”。其实还不止这些，比如宋的定陶，越的离石，魏的安邑、大梁，齐的莒、薛，楚的郢、陈、寿春等等，都是当时工商业非常发达、人口众多的大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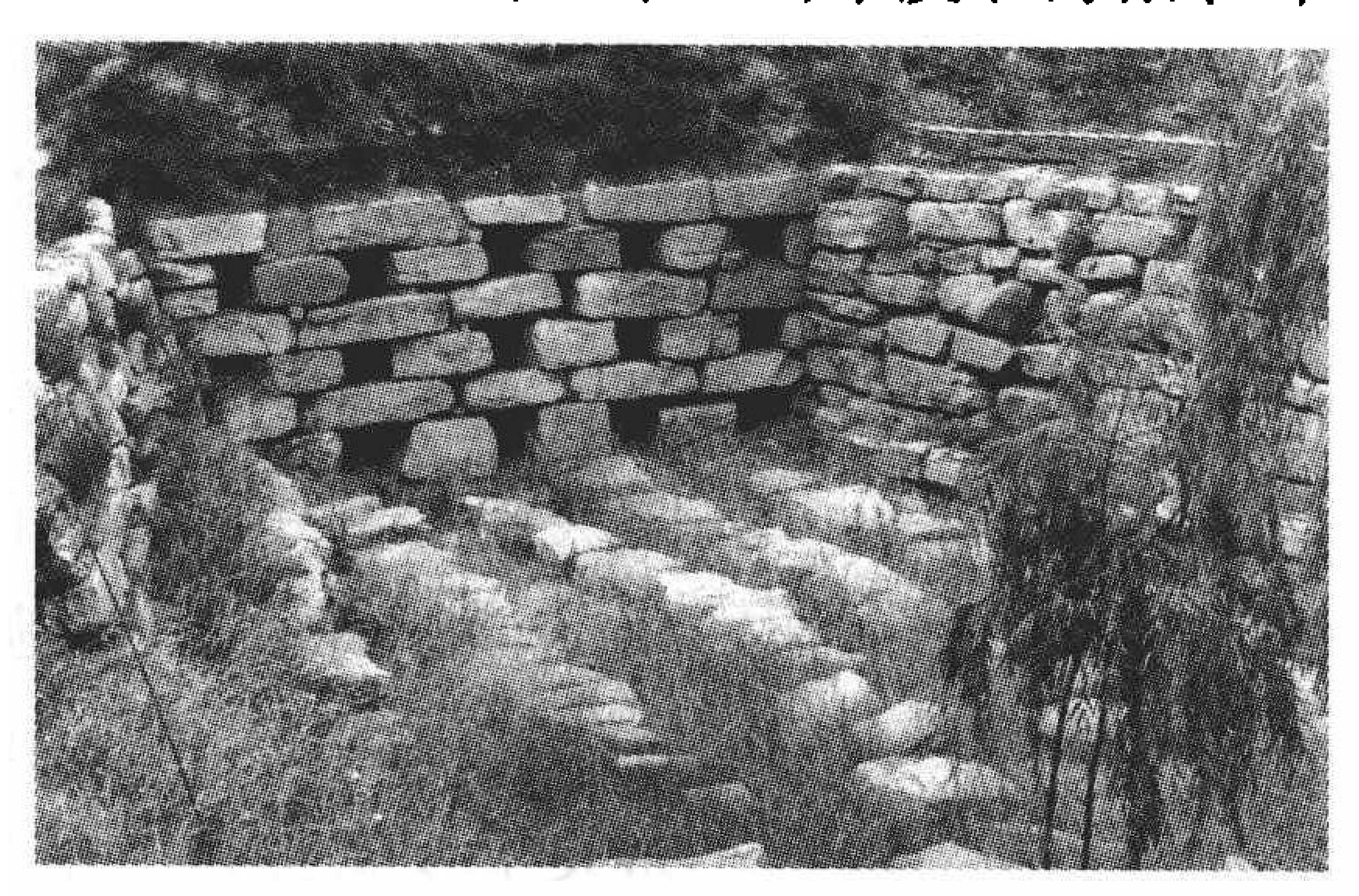
以齐国的都城临淄为例，当时就有人口7万户。我们若以每户5口计，也有35万人之多。当时街道上非常繁华，车水马龙，行人拥挤塞路。用战国人的话说就是：“车毂击，人肩摩，连衽（衣衿）成帷，举袂（衣袖）成幕，挥汗成雨。”说这话的人，虽然是当时的策士，不免有夸张成分，但是，也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否则说出来



战国时期城市兴起图

就不足以令人信服，达不到游说的目的。从地下发掘的情况看，当时的临淄城（今山东临淄城附近）确实不小。考古揭露出的临淄故城是由大小两座相互衔接的城组成的，小城在大城的西南部，东北一部分伸进大城一角，城墙总长约 41 400 多米。城内有人工排水沟，城外靠近城墙有护城河，都与天然河流互相沟通，形成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据考古探掘得知，当时临淄城的总面积达 60 多平方华里，大小城门已发现了 10 多座。从发掘出的情况看，城内干道平坦而宽敞。有的干道宽达 8 米，城里已发现有冶铁、炼铜、铸币、制骨等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这些情况和文献记载是相吻合的。据有关文献记载，那时的大都市已经是店铺毗邻，店门外高高飘着各种招旗，有卖酒的，兑换金钱的，弹琴下棋的，斗鸡走狗的；四方土特产、手工业产品齐集市上，有行商，也有坐商，交易繁忙，买卖兴隆，一派热闹景象。

与商业集散地都邑发展的同时，联系各个集散地的交通网道，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从历年来有关考古发现的一些线索，如在一些地方发现的货币情况之类来推测，就当时东方的齐国看，可以大致看到当时的商业交通概况。在它的东边有以今天的平度、海阳、即墨、诸城、日照等为中心的一些贸易集散点连接成的东部地区贸易网。尤其是临海的今海阳县地区，可能是当时齐国东部的一个重要海上商业中心。1972 年 12 月，在海阳小纪江格庄村曾发现过用木箱存放的齐刀币 1 800 多枚。1979 年 5 月，在日照城关、两城也都发现过各种齐刀币。这些线索证明，这一带是齐国当时的东部海上交通贸易重地。通过这些地方与东南的吴、越地区进



齐国国都临淄古城排水口

行商业贸易。齐国的西部，大致有以今天的济南、历城、章丘等地为集散点，构成与中原各国的商业贸易网点。齐的北部有以牟平为中心的海上贸易集散地，主要与燕国的辽西郡地区进行贸易活动。

燕的辽西郡是北方商业交通贸易特别发达的地区，是中原各国与今日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或更远的地方发生交往的必经之路[①]。1949年以来，曾经在旅大、鞍山、营口、锦州、抚顺、沈阳等地先后发现过不少刀币与布币。特别是今辽宁朝阳地区，更是当时燕国从内地通往今东北的交通要道。1961年在朝阳七道岑发现过用陶瓮存放的货币，计有10多斤重，其中除燕的"明刀"外，还有"安阳"布币、"平阳"布币。这就清楚地说明，北部有一条由燕通过今朝阳到东北各地的商业交通网道，在这条商路上有从三晋地区来的商人。

在南方，楚国是当时最大的诸侯王国。由于地处南部中国，它与南亚一些地区和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方面的具体材料虽不多见，但并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寻。楚国又称荆，据一些学者研究，外国人把中国人称为"支那"，这"支那"就是"荆"的转音。也有人认为不是"荆"而是"秦"的转音。但我们知道，楚国早在秦灭巴蜀前，就通过巴蜀、黔中，经云南与印度等南亚地方发生了联系。而巴、黔等地区，很早就是楚国的势力范围。楚将庄跻王滇，给今天中国西南的云南地区及其南亚地区不小的影响。到汉代，能在印度见到巴蜀的特产，也不是偶然的了。

在西北方面，我们从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山海经》、《管子》等书中对于大西北的山川地势、风土人情和特产的有关记载推测，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人民对今天的新疆以至中亚地区已有相当认识。如关于今新疆地方的昆仑、沙海、罗布淖尔、

---

① 据《史记·封禅书》讲，燕昭王、齐威王和宣王曾派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有人考证，此三地为今日本。美国人类学家尼尔斯蒂特在墨西哥的科马尔卡洛古代玛雅人的遗址中，发现过用中文写的铭文。这些铭文都是公元前400年的。可见，那时的中国内地已与日本列岛甚至美洲大陆有了交往。

孔雀河等地理概念的记载，就是很好的说明。《山海经》的《大荒西经》中不仅提到昆仑流沙，还提到了“有燃火之山，投物辄燃”，这当是关于今吐鲁番火焰山的记录。当然，这与这些地区的交通往来是分不开的。那时，内地的丝绸、布帛和其他手工业产品，通过秦国和赵国，溯河而上；或经过河西走廊，辗转运往新疆、中亚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在原苏联戈尔诺阿尔泰省乌拉干的古墓中和我国新疆阿勒泰县克木齐发现过战国铜镜。1976 年至 1978 年间，配合南疆铁路工程，又在吐鲁番盆地西线、天山阿拉河东口鱼儿河车站地段的古墓中发现了大量战国时代中原流行风格的野兽纹金银器、铜器和漆器以及丝织品等等。大西北的各种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传到内地。先秦文献中常见的所谓“昆山之玉”就是很好的说明。可见中原地区、大西北直至中亚地区交通贸易极为活跃。在这种交流过程中，秦国因地处西陲，作用和影响更大，与今日新疆及中亚地区的关系也必然更密切。所以，远在大西北的古代各族人民常把内地的人称作“秦人”。

在中原腹地，要特别提到的是韩国。韩国地处中土，是南北商业交通和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韩国有许多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如宜阳（今地名同）地方八里，就是当时北与赵国上党郡，南经南阳郡与楚国联系、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通要道。

这样，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在战国时代，东、南、西、北、中土实际上已经是四通八达，形成了一个交通贸易网。经常在这些交通要道上奔走的商人们往来不绝。这就打破了战国以前那种闭塞不通的局面，各地物资彼此得到交流。正如荀子所讲的那样：北方特产的犬马牲畜，南方特产的羽毛齿革丹青，东方特产的鱼盐海产，西方特产的皮革纹旄之属，都可以在中原地方买到，形成了“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新局面。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为全国的统一做好了准备，从而加速了秦灭六国，完成统一事业的步伐。为秦的统一大帝国的形成创造和准备了条件。

第五章　七雄并立　变法图强

一、从六卿专政到三家分晋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春秋末期，新兴的封建势力已经在一些国家逐渐成为经济上力量雄厚而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这种情况的结果，必然要求进一步在政治上也成为一种支配势力，即要求取得政权，以便保障在经济上已经取得的利益。于是，一些代表新兴封建势力的卿大夫，便利用旧的统治者日益奢侈腐化，“厚作斂于百姓，暴夺民衣食”的时机，以民众救世主的面目出现而实行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他们给人民某些好处，以换取民众的支持，借机向各国旧势力的代表——公室及其首领国君展开斗争，用夺取政权的方式来达到新兴封建势力进行政治变革的要求。这种情况，以晋国表现得最为突出。

晋国，原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受封所建，在西周时是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平王东迁后，晋与郑国同为王室两大支柱，故《左传》说周室“晋郑焉依”。进入春秋，郑国渐渐衰弱下去，晋国则日渐强大。到春秋中期的晋文公重耳（前636—前628）时，晋国强盛达到了顶峰，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死后，晋襄公（前627—前621）即位，依靠文公旧臣的辅佐，算是保持了晋国的霸业。但卿大夫的势力日渐强大起来，以晋君为代表的公室则日渐衰弱。后来的晋悼公（前572—前558）复霸不过是回光返照，从此以后，晋国的霸业也就结束了。往后的国君更是一

代不如一代。到了春秋末年，晋国的阶级矛盾尖锐起来。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当时就连国都也“盗贼公行”，国宾馆也感到不安全，要修筑起高高的墙垣，装上坚实的门户，才觉得保险一些。可见社会秩序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用当时晋国人的话说，已经是“庶民罴（pí）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指嬖宠之家）溢尤”（见《左传·昭公三年》），简直是民不聊生。而旧的贵族老爷、国君的亲信宠臣们，则愈是奢侈荒淫，腐败不堪。在这样的形势下，老百姓根本不愿为“公家”干事，听到“公家”有什么差使，有如遇到敌寇一般，相率而逃。这便是《左传》上说的“民闻公命，如逃寇雠（仇）”。结果晋国形成“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谁也不肯为“公家”出力气。

晋国卿大夫的势力虽然日益强大，但相互之间并不团结；而是你争我斗，都想保持各自的势力。晋国有名的卿大夫原有十几家，在晋文公称霸时，不少家都是他的得力助手。但在以后的内部斗争中，一些家衰落下去了；从前有名的栾、郤、原、狐、续、庆、伯诸家，都已降在皂隶，至春秋末只剩下知氏、范氏、中行氏和韩、赵、魏六家，即所谓“六卿”，当时也有称为“六将军”的。他们完全控制了晋国的军政大权，形成了所谓“政出家门”、“军出六将军”。历史家称之为“六卿专政”。

六家中的范氏、中行氏后来也倒下去了，剩下的知氏和韩、赵、魏四家掌握了晋国命运。从六卿专政，到四卿掌权的事实，说明当时晋国新兴势力不断增长和强大。1965 年 12 月在山西侯马发现的“盟书”，就是这段剧烈斗争历史的见证。这批写在圭形玉石片上的盟誓公约，时间大致是从晋定公十六年（前 495）开始逐渐积累下来的。其中主盟人就有四卿之一的赵氏——赵简子（即赵鞅，又叫赵孟）。从盟书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新旧势力之间的剧烈斗争，以及新势力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情况。

公元前 454 年（晋出公二十一年），知、韩、赵、魏四家灭范

氏和中行氏，并将土地正式瓜分了。本来，照传统惯例是，一个卿大夫亡了，土地应该归还给“公家”——国君。可是，这次却没有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交还给晋出公。为此，出公心里大为不满，想勾结鲁国、齐国来干涉。然而，时代已经不同了，四家反而把出公赶跑了。

剩下的四家中，以知氏最为强盛，野心也最大，他时刻想把别人吃掉，以便独占晋国。知伯瑶打着增强公室的幌子，要韩、赵、魏三家各拿出部分土地和民众给晋君，实际上是想以此削弱别人而增强自己的实力。三家中的赵氏不愿意，知伯瑶就胁迫韩、魏一起向赵襄子发动进攻。三家联军进逼赵地，赵襄子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晋阳是赵氏多年苦心经营的地方，城池坚固，粮食、兵器等也多有储备；又加上赵氏原来对晋阳的民众实行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较为得人心。所以赵襄子能率领全城民众坚守抵抗。知、韩、魏联军连攻3年不下，于是知伯企图决晋水，淹赵军，迫使赵氏投降。大水灌进晋阳城，全城民众撤到高处坚持奋战。这时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建议利用知伯与韩、魏两家的矛盾。张孟谈乘着木船偷偷去到韩、魏营中游说，提出打败知伯后，除了归还知伯强夺的土地外，并将知氏的土地三家平分。原来韩、魏与知伯联合攻赵，本是无可奈何。又加上知伯骄横，割去了他们的土地，心里早憋着一肚子怨气。经张孟谈一鼓动，韩、魏就和赵家联合起来，趁知氏得意忘形没有准备的时候，三家突然向知伯瑶发动攻击，捉住了知伯瑶，灭亡了知氏，瓜分了土地。

剩下韩、赵、魏三家，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晋国的国君反倒成了傀儡，对三家毫无办法。三家势力虽然都强于公室了，但都担心晋国公室再强起来，夺去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三家又共同策划进一步削弱公室。公元前433年（周考王八年），三家利用新立的晋幽公羽毛未丰、软弱无能的机会，又将公室的土地和人民——除曲沃（今山西闻喜县境）、绛州（今山西翼城东南）两处留给晋君外，都给瓜分了。韩、赵、魏三家的地盘更扩大了，晋国国君进一

步降到了三家之下，反而到三家去朝拜。原来的君臣关系颠倒了过来，韩、赵、魏三家实际上已经升到了诸侯地位。

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同时派人去王都。名义上是去朝见周天子，实际上要周天子正式册命他们为诸侯。周天子眼看晋唐叔之后已经不行了，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已是既成事实，只好顺水推舟，正式加封韩虔为韩侯（即韩景侯）、赵籍为赵侯（即赵列侯）、魏斯为魏侯（即魏文侯）。

三家取得周天子的正式册封后，也就名正言顺地做起诸侯来了。韩、赵、魏三家各自正式自立了宗庙，建起了都城。韩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公元前375年兼并郑国迁到郑（今河南新郑县）；赵都原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这时都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公元前386年又迁都邯郸（今河北邯郸）；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7公里的禹王村），公元前361年又迁都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公元前403年，三家正式列为诸侯，七雄（秦、楚、齐、燕、韩、赵、魏）并立的局面也就形成了。但当时晋君并没有从此取消。到了公元前369年（周烈王七年），周成王之弟唐叔虞所建的晋国，才完全从历史上消失。

二、魏斯图治与李悝改革

魏斯就是魏文侯，他是魏桓子驹的孙子。公元前445年由他做了魏家的继承人。到公元前403年，与韩、赵同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

魏国土地肥沃，人口众多，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利的。魏文侯又是一个胸怀壮志的人。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新兴封建阶级刚刚取得政权后那种朝气勃勃、奋发有为的“活老虎”形象。文侯决心励精图治，改革图强。他在中央设立了由国君直接任免的将相来统领百官；在地方建立郡县，由国君直接委派

守令来统治人民。文侯亲手在魏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新国家。他礼贤下士，用人唯贤，先后用魏成子、翟黄、李悝为相，以孔子的名门弟子卜子夏为老师，又优礼田子方、段干木等当时的社会名贤。战国招贤养士之风，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在魏文侯的朝堂上集结了一大批从各地来的志士能人，像善于治军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吴起，一心为国不讲私情的乐羊，善于兴水利为民除害的西门豹等等，文侯都委以重任，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依靠这批人，从经济到政治、军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李悝，他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李悝，又叫李克，据说是卜子夏的学生，曾作过魏国的北地守。李悝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继承和发扬了法家先驱的思想，总结了他们的历史经验。在相魏的 10 年中，他既得文侯的信任，又得到像卜子夏这样一批新兴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他能卓有成效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

在经济方面，李悝提出了“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

所谓“尽地力之教”，主要是破除旧有的阡陌封疆，鼓励自由开辟耕地，勤谨耕作，充分利用土地。如规定房前屋后要种植桑树，田地之间的埂子上要种蔬菜瓜果。为避免自然灾害对单一作物的影响，规定必须同时种上五谷杂粮。这都是为了尽一切可能增加农产品，防止自然灾害造成个体小农的贫困破产。李悝看到春秋到战国初，刚刚发展起来的小农经济十分幼弱，如果不加扶持，遇到天灾人祸，就会破产。其后果必然是人民四处流亡，劳动力丧失，土地荒芜，国家赋税无从收取，国库空虚，从而酿成“盗贼”四起，威胁新兴的封建统治。为要解决这个矛盾，李悝一面采取“尽地力之教”，一面又实行了“平籴法”。

“平籴法”和“尽地力”互为补充，从不同的角度，促使农民勤于耕垦。据《汉书·食货志》讲，李悝认为“籴甚贵则伤民，甚贱则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粮食贵了人民买不起，太贱了农民太吃亏。人民买不起吃的，

就会到处逃散求生活；农民吃亏太大，又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对国家也没有好处。为了使政治稳定，就得使人民生活安定，而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平籴法”就是这个目的。李悝的具体做法是：当收成时，农民交纳什一之税，留下自用的粮食外，其余的粮食由政府按定价收购。待到荒年饥馑的时候，又由政府平价粜出。这样，不仅可以防止“饥馑水旱”，还由于籴粜价格由政府统一规定，免除了商贾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自然可以在荒年缺粮食之时，保持粮价稳定。这样一来就“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汉书·食货志》），人民生活安定，政府财政收入也有了保证。

在政治上，李悝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见《说苑·政理》）的办法。具体说，就是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改为按功劳大小和对国家贡献的多寡，分别授予职位和新的爵禄。对那些于国家没有贡献，而靠老子的爵位享受特权，穿着华丽的服装，出门乘着车马，回到邸衙又沉浸在舞乐之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作威作福的“淫民”，则予以取缔，用这些爵禄去招揽四方新兴地主阶级所需要的士人。这样一来就打击了残余的旧势力，为新兴封建阶级的上升开了方便之门，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

为了进一步巩固新兴封建政权，李悝还用法律的形式把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固定下来。他收集整理了春秋后期以来各国的法律条文，“集诸国刑典”之大成，结合魏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编制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这部法典，后来不仅被他的学生卫鞅（即商鞅）带到了秦国，成为秦国实施法治的蓝本；而且，里面的许多内容，也为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沿用。

李悝的《法经》原文，早已佚失了。但从有关记载，可知原著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6个部分。前面4篇主要讲对“盗”、“贼”进行

关押拘捕的办法。如规定杀人者处死外，对全家和妻家都要收为奴隶。对“大盗”，轻者充军到边远地方，重者处死。《法经》中甚至规定了对在路上拾遗的人，也要砍去脚趾。《杂法》主要规定了对淫乱、赌博、盗窃官府印信、贪污贿赂以及僭越逾制、议论政府法令等等的惩治办法。甚至于对群众集居者，一日就要追问，三日以上的还要处死。可见法律是极为严厉的。《具法》是讲依据不同情况，减免刑的问题。

从整个《法经》看，虽然有的地方也是针对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为非作歹的人，如官吏贪污受贿，规定丞相以下要杀头，太子赌博要受笞刑或废黜等等，但法律毕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具体体现，从整个内容和精神实质看，主要还是对付被统治阶级的，李悝把《盗法》放在首位，就正好说明了这点。

魏文侯用李悝为相所进行的改革是全面的，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魏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强盛起来了，成了战国第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集权国家。

三、吴起和他在楚国的改革

吴起，卫人，出生在一个“家累万金”的富有家庭。为了在政治上求得发展，曾到处奔走寻找门路，花了不少钱财。后来弄得倾家荡产，成了一个破落户，遭到乡人的白眼，有些人讥笑他，诽谤他。由此看来，吴起的家庭虽然富有万金，却不是贵族名门，当是属于新兴的富有者。他把万金家财花光了，也没有取得一官半职。吴起为此气愤不过，杀了诽谤他的人30多个，就逃亡到别国去了。他临行时对母亲发誓道：“不当卿相，决不回卫！”吴起先去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门下学习儒术。不久他母亲去世了，因为没有按照儒家信条回家奔丧守孝，被曾申认为不孝，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弃儒学兵去了。

公元前410年，齐国进攻鲁国。据传，因吴起的妻子是齐国

人，鲁国不愿用他。为了取得鲁君的信任，吴起杀了妻子，以示自己忠于鲁国，于是鲁穆公（前415—前383）才用他为将。这就是有名的“杀妻求将”的故事。吴起当了鲁国将军，即刻率兵迎敌，结果把齐兵打得大败。吴起的军事才能第一次显示出来了，从此有了名气。但鲁国是一个旧礼教特别顽固的国家，世称“周礼尽在鲁”。像吴起这样一位“不讲孝道”，曾被儒门开除过的人，自然很难立足于鲁国的世卿贵族之间。吴起只好离开鲁国。

吴起来到魏国，先住在大夫翟黄家里。翟黄知道他很有才能，便推荐给魏文侯。文侯用吴起为将，率兵攻打秦国，很快连拔五城，夺取了河西之地（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文侯用乐羊攻中山，吴起又和西门豹奉令率兵相助，一起灭亡了中山国。大约在公元前406年左右，吴起被任为西河守，担负着防御秦国、保卫魏国西部边疆的重任。

吴起治兵不同一般将领。他关心士卒，与士卒共甘苦。史载他“常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说他“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与士兵们一样亲自背着军粮，徒步行军。士卒伤口化了脓，他亲自排脓上药。所以，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打起仗来勇往直前。

吴起在西河任上，还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吴起兵法》。这部书在我国军事史上，和《孙子兵法》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秦汉以前流行很广。据《韩非子·五蠹》讲，那时候是“藏孙吴之书著家有之”。凡是谈兵的人，没有不读的。可惜原书后来失散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吴子》6篇，据学者们研究，虽然基本上保存了吴起的军事思想，但已不是原著。

吴起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治西河27年，“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把西河治理得很好，从而“使秦兵不敢东向，韩、越宾从”，“辟地四面，拓地千里”，为巩固魏国西部边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文侯死后，武侯即位。一次武侯与诸大夫乘船巡视西河，看到山河险阻，自以为天赐洪福，出现了骄傲自得的情绪，贵族王错

在一旁还一味地阿谀奉承。吴起当即指责王错，认为这是有害于君王的行为；并以历代兴亡的教训相直谏，要武侯不能以为有了山河险阻，就可以高枕无忧，必须要政治清明，善于治理。吴起的一番话，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魏武侯听后也不得不佩服，称之为“圣人之言也”。但从此吴起也就引起了王错等人的忌恨，他们在武侯面前说吴起的坏话。武侯听信了王错等人的谗言，免去了吴起西河守职务。于是，吴起被迫去了楚国。

中原国家一向看不起楚国，称他为“荆蛮”。其实，楚国在春秋以后并不比中原国家落后，春秋时吞并诸侯国最多的就是楚国。



战国瓦当

据清人顾栋高的统计，春秋间楚灭国达42个。直属中央的郡县制，是楚国在吞灭邻国的过程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689年。公元前548年，楚令尹子木，又整顿田制和军赋，实行了“量入修赋”，促进了封建因素的增长。到春秋后期，公元前479年（楚惠王十年），白公胜企图进行一场较大的变革，结果被以叶公为首的一批旧贵族所扑灭。此后，楚国的政治越来越腐败，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到楚声王（前407—前402）时，由于他的暴虐，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声王为“盗”所杀。声王死后，他的儿子熊疑即位，是为楚悼王。

楚悼王即位前后，一直受到新兴的三晋威胁。公元前404年和公元前391年，楚国两次被三晋所败。第二次由于向秦国送了厚礼，才得以在秦国的帮助下讲了和。在国内，旧贵族既腐败又专横。用当时人的话说是，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他们“上逼主”，“下虐民”（《韩非子·和氏》），结果弄得国贫兵弱。楚悼

王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很想变法图强。正在这时，吴起从魏国来到了楚国。

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能，先任他为苑地守。苑地在今河南南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是楚与中原国家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门户，也是国防重地，有如魏国西河地方一样重要。吴起治苑的时间不长，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经济发展了，边防巩固了。于是，楚悼王便用他为令尹。令尹这个中央政府的官职，和中原国家的卿相或相国差不多，是直接辅佐国君统领大臣处理国家大事的。

吴起受到重用后，决心在楚国进行一番巨大的改革。他在做苑地守时，就注意了解楚国情况，曾走访过一些楚国的大贵族，试探他们对政治改革有些什么看法。据说他曾两次亲访当时楚国的大贵族屈宜臼。一次是做苑地守时，屈宜臼不理他。第二次是做了令尹后，去征求他对自己主张的意见。屈宜臼是坚决反对变法革新的守旧派，骂吴起是“祸人”（《说苑·指武篇》）。但吴起并不灰心，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和楚悼王制订了一套改革办法。主要内容是：

第一，限制旧贵族，改变世袭的分封制，“废公族疏远者”。规定：封君凡超过三世的就取消爵禄，把住在国都的旧有显贵迁到“广虚之地”（即地广人稀的地区）。

第二，厉行法制，严明法令。“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裁减无能无用的官员，废除不急需的官职）。

第三，整理财政，节省费用，奖励耕战，加强国防。把裁减下来的爵禄，用来抚养士卒，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第四，建设国都，重视人民生计。改变国都原来那种简陋的“两版垣”（只两版高的城墙），把城墙加高，以增强首都的防卫能力。

吴起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改善财政和增强军事力量方面，从而使国家富强。经过这一改革，那些腐朽、顽固守旧的贵族势力受到了打击。一些无所作为、作威作福、

“上欺主而下虐民”的旧贵族官僚被撤换了。这样，统治的效率提高了，楚国出现了新气象。

吴起变革的时间虽不长，但在楚国却造成了比较深远的影响。比如对封君的限制，我们从1958年在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便可以看到。鄂君启节是楚怀王时（前328—前299）封君鄂君启的通行证，上面记载有对封君的各种严格限制，如车船的大小、载重、行程等，都限制得很严。应该说，这是吴起改革后的深远影响的一个表现。经过吴起的改革，楚国确实有所强大。不仅过去欺负它的三晋不敢再轻易地侵袭，而且楚国还向外开拓了疆土。它西伐秦，南收杨越，北并陈蔡，成了南方的一个强国。但就在楚国走向强盛之时，积极支持革新的楚悼王突然死去。

吴起变革的后台一倒，原来那些在变革中受到压抑和打击的旧贵族，便乘机发动了政变。吴起正在为悼王办理丧事，叛军包围了他，并以乱箭相射。吴起眼看不行了，但又不甘心旧贵族的猖狂反扑，于是他就伏在悼王尸体上。楚国的法律规定：如果有谁伤了王尸，就要“尽加重罪，逮三族”。那些围攻吴起而箭射中王尸的旧贵族们，在太子（楚肃王）即位后，依照楚国的法律，“夷宗死者七十余家”。有的贵族如阳城君只好逃亡出国。不过，吴起的新政也被废除了。楚国的旧势力又有所抬头，使楚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虽然楚国地大物博，也未能成为统一六国的力量。

四、田氏代齐与威王图治

齐国原本姜姓，是西周初姜太公的后裔，战国初为妫姓之后的田氏所取代。虽然国仍号齐，但已换了主人，历史上称之为“田氏代齐”。

田氏，是春秋时陈国厉公（前706—前700）的后代。陈是妫姓国家。陈厉公的儿子叫陈完。相传陈完出生时，周太史（史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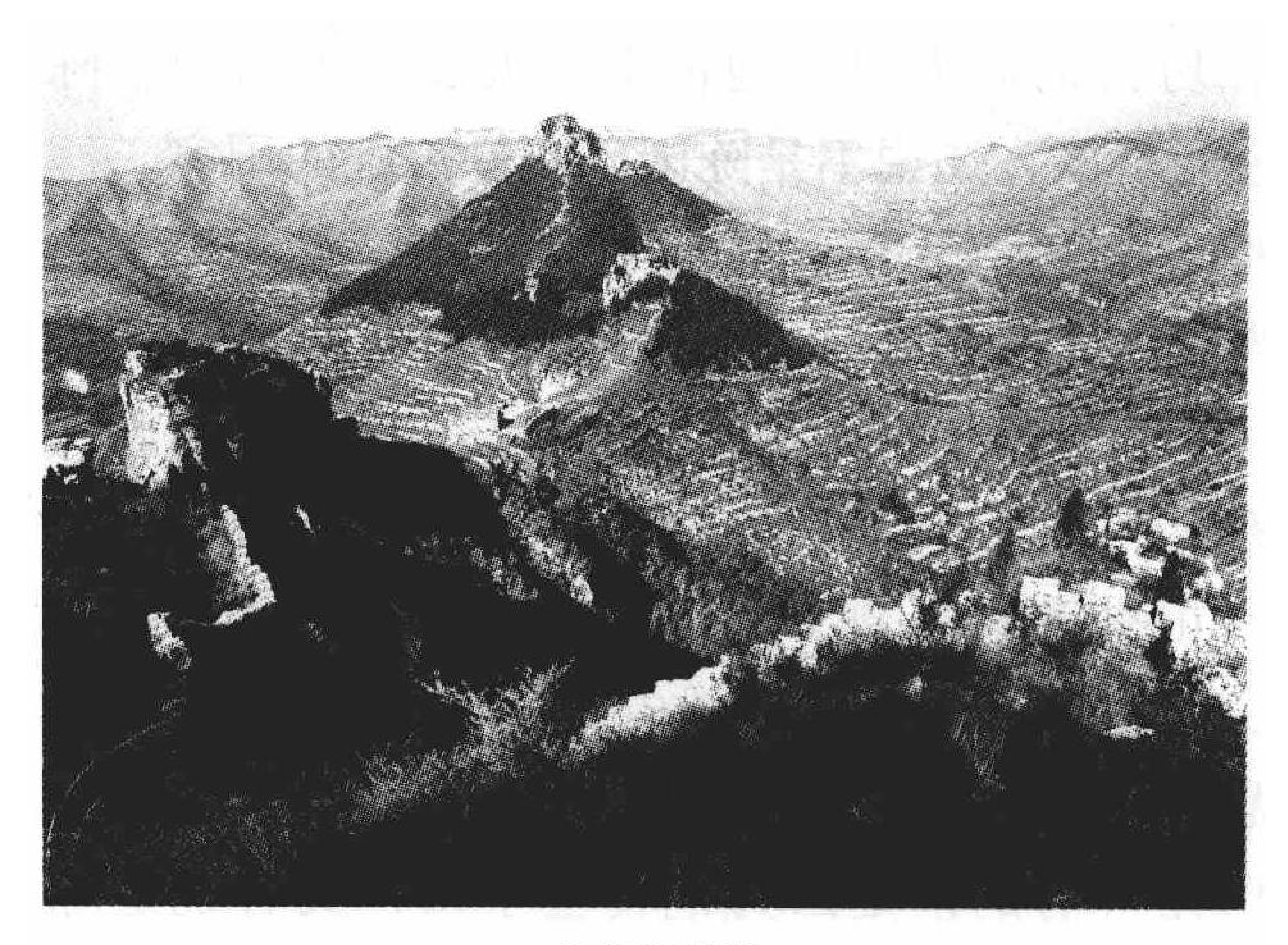
并掌占卜）路过陈，厉公请周太史为他占卜。太史占卜后说，陈完的子孙有取得国家的可能，还说不是陈国，而是姜姓的国家。

后来，陈厉公的侄儿杀厉公而自立，史称陈庄公。陈完没有当上陈国的国君，只当了大夫。其后，陈庄公的弟弟又杀了太子御寇，自己当了国君，叫陈宣公。御寇和陈完很要好，陈完怕因此株连到自己就逃出了陈国。

陈完来到齐国，正是齐桓公即位的第四年（前 682）。齐桓公要立他为卿，陈完推辞说："我是逃难在外的人，哪能受这样的高位呢？"桓公就让他当了齐国的工正（管理工匠的官）。陈完到齐后，改名叫田完（有的说是因为他食邑于田；又有说是陈与田声近，到齐后不便用原国名为姓，就改作田完了）。这时，齐国有个叫懿仲的贵族，打算把女儿嫁田完为妻。经过占卜，说：妫氏之后与姜姓结合，五世以后就会昌盛当正卿，八世以后就能取得国君的地位。齐桓公十四年（前 672），田完死，谥号为"敬仲"。所以《史记》作者司马迁为田氏作《世家》时，篇名为《田敬仲完世家》。

到敬仲五世孙田桓子时，似乎"应"了田完结婚时的占卜，昌盛起来了，开始当了齐的大夫。桓子联合齐国的鲍氏，向当时专权的栾、高二氏发难，趁他们饮酒的时候，一举诛杀了二氏，没收了两家的土地。田氏为收买人心，他自己一点不要，把土地都分给了过去受栾、高排斥打击的贵族，或是因贫穷而没落的贵胄子弟。于是田氏在齐国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了。

田桓子死后，田僖子（田乞）继立。僖子和晏婴（即晏子、晏平仲）曾同事齐景公（前 547—前 490）。这时已是春秋后期。新兴的封建势力在齐国已渐渐强大，开始了向旧势力夺取权利的斗争。田氏为了广泛争取民众，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采取了一些收买民心的做法，如用小斗收取赋税，大斗放出来，使下层人民得到一定好处。这种做法引起了晏平仲的注意。晏平仲曾劝谏过齐景公，要他警惕田氏的所作所为。但景公非但不听，反而把晏平仲打



齐长城遗迹

发到晋国去。晏平仲在晋国与叔向谈到齐国这些情况时说：齐国的政权势必要归于田氏了。

齐景公死后，齐国的旧贵族，特别是国氏和高氏，为了更好地控制齐国，要立景公宠姬的儿子为国君（即晏儒子）。田僖子不同意，联合另外一些贵族，赶跑了晏儒子，立景公另外一个儿子做国君，即齐悼公。田僖子也因此当上了齐的相国，开始执掌齐国大权。

田僖子死后，儿子田常（即田成子）继立。齐悼公被旧贵族鲍氏所杀，另立了一个齐简公。简公用田常和监止为左右相，但特别信任监止。田常为了和齐国的旧贵族斗争，也学着他父亲田僖子那样，继续做争取人心的事，以便取得民众的支持。他借出去用自家造的大斗，收回时用公家造的小量。他还注意发展经济，在田氏管辖的范围内整顿市场，使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拥护田氏，“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到处可以听到歌颂田氏功德的声音。田氏的势力强大之后，借故杀了齐简公，更立其弟骜为齐君，就是齐平公。平公用田常为相。为此田常怕受到别的诸侯国反对，又采取了结好各国诸侯的办法。他主动退还了原来齐国侵占的鲁国和卫国的土地，并与吴越通使。待站稳脚跟，势力巩固后，田常又进一步除掉了鲍、晏、监止三大旧贵族。于是，齐国的政权完全控制在田氏手里了。

田常死后，儿子盘（又作班）立，称为田襄子。襄子继续为齐相，这时已是齐宣公时候。宣公三年（前453），晋国的韩、赵、

魏三家灭知伯，这一事件，对田氏代齐也起了促进作用。田氏为了取代姜氏齐国，又进行了许多准备。他一面把自己的兄弟、亲家派到齐国各地的都邑去做大夫，以便全面控制齐国的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在外交上继续结好各国诸侯，特别注意与新兴的“三晋”拉关系，为取得各诸侯国的支持做准备。

公元前404年，田和（即田太公）立。这时正是姜姓齐国的末代国君齐康公即位。康公是个昏君，他贪恋酒色，不理朝政。于是，在公元前391年，田和借机把这位昏君放逐海上，只留下一城之地作为他的食邑。田和成了事实上的齐国之君，姜氏齐国到此变成了田氏齐国。

到了公元前387年（周安王十五年），田和与魏武侯在浊泽相会，请求魏侯出面在周天子面前同各诸侯国周旋，照着当年三家代晋的先例，把自己也正式立为诸侯。第二年，田和即被周天子封为齐侯。田氏在齐国的政权合法化了。

田和取代姜齐为侯，标志着齐国新兴势力已经正式掌握了政权。但是，任何新政权建立以后，都不会一帆风顺地巩固发展。由于旧势力的影响，以田氏为代表的新兴势力的发展道路，还是坎坷不平的。田和正式列为齐侯后30年，田因齐即位，就是后来的齐威王。当时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还很激烈。摆在威王面前的田氏齐国，问题仍然不少。在内部，朝内朝外还有像阿大夫那样身居高位、不尽职守、喜欢拉拉扯扯的官吏。这些人拉帮结伙，以邪压正，打击排挤正直官员。这对新兴封建统治政权，就像腐蚀剂一般，是很大的危害。

在外部，田氏虽被周天子正式列为诸侯，并为各国所承认，但由于国势弱，仍然被别的诸侯国看不起。因齐即位后，曾接二连三遭到别国的侵袭。据《史记》载：即位的第一年，韩、赵、魏就攻齐；到第六年，鲁国也来进攻；第七年，连那时力量不大的卫国也欺负起齐国来了；到第九年，赵国又再次攻齐。

齐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因齐上台9年，对此一筹莫展，只

好委政于卿大夫，听之任之。这样下去，当然对齐国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是不利的，引起了齐国人民极大的不安；特别是新兴封建阶级里有眼光有作为的一些代表人物，心里更为着急。他们希望改变这种现状，使齐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邹忌鼓琴谏威王的故事，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邹忌，应该说是齐国新兴封建阶级中的一个有识之士。他眼看齐国再这样下去，确实很危险，于是，不顾个人得失去劝谏威王。齐威王最喜欢听琴，邹忌声称给威王演奏。可是，邹忌调整好琴弦却停了下来。威王问他为何不弹，他说，我不光会弹琴，还有一番弹琴的道理呢。于是就借讲“弹琴”的道理劝谏威王。齐威王听后，很受感动，即用他为相，辅佐自己整顿朝政，下决心要励精图治。这件事充分反映了齐国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图强的愿望和信心。大约就在因齐即位后尚未称王之前，他铸了一件铜器，上面有一篇 79 个字的铭文，其中有一段就充分反映了以威王为首的齐国新兴势力发愤图强的决心。原话是：

“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尔嗣桓文，朝问诸侯。”（见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第九卷《陈侯因資敦》铭文）

这个“陈侯因資”就是田因齐，也就是后来的齐威王。“敦”是铜器的名称。原话的大意是说，他要继承和发扬他的父亲——田桓公午的业绩。远则要学习远祖黄帝（中原国家都自认是黄帝之胄），近则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号令诸侯的霸业。

齐威王用邹忌为相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主要的是修明法令，整顿吏治，集权中央。提出“谨修法而督奸吏”，首先做到端正君臣关系。邹忌认为，应该树立正气，打击邪气：做臣下的，要尽心竭力地辅佐国君，把国家的事放在第一位；做国君的，要顺民心，体贴民众，要亲贤人，远小人，鼓励臣民进谏，不为阿谀奉承的人所蒙蔽。只有这两方面搞好，国家才有希望。

齐威王完全采纳了邹忌的意见，曾下令臣民们：有能当面提出批评建议者，给上等赏；用书面提出给中等奖；在街头巷尾批评议论者，只要传到国君耳里，也要奖赏。据《史记·田世家》讲，这诏令下达后，开始时提批评建议的人争先恐后，“门庭若市”，数月后才慢慢减少。

为了整顿吏治，齐威王选择了两个典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处理。威王多次询问臣下，在地方官中，谁最好？谁最坏？不少人说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大夫最坏，最好的要算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大夫。威王便派人下去了解实际情况，待掌握了实情后，威王把即墨大夫和阿大夫以及其他官员都召到朝廷上，对即墨大夫说：“你到即墨后，常常有人说你不好。我派人去了解，发现你在那里治理得很有成绩。人民有吃有穿，社会秩序安定，府库增加了积蓄，出现了一派新气象。你勤勤恳恳治理即墨，又不向上级送礼行贿，所以别人说你不好。”于是赏给即墨大夫万户租税作为俸禄。威王对阿大夫说：“你到阿地后，常常有人为你说好话。我派人去了解，发现那里田地荒芜，人民缺衣少吃，老百姓话都不敢多讲，只在背地里埋怨你。赵国和卫国进攻附近地方，你也不去帮助抗击，只会欺压民众，向上司行贿，求得向上爬的机会，把齐国的风气也给败坏了！”下令立即把阿大夫和朝中受贿者以及为他说好话的几个官吏一起烹杀了。

这样一来，整个齐国的风气为之一变，“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威王又选用贤能的人，让他们充任要职。他派檀子守南方，使楚人不敢侵扰；使肦（fén）子守高唐，赵国不敢东进；使黔夫守徐州，燕、赵两国都感到害怕，7 000 多户前来归附齐国。又用钟首防治盗贼管理治安，于是道不拾遗。魏惠王曾讥笑齐威王国大不如魏国宝物多，威王则以有大批贤能之臣而骄傲，回答魏王：这比你的可以“照车前后各十二乘”的“经寸之珠”还贵重多了呢，使魏王深为惭愧。

齐国经过威王和邹忌的努力整治，在不长时间内就大治了，史

称威、宣时“齐最强于诸侯”，不仅打退了赵、卫的侵袭，还迫使赵国归还了侵地长城。三晋中最强大的魏国，也多次被齐国打败。有一次，把魏王围在浊泽，魏惠王只好献地求和。还有两次与魏的较量，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是“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一是大家熟知的马陵之战，两次都把魏国打得大败。

桂陵之战是战国史上有名的大战役，但说法不一，故这里再多说几句。事由魏攻赵开始的。当时魏派将军庞涓率兵围攻赵都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决定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前往救赵。孙膑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认为魏攻赵，兵力全部集中在邯郸周围，国内兵力必定空虚。这样，齐若扬言进攻魏本国，魏王必调回攻赵之兵自救，齐在途中截杀回国的魏军，出敌不意，定能大败魏军；齐兵不用去赵，而赵围自解。于是，齐军声称出兵进攻魏都大梁的门户襄阳（今河南睢县境），襄阳一破则大梁难保。魏国听到后，果然急调庞涓回兵相救。与此同时，孙膑则选择了魏军回兵必经之地桂陵（今山东菏泽境）设下埋伏，结果大败魏军于桂陵，主将庞涓被擒杀①。过去都说庞涓死于齐魏马陵之战，据1972年出土的《孙膑兵法·擒庞涓》章所记，庞涓实死于这次桂陵之战。关于桂陵之战的时间，依《史记·田世家》当在齐威王二十六年（前331），近人有认为在威王四年。我们以为还有待进一步考究，此暂存疑。

桂陵之战后，齐国就自称为王，而与战国前期称强一时的魏国相抗衡。后来魏惠王采用了惠施的策略，与齐威王在徐州相会，相互正式升格为王。

五、韩昭侯与申不害

公元前453年（周定王十六年），韩、赵、魏三家灭知伯分其

① 据有人研究，秦汉以前的“擒”，并不是后来的活捉之意，而是有死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是死了。

地，当时韩家的首领是韩康子。韩康子死后，儿子韩武子继立。武子立16年而死，由其子韩虔即位。韩虔即位第六年，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与赵籍、魏斯正式被周天子列为诸侯。韩虔即韩景侯，韩昭侯是他的六世孙。

三晋中的韩国，处在秦、楚、赵、魏之间，是一个地盘比较小的国家。韩虔正式取得诸侯封号仅三年就死去了，新兴的韩国政权尚未巩固。景侯虔死后，子韩列侯即位。第三年列侯的相国侠累又被严中子派人刺死。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写过一出《棠棣之花》的剧，就是以这个故事为素材的。关于这件事的真实历史背景和性质，因为材料有限，不便论定。但从有关记载看，据说是因为严中子与相国侠累意见不合，发生了争吵，甚至尖锐到要动刀剑，只是当时被人劝阻才未立即造成流血事件。事后严中子出走，在齐国结交了一个因杀了人从魏国逃出来的聂政。聂政受严中子之请去刺杀侠累。不管这件事的历史背景和性质怎样，至少说明韩国内部不是很安定的，这对韩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有很大影响。到了韩哀侯（前376—前371）时，国君又被杀。这一连串的事件，使韩国新的统治政权受到削弱，国力不强。在外部，因为国力弱，周围大国对它的威胁也很大。就在哀侯六年（前371），秦国伐宜阳，攻取了韩国的6座城邑。后来韩国虽然灭了郑国，并迁都到新郑（前375），但并不表明韩国力量的强大。实际上，迁都新郑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为了避免强大的秦国对都城的威胁。

到了韩昭侯（前358—前333）时，列国中大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变法和改革，新兴阶级在各国基本上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并且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些国家相继强盛起来，不断向外进行扩张。就连当时的宋国，也欺侮起韩国来，攻取了韩国的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魏国更是多次进攻韩国，后来韩昭侯和魏惠王在巫沙相会修好，才暂告缓和。国内外的种种形势，对韩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于是，韩昭侯不得不考虑变革图强。

大约在公元前354年，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

诸侯。”

申不害的生平事迹，有关记载不多。《史记》把他放在《老庄申韩列传》中，其中有关申不害的事迹只有69个字的简单记载。从有关记载，我们知道：申不害原来是郑国京人（今河南荥阳县），出身比较微贱，韩昭侯时为韩相15年而卒。推算起来，大致死于公元前339年，生于何时便无从得知了。申不害是一位学有专长的政治思想家，司马迁说他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和《汉书》都说他有著作传世。《汉书·艺文志》记有《申子》6篇（比《史记》讲的多2篇），可惜后来都佚亡了。我们只能从《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以及后来的类书，如唐代魏征主编的《群书治要》、赵宋时代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等书中，见到一些片断的文字。据研究，原《申子》中有《大体篇》，保存在《群书治要》中。后人有根据古籍辑录的《申子》，但都不是原书的面貌了，而且不全。

从有关申子的一些材料中，我们可以见到申不害的主要思想和他的主要政治主张，以及他相韩15年间的大体活动与政绩。

申不害是主张“法”和“术”的。所以人们有时称他为“法术士”。他的所谓“法”，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法治的意思；“术”则是一种用以贯彻执行“法”的手段或方式。他在相韩昭侯时，曾努力把他的“法”的思想付诸实践，作为他治理韩国的准则；把“术”用到在韩国推行政治改革、贯彻法治的实践活动中去。

首先，申不害认为，君主治国，务要明法察令。他说：“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又说：“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这就是说，国君一定要确立法治，法就像称重量用的秤那样，有了秤才能量知物重；有了法才能驾驭臣下的行为。也即是说，只有确立了法，一切人事关系和国家制度才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依据，从而才能建立起新兴封建阶级的统治秩序。

其次，申不害主张，有了“法”，就要依法办事，反对统治者

凭主观心智和个人的善恶去随意决定政策措施、赏罚制度。他认为，单凭各人的“耳目心智”是不行的。就是国君，也应该“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不依法行事，而根据各人的心智、好恶，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随心所欲，就会把国家搞乱。他指出，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一个大问题。

第三，申不害在提出法治的同时，还强调“术”的作用，用“术”去推动“法”的实施。他是主张国君集权一身的，用他的话说就是“独断”，认为独断者才能为天下主。要把国家官吏的设置、任免、考核、赏罚等以及生杀予夺之权，都牢牢地掌握在国君个人手中。他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持者也。”他的这一套，后来为韩非所重视，在《韩非子·定法》中特地加以引述。

第四，为了要更好的驾驭臣下，考核臣下，促使臣下去各尽其能，办好任内之事，申不害还主张做国君的要“无为”而治。他的“无为”，并非简单的无所作为，是表面无为而实有大为，是贯彻他的法治的一种手段。他要国君平常不要让臣下看出自己的欲望和某些弱点，使臣下猜不透内心的某种意图，臣下就不至于揣摸着国君的心理而投其所好，或弄虚作假，从而臣下就只好去尽力做自己的事。但他又反对越职乱来，提出“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只准各自办好职分之内的事，不相干的不要去随便干涉。这样，也就便于国君集权专制了。

总之，申不害在政治上，正如《史记索隐》作者司马贞所说的那样，是主张“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建立起一种遵循一定法制的新兴封建阶级的高度君主集权制统治。

为了使新兴封建阶级的国家政权得到巩固，申不害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相应的办法。他特别注重农业生产，把土地看得十分重要。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曰贵土，土，食之本也。”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要粮食，“王天下”者，“必当国富而粟多也”。这是一种重农思想的表现。这种重视农业生产的思

想，是法家人物所共有的。

申不害的上述主张，在他相韩的15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执行，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史记·韩世家》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韩。"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他那一套法术，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障碍。因而，他在韩国的一些改革也是不彻底的。其表现，正如《韩非子·定法》所说："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改，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发布了一些新的法令，但他并没有废除旧有的法令；不仅韩国先君的旧法未变，连过去晋国的旧法也没有废除。这样不仅使官员们无所适从，而且容易被一些人钻空子。比如，当新、旧法有抵牾时，一些反对新法的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拿旧法来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辩解。这是韩国改革不可能彻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韩国的旧势力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连支持他变革的韩昭侯，也信心不足。昭侯曾对申不害说："法度甚不易行也。"之所以不易推行，据申不害讲，主要就在于，昭侯虽然同意发布一些新的法令，但又往往听从左右一班人的错误意见，因而就不能坚决贯彻实施。加之昭侯晚年，不顾人民疾苦，大兴土木，修筑所谓"高门"，耗费了韩国不少的人力和财力。所以，韩国虽经申不害15年的苦心整治，但成绩并不显著，远不如魏、齐、秦等的改革收效大。无怪乎韩国在三晋中，以至于战国群雄中，始终处于弱小的地位。

六、秦孝公求贤与卫鞅变法

秦国地处西陲，长时间被中原国家视为戎狄之邦。到春秋秦穆公（前659—前621）之时，国力才渐渐强大起来。史称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秦成了西方一大强国。

春秋战国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秦国和中原各国一样，内部产生了一些新的封建因素。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秦简公（前

414—前400）时实行了“初租禾”（前408），这和东方各国的“初税亩”等差不多，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地租的封建剥削方式。但是，秦国的封建关系发展仍很迟缓，旧势力仍很强大，特别表现在秦厉公（前476—前443）、秦躁公（前442—前429）、秦简公和出子（前386—前385）等几个君主的时候。秦国的贵族侵凌公室，干涉君位，曾多次发生内乱，使秦国政权分散，君权削弱，国势日衰。各国也乘机欺负秦国。魏文侯曾用吴起为将，一举连拔秦国五城，夺去了河西大片地方。楚国也攻占了汉中之地。东方各国的诸侯又都看不起秦国了。

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想改变秦国内忧外患的处境。他首先废除了野蛮的人殉制度，并着手清理全国户籍，整顿卒伍；又在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开辟市场交易，注意发展经济。在献公统治的23年里，国势有了好转，为后来孝公的改革准备了条件。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他的21岁的儿子渠梁即位，就是秦孝公。孝公是一个有作为的国君，他看到东方国家经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后，国力都加强了，特别是东方的齐威王、魏惠王，是当时七雄中力量最强大的两霸。孝公决心继承献公的事业，使秦国很快地强盛起来。于是，秦孝公广泛地收揽人才。他下了一道求贤的诏令，说：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这个求贤诏令的大意是说，过去在秦穆公之时，实行德政，加强武装力量，平定了晋国的内乱，东边国土直达黄河，西边征服了戎翟少数族，开拓了上千里的大片国土，天子和诸侯都来祝贺，为后世开创了基业，好不荣耀！只是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和出子之世，由于内部忧乱，没有力量抵御外患，才把先君开辟的国土河西地方丢失了（被三晋中的魏国所夺），诸侯都瞧不起秦国，想到这里，感到脸上很不光彩，非常痛心。如今要下决心光复穆公之业。在宾客和群臣中，如果有谁能出奇计使秦国富强起来，就重重封赏。孝公一面下令求贤，一面又在国内赈济孤寡，募集战士，严明赏罚，设法使国富民强。


商鞅画像

就在这时，有个叫做公孙鞅的人，从魏国来到秦国。公孙鞅又叫卫鞅，原是卫国贵族子弟，从小就好“刑名之学”，曾受过法家李悝、吴起的影响。当他还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叔痤（cuò）手下做小官时，公叔痤见他很有才能，临死前，曾把他推荐给魏惠王，并说：如果不用就把他杀掉，不能让卫鞅离开魏国。魏惠王以为公叔痤病重说胡话，因而没有用卫鞅。公叔痤死后，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就到了秦国。

公孙鞅到秦国后，先住在孝公的亲信景监家里，并通过景监的关系得与秦孝公三次相见。前两次游说孝公要学尧舜禹汤的仁义，行所谓帝王之道。秦孝公听得直打瞌睡，生气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简直太迂腐了，我哪能用他呢！景监告诉卫鞅，孝公对他的谈话很不满意。公孙鞅要求再与孝公谈一次话。过了不久，孝公第三次接见公孙鞅。此时的公孙鞅已经摸透了孝公的心理，他是迫切希望秦国富强起来，不愿意慢慢地去实行“王道”。于是就大谈其富国图霸之术。这一下可把孝公的心打动了。孝公听得津津有味，高兴

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果然是好样的！一连和卫鞅谈了几天。

秦孝公准备用卫鞅进行一番改革。臣僚中有些人坚决反对，连孝公本人也存在一些顾虑。据《商君书》载：有一次，孝公跟卫鞅、甘龙、杜挚一起商议变法的问题。秦孝公说："继承了君位，不忘国家大事，这是一个国君应该抱的态度；执行法令，努力宣扬国君的威德，这是作臣下应尽的责任。我今天打算变更旧法制，借以教育百姓，治理国家，但是，又恐怕天下之人议论我。"

公孙鞅听了觉得，要是国君瞻前顾后，不能坚决行动，在秦国进行改革就难了。必须首先使国君有坚定的信心，方能推行改革。于是他说："有独到见解，做法高明的人，总会受到世俗常人的讥笑和反对。愚笨的人往往在事情发生后还不知为什么；而聪明的人，则能预见事情的苗头。做大事业的人是不和一般人商量的。至于说到法呀、礼呀，这些本来就是为了便于治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所以圣贤的人，只要能使国富民强，就不必按旧的制度去办，没有必要遵守老规矩。"秦孝公称赞公孙鞅说得好。

可是，在一旁的甘龙不同意，他认为："圣贤之人不用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是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的。遵循民众旧习来施教，不用费多大力气就会得到成功。依据旧有的法制来治理国家，官吏民众都很熟悉，就不会引起混乱。如果现在要变法，不按老规矩办事，天下人就会议论。"要孝公仔细考虑，不要轻举妄动。

杜挚也反对公孙鞅的看法。他说："守古法没有错，依照旧礼俗不会出偏差。"

公孙鞅毫不妥协，严加批驳道："治理天下不能只按照一个道理，为了国家的利益，不一定要效法古代那一套。成汤（商代开国之君）和周武王，他们并没有遵循古代的制度，也兴旺发达了起来。商纣王和夏桀，没有改变旧的一套，却照样亡了国。"

双方面对面的斗争非常激烈。通过这场舌战，以杜、甘为代表的因循守旧势力失败了，公孙鞅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胜利，而且说

服了孝公，使孝公坚定了变法的决心。这是秦国新兴势力的一个初步胜利。

公孙鞅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孝公六年（前356）公布的。主要内容有：

（1）编定户籍，实行“连坐”。公孙鞅把全国居民，按照5家为“伍”，10家为“什”编定户籍。这样不仅使国家直接掌握了全国户口数，而且便于相互监督。新法规定，有犯法而不报告的，10家都得受到连坐，处以腰斩；报告人和杀敌者同样受奖。隐藏罪犯，按投敌者论处。

（2）奖励军功，严禁私斗。新法规定，凡为国家立有军功的，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私斗者按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刑罚。这样就增强了军事力量。

（3）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制，重新确定爵位和等级。新法规定，宗室（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得享受宗室的特权。必须依据对国家功劳的大小，确定爵位、田宅、奴婢以及车服器用等等的占有，不许僭越逾制。有功的就显荣，没有功劳的，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这就严重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

（4）鼓励个体小家庭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新法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要加倍出赋税。努力搞好生产，粮食和布帛生产得多，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而贫穷了的，把全家罚做官奴隶。

为了新法能在民众中贯彻实行，公孙鞅还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据说，他在国都的南门外立了根3丈长的木头，宣布：如有人搬到北门，赏给十金。老百姓一般都很奇怪，没人敢去动。后又宣布增加到五十金，有一个人不怕事，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公孙鞅果真发了五十金的赏钱给他，表示公孙鞅说话是算数的，从而也教育了民众。这时公孙鞅才把新法正式公布了出来。

新法公布后，国都很多人议论，一些旧贵族也不满意，其中太

子明知故犯。公孙鞅认为，新法之所以贯彻有困难，主要就是这些自恃位高势大以为别人不敢动的大贵族们不遵守。为此，公孙鞅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脸上刺字的刑罚）其师公孙贾。”从此后，再也没谁敢不遵守新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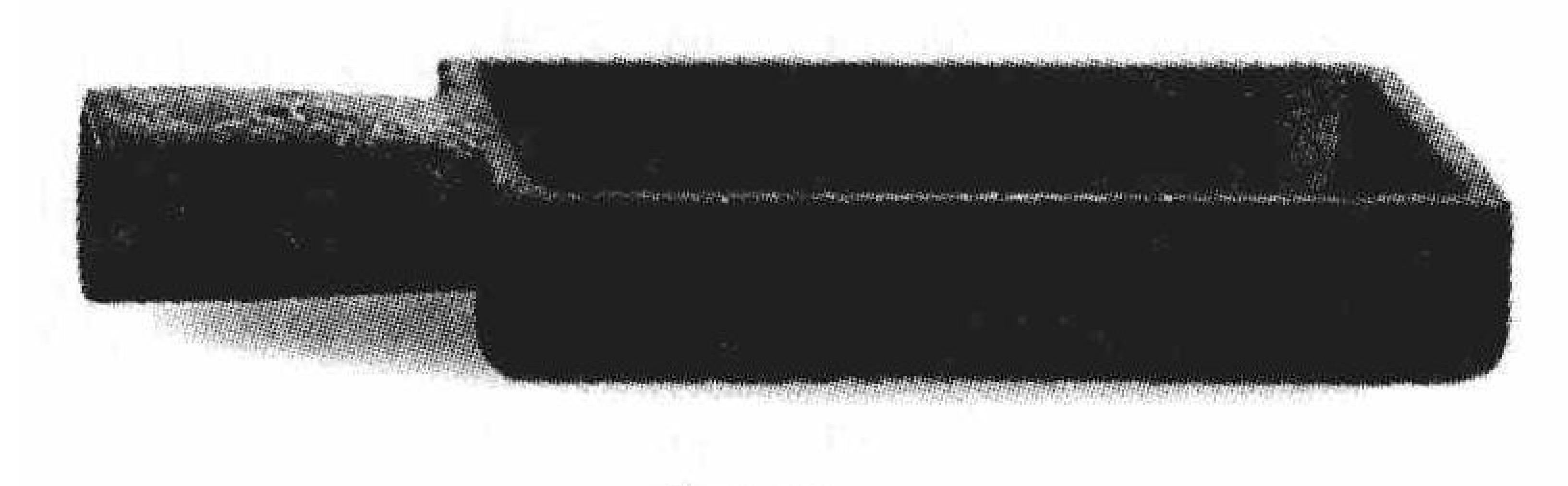
新法推行10年，取得了显著成效。据《史记·商君列传》讲，秦国的民众非常高兴，人民丰衣足食，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大治的局面。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十二年），秦国把都城迁到了咸阳，同时进一步进行改革，这就是一般讲的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有：

（1）在全国普遍建立县制。新法规定把原来的小乡邑加以合并，统一规划为31县[1]。县设令、丞（令是一县之长，丞辅助令管文书、库房、狱讼等），直接由国君任免。

（2）“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这是把从前所谓的“井田制”那种纵横疆界消除掉，鼓励开辟荒地，承认土地私有，可以买卖，按照土地多寡征收赋税。这样一来，就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

（3）“平斗桶、权衡、丈尺”，统一秦国的度量衡，这样方便了税收和交换。现有“商鞅尺”、“商鞅量”，就是保存至今的绝好历史见证。1966年，上海博物馆曾征集到一件商鞅方升，它就是50多年前发表过铭文和不准确的形制拓本的商鞅量实物。这件宝贵的文物，是商鞅为统一度量衡而作的标准量器。



商鞅量

（4）焚诗书，制秦律。秦国焚诗书，一般都以为是从秦始皇开始。其实在秦孝公时就实行过。商鞅还根据李悝的《法经》，制

---

① 《史记·秦本纪》作四十一县；《商君列传》作三十一县。

订了秦国的法律。秦律的制定，是用法律的形式把他所实行的各种改革成果固定下来。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以后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也很大。

商鞅在秦孝公的赞助下实行变法，前后达一二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发展了封建经济，巩固了统治秩序，奠定了富强的基础，从而使秦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秦国能够最后消灭六国割据势力，统一整个中国是和公孙鞅的改革分不开的。

秦孝公因卫鞅有功于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所以又称为商鞅。据《战国策·秦策》讲，秦孝公在病重时，还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呢，但商鞅不肯接受。孝公死后，太子即位。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旧贵族乘机报复，诬告他想谋反。商鞅打算逃往他国，结果在途中被抓了回去，车裂而死。

商鞅是处在上升时期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他办事“公平无私，罚不讳强，赏不私亲近”，是很了不起的。秦国变法能够取得当时各国变法中所没有的成就，不能说与他的这种品格没有关系。

商鞅虽然被旧贵族杀害了，但商鞅的变法成果，却在秦国生根发芽了，变法中提出的许多措施，一直沿袭到秦亡为止。比如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的。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重要地位。商鞅统一度量衡时定下的标准，直到120多年后的秦始皇还沿用着。据对出土文物实测，秦始皇时的方升容量，和当年商鞅方升容量基本一样，误差不过1/100。

总之，商鞅的变法无疑是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影响也是深远的。在秦国，从此法家思想就一直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这对封建制的发展和巩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法家的严刑峻法，特别是商鞅开创的“焚诗书禁游说”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政治思想，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这一点，

又集中反映出新兴封建统治阶级，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有其残暴的一面。

七、赵、燕与其他各国的改革

赵国的改革活动，不像魏国、楚国，更不像秦国那样轰轰烈烈。但赵国新兴封建势力也和别的国家的新兴封建势力一样，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过程中，也进行过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改革。三晋中的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之一赵简子（即赵鞅、赵孟），在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与邯郸范氏、中行氏等作战的时候，为了战胜敌人，在誓师辞中就提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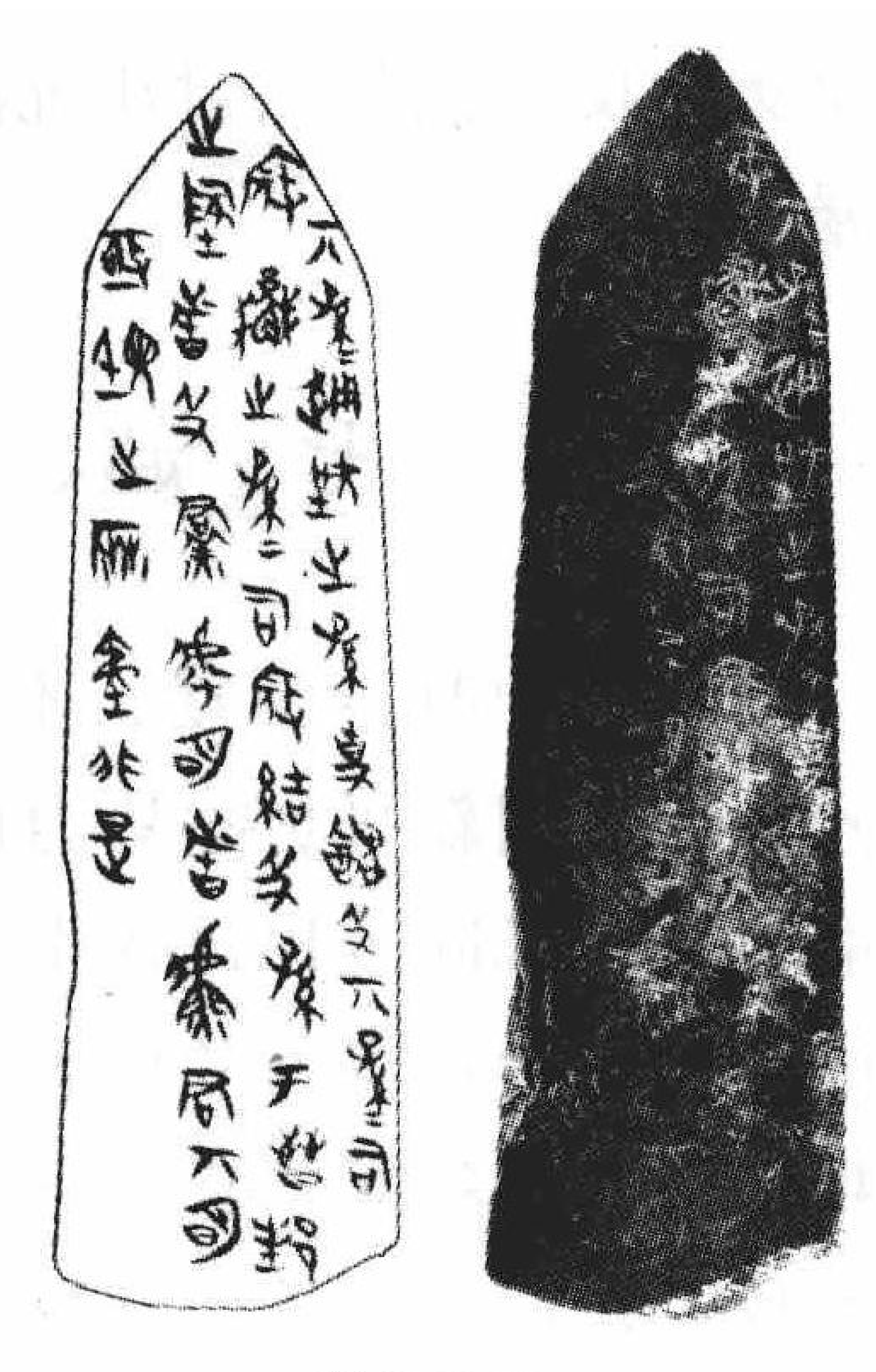
>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意思是战胜敌人的，上大夫受给县，下大夫受给郡，士赏给田地10万亩，庶人、工商业者得到晋升，奴隶得免除（即解放奴隶之意）。从这里不难看出，赵简子是实行军功制。只要立有军功的，都可以上升；特别是"人臣隶圉"这些原来处于奴隶地位的被压迫被奴役的阶级，也有了机会上升为自由民。这对生产力的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墓中出土的竹书《孙子兵法·吴问篇》中记载，孙武和吴王议论晋国的"六将军"之时，孙武指出，在"六将军"管辖的地区内，实行的都是按亩收赋的办法。其中赵氏把百步为亩的旧制，改成240步为亩。这种办法，是有利于民众的。可见，赵国在正式建国之前就已在赵氏控制的地方实行过田制和赋税的改革了。

另外，从1965年12月在山西侯马出土的一批盟书中，也反映出赵氏早在简子之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就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

这批盟书中，有关于限制奴隶占有的记载。盟书中称作限制“纳室”。所谓“纳室”，从《左传》中记载的有关“兼其室”、“取其室”、“纳其室”来看，其意思是一致的。意即把别人变为自己的附庸或奴隶的意思。室，除了像“公室”之类的室外，这里的室是春秋时期奴隶主占有奴隶财产的单位，它包括私属的田地和徒众等在内。其中主要指的就是土地和奴隶。


侯马盟书

到了列侯赵籍（前 408—前 400）之时，随着新兴封建势力政权的取得和巩固，这种改革逐渐完成。列侯用公孙连为相，公孙连又向列侯推荐了一批贤能之士，如牛畜、荀欣、徐越三人，是当时社会上有名的贤人。列侯用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依靠他们整顿吏治，改良统治机构。实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根据功德和能力大小授予官职。在经济上，注意节省财政开支，实行所谓“节财俭用”。

当时赵国的这些改革，和当时列国的改革一样，其本质都是为新兴封建势力的发展和巩固服务的。

七雄中还有一个燕国。燕是召公奭的后代，原是西周在北方的重要封国。但春秋时因戎狄所阻隔，与中原各诸侯国的交往较少，所以《左传》、《国语》等书有关燕的记载很少。进入战国时，燕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对东北辽东的开拓。但在战国七雄中比较起来不很突出。就有关材料所记，到了燕王哙（kuài）之时，才在相国子之的主持下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改革并没有完成，燕国就发生了动乱。据有关记载，燕王哙演了一场“禅让”剧，他没有把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禅让”给正进行改革的相国子之。这里是有文章的，表面上是一种“禅让”、“传贤”，实际上是燕国新兴

的封建势力强大了，迫使旧统治者交出政权的一种形式。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原国家，包括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在内，新兴的封建势力都已通过各种途径，在政治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燕国在当时内外形势的影响下，燕王哙戏剧性的“禅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常说战国七雄，并不是说当时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就只有韩、赵、魏、齐、楚、燕、秦七个诸侯国家。事实上，在战国时代一个较长的时间里，除“七雄”以外还有不少中小国家，如郑国、卫国、越国以及一度强大也称过王的宋国、中山国等；在边远地区还有不少兄弟族建立的小国。这些国家因为力量弱小，只能做大国的附庸，为了在大国的夹缝中求得生存，时而站在这一边，时而倒向另一国。与此同时，在当时各国新兴封建势力相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变法图强的相互影响和推动之下，除边远兄弟民族以外，一般也都不同程度地进行过变革。

宋国原是商王族微子启的后人，原都今河南商丘，战国迁都到今江苏徐州。在休公（前403—前381）的儿子辟（《史记·宋微子世家》作辟兵）即位后3年，发生了剔成夺君位的事件。关于剔成夺权的问题，据杨宽先生研究，就是《韩非子》讲的“司城子罕取宋”。《史记·宋微子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说，“宋剔成干废其君辟而自立。”剔成即司城，剔与司是一声之转，城与成音同通用。司城是宋国的官名，据说相当于司空，因春秋时宋武公名空，为避讳改司空为司城。子罕是名，罕和干也是一音之转。宋桓侯名辟兵（也即辟）。按《史记》讲，辟立后只3年时间便被司城子罕所取代。司城子罕取代微子启之后的子姓（商人是子姓，故宋国国君是子姓）的宋国，有如齐国的田氏取代姜齐一样。所以《韩非子》把这两件夺权斗争的事相提并论。司城子罕可能姓戴氏，故《韩非子》又有“戴氏夺子氏于宋”的说法。

戴氏子罕夺取子姓宋国的政权后，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并且还强盛过一些时候。

总之，战国前期，不仅七雄，包括所有的国家内的新兴封建势力都相继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过改革，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新兴封建势力的力量强弱也不一样。因而反映在各国的变革过程中，时间的先后、变革的方式和程度也不同。就地区看，中原地区是一批从旧贵族中分化出来的新兴封建势力通过斗争逐渐取代了旧势力的代表者公室，然后进一步通过变法革新，把已取得的胜利巩固下来。七雄中的三家分晋、齐国的田氏代齐，七雄外的郑、宋就是很好的例子。边远地区，如秦国、楚国等则是新兴的封建势力支持和利用国君励精图治，打击旧有的世卿贵族特权，来实现本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或者说，就形式看是这样两种情况：

一种是尚未取得政权的改革，其目的是希望通过一些改革，实现新兴封建势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另一种是，新兴封建势力已经在政治上取得了统治权，他们通过改革，为的是想进一步把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权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

第六章 大国逐雄 秦齐崛起

一、魏、齐、秦、韩、赵、燕称王

战国中期，各国诸侯纷纷称王，和周王的称号同等了。以前周天子才称王，各国国君称诸侯。楚国从春秋时起就称王，战国时也沿袭称王。

诸侯国在战国时最早称王的是魏国，魏惠王时魏国是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魏国一度拔邯郸。公元前344年，魏国率领十二诸侯朝天子，韩、宋、鲁、卫等国会盟，这就是魏国发起和主持的“逢泽（今开封附近）之会”，秦国也派了公子少官参加。这是战国中期的一件盛事，魏在这次盟会上称王，引起了各国的反对，齐国“举兵伐魏”，魏国向齐讨好，齐国罢兵。各国对齐国的行动很不满，楚国伐齐，赵国、燕国也调兵遣将准备伐齐，魏国称王引起了各国间很大的事端。

魏又谋伐秦，秦王和商鞅商议。商鞅说一个秦国是敌不过强大的魏国的，他有计谋败魏国，让他去见魏王。商鞅跟秦王说了他的办法，秦王派他去魏。商鞅到魏国对魏王说，要谋王业不能只是宋、卫、邹、鲁这样的小国听从，而是要伐齐、楚、燕、赵这样的大国。商鞅劝魏王行王服，然后伐齐、楚。魏王接受了商鞅的游说，于是建王宫、造王车、制王旗、穿王衣，“称夏王”，俨然成了天子。

商鞅怂恿魏国称王是要把各国攻击目标引向魏国，解除魏国对

秦国的威胁。诸侯国反对称王，齐国、楚国很愤怒；诸侯国都附和齐国，魏王很惊恐。魏国毕竟是这时候强大的国家，虽遭到各国的反对，魏国仍称王。

魏王和惠施商议，要报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仇，要和齐国进行决战。惠施说："现在国家弱，没有力量，不能决战。不如变服（不着王服）折节（表示屈节）朝见齐王，楚王必怒。"魏王觉得这办法好。公元前334年，魏王约请齐王在齐国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相会，这就是魏、齐"会徐州相王"。这是战国中期的重要事件，魏王和齐王互相承认为王。魏已称王，实际上这是魏国承认齐国为王，是向各诸侯国宣告齐国也称王。魏王不惜变服折节，对齐国委曲求全。齐国称王引起了楚国的反对，楚威王亲自领兵攻齐徐州，打败了齐将申缚。

公元前325年，秦国、韩国也相继称王。韩国由于经过昭侯、申不害的治理，国力比赵、燕强，韩比赵、燕先称王。

公元前323年，秦国派张仪和齐楚大臣在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相会。这时魏国公孙衍为了对抗秦、齐、楚的联合，发起"五国相王"。参加的五国是：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就是参加的五国互相承认为王，赵、燕、中山从这年起也称王。魏国用发起相王、承认一些国家称王的办法来组织联合阵线。燕国虽是大国但力量较小，中山是小国，别国看不起，他们利用"相王"的机会，能够得到一些大国的承认，也就称王了。赵国说过："谁没有力量谁就不敢称王"。可见称王是要有实力做后盾的，弱小国家力量不够，就要依靠大国的扶植。

齐王对赵、魏扬言："寡人羞与中山并为王，"要和赵、魏一起讨伐中山，废掉中山王号。中山王很害怕，和大臣张登商议，张登让派他带重金去见齐国的权臣田婴。张登对田婴说：赵、魏愿和中山称王，齐要废掉中山称王，中山王废，中山与赵、魏更亲密。这是齐国为赵、魏增加力量，对齐不利。不如齐国允许中山称王，中山必亲齐而绝赵、魏，对齐有利。田婴果然听信张登的话，说给

齐王，齐允许中山称王。这时张登又对赵、魏说：齐国想伐魏河东，因为齐国很不愿中山称王，现在允许中山称王，是想用中山的兵。赵、魏相信张登所说，对齐很是反感，更加保护和支持中山称王，中山和齐断绝了关系。

为了反对中山称王，齐国对中山“闭关不通”，齐国还想割平邑地方给燕、赵，一起攻打中山。燕、赵认为这是齐国故意离间燕、赵和中山的关系，想把中山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燕、赵坚决支持了中山称王，“事遂定”。

“平公立，是时六国皆称王。”（《史记·鲁世家》）鲁平公元年，是公元前322年，七个大国除楚国早已在春秋时称王外，其余六国也都称王了。

二、“合纵”与“连横”

过去有关战国的史书，记载了大量关于苏秦和张仪在七个大国间进行“合纵”、“连横”的游说。把他俩说成是同时的人，苏秦和张仪游说是针锋相对的。司马迁在写关于这方面的历史时曾感到怀疑，说“奇怪不是苏秦的事，又像是苏秦的事，都说成是苏秦的事”。后来又有一些历史学家也提出过怀疑。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全书共27章，11 000多字。其中11章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内容大体相同，另外16章是失传的佚书。《战国纵横家书》可校正和补充《战国策》、《史记》，特别是16章佚书，是研究战国的重要史料。苏秦的书信言论有15章以上，证明不是像过去的史书所说，苏秦死在张仪之前，他比张仪实际上死的晚，他主要的政治活动也比张仪晚。这使我们对战国合纵连横的了解比较接近实际了。

“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韩非子·五蠹》）一些游说之士，研究形势，奔走于各国之间。

他们为合纵游说称纵说，为连横游说称横说，历史上把他们称为纵横家，他们往往成了合纵连横的发动者、组织者。“三国攻秦”、“四国为一将以攻秦”、“五国攻秦”，合纵的国家多少不一，合纵进攻的对象有秦国有齐国，主要指的是秦国。连横主要以秦国为中心。能够连横的国家不如合纵的多，张仪活动秦国的连横只有魏国或者楚国参加，并且希望争取韩国。由于各国之间的矛盾复杂，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合纵连横也很不稳固，所谓“朝秦暮楚”，政局变化十分不定，今天和这个是朋友，明天又变成了敌人，和那个又是朋友。

最早发起合纵的是魏国的公孙衍，最早游说连横的是秦国的张仪，后来的苏秦、李兑、信陵君等也是发起和组织合纵的重要人物。

公孙衍（即犀首），在秦国做过大良造，后来回魏国做魏将、魏相。魏国不断受到秦国的进攻，韩也深受秦国之害，这时张仪为秦国拉拢齐、楚在进行外交活动。公元前 324 年，公孙衍发起了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用意是联合抗秦，这是针对张仪的外交活动组成的一次联合阵线，但没有什么成效。

公元前 322 年，魏王把惠施逐走，惠施是主张联合齐、楚抗秦的。魏王改用张仪为相，张仪是要魏国联合秦、韩伐齐、楚，意图是要魏国屈服于秦国而使别的诸侯国也效法。他实际上是为秦国的利益在魏国活动，魏国发现以后把他驱逐回秦国。这时，齐王“以事属犀首”，燕、赵“以事属犀首”，楚王也“以事因犀首”，韩相公叔“因委之犀首以为功”。齐、燕、楚、赵、韩五国表示对公孙衍的信任，公元前 319 年，在五国的赞助下，公孙衍做了魏相。山东各国对公孙衍很支持，公元前 318 年，公孙衍针对张仪为秦国搞连横活动，发起了一次五国合纵攻秦，五国是：魏、赵、韩、楚、燕[①]，以楚为纵长。联军至函谷关（今河

---

① 《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 318 年“韩、赵、魏、齐、燕帅匈奴共攻秦”有误。这次合纵没有匈奴，义渠在五国合纵攻秦时曾攻秦。五国中的齐应为楚。

南灵宝县境内），秦出兵回击，联军退。次年，秦军与五国中的韩、赵、魏军队战于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秦军胜，斩杀三晋军8万，这次合纵失败了。这是战国第一次五国合纵攻秦，是由公孙衍发动的。后来评论说公孙衍"能合纵连横"（《吕氏春秋·开春》）。

公孙衍曾对义渠君游说："只要山东国家进攻秦国，秦国就会给义渠送来重礼。"秦国受到五国进攻时，送给义渠君绸缎美女，想拉拢义渠。义渠君对群臣说："这就是公孙衍所预言的，"意思是说秦国必定有事了。义渠乘机起兵攻秦，"大败秦人李帛之下"。这是义渠君听了公孙衍的游说，当五国合纵攻秦时也发动对秦进攻。

张仪，魏人。公元前329年入秦，和公孙衍不和，秦免公孙衍的大良造，任张仪为大良造。公元前328年为秦相。公元前322年离秦入魏任魏相，他想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这对齐国和楚国是不利的，他们坚决反对，支持公孙衍任魏相。公元前319年，魏国以公孙衍代替张仪为相，很快出现了前面叙述的公元前318年公孙衍发动的五国合纵攻秦。张仪在魏的连横活动严重受挫，这是合纵连横的一次斗争。

张仪由魏国回秦国任秦相，以后他又去楚国游说，欺骗楚怀王说愿献商于600里地，让楚国"闭关绝约于齐"，因为秦国想攻打齐国，要拆散"齐、楚从亲"。楚王受了骗，没有得到秦国的土地，就和齐国绝了交，秦、齐反而联合起来。楚国很生气，发动攻秦，屡遭失败，楚怀王死于秦国。这是张仪为秦国的又一次连横活动，破坏楚、齐联合，建立秦、齐联合，达到了目的，秦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公孙衍和张仪是早期合纵连横的两位著名人物，所谓"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就是说他们两人进行的合纵连横活动。

合纵连横是战国的大事。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方面的情况。

三、秦并巴蜀

巴、蜀是上古时候地处今四川省境内的两个国家。巴约有今四川省东部沿长江南北之地，北到剑阁，西边沿嘉陵江流域阆中、南充等地与蜀交界，西南沿长江流域到合江、泸州、宜宾一带，东到万县、云阳和楚交界。蜀国约有今四川中部岷江、沱江、涪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南边东边和巴国接壤，北到今甘肃的文县与秦交界，西到今邛崃山一带。这是说的较固定的地域，但巴、蜀地域不大固定。

巴、蜀地方气候温暖，物产丰富，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地盛产五谷、桑麻、鱼、盐、铜、铁、丹漆等，六畜有马、牛、羊、鸡、犬、豖。蜀地有璧、玉、金、银、铜、铁、犀、象、桑、漆、麻之饶，有山林泽渔之富，四季有各种蔬菜瓜果，巴、蜀"地称天府"。《史记》、《汉书》也都有相似的记载，古代巴、蜀是很富饶的地方。



三星堆出土古蜀国面具

巴、蜀曾属周王朝管辖，周对巴、蜀封官职。"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战国时巴也称王。蜀王为开明氏，传了十二世，到十二世为秦所灭。《华阳国志》、《蜀王本纪》都说约相当战国前期蜀在成都定都。战国时巴在江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川）、平都（今丰都）、阆中（今阆中）定过都。战国时巴、蜀都早已进入奴隶社会。

春秋战国时巴、蜀与中原国家的关系主要是与楚国、秦国的关系。巴有时与楚联合，有时为楚附庸，有时与楚通婚姻。蜀有时对

秦战争，有时对秦纳贡，奉秦为盟主。华夏大国主持盟会很少让巴参加，史载“巴国与盟会希”。

蜀王封其弟于汉中，号苴（jū）侯，苴侯与巴王为好。蜀王对此很生气，发兵攻打。苴侯逃到巴，向秦国求救。这时韩国正发动攻秦。伐蜀呢？伐韩呢？秦王犹豫不决，遂和大臣商议。

张仪说：亲魏善楚，进兵三川（韩三川郡，今河南宜阳一带），攻新城（今河南密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兵临东周西周，周天子恐惧，献出九鼎，就可以“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这是成就天下的大事业。蜀是偏远僻陋之国，消耗人力物力，不能成名，得地也没有利。听说“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三川、周王室是天下的朝市，不去争，而去争偏远的戎狄，这就离王业远了。

司马错说：不能这样说。我听说要富国就要扩大土地，要强兵就要富民。今天秦国还是地狭民贫。蜀是西边戎翟的首领，“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今天蜀有内乱，是征伐的好时机。攻取蜀，天下不以为暴，得其利益，诸侯不以为贪。攻韩攻周，有劫天子不义之名。周是天下的宗主，齐是韩的友好。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失三川，必将紧密联合。齐、赵、楚、魏会援助，那时秦国就危险了，不如伐蜀有利。

秦王采纳司马错的意见，派司马错领兵伐蜀。

公元前316年，司马错带领秦兵伐蜀，蜀王败。蜀王走至武阳，为秦军所杀。蜀相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蜀亡。司马错继续攻取了巴。公元前316年，秦设巴郡。公元前314年，秦王封儿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公元前311年，秦设蜀郡。不久，陈壮反秦，杀蜀侯通国，秦派甘茂等入蜀杀陈壮。秦在巴、蜀采取发展经济的措施，修筑从秦本土到巴、蜀的栈道，大量移民进巴、蜀，兴修水利，如著名的都江堰，又在各地修筑城邑，筑成都城周围12里，高7丈。

秦攻占巴、蜀以后，军事上对楚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军队

从蜀的中心地带乘船而下，不费很大的劳苦，不要 10 天就可以到捍关（今四川奉节东），再往东，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黔中（治设今湖南沅陵）、巫郡（治设今四川巫山）就很容易为秦占有。汉中的兵甲，乘舟出巴，水涨时下汉，4 天可到五渚（在汉江下游）。“秦为船舶万艘欲攻楚”（《蜀王本纪》），秦处于有利的形势。公元前 308 年，司马错带领 10 万军队，从巴、蜀乘船沿江而下，攻占楚地黔中郡。

秦兼并巴、蜀以后，秦国的人力物力雄厚多了。“秦益强，富厚轻诸侯”（《战国策・秦策》），秦国的地位大为改善。

考古发掘证明，巴蜀文化和巴蜀文化前身与中原地区文化既有密切关系又有自己的地方特色。1959 年，在彭县竹瓦街出土了一批青铜器。1956 年，在成都发现的西周土台遗址和在广汉中兴公社出土的一批玉器，和中原地区的殷周青铜器、礼器纹饰形制相似，这些说明巴蜀文化前身与中原地区文化已有密切关系。

1972 年，在涪陵小田溪发现巴蜀文化遗物，出土铜器有编钟、錞于、铜壶、钲、罍、釜、甑、戈、矛、剑、弩机等，纹饰、形制只有剑尚有巴蜀铜兵器的特点，其他与秦楚器相似。巴蜀铜兵器出土很多，类别有戈、矛、钺、剑等，巴蜀铜兵器很有地方特色。像剑的形式为柳叶形、扁茎、无首，柄内有两穿，戈、矛的纹饰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巴蜀地区有一种葬俗，即船棺葬，时代属战国时期和稍后，分布地区相当广。凡是船棺葬就随葬巴蜀铜兵器，这是少数民族的葬俗，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和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船棺葬。1965 年，在成都百花潭中学发掘了一件嵌错赏功宴乐铜壶，壶腹有错银图案四层，内容有采桑、狩猎、宴乐、舞蹈、击磬、水战、陆战攻城等图像，内容和风格与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出土的水陆攻战鉴和宴乐铜壶基本相同。这些反映了巴蜀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四、楚怀王死于秦国

秦国害怕齐国和楚国联盟。秦王和张仪商议对策，张仪说让他去楚。秦王于是派张仪去楚试图拆散齐、楚联盟。

公元前 313 年，秦王派张仪去楚国，张仪对楚王说：“大王能够闭关绝齐，我请秦王献商于（今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之地六百里。这样大王能得商于之地，能西好于秦，能北弱齐国，一举而三得利，大王何不行之。”楚王信以为真，很高兴地答应了。

楚国大臣们也很高兴，纷纷向楚王祝贺。陈轸不高兴，楚王问为什么。陈轸说：“秦国所以看重楚国，是因为齐、楚联盟，今天和齐国绝交，楚国就孤立了。秦国怎么会给孤立无援的楚国六百里地？楚国何不表面上与齐国绝交，暗里又和齐国联合，派使者跟随张仪去秦国，如果秦国给地，和齐国绝交也不晚；如果不给地，就和齐国计划对付秦国。”楚王不听，不让陈轸再说。楚国和齐国绝了交。

张仪回秦后假装坠车受伤，3 个月不上朝。楚王听说，以为张仪怪他和齐国只不过绝交，于是派一勇士去齐国大骂齐王。齐王十分生气，和秦国和好。

这时张仪上朝，对楚使者说：“我有六里的俸邑，愿献给楚王。”使者报告楚王，楚王大怒，要兴兵攻打秦国。

陈轸对楚王说：“不要攻打秦国，不如献一名都给秦，和秦一起伐齐，这是我虽失之于秦而取偿于齐。”楚王不听。

楚王立即和秦国绝交，派屈匄（gài）、率师攻秦。公元前 312 年，秦楚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北），楚大败，秦俘虏楚将屈匄及副将等 70 余人，斩首 8 万，秦取楚汉中郡。

楚国失败，楚怀王十分恼怒，调动全国的军队攻打秦国。秦国、楚国又战于蓝田（今陕西蓝田县），楚军大败。楚国被迫割地与秦国讲和。

过了不久，秦王派使者告诉楚王，希望以秦国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以外的地方换楚国黔中地。楚王说："不愿换地，愿得张仪而奉献黔中地给秦国。"

秦王想派张仪又不好说出口，张仪请求去楚国，说他依仗秦国的强大有办法对付楚王。张仪到了楚国，楚王立即把他关押起来，要杀他。靳尚对郑袖说："秦王十分喜爱张仪，楚王要杀他。秦王要用上庸（今湖北房县均县等地）六县的地方和美女换回张仪，楚国能得到土地，楚王高兴，秦女必然得到贵宠而夫人就会被驱逐了。夫人为何不去说楚王放走张仪?"郑袖很害怕，就在楚王面前日夜哭泣，对楚王说："今天楚地没有给秦，秦王派张仪来，这是很看重楚国。要是杀了张仪，秦王必定大怒，报复楚国。我请求我们母子都迁到江南去，免得遭秦国的宰割蹂躏。"楚王听信了郑袖的话，放张仪回国。

屈原出使齐国回来，对楚王说："何不杀张仪!"楚王很后悔，赶快派人去追，但已经来不及了。

公元前299年，秦王写信给楚王说："秦楚过去约为兄弟，楚太子入质秦，两国关系很好。楚太子杀我大臣逃去，秦兴兵攻楚。秦楚接界，互为婚姻，相亲久矣。秦、楚关系不好，不能号令诸侯。愿与君王武关相会，友好结盟。"楚王接到信，犹豫不决。昭雎说："王不要去，发兵自守。秦是虎狼之国，不可信，有兼并诸侯的野心。"屈原也劝楚王不要去，秦国贪戾不可信。怀王子子兰对王说："何必绝了秦国的欢心。"怀王听了子兰的话，去赴会。

秦王命令一位将军埋伏在武关，假称是秦王。楚王到武关，秦军闭关劫持楚王去咸阳。到了咸阳，秦王不以王礼而以接见属国藩臣的礼见楚王，楚王大怒。秦王要挟楚王割巫、黔中郡，楚王不答应。秦王把楚王扣留起来。

楚国大臣们商议如何办，有人主张立王子。昭雎说："大王和太子（质于齐）都困在诸侯国，今天又背王命立庶子，不合适。"昭雎到齐国，假称楚王死了，要太子回国继王位。齐大臣对于是否

放楚太子回国发生争议，有人主张要挟楚割下东国地方，齐相主张放楚太子回国。齐王同意了齐相的意见，归还楚太子。太子回国立为王，这就是楚顷襄王。

公元前 297 年，楚怀王想逃回国，被发觉，秦军挡住去楚国的道路。楚王从便道跑到赵国，赵主父在代，子惠王初立，不敢接纳楚王。楚王想走到魏国去，秦使追来，赵国把楚王和秦国使者送回秦国。楚怀王忧愤成疾，公元前 296 年，死于秦国。消息传到楚国，楚国愤然和秦国绝交。

屈原回顾这段历史时十分愤慨，他借谴责桀纣的昏聩表示对君王的不满。他谴责那般佞臣是："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满）不厌（饱）乎求索。"（《离骚》）他愤怒地谴责那些人苟且偷安、无止境贪求私利，把国家引到昏暗和危险的境地。

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前 325—前 299 在位）是赵国的第六个国君，他奋发图强，立志改革，是从"胡服骑射"开始的。

赵人穿的衣服，袖子长，腰肥，领口宽，下摆大。赵王想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这种长袍大褂不适宜，无法在马上射箭打仗。大家都穿胡服，把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的短褂，腰里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看来只是服装改革，但实际上是要打破长期以来赵人的习俗，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因此阻力很大。

公元前 307 年，赵武灵王召大臣楼缓商议说：先祖的功业没有完成。今天北边有燕，东边有东胡，西边有林胡、楼烦、秦、韩，中山在我国的腹心。没有强兵，就不能生存。我想改革服装，大家都穿胡服，再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楼缓说好。但许多大臣想不通。赵王对肥义说：我想沿着襄主的道路，完成简主、襄主的功业，"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必然会遭到世人的非议。肥义

说：大王不要管天下的非议，成就大功的人不和众人议论。从前舜在有苗地方跳舞，禹袒体入裸国，不是为了纵情快乐，而是想成大功。愚蠢的人不懂得如何成事，智慧的人能预见未来。王就实行吧。赵王说：愚蠢人笑我，贤明人明白。赵国行胡服，功未可知，“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赵王首先胡服。


邯郸胡服骑射雕塑

赵王派人告诉叔父公子成，请公子成胡服。公子成是很有影响的人，他反对胡服。他对来人说，自古以来的礼、教、习俗不好改变。

赵王亲自去公子成家，对公子成说：服装是为了便用，礼是为了便事，礼不是一成不变的。地方不同，服装不同。圣人也看对百姓是否有利，礼也可以不同。今天叔父所言是因循旧俗，我所言是制变习俗。我们国家东边有河、薄洛水，没有舟船；西边边境没有骑射的军队守边。“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以前中山国依仗齐国的强大兵力，侵略我国地方，欺凌我国民众，我先王感到羞耻，没有报仇雪恨。今天胡服骑射，就是为了图强，为了雪恨。今天叔父顺从习俗但违背了简主、襄主的意愿，反对胡服而忘了报仇雪恨。公子成再拜稽首，说王将继简襄之意，臣敢不听。赵王赐他胡服。又下令全国胡服。

公族赵文、赵造反对胡服，他们说要遵循礼教、习俗，“循法无过，修礼无邪”，否则“百姓会乱”。赵王对他们说：古今的习俗不同，没有效法的。帝王不相沿袭，没有礼可循。三王时也各自

看形势和需要制法、制礼。法度制令，看怎么合适就怎么订，衣服器械，看怎么方便就怎么用。贤圣的君主，不沿袭前代能成就王业，夏殷的衰败，不变易礼也灭亡。循法修礼，不适应今天的需要，不足以治世。赵王说服了他们。

公族赵燕迟迟不胡服，赵王严厉命令他："你有意违抗我，犯了大罪。小心我亲自严惩你，处以极刑以示天下执法之严。"赵燕吓得直打哆嗦，一再称罪，立即胡服。

赵国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公元前306年，赵国攻取胡地到榆中（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黄河北岸），"辟地千里"。攻中山到宁葭。公元前305年，赵王亲自率领右、左、中军三路大举攻中山，攻取丹丘、华阳、鸱、鄗、石邑、封龙、东垣等地，中山献四邑求和。公元前300年，又攻中山，扩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经过五年的进攻，到公元前296年（赵惠文王三年），赵国灭了中山，迁中山王到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从此，赵国本土到代地的交通畅通无阻。

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在东宫大朝君臣，举行传王位的礼仪，立王子何为王，就是赵惠文王。肥义为相国。赵武灵王自号主父。

主父想让儿子治国，自己带兵征伐胡地，再从云中、九原南下攻秦。他要亲自看地形和了解秦国的情况，于是化装成使者入秦，见了秦王，秦当时还不知他就是主父。

主父封长子章为安阳君，有代（今河北蔚县）地。公子章不服弟立为王，主父担心，派田不礼为章的相。

李兑对肥义说："公子章骄横，党徒多，欲望大。田不礼残忍，两人在一起，必定有阴谋。小人有欲望，轻虑浅谋，只见利，不顾害，祸患不会久了。"李兑又几次与公子成商量防备田不礼。

肥义对信期说："公子章和田不礼表面上说得好，暗地里打坏主意，他们的贪欲很大。公子章想依仗主父作乱，祸害赵国，我很担忧。以后谁要见王必先见我，我要保护王。"

公元前295年，主父和赵王游沙丘，这里有离宫。公子章、田不礼率党徒作乱，假称主父命令召赵王。肥义先去见他们，被杀。公子成和李兑从邯郸赶来，调兵平乱，杀了公子章和田不礼，歼灭他们的党徒，安定了王室。公子成为相，李兑为司寇。惠文王年少，公子成和李兑专政。

公子章败退的时候，逃到主父的宫室里，公子成和李兑围困主父宫室，公子章被杀死。公子成和李兑商议：因为公子章躲到主父宫，围了主父，兵撤走以后，我们就要被杀。公子成和李兑决定不解围，命令宫中人都出来，主父想出，不得出。没有吃的，连幼雀都抓吃了，3个多月，饿死在沙丘宫。他们知道主父已死，才发丧告诸侯。

主父原先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孟姚，很宠爱，生何，废太子章立何为太子。孟姚死以后，主父又怜悯太子章，想让太子章在代称王。惠文王即位以后，公子章很傲慢，主父又怜悯惠文王。想分赵国立两人为王，犹豫未定，乱起来了。一个对赵国很有贡献的国王，最后得了饿死的下场。

六、燕国内乱与燕、齐战争

燕传至易王，易王传至燕王哙。燕王哙很看重燕相子之，苏代与子之要好，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燕王问苏代："齐宣王如何?"苏代说："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苏代说："对大臣不信任。"苏代是想激励燕王更重用子之，燕王果然更加信任子之。子之送百金给苏代作为报答。

鹿毛寿对燕王说："人们说尧很贤，是因为能够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地名，其实并没有让天下。今天大王能以国让子之，子之一定不敢受。那么大王和尧齐名了。"燕王把王权委托给子之，子之权势大重。又有人对燕王说："禹推举益接他的位，但官吏都是启的人。禹年老以为启不能管天下，把王位传给

益。启和他的党徒攻益，夺了王位。禹名义上是传位给益，其实是让启取代。今天大王委国给子之，但官吏都是太子的人，名义上是委国子之，实际是太子专权。”燕王果然收三百担以上官吏的官印给子之。子之从此“南面行王事”，即坐在朝南的国王王位上，行使国王权利。燕王哙年老不管政事，反而为臣。

公元前314年，子之为王第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惊恐怨恨。将军市被与太子平策划进攻子之。齐王派人对太子平说：“我听说太子要申张君臣的大义，端正父子的位置。齐国虽小，愿意听从太子的命令。”齐国想乘机插足燕国内乱。太子聚集他的党羽，命将军市被攻子之，没有成功。市被反攻太子，市被死。几个月骚乱，死了数万人，百姓非常不满。

孟轲劝齐王乘机伐燕。齐王命令章子率领临淄等五都的兵和齐国北部的丁壮伐燕。燕军不抵抗，城门不关闭。齐军很快进入燕国国都，仅5个月就占领了燕国大片土地。齐军杀燕王哙，擒子之，剁为肉酱。

从河北平山县三汲中山王譽墓出土的铜器铭文上，我们知道了燕国内乱时中山国也乘机派相邦司马赒率三军之众侵燕，占地数百里，占城数十。这一重要史实过去古书没有记载。

“燕人畔”，燕国军民纷纷起来反抗，各诸侯国也反对外国占领。公元前312年，齐军被迫撤出燕国，齐军占领达3年之久。

公元前312年，燕人立太子平，就是燕昭王。昭王即位，国家残破不堪，昭王决心复兴燕国和报仇雪恨。后来苏代和昭王一次谈话里讲到：“我听说大王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常常想着如何报仇。”乐毅说：“昭王怨齐，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

昭王为振兴国家，想求得贤臣良将，他去见郭隗，对郭隗说：“燕国力量薄弱，不能报仇。要是能够求得贤士和我一起治理国家，就能够雪先王的耻辱。先生说如何求得贤士?”郭隗说：“如果大王向着东面盛气凌人地求臣，只能是干苦力、服劳役的人来；如果向着南面用不失君臣的礼仪求臣，那会是有一般人臣才能的人

来；如果向着西面十分恭敬十分虔诚地求臣，那就会有很有才德的人来。”郭隗又说：“臣听说从前有人用千金买千里马，三年没有买得。主人另派一人去买，三个月买得一死马马头，花五百金。主人大怒，问为什么花五百金买一死马头。买者回答说：‘买了死马，不愁买不到活马。’果然不出一年，来卖千里马的有三次。大王真心求贤，先从臣开始。臣这样的人，大王能看重，何况比臣贤能的人，会不远千里而来。”昭王听了以后，为郭隗修筑宫室，尊郭隗为师。

邹衍从齐国游说来到燕国，昭王用衣袖裹着扫把一边退走一边扫地接他，表示十分尊敬。昭王坐弟子的座位请邹衍给他受业，还为邹衍筑碣石宫。乐毅从魏国来，剧辛从赵国来，贤士纷纷来燕国。昭王吊死问孤，积蓄力量 28 年，燕国富强，士卒百姓斗志旺盛。

齐灭宋，齐湣王很骄傲，接着南伐楚，西侵三晋，想吞并东周西周，为天子。大臣谏劝，被杀。

燕国“深怨积怒于齐”，处心积虑、长期艰苦准备为了报复齐国。燕国利用了有利的形势，昭王与乐毅商议伐齐。乐毅说，齐国地大人众，不能独攻，伐齐必须联合赵、魏、楚。于是燕国活动联合赵、魏、楚，并说服秦国。“诸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纵与燕伐齐。”（《史记·乐毅列传》）公元前 284 年，燕、赵、魏、楚、韩、秦六国合纵攻齐，燕国倾全国兵力，命乐毅为上将军，乐毅还受赵国相印，乐毅统帅燕、赵、魏、楚、韩五国之兵。秦派斯离领秦兵。齐国派大军应战，触子为将，战于济西，齐师大败。齐又派达子为将，齐燕军大战，齐军又大败，达子战死。乐毅遣秦韩军回国，派魏军攻宋，部署赵军取河间，自己率领燕军长驱直入。齐军崩溃，齐国大乱。仅半年时间，燕军攻下齐国都临淄，攻下 70 多城，齐国只保有莒、即墨两城。齐王逃到莒。燕军人临淄，劫走齐国的宝物祭器。燕王到济上奖赏将士，封乐毅为昌国君。

六国联军的时间不长，秦国占了齐国所得的宋地陶邑，魏占领

了大部分宋地，赵占领了济西部分地，楚国、鲁国占了齐国和原宋国的一些地方。

楚国派了淖齿在齐国，淖齿为齐相，淖齿在莒把齐湣王杀了。太子化装成平民，躲到太史的家里做佣人。淖齿离开莒以后，莒人和逃亡来莒的官员找太子，太子不敢露面，又过一段时间，才说自己是太子，大家立为王，即齐襄王。告国人，“王已立在莒矣”。齐坚守住莒，齐襄王在莒5年。

田单从即墨反攻，大破燕军。田单在临淄做过小官。燕人长驱攻齐时，齐人败退混乱，十分狼狈。田单在锯短的车轴两端包上铁皮，在撤退中车子保持完好终得逃出。田单逃到即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即墨守城长官战死。大家推他作首领，说他“以铁笼（指改造车子）得全，习兵。”

燕昭王死，惠王继位。惠王和乐毅过去不和，田单听说了，就派人去作反间。扬言说：乐毅不拔齐两个城，怕回燕国，以伐齐为名，是想联合诸侯在齐称王。齐没有归附，所以缓攻即墨以等待。齐人害怕别的将领来，那即墨就完了。燕王听信了传言，把乐毅换了，派骑劫代替。燕军士卒为乐毅愤愤不平。

田单命令城中人饮食必祭先祖，飞鸟都下来吃祭品，燕军奇怪。田单扬言：神下来教我。他让一个机灵的士卒假装“神师”，以后每逢下令，总是说出于天神的命令。田单又派人扬言说：我们别的不怕，只怕燕军俘虏了我们的士卒，割去他们的鼻子，再派他们走在前面和我们作战，那即墨就完了。骑劫果然如此做，城内的人看见被俘齐军尽被割了鼻子，都很愤怒，决心坚守，唯恐见到被割鼻的人。田单又派人作反间说：我们最怕燕人挖我们祖先的坟墓，毁我们祖先的尸骨，这最令人寒心了。骑劫果然令燕军尽挖齐人的祖坟，烧死人尸骨。即墨人从城上看到这种情景，人人痛哭流涕，个个都想出战，悲愤十倍。

田单看到齐军士气很高涨，知道可以动员出战。他派使者出城假意投降，骑劫信以为真，“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以重金收买

燕军将领，说即墨很快要投降，只希望能够保全即墨人的家小。燕军将领个个喜欢，满口答应，思想麻痹，盲目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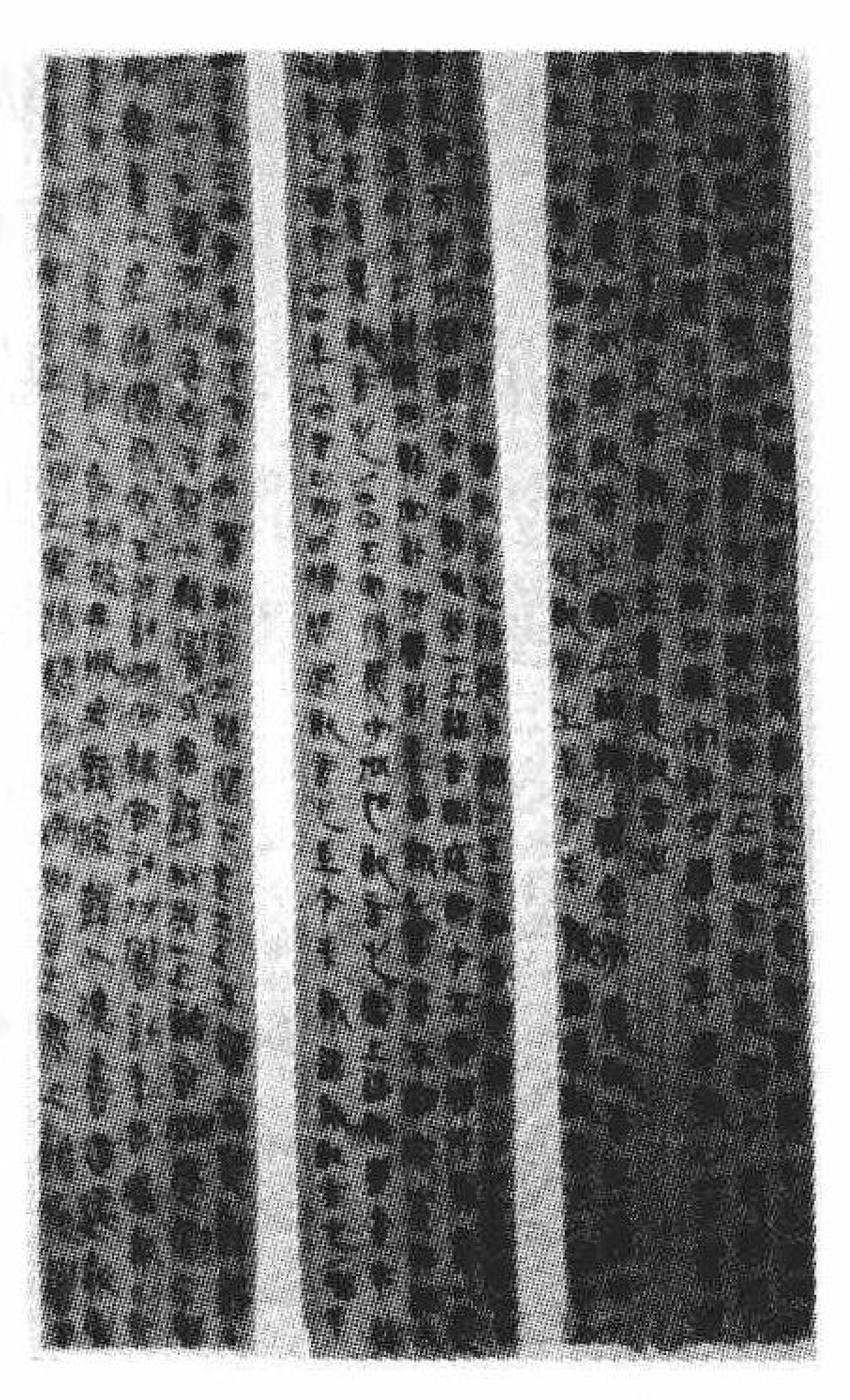
田单征集了1 000多头牛。牛身上穿上红丝绸衣，画上五彩画，两只牛角上绑上锋利的快刀，牛尾巴绑上灌饱油的芦苇。在城墙根挖了几十个洞口，把牛埋伏在里面。他又挑选了5 000名壮士，全副精锐武装跟在牛的后面。晚上，烧着牛尾，“火牛”从城门洞里猛冲出去，拼命向前飞奔，直冲燕军兵营，顿时大火冲天。燕军看到五彩龙纹的火牛，十分害怕。5 000名齐军壮士紧跟在牛后面，奋勇冲杀。城墙上的军民使劲猛敲各种铜器，声振天地，齐军声威大震。燕军大惊，十分慌乱，碰上牛就死。死伤遍地，溃不成军，燕主将骑劫也被杀死。这就是著名的田单大摆“火牛阵”。齐军乘胜追击，被占领的齐国地区的人民纷纷起来响应，配合田单打击燕军。齐军势如破竹，直至北部边境，70余城全部收复。

公元前279年，田单去莒迎接襄王，襄王入临淄主持朝政，封田单为安平君。从公元前284年六国攻齐到田单复国，前后有5年之久。

七、秦齐称帝

秦国征伐山东各国，不断占领山东各国的土地，前人把这种进占比为蚕食桑叶，如“蚕食六国”（刘向《战国策·叙录》），“则诸侯可蚕食而尽”（《韩非子·存韩》），“蚕食魏氏（即魏国）”（《战国纵横家书》），都用很形象的语言说明了战国中后期形势发展的特点。

秦国积极向外发展，扩大土地，三晋（赵、魏、韩）首当其冲。公元前361年，由于秦国势力东至黄河，魏国都安邑受到威胁，魏迁都大梁（今开封）。商鞅对秦王说：“魏国占有安邑一带山岭险要的地区，据有黄河天险而独揽山东之利。魏国有利时向西攻秦，不利时则向东发展。秦与魏好像一个人有腹心病一样，不是


湖南龙山县出土里耶秦简

秦并掉魏，就是魏并掉秦。魏接连大败于齐，可乘有利时机伐魏，胜魏，‘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服诸侯’。”秦王认为他说得对，派他伐魏。公元前 340 年，商鞅伐魏，魏派公子卬领兵抵抗。商鞅写信给公子卬说希望会盟罢兵，公子卬来参加会盟，宴会上商鞅埋伏甲兵俘虏了公子卬。继而又马上派军队进攻魏军，大破魏军。

公元前 330 年，秦军在鄜阴（今陕西鄜县北）再次大败魏军，俘虏了魏将龙贾，迫使魏国把河西之地割给秦国。公元前 329 年，秦又接连向魏猛攻，攻取了河东的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皮氏（今山西河津县西）、曲沃（今山西曲沃县）等地。公元前 328 年，秦又攻取魏的蒲阳（今山西省永济县北），魏被迫把上郡 15 县（今山西东南一带）献给秦国，至此，今陕西、山西黄河东西地区归秦占有，黄河天险被秦国掌握，秦国的声威震动山东各国。

公元前 314 年，秦国又趁齐国因燕国内乱进攻燕国的时候进攻三晋，再次攻取魏的焦和曲沃（原为秦所攻占，后又归还魏），又在岸门大败韩军，迫使韩国派太子仓作为人质押在秦国求和。公元前 313 年，魏国被迫按照秦国的意志立公子政为太子。这一年秦国攻取了赵的蔺（今山西离石县西），俘虏了赵将赵庄。

秦王对甘茂说：“秦国想东通三川（韩的三川郡），进而窥周室。此愿能偿，我死也不朽了。”这必须攻下韩国重地宜阳，宜阳是通三川、窥周室的必经之地。秦王派甘茂攻宜阳。甘茂说：“宜阳是大县，上党南阳两地久存物资于此，名为县，其实是郡。今天行千里而攻，很难。臣在秦算是一过客（甘茂齐人），樗里疾、公孙衍依持韩国而非议，王一定听信他们。臣恐怕不得信任，不要派臣吧！”秦王说：“一定相信你，订下盟约吧！”于是甘茂领兵攻宜

阳。宜阳有30万军队守卫，5个月没攻下，秦军死伤很重，秦王很着急。冯章说："不拔宜阳，韩楚乘吾弊，国必危矣！"甘茂动摇，左成劝他："不攻下宜阳，内有樗里疾、公孙衍攻击，外有韩的积怨，就危险了；攻下宜阳，功就多了。"甘茂说宜阳城是他的坟墓，要决一死战。秦派来援军，终于攻下宜阳，打开了通向中原的门户。秦攻下宜阳，韩对秦更害怕，韩先王墓在平阳，离武遂只有70里地。

公元前294年，秦又攻韩，取武始（今河北武安县南）、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第二年韩、魏联军抗秦，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市南）交战，这次大战秦军是左更白起指挥，秦军大胜，歼韩、魏军24万多人，俘魏将公孙喜，韩、魏联军遭到惨重失败。白起升为国尉。秦军比韩、魏军少得多，秦军大胜。白起分析这次战争胜利的原因，是因为韩、魏互相推诿，都想自己退在后面，把别人推到前面。秦军利用了韩、魏军的弱点，能够设疑兵麻痹韩军，出其不意以精锐攻魏军，魏军既败，韩军也就自溃了。

伊阙之战以后，秦国继续攻占三晋的地方。公元前292年，秦攻占魏的垣（今山西垣曲县）和韩的宛（今河南南阳）。公元前290年，秦又占魏的轵（zhǐ，今河南济源县东南）和韩的邓（今河南孟县西）。宛和邓原是韩国两个冶铁手工业地区，秦取得以后，更增强了秦的力量。公元前290年，魏被迫割河东400里（今山西西南部一带）给秦，韩被迫割武遂200里（今山西垣曲附近）给秦。公元前289年，秦击魏取61城。公元前288年，秦取赵梗阳（今山西太原南）。公元前287年，秦拔魏新垣、曲阳。公元前286年，魏献安邑及河内给秦。

"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史记·六国年表序》）秦国对三晋，尤其是魏、韩，一次一次地打击，一步一步攻占了三晋的大片领土。苏代对这段历史说："龙贾之战（前330），岸门之战（前314），封陵之战（前303），高商之战（无考），赵庄之战（前313），秦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现在生存的，都是死于秦军的遗孤。

西河、上雒、三川之地，纷纷落入秦国手中，秦国几乎占有三晋的一半土地。”（见《战国策·燕策》）魏、韩被秦国大大削弱了。

当时的人常分析魏、韩的战略意义：“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战国策·秦策》）秦国人士常分析韩国，说韩国对秦国像是木头里的蠹虫、人心腹病一样，秦国一定要除掉。秦国对三晋取得的胜利，是很有意义的。秦自认为很强大了，发动称帝。秦相约与齐称帝，遭到各国反对，秦受挫。整个说来，秦国逐步强大是最重要的事，对战国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齐国经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挫败了战国前期最强大的魏国，魏国从霸主的地位上跌落下来，齐国跃升为强国。“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公元前334年，魏国和齐国“会徐州相王”，齐称王。

公元前314年，燕国由于燕王哙让位子之引起国内大乱，齐军占领了燕国广大国土，大肆掠夺燕国的珍宝财物。后来乐毅在写给燕惠王的信里说：“故鼎反乎历室。”这是说乐毅攻入齐国国都临淄时，把以前齐国抢走的大鼎又送回燕国，陈放在燕宫历室里。齐军占领达3年之久，燕国受到很大的打击。

“秦与齐争长”（《史记·楚世家》），这两大国都极力拉拢五国相对抗。岸门之战（前314）以后，秦国拉拢韩、魏，齐国则和楚国联盟。公元前312年，楚攻韩的雍氏（今河南禹县境内），秦国救韩攻楚；齐和楚就联合攻秦、韩、魏，这时以秦齐为首的五国分成为两个阵营的攻战。

公元前301年，齐国组织起韩、魏三国共同攻楚，齐将匡章、魏将公孙喜、韩将暴鸢率三国军队攻楚方城（楚的长城），于垂沙大败楚军，杀死楚将唐昧。楚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楚屈服于齐，派太子横为质，向齐国求和。秦国为了和齐国修好，也派泾阳君去齐国为人质。

《孙膑兵法·强兵》说“齐大败燕”（指公元前314年伐燕），“齐大败赵”（指公元前325年齐败赵于平邑，俘赵将韩举），“齐

大败楚”（指公元前301年败唐昧之战），这时期齐国的国力是强盛的。所谓“威王、宣王以胜诸侯”（《孙膑兵法·强兵》）。

公元前298年，齐国发动齐、韩、魏三国攻秦，三国联军攻到函谷关。秦国君臣焦急地商议是否割地求和，如果割地求和，秦王感到可惜；不割地，“咸阳必危”。秦国害怕三国联军继续前进，秦王说：“宁可割让三城感到后悔，不能使咸阳危急感到后悔。”秦国不惜割武遂（今山西临汾境内）与韩，割封陵与魏，割齐城（此城无考）与齐讲和。

齐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发展，到了公元前288年，秦国约齐国称帝。秦为什么要约齐国称帝，这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各国力量的对比。乐毅说到秦齐去帝号以后“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齐”。（《史记·乐毅列传》）可见齐国有很大的实力。

宋国地处中原，“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史记·春申君列传》）对于这样一块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地方，齐国垂涎三尺，先后发动了三次对宋的进攻，公元前286年，齐国第三次伐宋，吞并了宋国。“夫以宋加之淮北，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兼之，是益一齐也”。（《战国纵横家书》）齐国兼并了宋国和淮北地方等于增加了又一个齐国的力量。这是齐国势力向上发展的顶点。“齐湣王灭宋而骄”，不久遭到了各国的联合进攻，受到很大的削弱。

秦国不满于齐王想称帝，“穰侯相秦而齐强，穰侯欲立秦为帝，而齐不听，因请立齐为东帝，而乃能成也”。（《韩非子·内储说下》）秦昭王派穰侯魏冉去齐国，劝说齐湣王，秦齐相约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齐王答应了，于是秦齐称帝。

《战国纵横家书》对秦、齐称帝的意图说得很清楚，意思是说，齐取宋，秦取魏的上党，韩魏从。进而攻赵，秦取赵的上地（赵的上党），齐取赵河东，赵从。秦取韩的上地（韩的上党），齐取燕的阳地。“三晋大破，而攻楚”，秦取鄢，齐取东国下蔡。“齐、秦虽立百帝，天下孰能禁之。”这就是秦、齐称帝的如意算盘，过去古书还没有这样清楚详细说过。

苏秦从燕去齐，游说齐王。齐王说："好，你来了，秦国使魏冉约齐称帝，你以为如何?"苏秦说："王问臣仓促，此事的忧患还隐微，愿王接受以后不忙于称帝。秦称帝，天下听从，王也称，不算晚，先称后称也不会有什么损伤；秦称帝，天下反对，王不要称，以收天下的心，是一很好机会。"苏问："齐、秦称帝，王以为天下尊齐，还是尊秦呢?"齐王说："尊秦。"苏说："去帝，天下是爱齐，还是爱秦呢?"齐王说："爱齐而恶秦。"苏说："立两帝伐赵有利，还是齐伐宋有利?"齐王说："伐宋有利。"苏说："比较起来，与秦称帝天下尊秦而轻齐，去帝则天下爱齐而恶秦，伐赵不如伐宋有利，愿王宣布去帝号，收天下之心。摈去称帝之约，摈弃秦国，让秦国处于被动境地而不能与齐争胜。王乘机伐宋，有了宋国则卫的阳地危，有淮北则楚的东国危，有济西则赵的河东危，有陶、平陆，魏国的城门不敢开了。齐去帝号加之伐宋，则国重名尊。名义上尊重秦国，结果让天下恨他，这叫做以卑贱换尊贵，愿王仔细考虑!"齐王接受了他的游说，去帝号仍称王。苏秦很合时宜的话，切中齐王的心理，说服齐王去帝是苏秦的一大业绩。可见战国的"游说之士"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战国纵横家书》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齐、赵遇于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臣与于遇，约攻秦去帝。"这是苏秦写给燕王的书信里说的，"遇"是临时约见的意思，可见事急。苏秦参加了这次会见，齐王和赵王达成去帝攻秦的协议。

齐国去帝后，秦国也被迫去帝。秦、齐称帝在公元前 288 年 10 月到 12 月，仅两个月的时间。这事时间虽短，但影响很大。多年以后，鲁仲连还说："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这是说秦称帝的欲望无穷，要去掉各国不合秦国心意的大臣，换为秦国谋利益的大臣，秦要称霸天下。历史学家钱穆说战国形势有三变，第一变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齐秦分帝，逮乎一统，为三变。"(《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自序》）秦齐称帝是战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第七章　诸侯削弱　秦并六国

一、白起拔郢和楚国的衰落

楚国从春秋以来，不断兼并周围的小国，是兼并小国最多的。公元前306年，楚国趁越国内乱，灭了越国，这是很大的胜利。这时候楚国的军队驻守在东起齐楚交界的今山东南部，经过与宋、魏、韩交界的边境，到西部与秦交界的今陕西南部地方，这是很长的边境线，楚国占有几乎整个南部中国的广大领土，在七国中楚国土地最大，人口最多，军队也最多。楚国人民在广阔的国土上进行了长期的开发，和秦国一样，楚国人民对于后来统一的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战国，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楚国本应处于有利的地位。吴起在楚国变法，“诸侯患楚之强”，这时各国感到了楚国的威胁。“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就是说楚国应该做合纵的首领，合纵成功则是楚的天下。不过楚国在历次合纵中没有起到过这样的作用。公元前318年的五国合纵攻秦，楚奉为纵约长，这是重要的，但是实际组织这次合纵的是公孙衍。楚国毕竟是大国，很有力量和影响。楚曾攻齐，使“齐王患之”。也曾积极干预过诸侯国的称王。公元前312年，楚攻韩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秦救韩，魏参加了秦韩一方；楚国与齐联合为又一方，两方旗鼓相当。但是，总的看来，楚国和诸侯国的征战失败居多。如公元前301年齐韩魏大败楚将唐昧之后，楚国受到很大的打击。和秦国的战争，楚多是

失败。

公元前280年以后，秦国的进攻重点转到楚国，攻取了楚的上庸（今湖北房县、均县等地）及汉水北岸等地。公元前279年，秦攻占楚的鄢（今湖北宜城县）、邓（今河南邓县）、西陵。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占楚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北），烧楚先王陵墓所在的夷陵，楚被迫迁都到陈。公元前277年，秦又攻占楚黔中郡（治设今湖南沅陵）。这样连续几年，秦国不仅占去了楚国的大片领土，连国都也被攻破了。这对楚国是很大的打击，引起了楚国上下极大的震动。《哀郢》是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据王夫之、郭沫若等考证，它是为国都陷落而作。“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楚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王夫之《楚辞通释》）《哀郢》和《离骚》一样，表达了对国家、对人民最悲愤、最忧郁的感情。

楚国的宗室贵族势力太大，“宗室太重”、“封君太众”，他们极力想保持政治经济特权，反对改革。屈原对楚国腐败昏庸的政治最为痛心疾首，他悲愤地指出：“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正直的人）之不容也。”长期以来，屈、景、昭三大贵族控制了楚国的政治。庄辛说楚襄王：“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郢都的陷落果然不出庄辛所料，楚国从此以后衰落不振。

秦国攻占郢等地以后，想联合韩、魏继续进攻楚国。

黄歇（即春申君），楚人，“游学博闻”。他感到秦国对楚国的严重威胁，“恐一举兵而灭楚”，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秦王，极力离间秦国和韩、魏的关系。

春申君劝秦王不要做得过头，物极就必反。如果秦王不考虑适可而止，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有所谓“始之易、终之难也”。

春申君说：秦国和韩、魏，有多世的怨恨。“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韩、魏不亡，是秦之忧。”秦还要和韩魏联合伐楚，这不大错了吗？再说怎么出兵呢？经过韩、魏和不经

过韩、魏对秦都不利。春申君提醒秦王说：秦楚相斗，魏国必然乘机占领宋国的领土，齐国必然占领楚国淮北的徐泗地方。这样的结果“王破楚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齐、魏、韩强大起来，那时秦想称帝也不行了。“臣为王虑，莫若善楚。”楚秦联合攻韩，韩就会屈服，秦再以 10 万人占领郑，魏也就要屈服，韩魏屈服了，齐国也就容易攻取了。

秦王看了春申君的信以后，取消和韩、魏联合伐楚的打算，派使者和楚修好。

二、赵对秦两次外交胜利

赵惠文王得到世上稀有的宝玉——楚国和氏璧。秦昭王写信给赵王，说是愿意拿 15 座城交换这块璧。赵王同大臣们商议，都感到很为难：若是答应，怕上秦国的当；若不答应，又怕秦国攻打。这时，宦官缪贤说：“我家门客蔺相如，又勇敢又有智谋，可以和他商议。”

赵王把蔺相如召来，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秦国说用城换璧，赵国不答应，赵国理亏；赵国给秦国璧，秦国不给赵国城，秦国理亏。哪种做法好呢？我看还是把璧给秦国。如果没有人去，我愿意带着璧去，如果秦国真愿意拿城交换，我就把璧给秦；不拿城交换，我将‘完璧归赵’。”于是，赵王派他带璧去秦国。

秦王在王宫接见蔺相如。蔺相如把璧献上。秦王非常喜爱，还把璧传给左右大臣和美女们看，大家齐声称赞。

蔺相如看秦王根本没有拿城交换的意思，就走上前去对秦王说：“璧上有个小黑疵，我来指给大王看。”秦王信以为真，把璧递给了蔺相如。

蔺相如接过璧，退到柱子旁边，怒气冲冲地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这块璧，写信给赵王。赵王和群臣商议，大家说秦国贪婪，依仗他的势力要璧，说用城换璧是假的。我说，平民百姓的交往还

要讲个信用，何况秦国是大国，就更要讲信用，不要因为一块璧有违强秦的欢心。所以赵王派我送璧来。可是大王今天对我很傲慢，把璧传给美人看。大王根本没有诚意拿城交换。现在璧已在我手中了，如果大王一定要威逼强夺，那我就拼着头颅和这璧一同碰碎在柱子上了！”说着，就举起璧，准备往柱子上猛撞。

秦王十分惊慌，唯恐碰坏了璧，连忙制止，表示道歉。并且命令人把地图拿来，指给蔺相如看，告诉他从这里到那里，一共15座城池，都划给赵国。

蔺相如看出这是秦王的欺骗手段，就说：“和氏璧是天下稀有的珍宝。送璧时，赵王斋戒了五日，今天大王也应斋戒五日，以隆重礼仪来接受。”秦王知道不能强要，只得答应下来。

蔺相如料定秦王不会遵守诺言，就叫同他来的随员化装成平民，藏着璧抄近便小路送回赵国。

5天以后，秦王以隆重礼仪在王宫接见蔺相如。蔺相如来了，他义正词严地对秦王说：“秦国自从缪公以来，从来没有讲过信义。这次我也怕受你的欺骗，派人把璧送回赵国去了。秦国是强国，赵国是弱国，只要秦王你有诚意先割15座城池，那么派一个使臣去赵国，赵王不会不送璧。我知道有欺大王，当死，请大王治我的罪吧！”

秦王十分生气，但也没杀蔺相如，放他回了赵国。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完璧归赵”的故事。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大夫。

几年后，秦王又派使臣去赵国。约赵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境内）相会。赵王很害怕，想不去。蔺相如和大将廉颇认为不去是表示懦弱和胆怯，于是赵王决定赴会，蔺相如随行。廉颇在国内作了布置，以防发生意外。

公元前279年，秦王和赵王相会于渑池。在筵席上，秦王酒兴正浓的时候，轻蔑地对赵王说：“我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鼓瑟（sè，一种古弦乐器）让我听听。”赵王忍气鼓瑟。这时，秦国的

史官急忙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赴会饮宴，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十分愤慨，立即走上前对秦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国音乐，请秦王敲敲瓦缶（fǒu，是盛酒浆的瓦器，可以当作打击乐器），以使大家高兴。"秦王大怒，厉色拒绝。蔺相如再走向前，跪在秦王面前，捧着瓦缶请秦王敲缶。秦王还是不肯，蔺相如愤怒地说："就在这五步之内，我就可以用颈血飞溅到大王身上！"秦王左右的侍卫都拿出刀来，要杀蔺相如。蔺相如瞪眼大声呵斥，吓得侍卫一个个呆立着。秦王害怕了，勉强敲了一下瓦缶。蔺相如叫赵国的史官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国的大臣们看到此种情景，甚为不快，便挑衅地说："请赵国拿十五城为秦王祝寿。"蔺相如也接着说："请秦国拿国都咸阳为赵王祝寿。"虽然在宴会上秦王施展了威逼、恐吓手段，都不能使赵国屈服。这时，廉颇在赵国边境上集结了大量的军队，防止秦国的侵犯，秦国也不敢妄动。

回来以后，由于蔺相如功大，赵王封他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扬言要侮辱蔺相如，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廉颇。他说："强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后有廉颇"负荆请罪"之事，也就是后来流传很广的"将相和"的故事。

赵、秦两次外交斗争表明：秦国依仗它是强国，蛮横无理，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企图损害别国利益，侮辱别国尊严。赵国不甘示弱，赵国有一定的力量，蔺相如以其机智勇敢挫败了秦国的图谋。赵国没有屈服，"不辱于诸侯"，对各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三、"远交近攻"与贬逐"四贵"

范雎，魏人。曾随须贾出使齐国。须贾怀疑他和齐国有勾结，回国后报告魏相魏齐，说齐王私送给范雎金子和牛、酒。魏齐命令家人狠狠鞭打范雎。打断了肋骨，打掉了牙齿，范雎假装死去。家

人用席子卷起把他扔在厕所里，使人往身上撒尿，看守人把他当死人抛出去。后被郑安平把他藏了起来，改名叫张禄。

秦王的使者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把范雎推荐给王稽，王带范入秦。

范雎在秦国住了一年多，没有机会向秦王进说。穰侯带兵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纲寿，范雎乘机上书秦王。

秦王在离宫召见范雎，命左右人都走开。秦王长跪而请“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说了三次。范雎说：“不是我不说，臣在秦不过是一个过客，和王没有交情，而臣所要说的，牵涉到王的骨肉之亲，臣愿以一片忠心进谏，但不知王的心是怎样的。臣不是害怕而不敢讲，臣知道今日讲了明日就会被害。人免不了要死，如果能够对秦国有些好处，这是臣最大的愿望。臣所害怕的，是臣死之后，天下的人因而不敢讲、不敢来、不肯入秦了。”秦王让他“事无大小，上至太后，下至大臣”，都可以说，不要怀疑。

范雎说：秦国地势险要，“四塞以为固”。军队众多，军民勇敢，可以成就霸王之业，但闭关15年，不敢进兵山东，“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秦王说：“请你说说我的失计。”范雎说：穰侯要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纲寿，这是失计。出兵少了不能对齐国怎样，出兵多了对秦国有害。今天秦和邻国的关系不亲，越邻国去攻别国，行吗？齐湣王南攻楚国，辟地千里，最后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各国趁齐国疲惫，兴兵伐齐，“齐几乎亡”。就是因为伐楚而肥了韩魏，“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天放弃这样的策略而去远攻，不是荒谬吗？韩国、魏国处在各国之中，是天下的枢纽。大王一定要征服韩、魏，以威慑楚、赵。如果楚、赵都依附秦国，齐国也必定依附秦国。秦王赞赏范雎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远交近攻”策略。秦王封范雎为客卿，常和他商议国家大事。

范雎日益得到秦王的信任。又过了几年，他对秦王说：臣在山东时，只听说齐国有孟尝君，没有听说齐王。只听说秦国有太后、

穰侯、华阳、高陵、泾阳，没听说有秦王。今天太后能擅自行事，穰侯把持对外大权，华阳、高陵、泾阳君可以自行决断，高陵君进退不请。这是秦国的“四贵”，“四贵备而国危”。大王的权利怎么能不倾覆，令怎么能从王出呢？范雎说，崔杼、淖齿、李兑是乱国害王之臣。今天秦国太后、穰侯专权，高陵、华阳、泾阳君为羽翼，这和崔杼、淖齿、李兑之事相类似。今天秦国从有等级的官吏到诸大臣，以及大王左右的人，没有不是属于相国的，王在朝廷是孤家寡人。臣实在为王惶恐不安，以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秦王听了，十分惊恐。公元前266年，秦王果断地废掉太后，把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中。贬逐“四贵”对于巩固和加强王权有重要的意义。

秦王封范雎为相，封以应地（今河南宝丰），号为应侯。

须贾出使秦国，范雎化装成普通平民商人见须贾。须贾惊异地说：“范叔固无恙乎！”须贾问范雎做什么事，范雎说：我为人家做佣人。须贾留他吃饭，很哀怜他，说：“范叔一寒如此哉！”送给他一件丝绸袍子。

须贾要见秦相张禄，原来就是范雎。须贾吓得魂不附体，赤着上身，跪行见范雎，请死罪。范雎数了他三大罪状，说须贾所以得免于死，是因为赠我一件丝绸袍子，“有故人之意”。范雎大宴宾客，宾客坐堂上，让须贾坐堂下，食粗劣之食。

魏冉是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惠王、武王时他就为臣。武王的亲生母亲不是宣太后，而是惠文后。武王死，宣太后和惠文后的儿子争王位，由于武王的母亲是惠文后，惠文后的儿子处于争王位的有利地位。但魏冉立了宣太后的儿子为王，这就是秦昭王。“唯魏冉能立昭王”，他握有兵权。昭王以魏冉为将军，卫戍咸阳。是年，公子壮（与昭王争立者）及诸公子、大臣作乱，魏冉杀了他们。惠文后不得好死，武王后出居魏。昭王年少，魏冉当政，“威震秦国”。

魏冉多次率秦兵攻三晋，他支持白起的对外征战。昭王时他为

相时间长，魏冉活动的时间前后长达40年之久。

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评论穰侯魏冉说："使天下诸侯稽首（叩头）而事秦，秦日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资治通鉴》卷五·赧王五十年）

穰侯的势力发展到了威胁秦王的王权，秦王要革除他，这是必然的。这样，秦国在统一过程中有一个稳定的内部统治核心，为秦最终统一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阏与之战和长平之战

阏与之战，大破秦军 战国后期在军事上能和秦较量的，只有赵国了，秦、赵阏与和长平两战表明了这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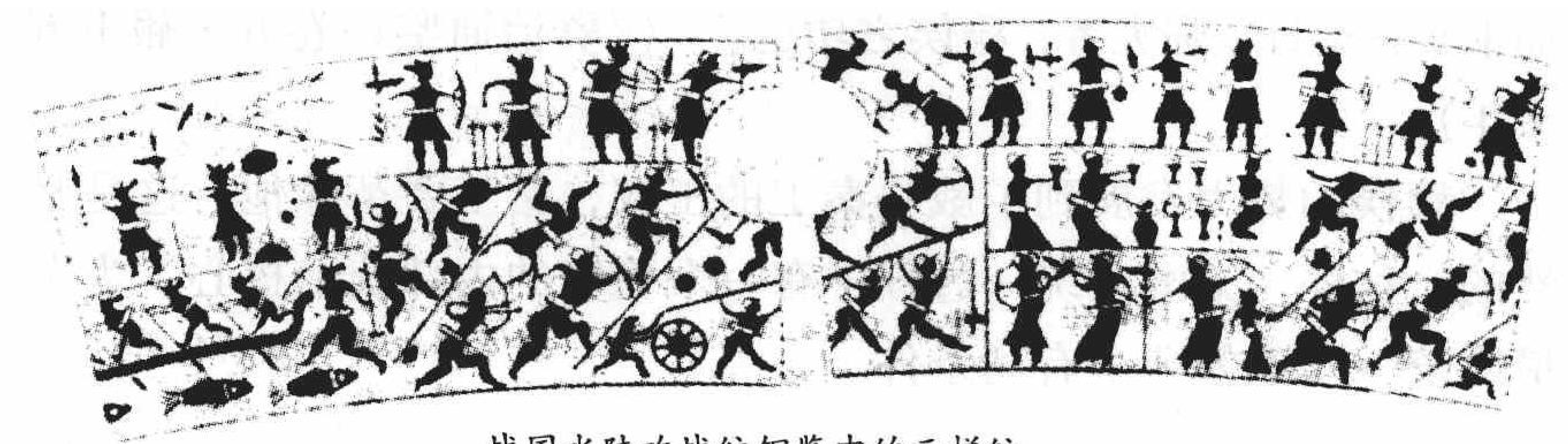
赵奢，做田税官时，平原君家不肯交租税，赵奢杀了平原君家管事的9个人。平原君大怒，要杀赵奢。赵奢就说："你是赵国的贵公子，你不守法，法就削弱，法削弱国就弱，国弱诸侯就来攻打，就没有赵国了。你还有富贵吗？国家强大，公子是贵戚，天下能看轻你吗！"平原君看他说得很有道理，说给赵王，任用他治理整个国家的田赋。赵奢治理得好，国家的粮食充实。

公元前275年，秦攻魏到大梁城下，韩派暴鸢救魏，秦大破韩军，斩首4万，暴鸢败走，魏割八城求和。公元前274年，秦占领魏四城，斩魏军4万。公元前273年，赵、魏伐韩，韩求救于秦，秦败魏军于华阳，斩15万，芒卯败走，秦兵又攻到大梁城下，魏割南阳求和。这一年，秦又败赵将贾偃，沉赵兵2万于河。公元前272年，秦设南阳郡。

公元前270年，秦伐赵，围阏与（今山西和顺县）。赵王问廉颇和乐乘："可以救吗？"他两人都说："道路远又险狭，难救。"赵王问赵奢，赵奢说："道路远又险狭，好像两鼠在洞里相斗，将帅勇敢就能取胜。"赵王欣赏赵奢所说，派他带兵去救。

赵奢领兵，他能和士卒共甘苦，专心致志，军队治理得很好。

他的军队离邯郸30里就驻扎起来，赵奢下令全军："有谁上书与秦军战者斩。"



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中的云梯纹

秦军驻在武安西，擂鼓厉兵，武安房屋上的瓦都震动了。赵军中有一人要求赵奢出兵急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杀了。赵军坚守了28日不动，而且还要加强防守工事。秦军的奸细窜入赵军，赵奢很好地招待他，还送他回去。秦军奸细报告秦军将领，秦将大喜，说："赵军去国都30里就不行了，而且还要继续增强防御工事，阏与不会属于赵国所有了。"

赵奢遣送秦军的奸细走以后，命令全军轻装急行奔赴阏与，两天一夜的功夫赶到离阏与50里的地方驻扎修筑工事。秦军闻讯急向阏与前进。

赵军许历献计说："秦军没有想到赵军这样快就到了这里，秦军气势汹汹，赵军一定要用重兵在此把守。要抢先占领北山，谁能够先占领北山谁就能够胜利，否则就要失败。"赵奢立即命令万人抢先占领了北山。秦军后至，争北山不能上，赵奢命令全军出动，奋勇进击，秦军大败，赵军解阏与之围。

阏与之战，赵军给秦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大破秦军"，使秦军的东进政策一时受挫。唐代史学家杜佑总结阏与之战是"示缓及先据要地"取胜的战例（《通典》第一五三卷）。

赵王封赵奢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位禄相等，许历为国尉。

长平之战，秦大胜赵　公元前262年，秦攻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县），野王降秦，这就切断了韩上党郡与本国的通路。上党郡

守冯亭派使者去赵国，愿以上党17个城邑降赵。赵王问平阳君豹，豹说：韩不愿意献给秦而献给赵，“欲嫁其祸于赵也”，不要受。赵王问平原君，平原君请王接受。赵王采纳了平原君的意见，派他去接受上党郡守的投降，同时派廉颇进军长平，互相声援，成犄角之势，抗拒秦军。

公元前260年，秦将王龁（hé）攻取上党，上党军民败退到赵。秦军进攻赵国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赵将廉颇坚守长平，修筑坚强的工事固守，秦军屡次挑战，赵军不出。赵军阻挡住了秦国的攻势，两军呈相持状态。这时，秦国派间谍以千金贿赂赵国的权臣，散布流言说：“秦国最害怕马服君的儿子赵括为将领兵，廉颇倒是容易对付的，他快要投降了。”赵王误以为廉颇坚守不出是畏惧秦军，听信了秦国散布的流言，撤了廉颇，以赵括代替。

蔺相如反对，他对赵王说：“以赵括为将，就好像用一根粗劣的木头棒去弹琴瑟一样。赵括读其父传的书，根本不知道怎样使用。”赵王不听。

赵括从小熟读兵书，爱谈战争的道理，以为天下谁也比不了他。常和他父亲赵奢议论兵家之事，他父亲也说不过他。但赵奢并不认为他可取。他母亲问赵奢这是什么缘故，赵奢说；“用兵，生死存亡的事，赵括却夸夸其谈，今后赵国不用他为将则已，如果用他为将，败赵军的必然是他。”

赵括母亲知道赵王用括为将，就上书赵王，说不能用赵括为将。赵王问为什么，赵母对赵王说：“他父亲为将时，能尊敬人，能友好人，能爱护部下，大王和宗室所赏赐的物品，他都分给部下。接受了命令，就顾不得家里的事。今天赵括一旦为将，就十分傲慢，部下都不敢抬头看他。大王所赏赐的金玉宝物，都拿回藏在家里，打算以后有利可图时买田宅。大王看他怎么能和他父亲的品德相比，他父亲对国家一片忠心，他完全为私利打算。请大王不要派他去领兵。”赵王却说：“你不要管，我已经决定了。”

秦国听说赵括代廉颇，立即暗里派武安君白起为将，以王龁为

副将，命令全军："如果谁泄漏武安君白起为将领的，斩首！"

赵括上任以后，全部改变原来的规定，更换原来的将官，引起了军中的不满。

赵括下令大举进攻秦军，秦军佯装失败逃走。白起埋伏了骑兵，赵括不知是计，直追到秦军阵地前，秦军坚守，赵军不能前进。白起派一支25 000人的奇兵切断后路，又派一支5 000人的骑兵分割赵军。赵军被分割包围，粮道被切断，只好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等待救兵和粮食。

秦王知道这时赵军粮食断绝，就亲往河北征发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开往长平，阻止赵国的救兵，阻止赵国的粮食支援。饥饿一天天夺去赵军的生命，赵军断粮40多日，互相残杀，以人肉充饥。赵军多次轮番突围，攻不破秦军的包围圈。赵括亲自率领一队精兵突围，想杀出一条路来，结果被秦军射死。赵军大败，40万人投降秦军。白起恐怕赵军作乱，除把其中240个小孩放回赵国外，其余全部坑杀①。

赵括惨败身亡，"纸上谈兵"的故事就是说赵括长平之战的教训。这个故事后来流传很广，用以讽刺那些脱离实际、夸夸其谈、败坏事情的人。

五、邯郸之战

长平之战以后的两年，秦军乘胜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抵抗不了秦军的进攻，向各国紧急求援。这又是战国后期的一次很重要的战争。围绕邯郸之战发生了两个故事，说明这次山东国家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合纵抗秦。

"毛遂自荐"　赵王向楚国求救，赵王派平原君赵胜去楚国。

---

① 关于长平之战后秦处置赵降卒事，从《史记》看就有不同说法：《秦本纪》作"尽杀之"，《赵世家》、《赵奢传》作"尽坑之"，《白起传》前作"尽坑杀之"，后又作"尽坑之"，我们这里用"坑杀"以兼顾诸说。

平原君要在门客中选文武俱备的 20 人一同去，选来选去，只选出 19 人，门客中有个叫毛遂的，走到平原君的面前，自信地对平原君说："我听说你要和楚国合纵救赵，准备从门客中带 20 人，现在还少一人，你就把我带上一同去吧。"平原君问他到门下有几年了。毛遂说有 3 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好像锥处囊中，锥尖马上会露出来。先生在我这里已经 3 年了，没有人称赞过你，我也没有听说你有什么本领，你不能去，留下吧。"毛遂说："我今日才得请处囊中，如果我早得处囊中，整个铁锥都会露出来，不只是露出一点点尖来。"于是平原君就带了毛遂等 20 人去楚国，那 19 人都对毛遂轻蔑地笑笑。

到了楚国以后，平原君与楚王商谈合纵抗秦的事，对楚王谈及利害关系，从早上谈起，一直谈到中午，也没有结果。来的人都对毛遂说："先生去。"毛遂按着剑把，急促地走上宫廷，对平原君说："联合抗秦的事几句话就可以决定了，你们谈这么久，怎么还不能定？"楚王问平原君他是谁，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楚王大声呵斥说："还不下去！我与你主人谈话，你来干什么！"毛遂按着剑把，走上前，逼近楚王，厉声说："大王你所以呵斥我，以为能凭借楚国的人多势大。现在在这十步之内，大王不能依恃楚国的人多势大，你的性命就握在我的手里。我的主君就在面前，你简直太无理了。我听说成汤、周文王都占地很小，臣服诸侯。他们难道是军队众多吗？这是因为他们能够掌握形势，发挥出自己的威力。今天楚国有地 5 000 里之大，士卒百万之众，天下谁能阻挡。可是，白起率数万军队，兴师伐楚，一仗就攻取鄢、郢，再一仗就烧了夷陵，第三仗就烧毁你祖先的宗庙。这是楚国的百世仇怨，赵国都感到羞辱，难道大王就没有感到耻辱吗？赵楚联合抗秦，这是为了楚国，而不是为赵国。"

毛遂义正词严，楚王连连说是，愿意贡献力量，合纵抗秦。毛遂叫人拿来马、狗、鸡血，当场歃（涂在嘴上）血为盟。先是楚王，其次平原君，再次毛遂。在殿上完成了楚、赵合纵抗秦的盟

约。楚王即派春申君领兵前往赵国解救邯郸之围。

平原君回赵国后，很有感慨地说："我不敢再相天下的士了。毛先生一到楚国，赵国就像九鼎大吕（周庙大钟）一样的重。毛先生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从此待毛遂为上客。

毛遂在别人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下，有勇于出来承担重大使命的主动精神。后来人们把这种自我推荐、勇于去做某件事的行动叫做"毛遂自荐"。

"窃符救赵"　秦军围邯郸，赵国多次向魏国求救，魏国派将军晋鄙带领10万人救赵。秦王派使者威胁魏王说："赵国很快就会攻下，谁敢救赵，秦攻下赵以后就攻打谁。"魏王害怕了，命令晋鄙在邺（今河北临漳县）安营，不再前进，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是看形势的变化。魏王还派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想说服赵王和魏共尊秦为帝，换取秦军从邯郸撤兵。这时，鲁仲连（齐国的高士）在赵国游说，听说魏国想让赵国尊秦为帝，他就去见平原君，平原君只得介绍鲁仲连见辛垣衍。

鲁仲连对辛垣衍说："今天的秦国，不要礼义，奖励杀伐，对他的士卒，玩弄欺诈手腕，对他的民众，任意驱使。如果让秦放肆称帝，我跳东海也不愿为秦国的民。"鲁仲连说商纣王把九侯剁成肉酱，把鄂侯切成肉条，把文王关进监狱，都是因为称纣为王的结果。齐湣王想在鲁、邹行天子礼，鲁、邹的大臣坚决反对，结果没能去鲁、邹。今天魏也是万乘之国，尊秦为帝，秦的欲望无穷，"魏王安得晏然，将军又何以得故宠?"辛垣衍再拜说："不敢再言帝秦。"

平原君的夫人是魏国信陵君的姐姐。平原君三番五次派人向魏国求救，救兵不到。平原君就写信责怪信陵君说："我以为你有急人的高

阳陵虎符

义，现在邯郸这样危急，你无动于衷。纵然你轻易地抛弃我，你就不可怜可怜你姐姐吗！”信陵君数次去请魏王，宾客辩士也百般游说，魏王害怕秦国，始终不答应。信陵君感到再也无法说服魏王，决定带100多辆车骑去赵和秦军死拼。路过东门，遇见侯嬴，告诉他说要去和秦军死拼。侯嬴对他很冷淡。他走了几里路，心里不快，又回来见侯嬴。侯嬴笑着说，你的行动好像是以肉去投喂饿虎，有什么用呢？侯嬴悄悄地告诉信陵君，如何弄到兵符调动晋鄙的军队。

侯嬴是魏国的隐士，70岁了，家里很穷，是看守城门的。信陵君几次去请他，送他很多财宝，他不受。信陵君大宴宾客，去请他，他故意很傲慢。公子把车位的上座让给他，他毫不客气地就坐上座。信陵君很恭敬地为他驾车，路上的人都观看着。侯说要去城里卖肉的地方见朱亥，信陵君就亲自驾车送他见朱亥。侯和朱故意久谈，信陵君很耐心地等待着。到信陵君家，又让他坐上座。宾客都是将相宗室，十分惊讶。酒酣，信陵君为他祝寿。

侯嬴对信陵君说：“我听说调动晋鄙的兵符藏在魏王的卧室里，魏王最宠爱如姬，如姬可以随便进出卧室。如姬的父亲被人所杀，要报仇，3年没找到仇人。如姬哭泣着求你，你派人杀了她的仇人。献头给如姬。如姬很感激你，愿为你死。只要你一开口，如姬一定会答应。请她偷出兵符，就能救赵了。”信陵君照侯的办法做。果然，如姬窃出兵符给他。

侯嬴又对信陵君说：“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如晋鄙不交兵权，事情就危险了。侯嬴让他带了大力士朱亥去。晋鄙听，很好，不听，就打死他。信陵君请朱亥同去晋鄙军。朱亥笑着说“臣乃市井鼓刀屠者”，公子待我很好，“今公子有急，乃臣效命之秋也”。

信陵君等一行人到邺，要代晋鄙领兵。晋鄙合了符，突然说：“我拥十万之众，今日几辆车子就来取代，不对头！”想不交兵权。朱亥迅猛地从袖子里抽出40斤重的铁锤把晋鄙打死。

信陵君整顿晋鄙的军队，大军救邯郸。这就是“窃符救赵”的故事。秦军在魏军、楚军、赵军的内外夹攻下大败，邯郸解围。

白起预言秦军失败 秦国这次攻邯郸，起初秦王派王陵领兵，失利，要派白起去替。白起对秦王说：“邯郸是不容易攻下的。”长平之战虽然秦国胜利，但兵卒死一半多，国内也空了，远征别国国都，赵国坚守，诸侯救援，内外夹攻，秦军必败。白起称病不愿前去领兵。秦王对白起很不满意，另派王龁去代替王陵。

王龁接替王陵后，仍然没有攻下邯郸，魏国和楚国的援军也到了，秦军失利。白起说：“不听我的劝告，今天怎样?”这话传到秦王耳里。秦王很生气，硬要白起去邯郸领兵。白起仍然推说有病。秦王免去了白起的官爵。秦军节节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秦王便把白起逐出咸阳，当他走出城门 10 里，到杜邮的地方，秦王派人送来一把剑，由他自己定夺。白起自杀了。

白起是战国后期秦国的重要军事将领。他领兵的时间很长，带领秦军打过许多胜仗，占领了山东国家的许多土地。他指挥秦军进行了一些著名的战役，如伊阙之战，秦军拔楚国都郢。司马迁说他指挥军队“出奇无穷”。他对邯郸之战的预言是正确的，也说明秦国君臣间有过激烈的争论。

六、“奇货可居”与嫪毐之乱

异人，是秦昭王太子安国君的庶子。安国君有 20 多个儿子。异人作为人质在邯郸，由于秦国屡次攻赵，赵国对待异人很不好，异人在赵国很苦恼。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很富，在邯郸见到异人，说：“此奇货可居。”吕不韦去见异人，说：“我能壮大你的门户。”异人笑笑，说：“还是壮大你自己的门户吧!”吕说：“你还不知道，我的门户要靠你的门户来壮大。”异人领悟到他的意思，与他深谈。吕说：“现在秦王老了，太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只有她能够立太子。你们兄弟有 20 多人，你排

在中间，又不得宠，还长期在赵国作人质。以后安国君继位，你是最没希望与朝夕在安国君身旁的兄弟争做太子的。”异人沮丧地说：“这又能怎么办呢?”吕说：“我虽穷，但我想办法弄千金为你去秦国游说，让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你为太子。”异人叩头说：“如果能够这样，我愿意和你共有秦国。”

吕不韦送给异人500金，要他结交宾客和左右，自己又用500金买了珍奇宝物去秦国。到了咸阳以后，他求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把珍奇宝物献给华阳夫人。吕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传话给华阳夫人说：“异人贤智，结交天下的宾客，常说‘以夫人为天，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华阳夫人听说后很高兴。吕又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对华阳夫人说：凡是以美色得人欢喜的，色衰也就得不到欢喜了。今天夫人甚得太子的宠爱，没有儿子，应该在诸子中选择一个贤孝的立为嫡子。以后夫人立的儿子继王位，夫人就不会失势。现在异人对夫人很贤孝，他自己知道排行在中，不能为嫡。如果夫人现在立他为嫡子，那就是“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夫人终身都能得宠于秦国了。这番话很能打动华阳夫人的心。华阳夫人在安国君面前说异人很贤孝，往来赵国的人都称赞他。她还哭泣着说：“我有幸得到宠爱，不幸没有儿子，愿立异人为嫡子，我以后也就有依靠了。”安国君答应了，还和华阳夫人刻玉符立约，立异人为嫡。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很多钱物，请吕不韦做异人老师，异人的名声在诸侯国也就盛传开来。

吕不韦和邯郸一个十分美貌的女子赵姬同居，他知道赵姬有孕了。于是宴请异人，席间让赵姬歌舞作乐，命赵姬向异人敬酒，异人神魂颠倒。席后，异人请求吕送赵姬给他，吕假装发脾气，异人苦苦哀求，吕乐得献赵姬给异人。赵姬果然生下一男孩，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公元前257年，秦攻邯郸，赵王想杀异人。异人和吕不韦用黄金600斤，买通守城人，逃出了邯郸。赵氏是赵国的富豪之家。母子藏在赵家，得免于难。

异人回到咸阳，吕不韦对他说："华阳夫人是楚女，你应穿楚国服装去见她，表示依恋之情。"异人就穿楚服拜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夫人端详异人，说："我是楚人，你穿了楚服，我很高兴。"安国君说："吾儿可改名子楚。"异人拜谢，从此又叫子楚。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死，安国君继位，即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送子楚夫人赵氏母子回国。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子楚继位，即庄襄王，华阳夫人尊为华阳太后，子楚亲生母夏姬尊为夏太后，以吕不韦为相国，封为文信侯，食洛阳10万户，有家僮万人。3年后，庄襄王死，秦王政即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政年幼，大权掌握在吕不韦手里。

吕不韦常与秦王政母私通，很怕事情败露。吕不韦把嫪毐（lào ǎi）收为自己的门客。他和太后商量好，假称嫪毐行了腐刑，并把他悄悄送入宫中，作为宦者留在宫里，说是侍候太后。太后有孕怕人知道，利用占卜，移居到雍。太后生下了两个孩子，私自藏起来，外面也有人知道，但没有人敢说。

太后为嫪毐请封，秦王封嫪毐为长信侯，赐给他山阳的地方，以太原为他的封国。太后给嫪毐的赏赐更是无计其数。从此，嫪毐家有门客奴仆数千人。嫪毐掌握了秦国的大权，"事皆决于嫪毐"。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去雍城行冠礼。有人告发嫪毐不是宦者，太后私生2子。秦王大怒，要惩治嫪毐，嫪毐的党徒急忙告密。嫪毐假称秦王和太后的旨令，发兵攻蕲年宫，想杀秦王。秦王的卫队拼力奋战，来犯的人一部分散去，一部分反戈。秦王命令昌平君、昌文君发兵攻嫪毐，战于咸阳，嫪毐兵败。秦王命令，能活捉嫪毐的赏钱百万，杀死嫪毐赏钱50万。嫪毐和他的党徒被活捉。

秦王下令车裂嫪毐，嫪毐被夷三族。他的重要党徒20多人被斩首示众，嫪毐舍人轻则罚为刑徒，有4 000多家被罚，流放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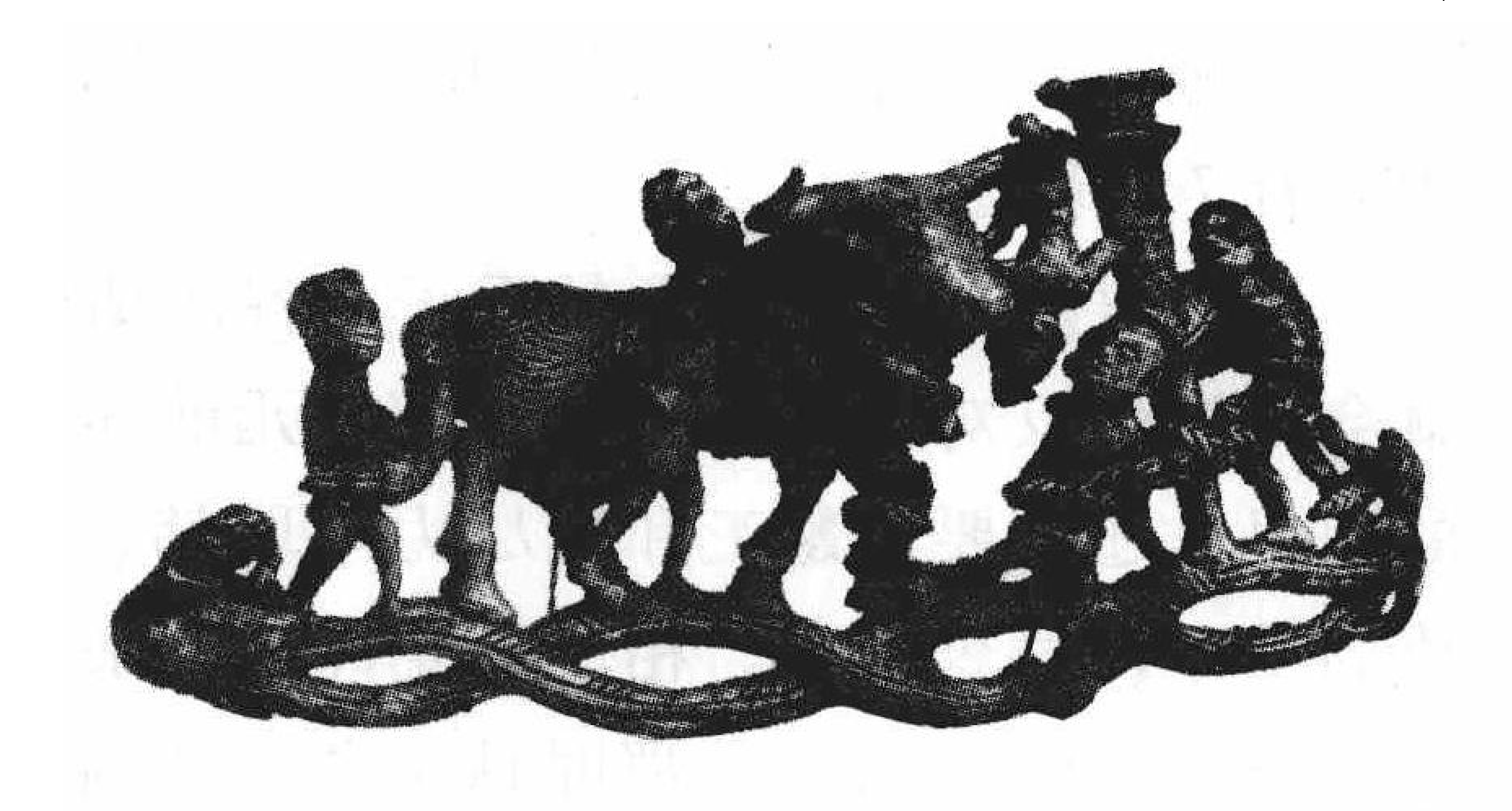
地。秦王杀了太后私生子，把太后迁到雍地贯（shì）阳宫。

嫪毐事牵连到吕不韦，他被免了相。让他迁到洛阳的封地去。在洛阳一年多，各国的宾客使者来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秦王恐他作乱，写了一封信给他，让他全家迁到蜀地。吕又生气又怕被杀，喝毒酒自杀了。

七、周嗣不祀，九鼎迁秦

平王迁都以后，周王室衰落了。东周传了22个王到赧王为秦所灭，周嗣就不祀了。到战国时期，周王室只占有王城洛阳附近相当于现在10多个县的一片土地，人口不多，力量微弱。处在大国之间，不时受到大国的攻击，七大国根本看不起周王室。周实际降到了一个小国的地位。

但是，周王名义上还是天子，从礼制来讲，各国要向他朝拜，各国国君爵位，要由他册封。由于周王室力量太小，毫无威力，各大国愿意的时候，表面上遵守这些礼制；不愿意的时候，就把这些礼制一脚踢开，自己僭称起来。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封赵魏韩三家为诸侯，以后安王又封篡齐的田氏为诸侯。这些诸侯的力量已很强大，周王室不过是礼制上的一个形式而已。


战国青铜雕

继封诸侯以后，各大国对于诸侯的称号不满足了，要求称王，不但七个大国如此，而且一些二等国，也都相继称王。而周王也毫无办法。

春秋战国之交从周元王算起，元王传给定王。定王死以后，长

子哀王继位，才3个月，哀王弟杀哀王自立，为思王，才5个月，思王弟又杀思王自立，就是考王。哀王和思王在位的时间都不到一年。过去史书算世系有些计算这二王，有些又不算，传位的王数因此也不同。公元前256年，秦灭赧王。这时离秦统一中国还有30多年，所以早在秦统一以前周王朝就不存在了，比秦灭山东各国为早。整个周代，经历西周、东周共37王，867年。

考王时，考王封他的弟弟揭于成周洛阳，说是为了要继续周公的官职，历史上称他为周桓公。也就是说在周王室的那点领土内又封出一个小国来。周桓公死后，传给儿子威公，威公死后，传给儿子惠公，惠公的长子叫西周公，封地在洛阳，惠公在位时又封他的小儿子于洛阳东面巩的地方，沿袭他父亲的称号叫东周惠公，这样在周王室的领土内又有西周东周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逐步占有了周王室的土地，以致赧王没有容身的地方，或是寄住东周，或是寄住西周。公元前256年，秦国灭西周，把西周迁到憚（dàn）狐，这一年赧王死，周朝算正式结束。公元前249年，秦国灭东周，东周只有7个邑了。

战国时期周王名义上是天子，各国诸侯表面上要尊重，不然就会是遭到反对的一个口实。如公元前309年，在齐王写给楚王的信里，还说要让楚王和他尽力争取韩、魏、燕、赵，联合起来尊周王室以号令天下。相传从夏代传下来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收藏在周王室的宗庙里。那时认为得到九鼎就能挟天子号令天下，诸侯没有敢不听的，就能成就王业。战国时也和春秋时一样，诸侯国觊觎王室的九鼎。有一次，秦国兴师临周，想得到九鼎。周向齐求救，齐出兵，秦兵退。齐国又“将求九鼎”。周派颜率说齐王，九鼎要是经过魏或楚，会被魏、楚劫去。颜率又说，每鼎需要9万人牵引，九鼎需要81万人牵引，这从哪里送来呢？齐王也就作罢。

秦灭周以后，就把九鼎迁到秦国国都咸阳去了。这标志着秦国完全取代了周王的地位。

八、“合纵”的失败

合纵连横是战国中后期100多年间的大事，合纵是谈论更多和实践更多的。如前面所述，战国有过多次重要的合纵，另外，还有倡议而没组织的，游说之士看到山东各国的危亡而呼吁合纵的就更多了。

下面我们分析一次合纵，就能比较具体了解为什么战国合纵攻秦往往失败。

秦、齐去帝号以后不久，出现了一次五国攻秦的合纵。齐、赵组织了这次合纵。《战国纵横家书》说：“秦受兵矣，齐、赵皆尝（曾）谋。”就是指组织这次五国攻秦。苏秦以齐国使者的身份积极活动，他在写给齐王的信里说：“臣能以天下攻秦。”他奔走于燕、齐、赵、魏各国之间，为组织这次五国攻秦起了重要作用，《战国纵横家书》说明了这一情况。

赵国奉阳君李兑出面组织了这次五国攻秦。李兑害怕秦国攻赵，想阻止秦国东进；他也很想得到宋国陶邑作自己的封地。魏、韩参加了这次合纵，这是由于孟尝君的支持，魏、韩才能组织起来；又由于魏、韩受到秦的进攻，所以当齐、赵组织攻秦时，魏、韩是愿意参加的。燕的情况复杂，燕、齐是世仇，但燕国还是参加了这次五国攻秦，因为燕感到秦称帝的威胁。齐国想灭宋国，秦国反对，秦也想吞并宋，齐国想利用合纵攻秦，削弱秦国。楚国没有参加这次合纵，但派了使者去齐。

齐国出兵，赵国派了驻在上党的军队，燕国派兵两万人，联军驻在韩国的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之间，军队在这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发起对秦国大的进攻。“五国攻秦，无功而还。”（《战国策·赵策》、《战国策·魏策》）实际上联军不了了之的散了。

这次五国攻秦的合纵，很不巩固，没有力量，原因是各国都有

自己的打算。齐国想利用五国攻秦达到兼并宋的目的，对于攻秦则是三心二意。“今攻秦之兵方始合，王又欲得兵以攻平陵（即宋地平陵，今山东汶上县西北），是害攻秦也。”（《战国纵横家书》）齐是组织合纵的，齐的行动有很不好的影响。赵相李兑想得到陶邑为封地，想利用这一时机与齐争宋地。合纵组织起来以后，对秦国的行动很迟缓。更有甚者，赵还想退出合纵与秦联合伐魏。魏当时以孟尝君为相，他是反齐的。魏的态度很动摇，“梁（魏）人两使阴成于秦”（《战国纵横家书》），两次暗中派使者想和秦国讲和。孟尝君还想得到宋的平陵为封邑，也是和齐争宋地。燕是矛盾的，既害怕秦的强大，更害怕齐的强大，燕对于五国攻秦也是动摇的。这次五国攻秦形式上存在1年多时间，由于各国怀有自己的目的，也就没有什么结果。

由于东方国家的不同利益和矛盾，合纵攻秦往往归于失败。对此，后来的评论家很有感慨。“纵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贾谊《过秦论》）山东国家对秦国屈膝，或者苟且偷安，齐国就是一个例子。齐王建在位几十年到齐亡，奉行“事秦谨”的方针，见危不救。如长平之战拒绝支援赵国粮食，赵军被围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向齐国求救，有大臣劝齐王应该紧急支援，提醒齐王，齐国和赵国“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齐王还是不肯援赵。后世苏洵批评这种做法，“与（结好）嬴（秦王姓，指秦国）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苏洵《嘉祐集·六国》）。山东国家还有帮助秦国攻打别国的，如赵国几次帮助秦国攻齐，《战国纵横家书》说：“今从强秦久伐齐，臣恐其祸出于此也。”公元前263年，魏国和秦共伐韩，无忌对魏王说：“秦国不是没有欲望的，韩亡之后，非攻魏不可。”

山东国家明智之士，如陈轸说，能够危山东的是秦国，山东国家自己不断互相削弱，这样秦国得天下不用出力，秦国“烹”天下不用出“薪”，“何秦之智而山东之愚耶”。有人呼吁山东各国“如同舟而济”，应该共同扶助、渡过困难。

秦国对于山东各国的合纵，极力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有一次，一群天下之士相聚于赵，策划合纵攻秦。范雎对秦王说，可以用金钱分化他们。于是秦王派范雎携五千金去收买。范雎扬言说谋攻秦的不得金，得金的如同兄弟看待。行到武安，山东之士都来争着要金，合纵也就不了了之。

秦国是害怕合纵的。贾谊描写合纵的威力："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过秦论》）有一次，秦王和秦臣顿弱谈话，顿弱劝秦王不惜重金收买韩、魏权臣。秦王说拿不出重金，顿弱提醒说："天下不是没有事情的，合纵成功就是楚国的天下。"秦王采纳了顿弱的建议。荀子说："諰諰（xī，忧虑）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荀子·强国》）生动描写了秦国的心理。

山东各国如果合纵作出成效，会给秦国造成极大的困难，"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战国策·赵策》）。山东各国力量比秦大得多，但最后还是为秦所灭。

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把三晋比成齐、楚的藩蔽，齐、楚比成三晋的根柢，这是互相依赖互相保护的关系，更不能互相攻击。"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资治通鉴》卷七）在我们今天看来，无论合纵也好，连横也好，都只是强调计谋策略的作用。山东六国合纵的失败，虽然有许多因素，恐怕也是必然的。

九、秦统一中国

李斯《谏逐客书》和尉缭献计　李斯，楚国上蔡人，荀子的学生。他想在秦国干一番事业，入秦以后，在吕不韦的门下做门客，因而有机会游说秦王。秦王赏识他，封他为长史。李斯又劝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国作反间，秦王也采纳他的主意，又封他为客卿。

这时韩国有一人名叫郑国，来秦国修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

人力物力，事情被发觉。宗室大臣都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抵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作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是被驱逐的。



秦长城遗迹

李斯准备走，同时给秦王写了一封信。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要来由余，从东方楚国要来宛人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穆公任用这五人，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孝公重用商鞅，行新法，国家、人民富强昌盛，伐楚、魏，扩地千里，直到今天，秦国仍然强大。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东方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西面而事秦"，功业直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君，贵戚大为削弱，王权大为加强，蚕食诸侯，秦成帝业。这四代王，都由于任用客卿，对国家有很大的功益。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

李斯又说：今天十分珍贵的宝、玉、珠、剑，秦国并不出产。如果必定是秦国的东西才可以，那么，"夜光之璧"、"犀象之器"、"郑、卫之女"、"骏良駃騠"、"江南金锡"、"西蜀丹青"秦国就没有了。今天不喜欢"秦之声"，而喜欢郑、卫、昭、虞之乐，是因为求快意。用人又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这不是"跨海内制诸侯之术"。李斯还说：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今天秦国抛弃百姓，拒绝宾客，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这是"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对秦国是非常有害的。

秦王看了信，把李斯叫来，恢复他原来的官职，去掉逐客令。后来李斯一直是辅佐秦王最重要的人物。

在秦王去除逐客令后不久，大梁人尉缭来到秦国，他劝秦王不要爱惜财物，要收买各国的豪臣，搞乱他们国家的君臣关系。不过花三十万金，就可以收到兼并各国诸侯的效果。秦王接受了尉缭的建议，厚待尉缭，让尉缭的衣服饮食与自己同，封尉缭为国尉（统率全国军队的长官）。

在兼并各国的进程中，李斯、尉缭主张离间各国君臣关系的计谋，收到了很大的功效，加速了秦统一的进程。不过也应看到，如李斯所说“不肯者，利剑刺之”，秦国是以武力做后盾的。

秦灭六国　长平之战以后，秦国继续蚕食山东。公元前 249 年，蒙骜伐韩，取成皋、荥阳，设置三川郡。公元前 248 年，蒙骜伐赵，取榆次（今山西榆次县）、狼孟（今山西阳曲县东北）等 37 城。公元前 247 年，王龁攻取上党诸城，设置太原郡。公元前 244 年，秦攻韩，取 13 城。公元前 243 年，秦取魏畼、有诡，又取燕武遂（今河北徐水县西）、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公元前 242 年，秦伐魏，取酸枣（今河南延津县东南）、燕、虚、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东北）、雍丘（今河南杞县）、山阳（今河南修武县西北）20 城，又攻取原卫国地，连同原卫都濮阳设置东郡。

秦军节节胜利，在东方设置了一些重要的郡，如三川郡（今河南西部洛阳、荥阳、宜阳一带）、南阳郡（今河南南部南阳为中心的地区）、上党郡（今山西东南部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太原郡（今山西太原为中心的地区）、东郡（今河南东北部以濮阳为中心的地区），这些地方是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人们常说这是中国的“咽喉”，山东的“脊梁”。六国为秦所分割，东郡的设置则进逼到齐国，秦国向东、向北、向南进攻都处于有利的地位了。

公元前 241 年，各国又有一次合纵，赵将庞煖带领赵、楚、韩、魏、燕五国军队攻秦，到了函谷关。秦国军队出来应战，五国军队败走。这是战国最后一次有五国军队的合纵攻秦。

从公元前230年开始，秦国向山东各国大进军。秦首先攻韩，虏韩王安，韩灭亡。韩地设置颍川郡。

公元前229年，秦攻赵，赵派李牧、司马尚抵抗。秦以重金收买赵王宠臣郭开，郭开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以赵葱和颜聚代替，杀李牧。第二年，秦军攻破赵军，杀赵葱，颜聚逃跑，秦军攻入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率宗族数百人逃到代郡，自立为代王。

公元前227年，秦攻燕。燕太子丹派荆轲去刺杀秦王，没有成功。燕联合退守代地的赵公子代王，也被秦军击破。公元前226年，秦军攻占燕都蓟城，燕王喜逃到辽东。

公元前225年，秦攻魏，包围了大梁，放黄河、大沟水灌大梁，大梁城坏。魏王假投降，秦杀魏王假，魏灭亡。

秦王问李信，多少人伐楚可以取胜，李信说20万人。秦王问王翦，王翦说非60万人不可。秦王说王翦老了，李信壮勇，派李信、蒙武领20万人伐楚。李信开始取得了胜利，后被楚军打败，李信逃回秦国，秦王大怒。秦王亲自请王翦，答应他的要求。王翦领60万大军伐楚，大破楚师，杀楚将项燕。公元前223年，秦攻占楚都寿春，虏楚王负刍，楚亡。秦又继续平定了楚属百越地方。

公元前222年，秦攻燕辽东，虏燕王喜，燕亡。秦攻代，虏代王嘉。

公元前221年，秦军从燕南下攻齐，掳齐王建，齐亡。齐相后胜，接受了秦国的大量贿赂，秦国向山东进攻时，后胜劝齐王和秦国修好，助长了秦国的进攻。

在秦国最后征服各国的战争中，王翦父子有很大的战功。王翦领兵征服了赵国、燕国、楚国，他儿子王贲领兵征服了魏国、齐国，攻燕辽东虏燕王喜。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只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山东各国为秦所灭，秦王政完成了海内一统的大业。

揭开历史的新一页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最后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建立起一个东到大海，南到岭南，西至甘青高原，北至今内蒙古、辽东的前所未有的封建大一统国家，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一页。

从春秋起，中国经过500年左右的战争动乱，特别是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人民灾难深重。“暴骸骨于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史记·春申君列传》）。知伯围晋阳3年，城内“人马相食”。秦军围邯郸，城内“炊骨易子而食”。无休止的兵役、徭役，沉重的赋税落在人民头上，“兴师十万，日费千金”，“黔首（即民众）之苦，不可以加矣”（《吕氏春秋·振乱》）。相反，统治阶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秦国统治者有从山东国家来的锦绣丝绸、珍珠宝玉，有从赵国来的美女。穰侯被废，他的财宝有千多车。邯郸被围，平原君家仍有宫女以百数，还是美食绸衣。

“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孟子·尽心》）诸侯林立，关卡林立，严重阻碍经济文化交流。“雍（壅）防百川，各以为利。”齐国的地势低，赵、魏的地势高，齐国在黄河筑起堤防，河水泛滥时为害赵、魏；赵、魏也筑堤防，河水泛滥时又为害齐国。公元前225年，秦军为迫使魏国投降，引黄河水灌魏都大梁，水浸3月。分裂和战争带来巨大祸害，人民希望能够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定于一”，这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各民族和汉族逐步融合的历史进程，要求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家庭。



荆轲刺秦王石刻

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和加强他们的地位，加强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希望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工商业者想发展，希望

结束分裂。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深受战争的痛苦，希望结束战争。海内一统是全国大多数人的愿望，是大势所趋。只有各国宗室贵族害怕失去自己的利益，害怕被别国兼并。秦国统一六国，六国宗室贵族受到沉重打击。新兴地主阶级推动统一，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是实现统一的基本力量。

“跨海内，制诸侯”，“大胜以十数，小胜以百数”，秦国经过多年的努力，登上了统一全中国的历史舞台，这是有主客观原因的。秦国的社会改革比较彻底，注意奖励耕战。秦是“上首功之国”，“功赏相长”，有军功受赏，有多大的功受多大的赏，打败仗要受罚，秦国的军队比别国勇敢善战。秦国能够任用客卿，由于历来注意任用山东国家来的人才，对秦国的强大起了很大的作用。秦国还注意吸收山东的劳动力为自己开发经济。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规定官吏要“清廉”，这可以和荀子、韩非所说的秦国政治作印证。荀子和韩非是去过秦国的，他们对于秦国的政治有好的印象，荀子在《强国》篇里说“其百姓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恶劣）”，“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韩非在《饰邪》篇说：“彼明法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这虽有些夸张，但可以看出秦国新兴地主阶级是有作为的。

秦国又善于利用山东六国的矛盾和弱点，秦国的“远交近攻”和“离间”的政策，达到了各个击破和从内部分化的目的。秦国攻取巴蜀和兼并义渠等，达到了富国强兵，这些都是正确的。

秦国的客观有利条件居多，占有关中、汉中和后来的巴蜀地区，这是富饶肥沃和有山林川泽之饶的土地，“为九州膏腴”。秦征服的周边少数民族国家“畜牧为天下饶”。《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十分之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说的不一定准确，但关中确实很富饶。秦国占有关中几面有山的地方，东边的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对于秦和山东各国的争夺很有利。

荀子说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侥幸）也，数（必然）也”。秦国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汉朝的贾谊这样评论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天地四方），执棰拊（刑具）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过秦论》）贾谊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评论秦始皇的。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是有进步意义的，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八章　政治制度、阶级关系、民族关系

一、官制、爵制和郡县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政治制度。中央设立了相和将，“相”是“百官之长”，也称相国、丞相、宰相、相邦等，秦国还设立过左右相。“将”是统率军队的长官，还称“将军”、“上将军”、“大将军”等，地位仅次于相。如齐威王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魏惠王用惠施为相，庞涓为将。赵惠文王用蔺相如为相，廉颇为将。

秦国设相较迟，商鞅在实行变法时他的官职是大良造，这是当时的最高行政官。秦惠王时设相，张仪为相。秦武王又设置二丞相，以甘茂为左丞相，樗里疾为右丞相。秦王政时吕不韦为相，称相国。秦昭王时开始立将军，以魏冉为将军。楚国一直没有设相，以令尹为最高官职，相当于相。楚也没有设将军，有柱国、上柱国的官职，是最高武官，相当于将。

中央还有负责专门事务的一些官职，如尉是次一级武官，也有些国设尉是负责选择任用官吏的。尉史是协助国王处理日常事务的秘书性质的官吏，还有负责司法的廷尉，负责守卫宫廷的官吏称郎中，负责教育太子的为太师、太傅，负责宗教事务的是太祝、太卜等。不过这些名称各国不尽一样，官吏的设置也不尽一样，有些发展为秦汉的三公九卿。

战国时打破了贵族的世袭，平民也可以做相、将和地方军政长官，如申不害、范雎、蔡泽、张仪这样的平民而为相，孙膑、乐毅、白起、廉颇、王翦这样的平民而为将。不过多数情况仍是宗室贵族担任军政要职，如楚国的屈、景、昭三家族，齐国的诸田氏。

地方设郡、县，郡管辖县，各郡的大小不一。例如，赵国代郡管辖36县，上党郡管辖24县，河间郡管辖12县。魏国上郡管辖15县。韩国上党郡管辖17县。燕国上谷郡管辖36县。秦国太原郡管辖37县。战国设郡起初是为了边境的安全和加强对边境的管理。如魏设上郡是为了防秦；赵、韩都设上党郡，因为这里处于几国争夺的险要地带；韩设三川郡，因为这是秦国争夺韩国以致整个中原地区的必经之地。华夏国家为了巩固边防往往设郡管理，如赵设云中、雁门、代郡，燕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郡，秦设陇西、北地郡和上郡。郡设守或太守为一郡之长。

齐国没有设过郡，齐设的都约相当其他国的郡。都的长官称大夫。齐攻燕时发“五都之兵”，就是说的一种行政建制。

战国时各国普遍设县，如秦国商鞅变法后全国设41县。县设令为一县长官，县令下设丞、尉，丞主管民政，尉主管军事。郡守县令由国君任免。郡县制的推行加强了国王对地方的控制，巩固了王权。

郡县的设置在春秋时就出现了，郡比县又晚，郡是在春秋晚期才开始有的。公元前493年，晋国赵简子在誓师时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这时郡比县小。县比郡设置为早，春秋初期，秦、楚在新兼并的地方开始设县。公元前688年，秦伐邽、冀戎，占领后设县。公元前687年，又在杜、郑设县。公元前688年，楚灭申，设县。公元前680年，楚灭息，设县。春秋中期以后，各国设县多起来。公元前627年，晋襄公命以先茅之县赏胥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598年，楚以陈为县（《左传·宣公十一年》），楚还有所谓“九县”。公元前537年，楚薳启强说晋国“其余四十县”（《左传·昭公五

年》)，说明这时晋国有许多县了。公元前594年，晋景公赏给士贞子以瓜衍之县（《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14年，晋国灭掉祁氏，把他的地方分为七县；灭掉羊舌氏，土地分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到春秋后期，县的设置已普遍起来。

战国时县以下设乡、里、邑、聚。另外还有亭，这是属于军事性质的组织。乡有三老、廷掾，里有里正。又按什伍编户组织，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伍有伍长，伍长也称伍老，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有系统的、相当严密的各级组织。

战国时还有封君，国王封给他们地方。如战国“四公子”的孟尝君，他父亲封于薛，他继承了封地；平原君封于东武城；信陵君是封号，信陵可能是地名；春申君为封号，封赐淮北地十二县。又如，秦国封商鞅为商君，封地于商。封白起为武安君。齐国封田单为安平君。赵国封李兑为奉阳君。燕国封乐毅为昌国君。也有封侯的，封侯与封君性质一样。如秦国封魏冉于穰，又加封陶邑，号穰侯。吕不韦号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封嫪毐为长信侯。齐国封邹忌于成邑，号成侯。战国时封君封给食邑，食邑通常不能世袭，只能“衣食租税”，由封君收若干邑的租税。食邑的行政权属国家，食邑的军政长官由国君任免。但封君在食邑还有部分权利，有少量的武装。战国时的封君与奴隶制的诸侯分封已经大不相同了，奴隶制的诸侯有很大的军政权，能够发展成为独立的国家。战国时破除了像奴隶制分封那样的权力，这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各国还设有爵位的等级制度。秦国商鞅为秦制爵20等，最高为第二十等彻侯，以下顺次为十九关内侯，十八大庶长，十七驷车庶长，十六大上造，十五少上造，十四右更，十三中更，十二左更，十一右庶长，十左庶长，九五大夫，八公乘，七公大夫，六官大夫，五大夫，四不更，三簪袅（niǎo)，二上造，一公士。大概十六级以下既是爵位又是官名，如白起曾任左更和大良造（即大上造)。秦爵原来是军队的等级身份，士兵没有爵位；官长的爵位不同，地位和权利也不同。八级公乘以下，只能得到赏赐田亩，不

能食税邑。山东六国人士入秦有功的，也有得到卿的称号的，如司马错称客卿错。有了爵位就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得到官职，享有食邑和赏赐，减免刑罚等。爵位的实行有利于破除宗室贵族的世袭权力，为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取得政治经济权力创造了条件。



战国三龙环形玉佩

齐、韩、赵、魏、燕的爵位等级大抵为卿和大夫。如齐国立淳于髡为上卿，邹衍、淳于髡等的学生、即稷下学士赐为上大夫。赵国廉颇、蔺相如拜为上卿，蔺相如还拜为上大夫。魏国须贾为中大夫。韩国聂伯为大夫。燕国荆轲被尊为上卿，乐毅封为亚卿。大抵卿分上卿、亚卿，大夫分为上、中、下大夫。

楚国的最高爵位叫执珪，昭常“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景翠“爵为执珪，官为柱国”。楚国还有上大夫、五大夫爵位。

任命文武官吏时发给玺、符。玺是官印，下达命令和来往公文，必须用玺来泥封，这是凭信。玺实际上是权力的象征，去职时要上交，对不称职的官吏要收玺、夺玺。对武官领兵发给虎符的左半，右半留在王手里，右半与左半合符是调动指挥军队的凭证。调动50人以上的军队就必须有留在国王手中的符相合，只有边境烽火的紧急情况除外。“窃符救赵”就是窃得魏王手里的右半兵符。出土的秦国《新郪虎符》铭文记载：“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会符，行殹（也）。”说的就是这些情况。

战国时对官吏实行俸禄制度，各国计算的单位不同，高低的悬殊也很大。卫国用“盆”计算，有千盆、五百盆等级。齐、魏用“钟”计算，如魏文侯时魏成子为相国，“食禄千钟”。秦、燕等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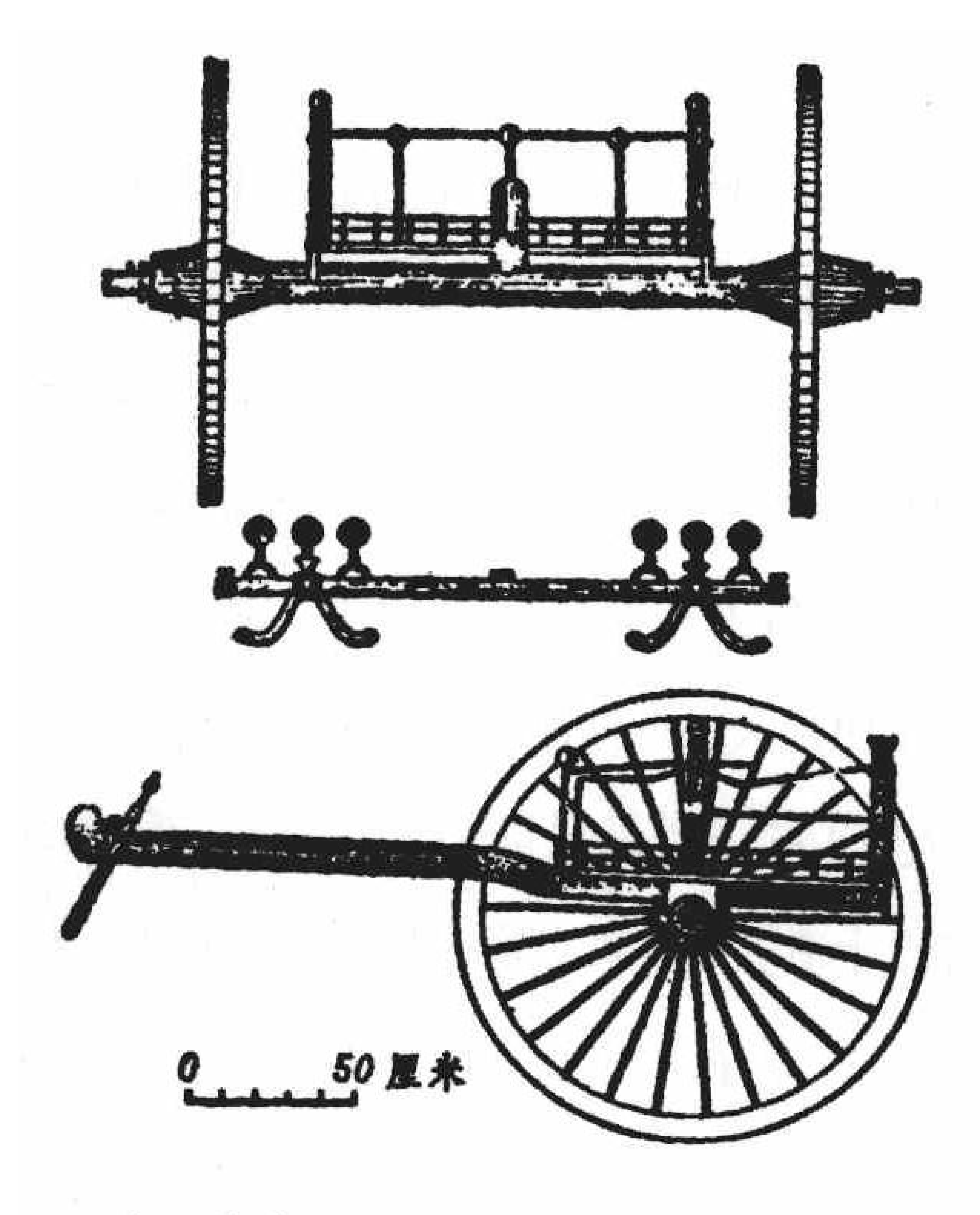
用“石”、“斗”计算，秦国有50石、100石至五六百石以上俸禄的官，最低有斗食的。如秦孝公时规定，斩敌一首者，可为50石之官。楚用“担”计算，有“禄万担”。所谓“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这时已不同于分封制的君臣关系。

战国时的著作常说“上计”，这是一种考核官吏的制度。地方官吏每年把应收的赋税数目写在卷上，这种卷分左右卷，右卷存国君处，左卷归臣下。到了年终，臣下必须去向国君报核，这就是上计。由国君亲自考核，没有达到卷上的规定，国君不满意，即收玺免职。

二、战争和武器的变化

春秋时中原地区进行的战争一般为车战，双方排成整齐的车阵，有步兵跟随，但并不重要。山地进行的战争则为步兵作战。到了战国，步兵骑兵作战成了主要的方式。

春秋时一些著名的战争，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都是以车战为主，只在一二天之内就决定了胜负，没有哪次战争双方能相持一月、数月以上的。战国时的战争就大不相同了，作战双方能旷日持久地相持。魏国“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吕氏春秋·不屈》)。“秦虽不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吕氏春秋·应言》)从公元前284年燕军攻入齐国和围莒、即墨到公元前279年田单在即墨反攻并驱逐燕军出齐境，前后相持达5年之久。这些战争主要以步兵进行的野战为主。



战国车复原图（河南辉县出土）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军事上大胆的、重要的改革，华夏国家建立骑兵作为军队的主要兵种之一是从赵武灵王开始的。赵国建立了中原国家第一支骑兵主力部队，战国和战国以后骑兵成为中国军队的一个主要兵种。赵国在和三胡（东胡、林胡、楼烦）的战争中，骑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车战虽然退居次要地位，但车战还起一定的作用。李牧在和匈奴进行的一次大战中，“选车千三百乘”，战车是李牧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军和船战也是战国时一种作战方式。《越绝书》记载战国的大型战船能乘90人左右，水军的装备有护体的铠甲和兜鍪，有远射的弩。河南汲县山彪镇水陆攻战纹铜鉴，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嵌错宴乐铜壶和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传世铜壶上都有水军战斗情形。这三件铜器的水战画面大体相似。以完整清晰的山彪镇所出铜鉴为例，船上有武装的水军和配剑的划船手，水军的武器有戈、矛、弓箭和短剑。画面描写了水战的情况，指挥系统是旗、金、鼓，指挥员鸣金击鼓，水军奋力拼杀。从画面来看，远距离用弓箭杀伤对方，近身用戈、矛，肉搏用短剑，形象生动逼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攻城不便，《孙子兵法》说攻城“为不得已”。战国时城市更重要，争夺城市变得很重要，《墨子》说公输般还专门制造攻城的“云梯”，《孙膑兵法》分析难攻的城为“雄城”，易攻的城为“牝城”。

春秋时齐桓公为五霸之首，齐国的军队以万人为一军，共三军“三万人方行于天下，……莫之能御也”（《国语·齐语》）。只有3万人的军队，就可以无敌于天下。晋楚城濮之战，晋有上中下三军，有车70乘，共为52 500人。楚国三军的人数和晋军差不多。春秋时各大国常备兵的兵力看来不会超过10万。战国时各国的兵力大为增加，据记载秦楚两国各有兵力100万，战车千乘，马骑万匹；齐、赵、燕各有兵力数十万，车数百至千乘，骑数千至万匹；魏有各种兵力六七十万，车数百乘，骑五千匹。战国时每次战争动

员的兵力和杀伤的人数远超过春秋时，一次常是杀伤数万、十多万甚至数十万人。

战国时各国实行征兵制，有常备兵和根据战争需要随时进行征发的，如长平之战，秦国随即征发大量兵员去前线。春秋时从未记载有妇女当兵的。战国时妇女亦组成作战的女军。《商君书·兵守》说："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除了普遍征兵制外，还出现了雇佣兵，"赁市佣而战"。各国建立的常备兵，受一定的训练，装备也较优良，当时称为"练卒"或"练士"。魏国称"武卒"，齐国称"技击"。魏考选武卒，要穿甲胄，带戈、弩，带50支箭，背3日的粮，"日中而趋百里"，即半天急走百里，挑选严格。各国对常备兵给予优待，他们能享有俸禄，还可以免除全家的赋役。云梦秦简《编年记》记载，一个名"喜"的男子，15周岁登记服役。长平之战秦国"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也是说15岁开始被征兵。被征的最大年龄没有记载，有人估计到60岁。战国时一般以郡县为征兵单位。常备兵和随时征发的兵主要来自农民。


秦陶俑

恩格斯论证战争和军队的变化说，"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再就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反杜林论·暴力论》) 这是春秋战国战争有许多不同的原因。

战国时已有铁制兵器。《史记·范雎列传》说："吾闻楚之铁剑利。"《荀子·议兵》说："宛钜铁钜铯（shī），惨如蜂虿（chài）。"

(宛地的钢铁作矛，像蜂、蝎子一样厉害)“窃符救赵”的故事里说：“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都说到了各种铁兵器的情况。韩国的冥山、堂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方的兵器很有名，能“陆断牛马，水击鹄雁，当敌即斩”，也当有铁兵器。

从考古发掘来看，河北、河南、湖南都有铁兵器出土，长沙杨家山 65 号墓出土春秋晚期的钢剑，这是我国最早的钢剑。1965 年，河北易县燕下都 44 号墓出土遗物中有大量的兵器，其中有铁制的剑、矛、戟、盔、甲片等，占出土兵器的 65%，而铜兵器只占 30% 多。这是战国晚期墓，就全国来说，这时的铁兵器也应相当普遍，对 44 号墓 9 件兵器作金相分析，6 件为纯铁或钢制品，说明当时已能够掌握将海绵铁增碳制造高碳钢和淬火的技术。钢铁兵器的使用，较之青铜兵器，杀伤能力大为提高。

战国时还大量使用铜兵器，各地都有出土。长沙楚墓出土了大量多种的铜兵器，有戈、矛、戟、刀、剑、匕首、弓、箭、弩等，还有漆盾，也属兵器。1978 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 500 多件兵器，有戈、矛、戟、殳、弓、箭、胄、甲、盾等。戈有单戈、双戈、三戈，有三戈一矛同柄的长戟，长柄的戈、戟柄长 3 米多。带刺圆球的殳是一种刺杀武器，柄长 3 米多，是战国以前未见过的武器。箭镞的种类有 10 多种，3 000 多个，绝大多数有倒刺。漆盾、皮胄、皮甲制作精美，保存完好。少数民族地区出土许多兵器，如甘肃灵台县景家坪春秋墓出土的铜柄铁剑，宁夏南部战国匈奴遗物有铁剑，巴蜀地区出土的多种战国铜兵器，辽宁、吉林、河北许多地方出土的以青铜短剑为主的东胡族兵器。说明战国时兵器种类多、数量多、分布广。

战国时武器比以前有了发展，以戈来说，这是主要兵器。戈胡是系在木柄的部分，最早的戈是没有胡的直戈，西周时发展为有短胡，胡上有一孔，西周末春秋初又发展为胡略长有两孔，战国时发展为长胡三孔，这就能牢固地把戈捆在柄上。

又以剑来说，公元前409年，秦国“令吏初带剑”。河南汲县山彪镇水陆攻战纹铜鉴等铜器上铸刻的水军和划船手都带剑，看来战国时普遍使用剑。剑的长度增加了，春秋到战国早期剑的长度一般只有50厘米左右，战国晚期秦国的剑达到80多至90厘米。湖南楚墓出土的铁剑比较多，常常不短于70厘米，接近1米或超过1米的也不少。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15把铁剑，平均长度约88厘米。在增强杀伤能力方面，生产了剑脊背和剑刃含锡不同的复合剑，剑身更不易断，剑刃更加锋利。

在防护武器方面的改进是出现了铁甲胄，这是战国才开始有的。《史记·苏秦列传》说“以铁为臂胫之衣”，是说有遮护手足的铁衣。《吕氏春秋·贵卒》说“衣铁甲操铁杖以战”，是铁质铠甲，这是防护身躯的。我们从秦始皇陵出土的披甲陶俑可以知道当时披铠甲的情形。燕下都44号墓出土一件铁兜鍪，用89片铁甲片连缀编成，全高26厘米，上层压下层，共7层。是带在头上用的，即通常所说的胄。

据研究，春秋晚期开始出现弩，战国已普遍使用弩。马陵之战齐军埋伏马陵道，魏军进入埋伏地域，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败。《孙膑兵法》多次说到弩的作用：弩能杀人百步之外，而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险要的地方多用弩，“弓弩，势也”，弩可以造成有利的形势；“劲弩趋发”，弩是最厉害的武器，“矢，卒也，弩，将也”，弩的作用比矢大得多。湖南常德、长沙，河南洛阳，河北平山，四川成都、涪陵等地都曾出土战国的弩。弩主要由弩弓和弩臂两部分组成，弓上装弦，臂上装弩机。弩机有“牙”钩住弓弦，上有“望山”，即瞄准用的，下有“悬刀”，作为拨机。拨动悬刀，牙就缩下，牙所钩住的弦就射出。有用手臂发射的“臂张弩”和用脚踏发射的“蹶（jué）张弩”，《战国策·韩策》说韩军“蹠（zhí）劲弩”，就是脚踏发射的弩。魏军有“十二石之弩”，是说弓弦拉开相当于12石的重量，韩国的劲弩能射600步之外，可见弩的巨大威力。

战国时军队装备和武器的发展，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发生的。

由于战争的需要，中原各国修筑长城。齐长城从今山东平阴县境内经泰山北麓，东至今山东日照县北的黄海之滨。楚长城西起今河南内乡县，南经鲁山县、叶县等地至今河南泌阳县境内，所谓“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即指楚长城。魏西边长城自今陕西华县境内沿洛水北上至今陕西葭县，东边自今河南新郑县东北至今黄河北岸的原阳县西北。赵南边长城自今河北省涉县境内经临漳县等地至今河北曲周县境内。燕南边长城自今河北易县西经徐水、安新等县至今河北文安县境内。

三、战国的礼乐制度

“制礼作乐”　《汉书·礼乐志》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实际上，从夏代以来，统治阶级即十分重视礼、乐、政、刑，认为这四件事能达到他们所希望的境界，“则王道备矣”，就是理想的治世了。

礼乐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阶级十分强调礼乐的重要，目的是要使人民能够在礼乐的束缚、熏陶下，规规矩矩。他们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章》）“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孝经·三才》）礼乐能使人民温顺。“礼乐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制礼作乐的目的是让人民不能有丝毫反抗。“礼乐不可斯臾（片刻）去身。”（《礼记·乐记》）统治阶级以礼乐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是一刻也不能缺少的。“世乱则礼慝而乐淫。”（《礼记·乐记》）在统治阶级看来，礼乐与治乱是影随人身，治世则礼乐正，乱世则礼乐坏。

先秦统治阶级十分强调礼。“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

非礼无以则男女父子兄弟之亲。”（《礼记·哀公问》）“礼之于正（治）国也，犹衡之于轻重，绳墨之于曲直，规矩之于方圆也。”（《礼记·经解》）用三种事物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以礼治国的重要。“礼，禁民之淫。”（《礼记·坊记》）“礼，禁乱之所由生。”（《礼记·经解》）国家失去了礼，乱就要生，就要失国。

乐，也是先秦统治者很强调的。乐，常常是和社会政治的兴败联系在一起，“审乐以知政”。先秦统治者提倡雅颂之声，反对郑卫之音。雅颂是正声，郑卫之音是淫声，正声可以兴国，淫声则丧国。“雅颂之音理而民正，……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史记·乐书》）正声对于社会政治产生积极效果，是国家兴盛的标志，国家的衰败与乐的淫乱是相为表里的，他们说殷纣亡国，大兴靡靡之乐，是乐的败坏。

春秋时，孔子对“礼崩乐坏”的“僭越”深恶痛绝，“是可忍，孰不可忍”。战国时，从春秋沿袭而来，周天子没有力量，不能维系天子的礼乐制度。各国国君有力量，他们要维系本国的礼乐制度。战国进入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建立了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礼乐制度，封建地主阶级是坚决维护封建社会礼乐制度的。孟子、荀子的著作里，贯穿了这种思想。孟子还具体说到：“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尽心》）“礼与食孰重，礼重。”（《孟子·告子》）荀子写了《礼论》、《乐论》，系统阐述礼乐的重要。荀子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这就是“礼三本”说，后来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最高政治道德标准。荀子也和先辈思想家一样强调乐的重要，他说乐能“移风易俗”，能“安其处，乐其乡”（《荀子·乐论》）。对于乐的正反社会效果荀子予以极大注意，“流漫鄙贱，流漫则乱，鄙贱则争”（《荀子·乐论》），荀子是坚决反对淫乐的。

杂家学派《吕氏春秋》，由于采纳各家之言，比较复杂，更多的还是强调维护和巩固礼乐制度。《吕氏春秋》有《大乐》、《侈乐》、《和乐》、《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等篇，多是强

调乐的重要，也强调侈乐、淫乐的危害。《吕氏春秋》对于儒家的礼、义、德是提倡和维护的，它说："故先王之制礼乐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吕氏春秋·和乐》）它认为国家的兴衰表现在礼乐的正淫上。"世浊则礼烦（乱）而乐淫。"（《吕氏春秋·音初》）"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吕氏春秋·和乐》）所有这些，继承和发展了历来统治阶级的礼乐论。但是，《吕氏春秋》又有《节葬》、《安死》等篇，这是墨家思想，对儒家的礼乐论有所非议，表现了《吕氏春秋》又想从墨家思想来调和儒家思想。

法家推行法治，他们批判儒家的礼乐。商鞅说，"不循其礼"，他还说用礼乐"必削国"。韩非系统提出了法治的主张，强调法与刑是治国的根本。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对贵族进行说服，指出"事异而礼异"，批判贵族提出的"循礼无邪"。在变革过程中，旧贵族以礼乐为武器，反对变革。商鞅等人批判旧礼乐，是要克服变革中的障碍，不是不要礼乐，而是要维系和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的礼乐，丝毫也不能动摇荀子所说"礼三本"的准则。秦始皇统一中国，"悉内（采纳）六国礼仪"（《史记·礼书》）。秦国新兴地主阶级全部采纳了各国的礼乐。

墨子与各家不同，他写了《非儒》、《非乐》、《节葬》等，他同情人民，深刻揭露统治阶级礼乐制度的罪恶，指出这种制度带给人民的灾难。他说王公大人为乐"专夺民衣食之财"（《墨子·非乐》）。说齐康公为乐，"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墨子·非乐》）。墨子的批判锋芒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他反对一切乐，这又是文化的倒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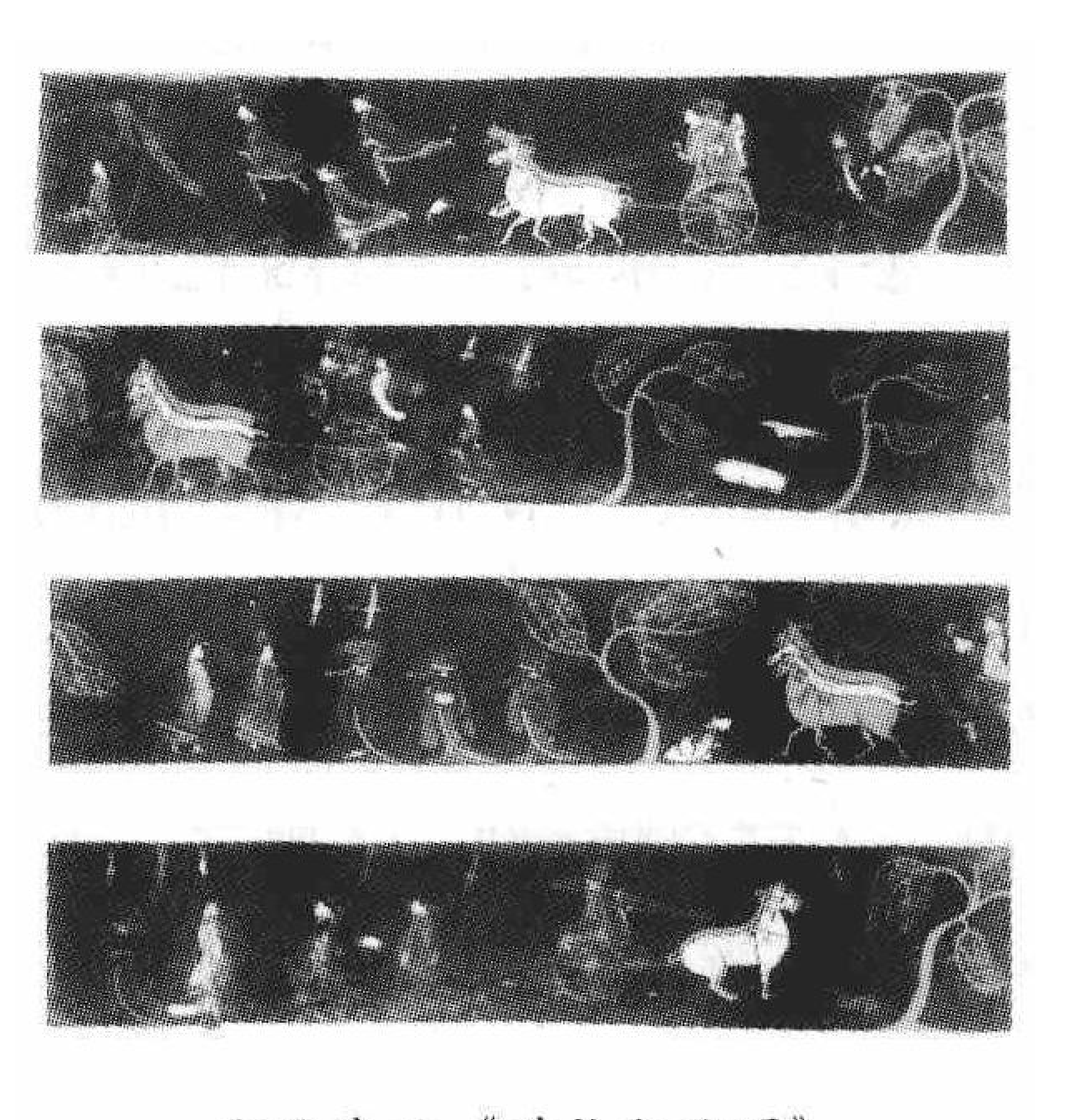
先秦统治阶级宣扬的礼乐制度对劳动人民起麻醉作用。战国对礼乐虽有各家异说，事实上战国封建统治阶级以礼乐维护统治和过去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战国礼乐多是继承过去，有些尚有发展。战国时沿袭下来的礼制很繁，重要的如朝觐礼、祭祀礼、乡饮酒礼、冠礼、婚礼、丧礼等。下面我们以婚礼、丧礼的情形来进一步看看

战国的礼乐制度。

婚姻 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这是古书关于男女结婚年龄的一种普遍说法。《墨子·节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这两种是战国时代的书，大概是说最起码的嫁娶年龄。

“取妻如之何？匪（非）媒不得。”（《诗经·齐风·南山》）媒的作用很大。“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公羊传·庄公十四年解诂》）先秦的礼俗，男子不得亲征婚，女子不得亲许婚，必须有媒。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男女的接触都是不允许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青年男女的婚姻就是这样决定的。

婚姻要经过六礼仪。即一纳采，意思是纳其采择，男方向女方求婚，送一只雁，得女方允许。二问名，男方问女方的名字。三纳吉，问得女方名字，男方在祖庙占卜，卜得吉利，向女方报喜；卜不吉利作罢。四纳征，以鹿皮为礼物送女方作为订婚凭证，“征”是成的意思，即后世订婚。五请期，选择迎娶吉日，商请女方。六亲迎，男子到女家迎亲，女子被接到男家，男女要共鼎而食，合卺而酳（yìn）（卺为一瓠分为两半，男女各拿一半，用来饮酒，酳是用酒漱口，后世为男女交［换］杯饮）。《孟子·滕文公》说嫁女时母亲对女儿说：“必敬必戒，毋违夫子（丈夫），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父母就是这样对女儿教诫的。女子出嫁以后，就有所谓“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连同“在家从父”，即所谓“三从”。还有“夫死不嫁”之说，男子死后女子不得再嫁。


彩绘漆画《聘礼行迎图》

儒家有“七弃”说，即无子弃、淫逸弃、不事舅姑弃、口舌弃、盗窃弃、嫉妒弃、恶疾弃（见《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解诂》）。这“七弃”对妇女言行规范极严，如嫉妒弃，是指与同辈不和要遭遗弃；无子弃，是指没有生育要被遗弃。妇女对男人有什么要求呢？“必义绝乃得去。”（《白虎通·嫁娶》）什么是“义绝”，“杀妻父母，废绝纲纪”。男方杀死女方父母，女方才可离去。可见男女很不平等。

战国时已有“出赘”，淳于髡为“赘婚”。战国有至死不嫁。齐国婴儿子去掉钗环装饰，到老不嫁，说要做孝养父母的表率。《盐铁论·散不足》说：“古者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士、大夫已有妾，所谓“媵以娣侄”，“媵”即陪嫁，“娣”是正妻的妹妹，“侄”是正妻兄弟的女儿。娣侄为陪嫁者，陪嫁者实际就是妾。战国时贵族妻妾已很多，平原君“后宫以百数”。田单“东有夜邑（地名）之奉（俸），西有菑上（地名）之虞”（《战国策·齐策》）。不但大贵族、大官僚妻妾众多，经济地位稍好的也“蓄妾”。《韩非子·内储说下》记述一夫妻祷祝，妻说希望能得到百匹布，夫对妻说，这么少呀！妻回答说，再多，你就得买妾。还有说“去贵妻，卖爱妾”。“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战国策·秦策》）。

张仪游说时说：“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兄）弟之国。”（《战国策·齐策》）张仪的用意为秦连横游说，他说秦楚互为婚姻关系好，要别国多考虑。秦昭王写信给楚王要与楚修好，说：“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史记·楚世家》）可见诸侯之间的婚姻，往往出于政治的需要。战国诸侯之间婚姻较多，秦昭王母亲是楚女，芈氏，即宣太后。秦武王母亲是魏女（《史记·六国年表、魏世家》有记载）。秦始皇母亲、庄襄王夫人是赵女（即赵姬），秦惠文王女儿嫁燕太子（即后来易王），卫元君是魏王女婿，齐湣王“迎妇于秦”，赵惠文王“迎妇于秦”。

恩格斯论证人类随着社会发展经历了群婚、普那路亚、对偶

婚、一夫一妻制几种主要婚姻形式。战国社会普遍婚姻已是一夫一妻制了，贵族地主阶级是一夫多妻制。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国也是这样。

封建社会，“夫权”是捆绑妇女的一大绳索，战国时夫权已有充分表现。

丧葬 丧礼在战国各种礼制中尤为重要。“大王以孝治闻于天下”（《战国策·赵策》），这是赵国使者对秦王说的话。丧葬是孝的重要内容，苏秦“说湣王厚葬以明孝”（《史记·苏秦列传》），明确说厚葬是为了孝。“为人子而以民劳与官费之故而不行先王之丧，不义也。”（《战国策·魏策》）这是魏惠王死，惠王太子对群臣说的话，行丧葬要不惜人力物力。《孟子》、《荀子》都说到要行“三年之丧”。战国统治阶级提倡厚葬久丧。

人死以后要发丧。赵武灵王死，公子成、李兑迟不发丧。秦始皇死，也迟不发丧，掌权者认为到了可以发丧的时候才发丧。得讯后要吊丧，“周烈王崩，齐后往，周怒”（《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这是吊丧不及时。秦昭王死，韩王和其他国派来将相吊丧。庄子妻死，他的朋友惠施去吊丧。吊丧要赠送礼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竹简记载有不少别国封君赠送车马兵器。

棺椁，棺是内棺，装尸体；椁是外椁，装棺。贵族地主阶级很讲究，《墨子》反对“棺椁必重”。《吕氏春秋·节丧》说贵族“棺槨（即椁）数袭（重）”。考古发掘河北平山县中山王譽墓为木棺四层。春秋时还没有坟堆，战国时有坟堆，有陵寝。

衣衾，即死者衣着有规定，贵族地位越高越讲究，战国已有金镂玉衣。死者要饭含，“邹鲁之臣，生者不得事养，死者不得饭含”（《战国策·赵策》）。意思是对死者在生和死去以后都没有尽应尽的礼。“饭”，即在死者口里放入粟，“含”，即在死者口里放入玉。

送丧是白衣执绋，“白衣”是白色丧服，“绋”是拉灵柩车的带子，“执绋”是送葬人帮拉灵车。

丧服分为五等，叫做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sī，细麻布）麻。什么亲属关系服什么丧服，规定很详细。丧服的上衣叫衰，下衣叫裳。衰是用生粗麻布做的，衣旁和下边不缝边，“斩”就是不缝的意思，所以叫斩衰。子为父，父为长子，妻妾为夫都服斩衰。3 年丧。齐衰是用熟麻布做的，缝边整齐，所以叫齐衰。齐衰有 3 年、1 年、3 月丧。父已卒为母，母为长子服齐衰 3 年。父在为母，夫为妻服齐衰 1 年。大功是用熟麻布做的，比齐衰精细些。女子为丈夫的祖父母、伯叔父母是大功。9 个月丧服。小功比大功丧服更精细，男子为伯叔祖父母为小功。5 个月丧服。缌麻比小功丧服还更精细，男子为族曾祖父母、为外甥、外孙（女之子）为缌麻。丧服 3 个月。后来，习惯称五服以内为亲，五服以外为疏。族兄或族弟的儿子与自己已没有丧服关系，是五服以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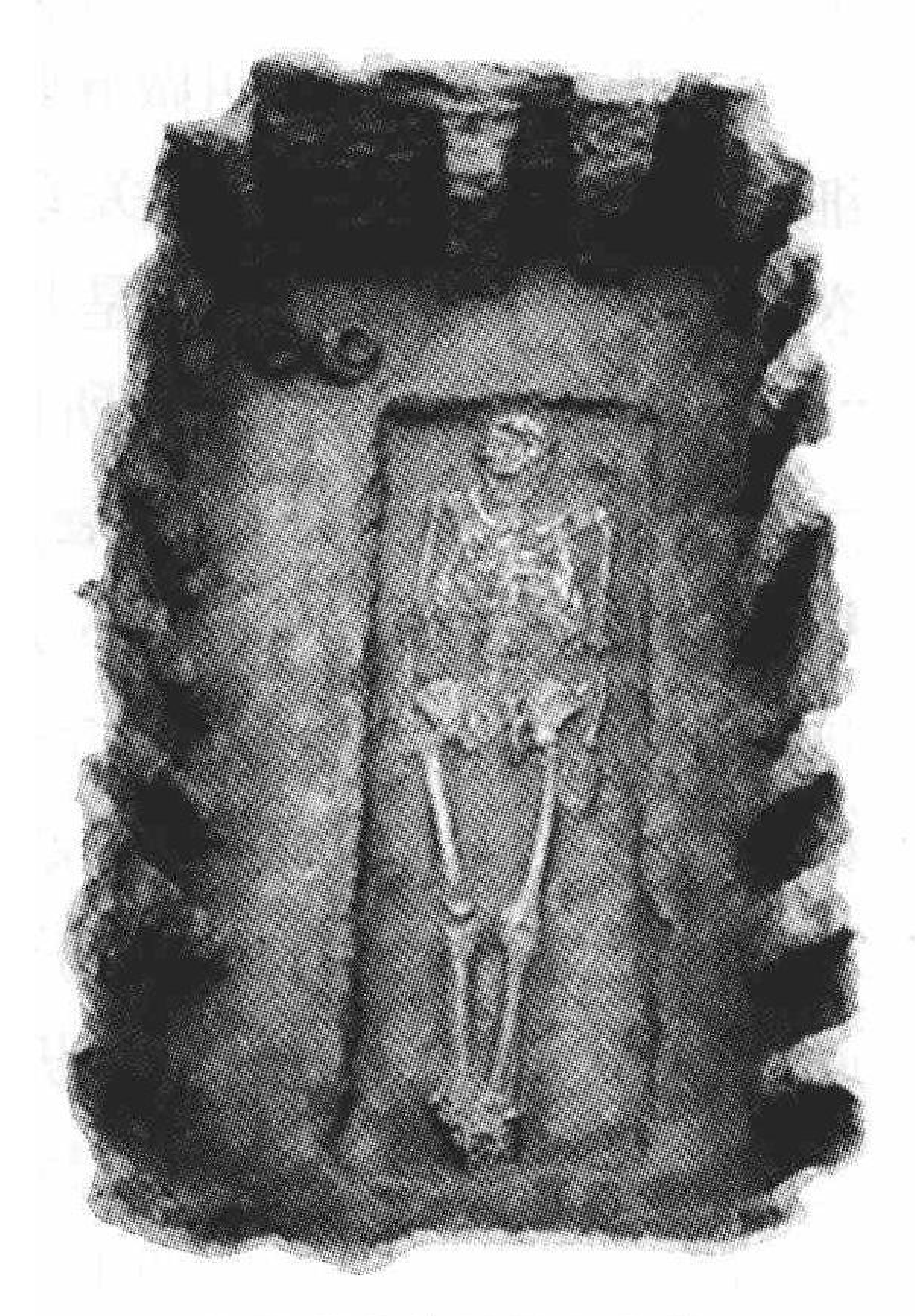
下面简要介绍战国大中小型墓，可进一步了解战国的丧葬。

大型墓。河北平山县中山王䁠墓，南北墓道长 110 米，主室部分长宽 29 米，椁室高约 2 米，木棺 4 层。出土许多珍贵的青铜器等文物。陵墓的上面建有享堂，有方形封土，东西宽 92 米，南北长 110 米，高约 15 米，自上而下形成台阶状三级。享堂是周绕回廊，上盖瓦顶的三层台榭式建筑。墓内出土一块“兆窆图”铜板，是中山王陵园规划图。图中整齐排列五个享堂，居中为王堂，方 200 尺。王堂的左右为王后堂、哀后堂，靠外左为夫人堂，右为与夫人堂位置对称的另一堂。中山王䁠的享堂规模与图上的王堂大体相符。由“兆窆图”使我们知道陵园建筑的情况。邯郸赵王陵的墓地布局与中山王墓基本一致。西周春秋时还没有这种享堂建筑。

中型墓。河南陕县后川，辉县琉璃阁，汲县山彪镇的战国中型墓，墓坑长度约为 7 至 8 米，出土文物较多。以后川第 2041 号墓为例，出土无盖的大鼎 5 件，豆 8 件，敦、簠、方壶、圆壶各两

件，还有鬲、甗、盘、匜（yí）、鉴、编钟、编磬和玉石饰物等。此墓可称为7鼎墓，墓主身份系贵族。

小型墓。湖北江陵雨台山有战国楚墓500多座，墓坑一般长2至3米，宽1至2米。多数单棺无椁或单棺有椁。随葬物以陶器为主，主要是一套鼎、簠、壶或一套鼎、敦、壶，无论哪一套大都是相同的两件，实为相同的两套，有的墓还另有盘、匜等。


山西侯马战国竖穴墓葬

湖南长沙战国墓900多座，半数以上的小墓出鼎、敦、壶或鼎、簠、壶各1件。

郑州二里岗战国墓150多座，随葬陶器半数以上是鼎、豆、壶、盘、匜各1件，还有鼎、豆、壶各1件。

陕西西安半坡110多座、长安客省庄70多座战国小型墓，大部分不出任何随葬品，少部分出少量随葬釜、鬲、罐、盂、壶等日用陶器。湖北当阳赵家湖约60座小墓，墓坑小而窄浅，没有任何随葬品。这与西安半坡、长安客省庄小墓相似。

可见，小型墓可分少量随葬品和无随葬品者，这些墓主应是庶民百姓或经济地位更低的人。

山西侯马乔村奴隶殉葬墓，奴隶埋在沟里，有一处埋18人，少的埋几人、一二人。有男有女，有儿童，多为青壮年。有的被活埋，有的先被处死，有的颈戴刑具铁钳，有的被肢解。

从战国的墓葬看，阶级分野是很清楚的。《墨子·节葬》抨击贵族地主阶级的厚葬久丧，“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吕氏春秋·节丧》也指出：“含珠（口含珠玉）鳞施（如鳞玉衣，施于尸体），玩好货宝，钟鼎壶鉴，轝（同舆，即车）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

题凑之室（椁室四周用短根黄心柏木、即‘黄肠’垒砌，从下到上每根木头纵向对着内棺，即‘题凑’，叫‘黄肠题凑’）棺槨（即椁）数袭（重），积石积炭，以环其外。”考古发掘的大墓完全可证实这种情况。墨子指出统治阶级厚葬久丧大兴礼乐严重浪费社会财富、损害人民利益，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四、云梦秦简与战国的法、刑

云梦秦简与战国的法　古代法与刑常是并称的，如“（圣人）制礼作乐，立法设刑”（《汉书·刑法志》）。

《周礼·大司寇》说：“掌建邦之三典（即法），以佐王刑邦国，诘（治意）四方。”“三典”即三种法，据说轻典治新（新建）国，中典治平（守成）国，重典治乱国。自从夏代进入奴隶社会，古书说到了法和刑，这是奴隶制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时期，各国统治阶级对于法给予更多的注意。公元前536年（《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刑书铸在鼎上，也就是法。公元前513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国赵鞅铸刑鼎，把法和刑铸在鼎上。公元前501年（《左传·定公九年》），邓国有竹刑，把法和刑写在竹简上，据说郑国杀邓析就是根据了竹刑。这些法，当时还遭到反对，说行德义不能推行法刑，推行法刑就会丧失德义，国家会乱。结果还是推行了法刑。

到了战国，法比以前有了很大发展。《周礼·布宪》说：每年正月（一月）初一，君王在群臣的拥戴下，向全国发布命令，命令就是治国的依据，这叫“布宪”，也就是法。《管子·立政》说每年正月初一，“君出令，布宪于国”。《韩非子·定法》说：“宪令著于官府。”看来战国时仍然有“布宪”，这就是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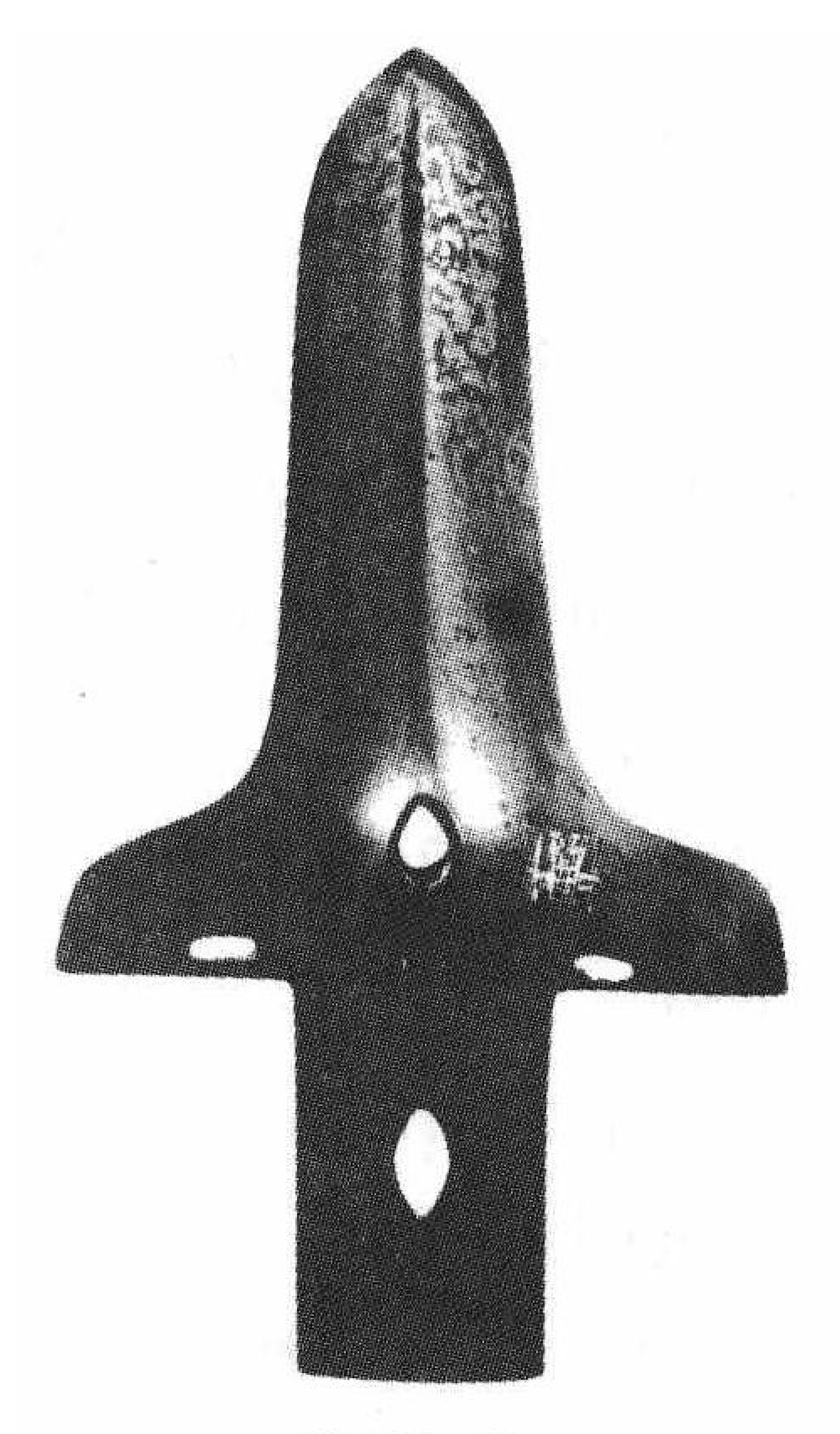
魏惠王时惠施作《国法》，赵国有《国律》，燕国、韩国也有过法。李悝在魏国改革，推行《法经》，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

部法典，有《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可惜散佚了。《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晋书·刑法志》）。商鞅在秦国变法，继承了《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商鞅变法说“民为什伍而相收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这是连坐法。还说“国皆有禁奸邪盗贼之法”。古书还说到战国的一些法。王稽为河东守，通敌，“坐法诛”（《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这是通敌者斩。“秦之法，盗马者死，盗牛者枷……盗伤与杀同罪”（《盐铁论·刑法》），这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法。“秦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之律”（《晋书·刑法志》）。这与云梦秦简的《厩苑律》、《传食律》十分相似。《墨子·号令》说：“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这是对降敌者严惩的法律。

1975 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的竹简，是建国后战国考古的一项重要收获。睡虎地 11 号秦墓，墓主为秦狱吏，名喜，死时 46 岁，可确认为秦始皇三十年（前 217）所葬。此墓出土竹简 1 100 多枚，保存基本完好，简上墨写文字，大部分可认。经整理，分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9 种。《编年记》起秦昭王元年（前 306），至秦始皇三十年（前 217），共 90 年，云梦秦简主要记这时期的事。下面简要介绍《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5 种，有竹简 600 多枚，是关于法律的内容。

《秦律十八种》内容广泛，18 种的名称是：《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律》、《军爵律》、《置吏律》、《效》、《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每种的条文多少不一，下面选择介绍一些条文，以便于了解秦简法律的内容。《田律》是关于农田水利的管理和山林保护的法律。如有一条，其中说：“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这是说禁止砍伐木材，

不许堵塞水道。《厩苑律》是关于牛马饲养的法律，规定官府牛马饲养得好，可受奖，饲养不好受罚。如有一条，其中说："牛减絜，治（笞）主者寸十。""絜"指腰围。管理使用官府的牛，如腰围瘦1寸，则笞打当事者10下。《仓律》是关于粮食贮存、保管和发放的法律。如有一条，其中说："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其不从事，勿禀。"隶臣妾是男女奴隶，从事公是为官府服役，勿禀是不发给粮食。只有服役才发给粮食。《金布律》是关于货币与市场管理的法律。如有一条其中说："其债毋敢逾岁，逾岁而弗入及不如令者，皆以律论之。"这是规定欠官府的债不得超过当年，如超过当年和不按法令缴纳的，依法论处。《徭律》是关于徭役征发的法律，秦国的徭役既繁又重。如有一条其中说："兴徒以为邑中之功者，令结堵卒岁。未卒堵坏，……令其徒复垣之。勿计为徭。""结"，保的意思。"堵"为墙垣。这是说征发徒众筑城垣保1年，年内如有坏，令其复修，不算服徭役的时间。《司空律》是关于工程兴建、刑徒监管的法律，反映了秦统治者大规模使用刑徒兴筑土木工程。如有一条其中说："城旦舂毁折瓦器、铁器、木器，为大车折䡊，辄笞之。值一钱，笞十；值二十钱以上，熟笞之，出其器。"城旦舂为刑徒，毁坏工具，立即笞打，视工具价值笞打多少，注销其所毁器物。《军爵律》、《置吏律》、《内史杂》是关于军爵赏赐、官吏职务的规定和任免。《效》是关于核验官府物质财产的法律。《传食律》是关于驿传供给饮食的法律规定。从《秦律十八种》可见，秦统治阶级运用法律手段，在政治经济广泛的领域内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战国铜戈

《效律》详细规定核验县和都官物质账目的一系列制度。对于度量衡，明确规定了误差的限度，是贯彻统一度量衡的法律保证。如有一条其中规定："桶不正，二升以上，赀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赀一盾。""赀"是罚的意思，桶误差2升，罚一付铠甲，在1升以上不满2升，罚一付盾。

《秦律杂抄》中许多条文与军事有关，有关于军官任免、军队训练、战场纪律、战勤供应、战后赏罚奖惩的条文。如有一条规定："战死事不屈，论其后。又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是说战死不屈者，爵位授予其子。后来察觉该人不死，应夺其子爵位，并惩治其同伍的人；那个未死归来的人罚做奴隶。

《法律答问》有189条，多采用问答形式，对秦律的条文作出明确解释，所解释的主要部分为刑法，还有部分是关于诉讼程序的说明。所说内容最多的是对"盗"、"贼"的处罚，其次是对逃亡的人和诬告的人的处罚。如有一条，其中有对"盗"的处罚："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趾，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二十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二十以下到一钱，迁之。"是说5人共同行盗，赃物在1钱以上，斩断左脚，再施黥刑（脸上刺刻涂墨），罚作城旦（黎明起筑城刑徒）；不到5人，所盗超过六百六十钱，处黥刑、劓刑（割去鼻子），罚作城旦；不满六百六十钱而在二百二十钱以上，处黥刑，罚作城旦；不满二百二十钱而在一钱以上，处以流放。又一条说："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是说有贼进入甲室，杀伤甲，甲呼喊有贼，其四邻、里典、伍老都外出不在家，没有听到甲呼喊有贼，问应否论处？四邻确不在家，不应论处；里典、伍老虽不在家，仍应论罪。又如有一条说："誉敌以恐众心者，戮。戮者何如？生戮，戮之已乃斩之之谓

也。”是说赞扬敌人而动摇军心的人，应戮。什么叫戮？先活着刑辱示众，然后斩首。

《封诊式》为办案案例和报告书等，内容广泛。在有关刑事案例中，大部分是关于盗牛、盗马、盗钱、盗衣物、逃亡、逃避徭役等方面的法律内容。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秦律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进行专政的武器。如有一条其中说：“……告曰：‘丁与此首人强攻群盗人，自昼甲将乙等徼循到某山，见丁与此首人而捕之……山险不能出身山中。……’诊首毋诊身可也。”这是地方官向上级报告，说丁和这被斩首人结伙抢劫，昨日白昼甲率领乙巡逻到某山，发现丁和这一被斩首的人。逮捕了丁，杀了这人。因山险不能把他的身躯运出山来，只取了首级。上级对这报告答复可以只验首级不验躯体。又如有一条其中说：“某里士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卖公，斩以为城旦，受价钱。’”是说某里士伍甲捆送男子丙，告官处罚奴隶丙。因奴隶反抗，不耕田，不听命。请求卖给官府，送去充当城旦。又如：“某里公士甲缚诣大女子丙，告曰：‘……丙，乙妾也。乙使甲曰：丙悍，谒黥劓丙。’……丞某告某乡主……其问如言不然？定名事里，所坐论云何，或复问毋有，以书言。”这是某奴隶主乙指使甲捆送丙奴告官，丙的罪状是“悍”，要求处丙黥劓刑。县丞让某乡负责人询问是否与所说一样？确定其姓名、籍贯，曾犯有何罪，还有什么问题，用书面回报。又如有一例其中说：“其里士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已往执。令史已爰书：与牢隶臣某执丙，得某室。”这是因子不孝，告官处死刑。官府当即命令名已的令史前往捉拿，在某家拿获。

以上简要介绍了《封诊式》的一些办案案例。从这些案例看，所谓“群盗”，所谓男女奴隶“骄悍”、“悍”，反映了被统治阶级的强烈反抗；同时秦法律对于这种反抗坚决予以镇压。秦律规定不孝者处死，极力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这些充分表现了秦律的

阶级实质。

每种秦律的条文很多，每条又往往有许多内容，上面所介绍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秦律是封建社会的法和刑，要维护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关系，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镇压农民和奴隶的反抗，保护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维护农业、工业、商业、边防等各方面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要加强国家机关和武装部队的统治能力。总之，可以说，秦律渗透到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据研究，用今天的话来说，秦律已具备了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但仍以刑法为中心，表现在刑法制度方面也最为成熟。云梦秦律，只是考古发掘所得，肯定不是秦国法和刑的全部内容，或者还只是很少部分的内容。云梦秦律的发现，十分可贵。我国古代法律，现存以唐律为最早，唐以前的法律已全部散佚。云梦秦律是我们今天所见我国时代最早、保存条文最多、内容最丰富而又有系统的定型的成文法典。它的发现，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云梦秦简与战国的刑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据韦昭说，五刑又加流、鞭、朴、赎为九刑）。”（《左传》昭公六年）从夏代奴隶社会开始，就有了刑。《尚书·吕刑》说：“墨（脸上刺字）刑千，劓刑千，刖（砍掉腿）刑五百，宫（男子去生殖器，女子幽禁）刑三百，大辟（死刑）二百。”这是“五刑”，即五种刑罚，有 3 000 条之多。《周礼·司刑》也记载五刑，每种刑 500 条，有 2 500 条。刑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汉书·刑法志》说：“（先王）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刑是为了显示统治阶级的威严，像上天震电雷鸣一样，对犯罪者施行杀戮。

先秦时，受刑后还要罚各种劳役，《周礼·掌戮》说：“墨者使守门（宫门），劓者使守关（离王都远处的关门），宫者使守内

（宫中），刖者使守囿（苑囿）……”

先秦时可以赎刑，即可以金钱赎罪免刑。“墨辟（刑）百锾，劓辟惟倍（二百锾），剕辟倍差（劓辟倍的一半，三百锾），宫辟六百锾，大辟千锾。”（《周礼·职金》注疏）有人估算，像宫辟、大辟的赎金，是很大的数额，庶民根本无此能力，其他刑罚庶民想用赎金免刑也是十分困难的，这只能有利于有产者。

战国的刑比以前繁苛了。死刑有“诛”：“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是说王稽叛国，诛杀之。“腰斩”：“（什伍）不告奸者腰斩”（《史记·商君列传》）。“死”：“为奸邪盗贼者死刑”（《商君书·画策》）。“秦之法，盗马者死……”（《盐铁论·刑法》）。“烹”：《汉书·刑法志》说战国有“镬烹之刑”，镬是大鼎，烹是煮。《战国策·魏策》说：“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齐威王烹阿大夫和接受阿大夫贿赂的官吏。可证《汉书·刑法志》之说。“大辟”：这也是战国时一种死刑。“车裂”：“告商君反……卒车裂以徇”（《史记·商君列传》），“苏秦车裂以徇于市”（《史记·苏秦列传》）。这是用几辆车子拉着分尸。“枭首”：“尽得嫪毐等……二十人皆枭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把脑袋挂在木杆上。“湛”：“荆轲之湛七族”（《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湛为沉水中死，荆轲七族即被湛。可见，战国的死刑种类很多，很残酷。还常有牵连其家、其族、其里。灭家：“商君反，发兵捕之，灭其家”（《史记·商君列传》）。灭宗：“尽得毐等……皆灭其宗”（《史记·秦始皇本纪》）。夷三族：“韩任申子，秦用商鞅，相连坐之法，造参夷之诛”（《汉书·刑法志》），参夷，即夷三族。湛七族：荆轲被灭七族。灭里：“荆轲刺秦王……复夷轲之一里，一里皆灭”（《论衡·语增》）。

死刑以外的其他肉刑有“黥”：“太子犯法，黥其师公孙贾”，“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史记·商君列传》），这是在脸上刺字。“劓”：“孝公用商鞅，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史记·商

君列传》），这是割去鼻子。“髡钳”：“秦制：凡有罪，男髡钳为城旦。”髡是剃光头发，钳是用铁颈锁住脖子。“矐目”：高渐离用筑刺杀秦始皇未成，秦始皇“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史记·刺客列传》）。矐目是用马屎熏瞎眼睛。肉刑以外的刑罚还有“收”：“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孥是妻子，没收妻子为官奴婢。“籍”：“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史记·秦始皇本纪》）。籍为削籍，一家人削去户籍，没收为官奴婢。“迁”：“毐毒舍人迁蜀”（《史记·吕不韦列传》），迁是流放。

囹圄，即监狱。《吕氏春秋》说到战国时的囹圄有“省囹圄”（《仲春纪》），高诱注：“省者，赦轻微也”。“缮囹圄”（《孟秋纪》），意为整治。《史记·孟尝君列传》说秦王“囚孟尝君欲杀之”，当为投入监狱。《尉缭子·将理》说：“小圄不下十数（人），中圄不下百数（人），大圄不下千数（人）。”“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这是说魏国魏惠王时的情形，可见战国监狱“犯人”很多。《汉书·刑法志》说：“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这虽说是秦统一中国以后的情形，但统一以前秦国对人民的镇压也是很严酷的。

云梦秦简相当详细地记载了战国刑罚，有些是古书中没能看到的。死刑有“斩首”：有一条说在山中追捕“群盗”，追得一人斩首。有一条说赞誉敌人，动摇军心、民心的斩首。“弃市”：有一条说对一杀人犯处弃市，这是在市上处死。“磔”：这是分裂肢体的酷刑，即车裂。有沉于水中溺死，有一条说对麻风病罪犯沉水中溺死。“杀”：有一条说对不孝者处杀。“黥”：有一条说盗钱者“黥为城旦”，黥刑以后罚为城旦。“劓”：有一条说盗钱者“黥劓为城旦”，处黥劓刑后罚为城旦。“斩左趾”：有一条说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趾……又一条说被赦为庶人的“群盗”，逃亡者，斩左趾为城旦。“腐”（男子去生殖器，女子幽禁）：有一条说罪当腐刑，如为少数民族酋豪可准赎免。“鋈（wù）足”，即钳足：有一

条说犯此罪如为少数民族酋豪可准赎免。“耐”：有一条说，“捕人相移以受爵者，耐”，是说把所捕的人转交他人，借以骗取爵位的，处耐刑。又一条说斗殴咬断他人鼻子或耳朵或手指或嘴唇，处耐刑。耐是剃去胡须。“笞”：有一条说用官府牛耕种，消瘦要笞打。“迁”（为流放）：有一条说盗不满220钱而在一钱以上，处以流放。秦律罚作刑徒的有“城旦”：这是刑徒名，有一条说，盗一牛，当完城旦。这是只罚作城旦，“完”是说不处别的刑。对盗钱的看人数多少、钱多少或黥或劓或黥劓以后罚作城旦。“司寇”：是看守边境的刑徒。“鬼薪”、“白粲”：也是刑徒名，鬼薪是为统治阶级宗庙祭祀砍伐薪柴，白粲是妇女刑徒为宗庙祭祀选拣粮食。“舂”：是妇女刑徒为官府舂米。“隶臣”：也是刑徒，有一条说“寇降，以为隶臣”，隶臣即奴隶，敌人投降降为奴隶。秦简多次说到隶臣妾，隶臣是男刑徒奴隶，隶妾是女刑徒奴隶。有罚作徭役的：有一条规定偷人桑叶，赃不到一钱，罚徭役30天。秦律罚铠甲罚盾的条文有许多。秦律关于刑罚的内容很多，以上所举的种类与条文只是少部分，这些使我们对战国刑罚的了解具体深入多了。

五、从“四公子”谈战国的士

春秋时诸侯卿大夫有养士的，不过还很少。战国养士十分盛行，成为这时期社会的一种特殊风气，统治阶级争相“养士”、“下士”。战国以后，这种如此盛极一时的养士风气又不复见了。

战国的士在政治生活中起过不可估量的特殊作用。一些本来是布衣平民，甚或博徒卖浆者流，由于贵族官僚的养士、下士机缘，成了某一政治事件的举足轻重的人物，显示了卓越的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内，涌现出不少才华横溢的人物，对战国社会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

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号称“四公子”，他们养士很有名。他

们都是大贵族大官僚，封地广、家产富，争相下士，“以相倾夺，辅国持权”，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孟尝君收养各国门客和有罪逃亡的人，舍弃家产厚待门客，以致到他门下的士很多，有数千人。他与门客谈话，屏风后面有人记录谈话内容。谈到门客亲戚情形，他派人去其亲戚家送钱物解决困难。他不分贵贱，对门客都能很好相待，门客个个把他作为知己。

一天，附近民家一瘸子，一瘸一拐去打水，平原君爱妾在楼上，看见大笑。第二天，瘸子找到平原君说：听说你很喜欢士，士能不远千里而来，因为你能贵士贱妾。我不幸是一残废人，你的妾竟取笑我，希望你把她的头给我。平原君笑着答应，好吧。瘸子走后，平原君对人说，此人也太过分了，并不杀妾。一年多以后，门客纷纷离去，平原君感到奇怪。家人对他说，这是因为没有杀那妾。于是平原君杀了妾，提着人头去瘸子家道歉。门客们又都回来了。

信陵君“仁而下士”，不管对什么人都能以礼相待，从不以自己的富贵对士骄傲。几千里以外的人都争相到他门下，家有门客 3 000 人。“窃符救赵”的故事，叙述了信陵君对侯嬴、朱亥十分恭敬的情形。此后信陵君留在赵国，听说有处士毛公、薛公藏于博徒卖浆者家。信陵君想见他们，他们不愿见。信陵君便服去拜访，和他们交为好友。平原君听说，讥笑为“妄从博徒卖浆者游”。信陵君知道此事，气愤地要离赵。说平原君不是真心求士，“徒豪举耳”，是摆场面的。平原君往见信陵君，脱帽深表歉意，真诚、坚决留住信陵君。信陵君留赵 10 年。秦攻打魏国，魏王要信陵君回国领兵。信陵君因“窃符”事怕回国，诫其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门客都不敢劝，毛公、薛公见信陵君说以利害，话还没有完，“公子立变色”，马上回魏，率五国之兵破秦军，秦将蒙骜败走，“公子威振天下”。

春申君为楚相，他和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争相下士，招致宾客，有门客 3 000 多人。一次，平原君派门客见春申君，春申君

让来客住上等房舍。来客夸耀平原君待客的富贵，戴玳瑁簪，刀剑篋饰以珠玉。春申君门客穿着装饰珠玉的鞋子见客，平原君门客十分羞惭。

战国“礼贤下士”的风气甚盛，四公子外，前有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魏惠王、燕昭王，后有吕不韦、燕太子丹等，他们都有礼贤下士的动人故事。吕不韦自比四公子，“以秦之强，羞不如”，也大招门客，有3 000 人之多。《吕氏春秋》就是他的门客所著。

有的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孟尝君在秦国被囚，秦王要杀他。孟尝君派人向秦王爱妃求救，她要孟尝君的狐白裘。此裘十分贵重，孟尝君就此一件，献了秦王，藏于秦王宫府库内。门客中有一人说能为“狗盗”，深夜装狗，潜入秦宫府库中，盗得所献狐白裘，孟尝君给了秦王爱妃。孟尝君得脱，赶快逃出秦国，半夜至函谷关，关上的规定要鸡叫才能出关。门客中有会作鸡叫的，便模仿鸡叫，各处的鸡也跟着叫起来，孟尝君等人赶快出关。秦兵追到，但他们已出关了。这就是“鸡鸣狗盗”的故事。还有故事描述孟尝君十分善待门客冯谖，冯谖为他献“狡兔三窟”的计谋，以致孟尝君为齐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毛遂自荐”、“窃符救赵”等故事都说明了门客在当时政治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

齐威王“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酒色，政治腐败，国家危殆，诸侯并侵，左右不敢谏。淳于髡“滑稽多辩”，他知道威王好隐含哲理的言论，他对威王说：有一大鸟，落在王的宫廷，3 年不飞不鸣，王知道这是什么鸟吗？威王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威王悟出淳于髡提问的寓意，于是励精图治，夺回诸侯侵地，威行36 年。威王八年，楚侵齐，淳于髡为齐求救于赵，赵兵出，楚兵去。威王设宴，赐醇酒，问能饮多少会醉？淳回答饮一斗也醉，一石也醉。威王感到奇怪，让他说说。淳说：如果在大王面前，左右有侍卫之臣，淳很惊恐，饮一斗就醉

了。如果男女同席，促膝而坐，志趣相投，杯盘狼藉，日暮酒酣，屋内烛灭，主人留淳，客走解衣，这时最为欢心，能饮一石。淳于髡以此讽谏威王。威王说“善”。此后不再淫乐长夜之饮，以淳为门客主客。

庄辛对楚王说：君王左有州侯，右有夏侯，鄢陵君、寿陵君常跟随车后，专讲究淫乐侈靡，不顾政事，国都郢危险了。不很久，秦攻楚拔郢。楚王对庄辛说：没有听你的话，至于此，怎么办？庄辛说：“见菟（tú）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庄辛劝楚王不要气馁。他说蜻蜓的生活与人无争，小孩子要捉它喂蚂蚁。蜻蜓算是小的了，黄雀的生活与人无争，坠于公子弹丸之手。黄雀算是小的了，黄鹄（hú）的生活与人无争，射手想法射它。黄鹄算是小的了，蔡圣侯淫逸侈靡，子发受楚宣王的命令，俘虏蔡侯。蔡侯的事算是小的了，君王不以国家为事，不知穰侯受命秦王，黾（méng）塞以内都是秦兵，君王只得逃亡黾塞以外了。楚王听了，面如土色，浑身发抖。于是授庄辛以执珪，封为阳陵君，封与淮北之地。

韩国严遂为韩王看重，与韩相韩傀有仇怨，严遂拔剑杀韩傀，未成。严遂逃亡，求人杀韩傀。到齐国，听说聂政是勇士，严遂私下与他交，厚待聂。奉黄金百镒为聂母寿，聂愈奇怪，坚决不受，严遂坚持进奉，对聂说：我有仇，听说你高义，敢有请。聂说老母在，不能离开，坚不受礼。后来，聂母死。聂政想：我是一市井屠刀的人，严是诸侯卿相，不远千里来请我，待我很厚，我待他很薄。我虽不受他的礼，他是深知我的，这样的贤人能亲信我这样穷僻的人，我能无动于衷吗？今老母以终天年，“政将为知己者用”。于是去见严遂，告严老母已去世。严遂告其仇人为韩相韩傀，韩傀兵卫森严。严与聂计议，人多不便行事，聂决定只身一人行动。此时，韩国正好有东孟之会，韩王韩相与会，保卫的人很多。聂政进去，走上台阶，直刺韩傀，韩傀逃避，抱着韩王，聂政刺杀韩傀，也刺中韩王，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杀数十人，自己揭去脸皮，挖

掉眼睛，割开肚皮，肠子流出，死去。韩国把聂尸陈放市上，悬赏千金，招募认识他的人。很久没有人认尸。聂姊知道了，从齐国到韩国，抱尸大哭，自杀于尸旁。郭沫若写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就是歌颂聂政的献身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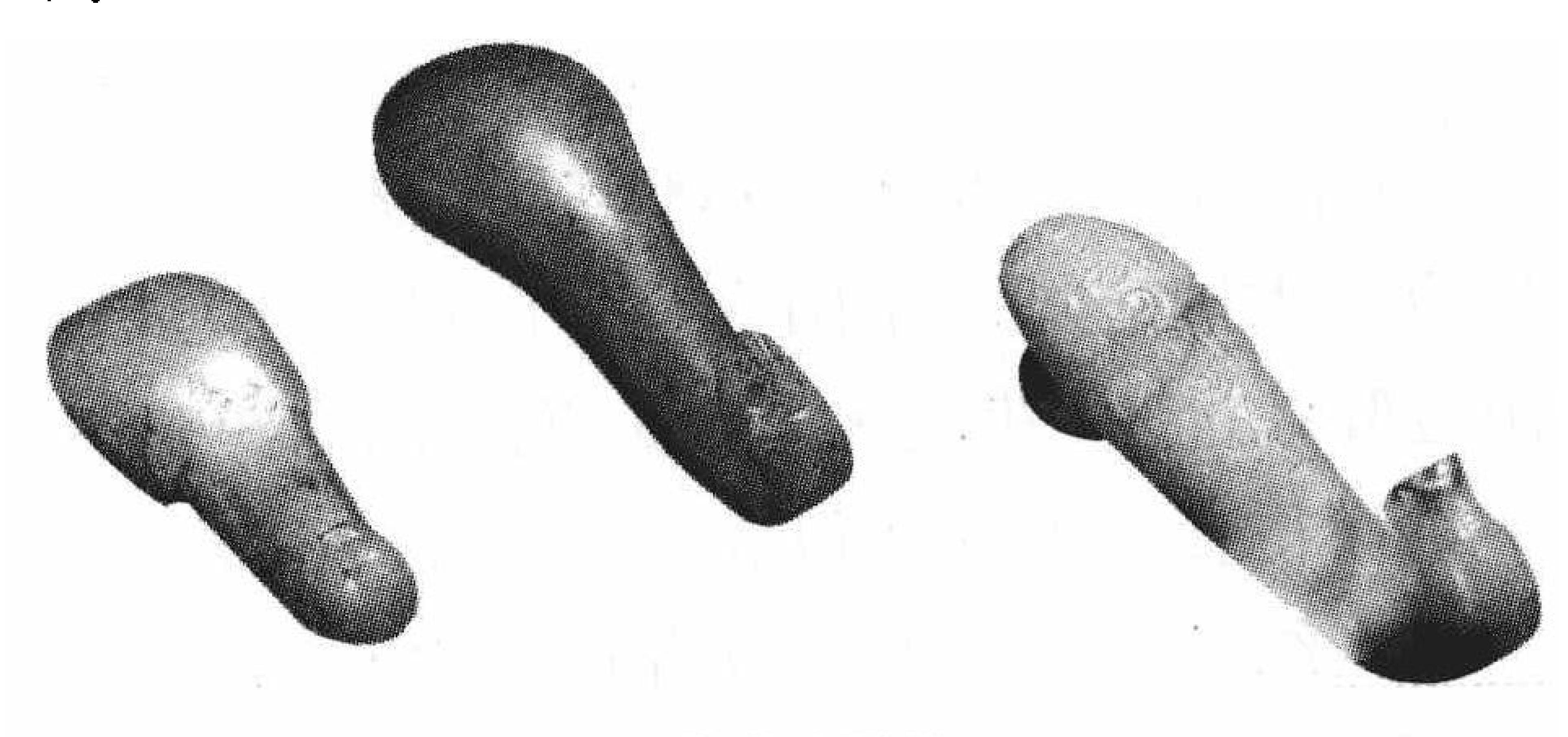
战国的士从事各种活动，可以说有各种不同的士。各国显赫的客卿，多出身于布衣之士。稷下学宫活动的士，多是学士。进行政治游说的是辩士。为主人献身的是侠士或义士。他们为国家统一和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王充说："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论衡·效力》）战国之士堪称举足轻重。像秦国著名的客卿，商鞅、白起、范雎、蔡泽、李斯等；像孟轲、淳于髡、公孙龙、荀卿、韩非、《吕氏春秋》作者等；像张仪、苏秦、鲁仲连、庄辛等；像毛遂、侯嬴、冯谖等；像聂政、荆轲等，他们都是各种士的代表人物。

六、"盗"跖、庄蹻起义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跖原籍属秦。《庄子·盗跖》说跖率领 9 000 人的队伍，在各地横冲直撞，所过的地方，大国守城，小国守堡，诸侯胆战心惊。还说他的队伍在泰山附近驻扎过。《荀子·不苟》说跖的名声像日月。跖痛斥统治阶级不耕而得食，不织而得衣，侥幸于王侯富贵。他向往人人耕而得食，人人织而得衣，大家没有相害之心的社会。他骂历代统治阶级从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以来，都是些害人之徒。跖代表了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在劳动人民中有很高的声誉。《吕氏春秋·当务》记跖说的一段话："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这是说在夺取富人的财物时，能够确切知道库藏的财物；行动时冲在前，勇敢；后退时在后，有义；能正确判断时机，有智慧；分配胜利果实平均，能仁。跖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勇敢智慧和高尚道德。

庄跻是楚人，在楚国领导了起义。庄跻和跖一样，率领数千人的队伍，在天下横冲直撞，夺取富贵人的财物，杀地主贵族富商大贾，所向披靡，统治阶级毫无办法。《荀子·议兵》说："庄跻起，楚分而为三四。"《韩非子·喻老》说："庄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吕氏春秋·介士》说庄"暴郢"。可见庄跻起义对于楚国统治阶级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古书往往称庄跻为"大盗"，但农民们却热情歌颂自己的领袖，"其徒颂义无穷"。

战国时各国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很激烈，公元前416年，晋幽公被晋国人民杀死。古书记载战国时"盗贼横行"。《吕氏春秋·安死》说"聚群多之徒"，人数众多的队伍以森林湖泽为根据地，时出时没，打击统治阶级。《荀子·正论》说："盗贼击夺以危上。"直接危及统治阶级的安全。《墨子》反映人民强烈反抗统治者的事实很多，如《明鬼》篇说："寇乱盗贼并作。"《节葬》篇说："并为淫暴而不可胜禁也，是故盗贼众而治事者寡。"人民的反抗禁止也禁止不了，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想找一块"安乐"的土地也找不到。《管子·八观》也反映人民反对统治者，到处起来"攘夺、窃盗、攻击、残贼"。古书所谓"盗贼"是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污蔑。


战国玉带钩

封建社会的法律是封建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是为了保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和财产、镇压人民反抗的。从战国地主统治阶级的立法也可以曲折地看到人民的反抗斗争。李悝的《法经》六篇在魏国推行，其中四篇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目的很清楚。商鞅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秦律六篇，也是把镇压"盗贼"、企图达到"山无盗贼"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云梦秦简法律条文关于镇

压“盗”、“贼”的十分之多，和商鞅重视“连坐之法”一样，云梦秦律在这方面也着重有所规定。以189条法律问答来说，讲到“盗贼”的就有58条；25则治狱案例，涉及“盗”的6例，“贼”的一例。云梦秦律还反映人民群众不断“贼伤”、“贼杀”地主，破坏“公器”。云梦秦律对于“盗贼”实行严厉镇压，反映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矛盾的尖锐，反映了人民反抗斗争的激烈。

人民为什么这样强烈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因为封建地主阶级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孟子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汉书·食货志》说战国时魏国农民（为自耕农）向国家交“什一之税”的田税，即十分取一，不算别的赋敛。《管子·大匡》说：“下年什取一，中年什取二，上年什取三。”比《汉书·食货志》所说又重得多。“上稽之以数，下什伍以征”，“民食什伍之谷”，这是说农民收入的一半被封建统治者所搜刮，征收更重了。国家还要按人头收税，如秦国商鞅变法规定收的“口赋”，大概在成年人中征收，税额很重。其他如宅园、牲畜、蚕桑要收税，以及“关、市”之税等。秦国商鞅变法以后，“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可见战国赋税之重。

由于战争频繁，兵役徭役很重。如长平之战，秦国征发秦占领中原地区15岁以上的都去前线。各国建长城，修筑城池工事，也耗费很多民力。《战国策·楚策》记载楚国的昭常驻守在楚国东部地区防齐，他表示要与阵地共存亡，把刚成年到60岁的人都征发来了，征调30多万人修筑防御工事坚守。和春秋时不同，只是征发男子不够，还要征发女子和老、小。《墨子·备城门》说守城的兵力配备比例是50步的范围以内配备40人，其中壮年男子10人，壮年女子20人，老、小10人。“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即构筑工事女子和男子各占一半。《商君书》也有类似的记载，男、女、老、弱都被征发去军队，大抵壮男充当作战人员，壮女作构筑工事和其他为军队服务的事，老弱者要为军队的牲畜供应草料以及

从事其他劳动。屈原在《九辩》里说："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也是说的劳力被征发以后的情况。

统治阶级修建宫室台榭，厚为棺椁之葬，都要征发民力。齐宣王造宫殿，修建3年，还未建成，动用全国人力物力，耗费十分惊人。

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要向地主交很重的租税，"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汉书·食货志》）。交十分之五的田租，这是农民耕种大地主田地的情况，地主剥削农民收入的一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战国时有大批无地少地的农民，充分说明了战国时期农村土地被大地主集中占有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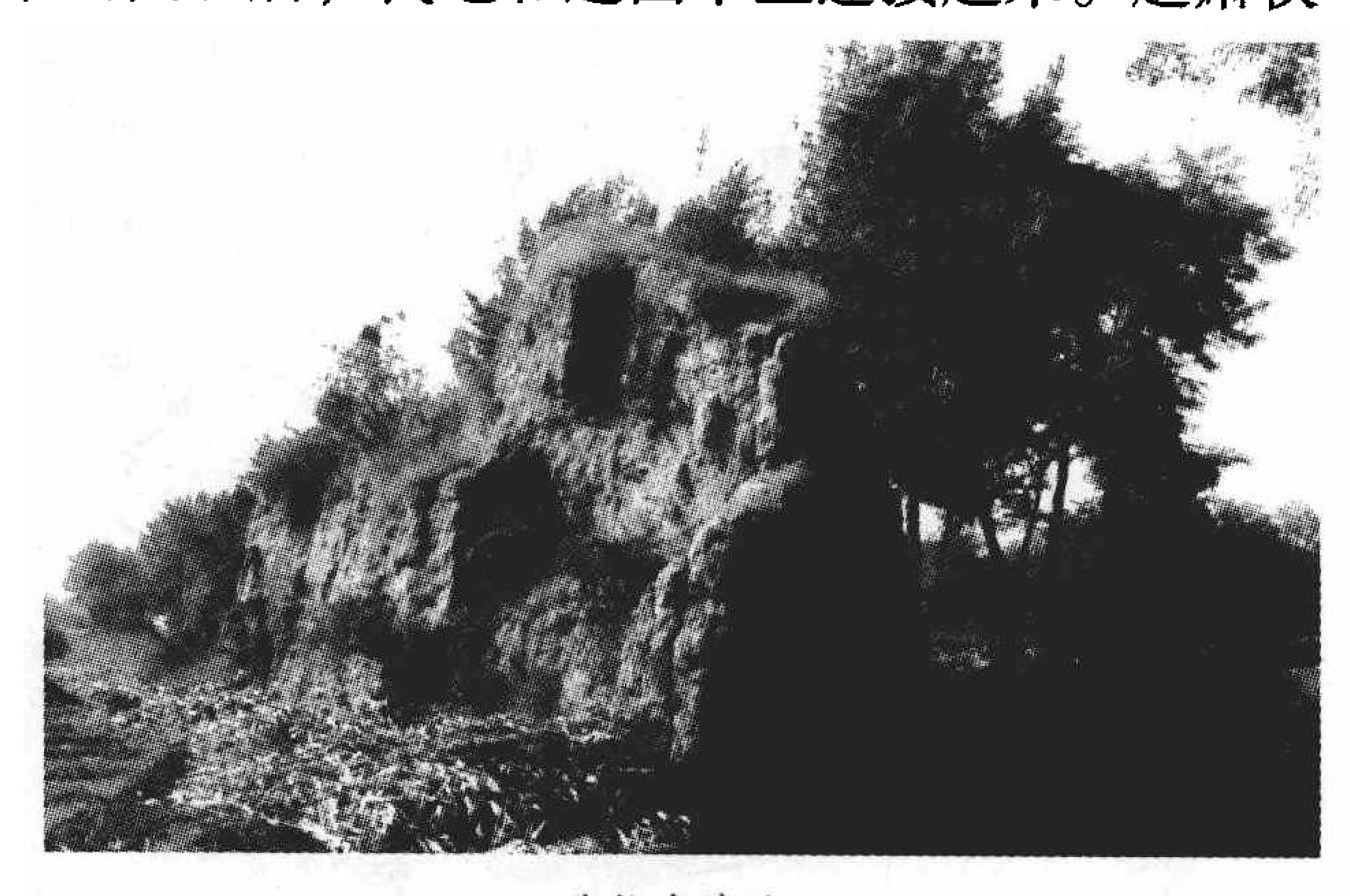
李悝计算过一户自耕农从国家领取田地的生产生活：一家五口，耕100亩田，按平均每亩年收粟1.5石计算，年收粟150石。交十分之一税15石，按每人每月平均吃粮1.5石计算，5人一年吃粮90石，这两项为105石。还剩45石。每人每年穿衣费300钱，全家用于祭祀、赛会300钱，两项合计1 800钱。每石粟卖30钱，可得1 350钱，这样还短少450钱。常年已入不敷出，如果遇上荒年饥岁，家庭有疾病死亡一类的红白喜事，就会破产。这是说的自耕农，佃农、雇农处境更困难。孟子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与李悝所说自耕农的情况基本相合。李悝没有计算兵役徭役，李悝生活在战国早期。后来战争越来越频繁，兵役徭役越来越重。"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梁惠王》）。这是说的魏国，劳动人民处境十分悲惨。同时孟子又说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形成鲜明的对照。

七、七国和各民族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战国时期中国境内有很多民族，他们多数已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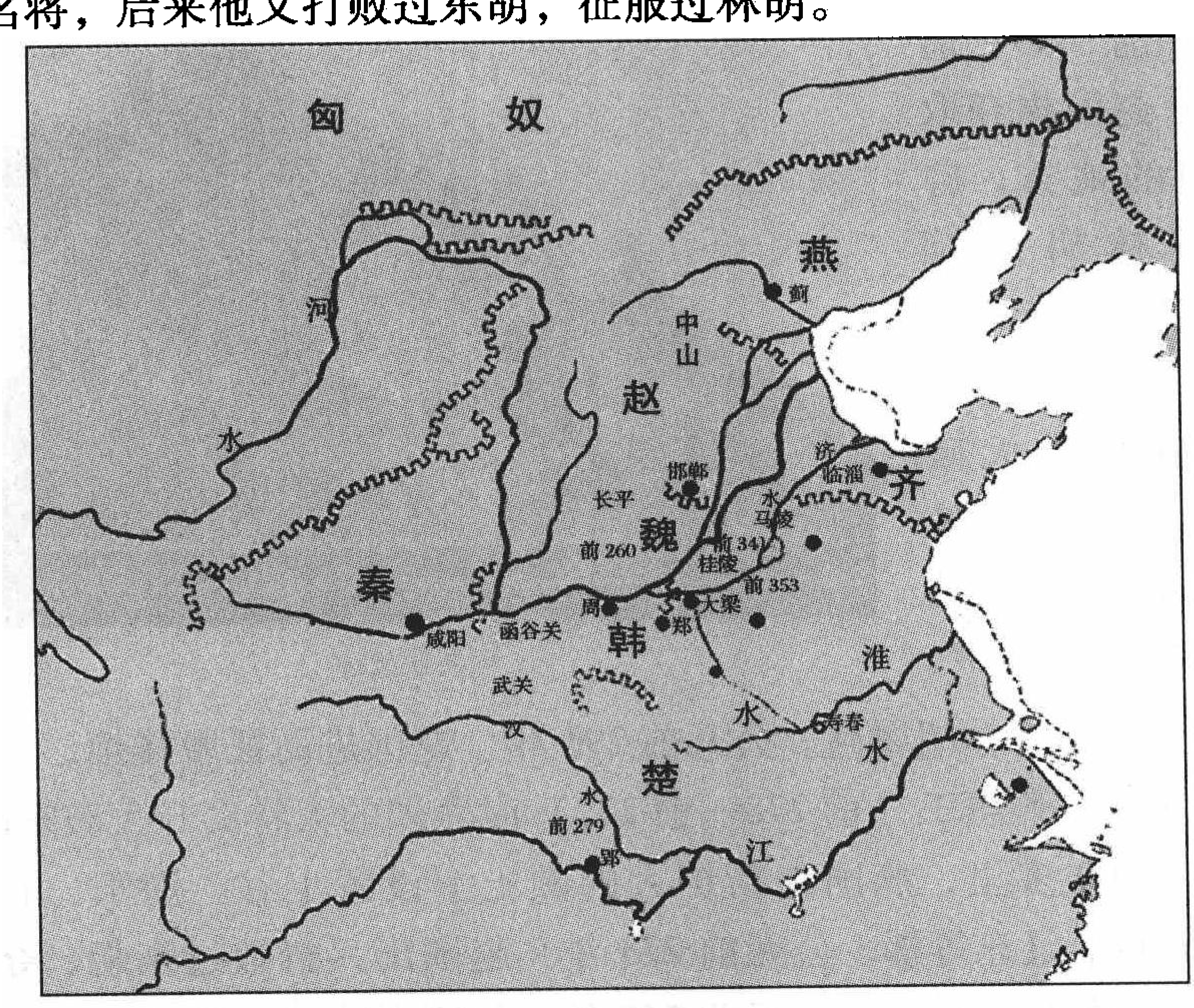
“三国边于匈奴”，匈奴和燕、赵、秦三国毗邻。三晋的北边有林胡、楼烦，燕北有东胡、山戎，东胡以东有秽貊（mò）、肃慎。东胡约有今辽宁西部和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一些地方。林胡约有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楼烦约有今山西西北部和内蒙古集宁一带。中山国属白狄族，与赵齐燕接壤，后为赵所灭。春秋以来，秦国北边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春秋战国之际，“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后汉书·西羌传》）。陇西有羌、绵诸、混戎、翟、原等，再向西敦煌、祁连一带有月氏，天山以南有楼兰、龟兹、于阗等，准噶尔沙漠以北有乌孙、呼揭等。秦国南部有巴、蜀，巴、蜀的南部，楚国的西南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等。越族散居在今福建与浙江南部等地，居住在今两广地区的少数族也属越族，“百越”、“扬越”指越族居住的地方。

赵国赵襄子（前457—前425）占领代地，代地属戎族，和赵国关系密切，赵灭中山国以后，代地和赵国本土连接起来。赵肃侯时（前349—前326）赵国想夺取林胡的地方，曾打败林胡于荏（地名）。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在位）大破林胡、楼烦，扩大了赵国北方领土，新设置云中、雁门、代郡，林胡属赵。公元前296年，赵国进而征服楼烦，楼烦臣属于赵。燕惠王（前278—前272）时燕国的大将秦开大破东胡，扩地1 000多里，燕国在新扩大的领土上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公元前273年，赵国出兵打败过东胡，夺回东胡强占的代郡地方。公元前265年，赵国李牧又打败过东胡和林


燕长城遗迹

胡。战国以前的长时期以来，中国北部匈奴就和中原地区国家常有征战。进入战国，匈奴威胁到秦、赵、燕三国的安全。公元前310年左右，匈奴骑兵“驰驱于楼烦之下”，势力到达三国边境，赵国北部边境“不得田畜”，匈奴军队掠夺人口、财物，边境不得安宁。

赵国大将李牧，驻守在雁门，防御匈奴，这是一个险要的地方。他平时很注意训练士卒，对待士卒很优厚。在战术上他采取严守阵地的办法，使匈奴无法入境，相持很长时间，匈奴来骚扰也不出战，匈奴误以为李牧是胆怯。公元前265年，李牧挑选精壮的骑兵、步卒、射手和最好的战车，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布置好战阵。他派兵士赶着大批牲畜引诱匈奴来攻，李牧军佯败，让匈奴深入，匈奴以为得胜，很高兴，大举进攻李牧军。匈奴军队陷入了包围圈，李牧军队四面冲杀，大破匈奴，歼灭10多万骑，取得一次辉煌的胜利。以后10多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国境。杜佑把这次战争列为“示怯”取胜的战例（《通典》一五三卷）。李牧不愧是一位名将，后来他又打败过东胡，征服过林胡。



战国长城示意图

秦国不断对周边各民族发动进攻。公元前 461 年，秦灭大荔（今陕西大荔县），公元前 5 世纪中叶到公元前 4 世纪中叶，绵诸（今甘肃天水县）、乌氏（今甘肃平凉县）、翟（今甘肃临洮县）、原（今甘肃陇西县）先后为秦所灭。羌和秦有过密切关系，秦孝公时，羌首领曾随秦太子朝见周显王。秦并原，羌被迫向西迁移。义渠是秦国西、北边最强的戎族，约有今陕西北部和甘肃东北部泾水、渭水以北地方和宁夏少数地方，都城在今甘肃宁县。义渠和秦国长时期中不断有征战：公元前 444 年，秦伐义渠，虏义渠王；公元前 430 年，义渠伐秦至渭阳；公元前 331 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公元前 327 年，义渠国内乱，秦派兵征伐，义渠臣服于秦，后又反秦；公元前 319 年，秦伐义渠，取郁郅（今甘肃庆阳县）；公元前 317 年，五国攻秦时，义渠败秦师于李帛；公元前 314 年，秦伐义渠，占 25 县；公元前 272 年，秦昭王诱杀义渠王，接着派兵伐义渠残部，灭义渠。在新扩大的地方设置陇西郡、北地郡、上郡。陇西郡为原属翟原的地方，北地郡为原义渠的地方。

公元前 279 年，楚国派兵征伐西南，占领了夜郎、滇池等地，即今云南昆明为中心的大片领土。由于秦国占领了黔中郡，切断了其与楚国本国的联系，领兵的将军就“以其众王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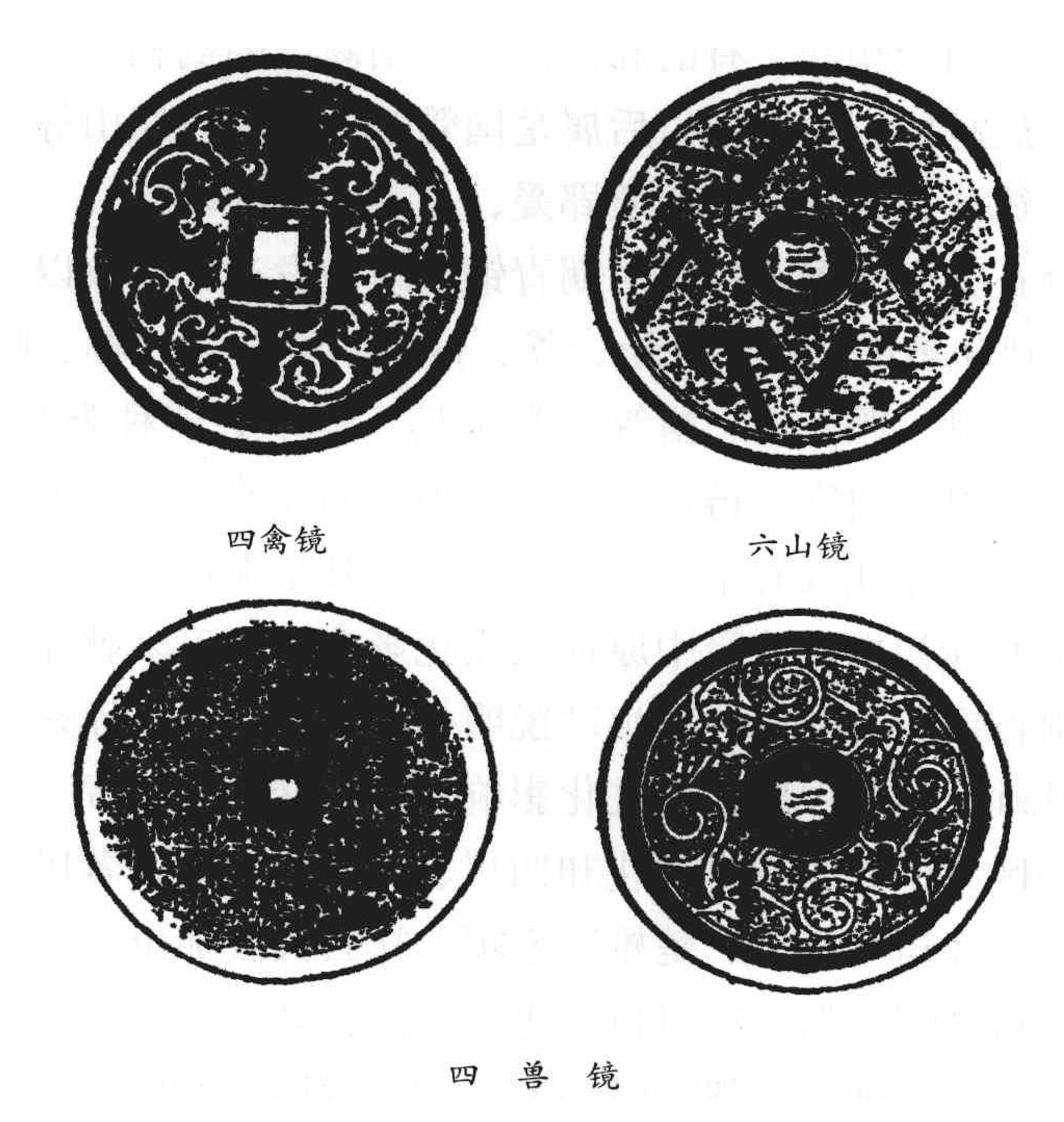
从考古发掘看，辽宁为燕国与东胡接境地方，燕国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境内基本上是中原地区文化面貌。在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锦西乌金矿和大连后牧城驿等地，发现了不少东胡的遗物，如青铜短剑、刀、长方形饰等。东胡处于青铜时代。东胡畜牧业很发达，出土马、牛、羊、猪等多种动物骨骼。出土器物上有各种饰牌，其中双虺（huǐ）纠结形饰牌和人面形饰牌最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老哈河流域发现数以百计的东胡遗址，其中有些墓葬出土遗物很多，如宁城南山根的一座石椁墓，仅铜器就有 71 件；而又有许多墓葬没有任何随葬品，这是进入阶级社会阶级分化的明证。

辽宁是北方出土青铜短剑最密集的一个地区，时间从西周延续到战国。喀左南洞沟、沈阳郑家洼子等地出土的青铜短剑和朝阳十二台营子出土的青铜短剑相似，喀左南洞沟属春秋晚战国早期。以后牧城驿 1 号墓青铜短剑为代表，窄身、直刃、长锋，有饰细鳞纹的剑柄，时代属战国晚期。在河北承德、青龙等地发现以青铜短剑为代表的一种文化类型遗物，和分布在辽宁等地的以青铜短剑为代表的文化属于同一类型，也是东胡族文化。和剑共出有燕明刀钱，说明和中原地区文化的关系。吉林集安县多次出土战国的布币、燕明刀钱，也说明这种关系。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上土城子古城，凉城县双古城有赵国遗迹遗物，凉城县新堂镇出土的一批铜币中，有赵国布币、燕国明刀、齐国刀币。

1973 年，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发掘的一批墓葬很有价值，时代属战国，是首次发现的早期匈奴墓葬。不采用棺椁的特殊葬俗以及富有游牧生活气息的遗物，如青铜短剑、鹤嘴镐、动物形饰牌等，反映了早期匈奴民族的习尚。同时出土的铜斧、铁刀和丝织品等物来自中原地区。还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等地发现战国时匈奴遗物。宁夏大部地区为匈奴所居，发现的几批遗物，也是富有匈奴文化的特色，如透雕虎搏驴铜牌、鹤嘴斧、各种铜马具、银器及装饰品。还发现具有中原地区文化特色的铜锛。出土的战国匈奴遗物中，有刀、剑等铁制兵器，镰、铧等铁制生产工具，马嚼、铁环等生活用具，说明匈奴人已较多使用了铁器。从早期匈奴墓葬的遗物还可以明显看出贫富的分化。

中原地区生产的青铜器、铁器、丝绸等传到甘肃、新疆，在新疆吐鲁番盆地阿拉沟发现的春秋晚期和战国的墓葬，出土文物多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产品，其中铁刀、丝绢、刺绣、漆器为来自中原地区或受中原地区影响的产品。今前苏联境内的巴泽雷克地方和阿尔泰山西麓等地的墓葬中，出土不少我国战国时期的文物，其中丝织品有平纹织物，刺绣和斜纹织物，青铜镜有“山”

纹镜等。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文化已经影响到阿尔泰以西的地方。同时，甘肃、新疆等地出产的“玉”等珍贵物品也传到了中原地区。



四兽镜

吴起在楚国变法时，记载“南平百越”，两广地区受楚文化强烈影响。战国时广东进入青铜文化的兴盛时期。建国以来在广东始兴、四会、肇庆、德庆、增城、清远等地发现战国遗址、墓葬，发现的青铜器和兵器相当精美，花纹有常见的云雷纹、蟠虺纹等，鼎、壶、盘、剑、矛、斧和清远出土的铜罍（léi），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楚文化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也有富有本地特色的，如匕首、人首柱形器等。钺、戚两种兵器，又在广西、云南、贵州常有相似的发现。始兴最早发现铁器，时代属战国晚期。广东这时许多地区已进入奴隶社会。

1974 年，在广西平乐银山岭发掘一批战国中晚期墓，这批墓葬同湖南等地早期楚墓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长方形墓穴，随葬品有

铁锄、实茎剑、扁銎（qióng）、矛、戈等，都和楚文化遗物相同。又在灌阳、兴安、灵川等地发现战国墓，与平乐银山岭大体相同。在田东锅盖岭发现的战国墓，出土的铜鼓属滇桂系统，出土的剑有的和平乐银山岭相同、有的和云南石寨山新出的剑相似。

浙江属越国，楚灭越以后属楚国管辖，绍兴凤凰山等地发现的木椁墓，德清武康发现的金质郢爰，是楚文化的印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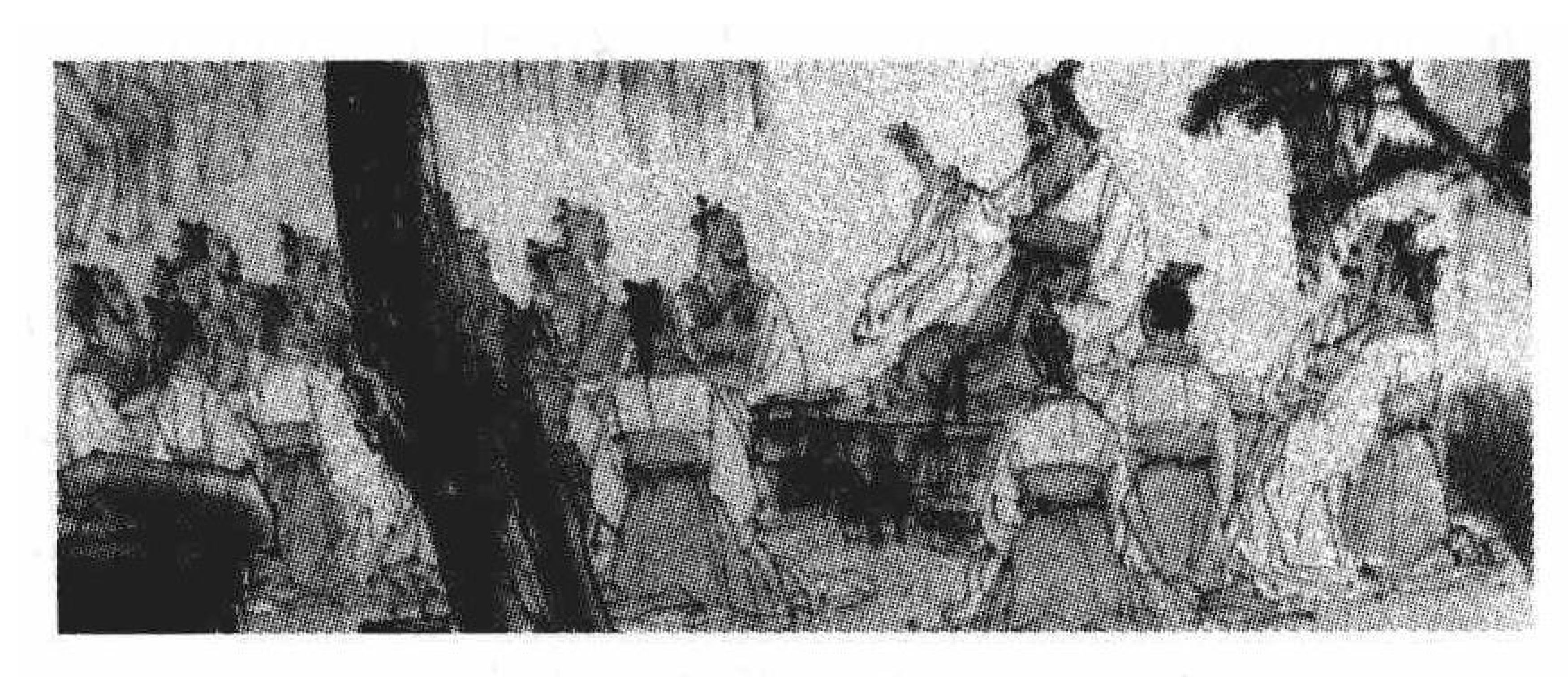
云南在整个战国至西汉时期青铜器最为发达，解放以来出土青铜器达7 000多件，有戈、矛、斧、钺等兵器，壶、尊、贮贝器等生活用器，锄、镰、锯、凿等生产工具，其中兵器种类数量最多。青铜器的题材、内容、铸造工艺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但铜戈、铜矛、铜斧和中原地区有不少相同之处，尤其是铜尊等生活用具更是相同。到西汉初更多接受中原地区文化影响，西汉末就完全融为一体。云南青铜器的发展过程生动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在原来具有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接受中原地区文化影响、发展变化的过程。云南西部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和四川、西北、内蒙古各民族文化关系很密切。江川李家山、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兵器，这时也已进入奴隶社会。

大量的文物证明，战国时期七国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往更为密切，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战国时期是我国各民族逐步融合的时期，为组成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加速各民族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第九章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一、墨子和后期墨家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大约生于公元前468年，死于公元前376年。他出身低微，做过工匠，自称“贱人”。他的门徒也多半来自社会下层，墨家组成为团体，这种团体表现出原始的组织性。他们生活俭朴，互相救助，服从教义，严守团体的法规，严格服从首领的指挥。墨子死后，团体的首领称为“巨子”，代代相传。《墨子》一书，为墨家门徒所编，代表墨家思想。


墨子授业图

墨家在战国时是一大学派，“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由于墨子和墨家团体多来自下层社会，墨家代表了自由平民或者叫庶人的利益，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其政治制度。

墨家有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

墨子提出“非命”，他说“命”的观念是“昔者暴王作之，穷

人述之”（《墨子·非命下》）。他强调人的力量，强调“自强”，他认为富贵、贫贱不是命中注定。他说：“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非命》）。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墨子主张节用、节葬和非乐，抨击了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批判了儒家提倡的厚葬、久葬（行3年之丧）。当时的统治阶级，大讲排场，大修坟墓，“厚为棺椁，多为衣裘”，弄得“民苦于外，府库单（尽）于内”（《七患》）。墨子猛烈抨击统治阶级对社会、对百姓造成的祸害，他说：“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非乐上》）。墨子喊出了下层民众的声音。

墨子主张“尚贤”。他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尚贤上》）。“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不但各级官吏要“尚贤”，还提出“选择天下贤王者，立以为天子”（《尚贤上》）。墨子提出的尚贤，目的是要打破等级制。无怪乎荀子评论墨子“慢差等”。的确，墨子对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挑战。

“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墨子提出的著名的“兼爱”主张，但他主张的是普遍的爱，包括了国君兼爱一国，天子兼爱天下。儒家主张爱有差等的，从反对儒家提倡的“爱”来说，墨子的兼爱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这是一种小生产者的幻想，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不可能“兼爱”的。

从“兼爱”的观点出发，墨子提出“非攻”。《墨子》书里有一著名故事：公输班为楚国造云梯准备攻宋。墨子日夜兼程从齐国赶到楚国，说服公输班和楚王不能大国欺侮小国；同时墨子派人去宋国做了防守的准备，结果制止了楚对宋的一次战争。

墨子讲“天志”、“明鬼”。把天当作人格化的神，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认为鬼神能够赏贤罚暴，他要用鬼神来监督人间政治。可见墨子的“天”、“鬼”思想是一种宗教迷信世界观。墨子还提出了“尚同”，即一层一层定是非，最后是“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

天子”（《尚同上》）。天子“上同于天”。这样一来，最后必然归结为以“天志”为转移。看来墨子又是相信天命论的。

墨子在认识上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法”。就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墨子的“三表法”在认识论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认为言论是否正确要看是不是符合历史经验，是不是有所见所闻为根据，是不是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这种注重实际，把认识和社会效果联系起来，特别是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的主张，在认识论的发展史上是可贵的。但他的“三表法”仍不免侧重感性认识，缺乏理性认识而陷入经验主义的错误。

《墨子》书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据研究这有别于《墨子》，时代属战国后期，几乎全属于认识、逻辑和科学的范围，称后期墨家。后期墨家扬弃了墨子的“天”、“鬼”宗教迷信思想，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比墨子有很大的发展。

后期墨家充分肯定人的认识能力，“惟以五路（五官）知”（《经说下》），是说通过感官与外界事物接触才能获得知识。他们认为知识来源有“闻知”、“说知”、“亲知”三条途径。“闻知”是听别人传授的知识，“亲知”是自己亲自经历得来的知识，“说知”是思维推理得来的知识。他们说“室中，说知也”（《经说下》），这是说在室内而不直接接触事物得来的知识，即判断推理，有理性认识的意思，克服了墨子在认识上的狭隘经验主义。后期墨家还认为得来的感性知识只有通过“心之察”和“心之辨”（《经上》）才能达到“其知之也著”（《经说上》）。后期墨家在认识论上比墨子进了一大步，是唯物主义认识论。

后期墨家提出了一整套逻辑思想和方法，当时盛行“辩”。他们提出概念要准确，要能充分表达事物的含义；理由要充分，要用

同类的事物或概念进行类比、类推，不能把不同的事物或概念进行类比、类推。概念应该适应于事物的变化，不要强求别人承认自己的论证等。他们还提出了“或”、“假”、“效”、“辟”、“侔”、“援”、“推”七个论式（《小取》）。“假”相当现在假设的意思，“辟”相当譬喻，“侔”相当推论，“援”相当类比，“推”相当类推。后期墨家的这些论证，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后期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学在对名家批判中得到发挥。他们给空间和时间下了比较确切的定义，“宇”是空间的总称，“久”是时间的总称。空间包括东、西、南、北、中一切方位，时间包括古、今、日、夜所有历程。空间有远近，时间有先后。这看来好像是很普通的道理，可是他们是针对名家的诡辩说的，是很有意义的。墨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和他们许多人亲身掌握生产技能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有直接关系。

秦汉以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思想上定于一尊，墨家不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遭到排斥而衰落了。

二、稷下学派

稷下，是齐国国都城门的名称。在这城门附近建有学宫，各国的学者们来这里讲学、著书和辩论，他们被称为稷下先生。由于时间长，来这里讲学的人也多，有许多有影响的人物，这里成了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称为稷下学派。来稷下讲学的不只是一个学派的人，道家的黄老学派在这里占优势。

战国齐威王、宣王时，齐国是东方的强国。在文化思想上，齐国既有西周礼乐制度的一些传统，又有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各种新思潮，齐王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在这里讲学，封稷下先生为上大夫，建造高门大屋的学宫，招揽天下的学士，稷下学派日益发展起来。战国初这里就开始设立学宫，到齐宣王时最盛，前后活动大约100多年，人数多的时候达“数百千人”。“不治而议论”，他们都

是些不当权的文人学士。见于历史记载的有名人物，有宋钘、尹文、慎到、彭蒙、田骈、环渊、邹衍、驺奭、淳于髡、儿说、田巴、鲁仲连、接子等，孟子、荀子也来过这里。稷下学派的著作当不少。除《慎子》残本外，其余失传。

现只能从《庄子》、《管子》、《荀子》、《史记》等书中，略知他们一些情况。

稷下黄老学派分为3个支派，一是宋钘、尹文派，二是田骈、慎到派，三是环渊派。

宋钘、尹文的著作大部失传，《管子》一书中的《心术》和《白心》、《内业》是他们的著作。宋、尹继承老子，又改造老子。把“道”说成是万物的本源，这是继承老子的学说。宋、尹把“道”理解为“灵气”或“精”，这种“精”能生万物，还能够“藏于胸中”。宋、尹认为“精”和“灵气”通过人的涵养努力能够保藏起来。他们说的“道”和老子说的又有不同，老子的“道”不能藏于人的胸中。

老子主张绝仁弃义，反对礼义法度。宋、尹论证了德、义、礼、法的含义，包含了不同学派的思想。宋、尹推崇明君圣人，明君圣人能够保持体内“精”和“灵气”，能够掌握“法”，这个“法”就是国家的条文规定。宋、尹还强调正名，“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心术上》）。他们把“名”和“法”联系起来，要求“名正法备”（《白心》），可见宋、尹的学说属于道家向法家的过渡。

田骈，齐人，是彭蒙的弟子，长于名辩，号为“天口骈”。有说他“贵齐”，有说他“贵均”。“贵齐”是齐万物，万物皆齐于道。“贵均”意思是“贵分”，就属于法了。

慎到，赵人。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兼重“礼”、“法”，但他更多地谈到法。他说“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慎子·威德》），又说“事断于法”（《慎子·君子》），一切以法为准绳。他还说“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

臣》)。应该不分亲疏，用法作唯一标准来衡量人的言论、行动。“治国无其法则乱”，没有法国家就会乱。慎到更多地提出了法的理论。田骈、慎到派已从道家转变成法家。

慎到又是法家中主“势”的一派，他说的势就是最高政治权力。权力要集中在国君手里，分散就有害，要有威势。他认为如果尧只是一个普通人，连邻人也治不了；桀所以能乱天下，就因为他是天子，有权势。他说“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没有势也就谈不上执法了，韩非集法家的大成，“势”就是继承了慎到的学说。

在稷下黄老学派中，真正继承老子的是环渊派。有人认为老子的《道德经》由环渊整理成上下篇，流传于世。环渊着重于道，较多地保留了老子虚静无为的思想，主张脱离现实，独善其身。

1973 年，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中出土一批帛书，在《老子》乙本卷前有《十大经》、《经法》、《称》、《道原》等著作，它的成书年代不晚于战国后期，为我们研究黄老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对研究稷下黄老学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十大经》赞美黄帝“是以能为天下宗”，黄帝具有非凡的智能。《十大经》认为治国的根本，要有一套“成法”，主张法治，要推行法治，必须刚柔并用，刑法兼施，缺一不可。《十大经》主张通过战争来实现统一，要“伐乱禁暴”，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平乱，才能禁暴，才能统一天下。

《经法》的作者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这里一方面继承了道家的学说，把道说成是万物的本源，还说法是由道所生的；另一方面又强调法是政治生活的准则。“以法断之”，进一步强调法的重要。《经法》和慎到说的法很接近。《经法》还明显的表现了“贵农”思想，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也和法家的理论一致。

《称》主要讲事物的名实关系和度量界限，《道原》专讲什么是道，较多的受《老子》的影响。

三、战国儒家的代表——孟子

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他原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曾经游历齐、魏、宋、鲁、滕等国，但他的政治主张不为各国诸侯所用，晚年又回到邹国，著《孟子》一书。“宗师仲尼”，孟子向来被认为是继承孔子学说的正统。



孟母教子图

孟子的政治主张是行“仁政”。他主张恢复井田制，这要从“正经界”开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文公上》）。井田制破坏了，区分井田的“经界”破坏了，“分田制禄”也无法实行了。他描绘其理想的井田制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滕文公上》）。土地私有已经普遍存在，孟子还想实行井田制，这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说：“善战者服上刑。”对那些提倡富国强兵，能战善战的国君、将领要施行最重的刑罚，这是不合时宜的。还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告子下》）。

但是，孟子的政治思想还是要维护封建制度，他认为封建社会“有大人之事（即劳心者），有小人之事（即劳力者）”。他说了一

段有名的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这种理论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赞赏。

孟子的"仁政"，表现在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主张"制民之产"，8口之家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梁惠王上》）。"要省刑罚，薄赋敛"，"勿夺其时"。他要求广大平民生活能够稳定，赋税徭役能够减轻。这对人民是有利的。

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是孟子可贵的政治思想，和他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一致。孟子敢说"民贵君轻"的言论，这对统治阶级是不利的。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纣王是一暴君，孟子说"武王伐纣"是诛"一夫"，不是弑君。

孟子的"仁政"还包括"谨庠序之教"，要求统治阶级办教育，要人民懂得"孝"、"悌"的道德，达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维护封建秩序。可见孟子的"仁政"又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打算的。

孟子主张性善论，这是他哲学思想的基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见《告子上》）。人是性善的，"仁"、"义"、"礼"、"智"是从性善发端的，"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羞恶之心"是"义之端"，"恭敬之心"是"礼之端"，"是非之心"是"智之端"。"仁"、"义"、"礼"、"智"，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本性所固有的，这是脱离社会实践的唯心主义。照他的说法，只有君子才有"仁"、"义"、"礼"、"智"，这是他哲学思想的阶级偏见。

孟子对子思的"诚"作进一步的发挥，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认为"诚"来自天道，又是人心所固有。他还进一步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这里他说的"诚"可以是自有的，有了

"诚"，一切事物可以知道，可以掌握。"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人的学问和才能不需要学习、实践和锻炼，生就固有了的。这些都是他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他说："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这是说没有人去做而自然做出来的，就是天意；没有人去招致而自然到来的，就是命运。他还说，只要充分扩张善良的本性，就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就懂得天命了。这样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能够顺"天命"了。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500 年左右出一个"明君"、"圣人"，周而复始地循环。他又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离娄下》）。也是逢"五"就起了变化。孟子开始把原始的五行说和主观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后来邹衍扩大五行学说，成为阴阳五行家。

孟子维护儒家学说，贬斥杨朱和墨子，在儒家学说的发展史上是很重要的。

四、杰出的军事家孙膑和《孙膑兵法》

孙膑，齐人，生卒年代不可考，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 380 年至公元前 320 年，他是战国时著名的兵家代表人物。

孙膑是春秋时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后世子孙。他曾和庞涓一起学过兵法，庞涓去魏国当了将军，自以为才能不及孙膑，召孙膑到魏国，依仗权势对孙膑处以膑刑（去掉膝盖骨）。孙膑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逃到齐国。齐将田忌很器重他，把他推荐给齐威王，威王任命他为军师。孙膑还有军事著作传世。

1972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其中《孙膑兵法》经过整理，编辑出版了 30 篇，

11 000 多字。这就是传世的孙膑军事著作，为我们了解战国著名军事家孙膑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能够使我们对孙膑的军事思想有一个基本的较为完整的了解。

据考证，《孙膑兵法》应是孙膑及其学生所著。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先辈孙武、吴起等人的军事学说，总结了战国丰富的战争经验。《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是我国古代军事学的又一杰作。

孙膑所处的时代正当战国七强并立，孙膑主张“富国强兵”，主张战争解决问题，“故举兵绳之”。这些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对于如何进行战争，他有许多精辟论述。

孙膑说“事备而后动”（《见威王》），又说“用兵无备者伤”。战争以前要做好各种准备，否则会失败。

孙膑提出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可以战胜敌人，但要善战。善战的办法：如“让威”，不和敌人硬拼，避开敌人锋芒；“以骄其意，以惰其志”，制造假象，表示软弱，使敌人骄傲而松懈斗志。“营（迷惑）而离之，我并卒而击之。”迷惑敌人，瓦解敌人，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敌人。

孙膑提出，“必攻不守”，主张采取以攻为主的战略，他主张“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就是要灵活机动地突然打击敌人。

他主张严格治军，他说：“令不行，众不一，可败也”（《将义》）。军法严明，号令必行。能“令行如流”（《奇正》），下达的命令像流水一样畅通无阻。孙膑主张赏罚分明，“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整饰）乱，令民畏上也”（《威王问》）。这样能够鼓舞斗志，严明法纪。

“旦暮服（佩带）之，未必用也”，“剑之为阵，有锋有后”（《势备》）。经常训练好的军队像佩剑一样，不一定马上用，一旦打仗就像剑一样地锋利，所向无敌。这就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孙膑还注意指挥员的选择和培养，要求指挥员能够精通兵法，善于指挥，能有勇有谋。

战国时，战争阵法的运用比春秋有了很大的发展，孙膑讲了10种阵法，如方阵、圆阵、锥行之阵等，还讲了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阵法。孙膑重视攻城，有一篇《雄牝城》，讲什么情况下的城市可攻，什么情况下则不可攻，这是在新的条件下对《孙子兵法》的发展。

《孙膑兵法》朴素地反映了唯物和辩证的思想。“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尽）而不穷。”《奇正》万事万物相生相克的现象和天地共始终而无穷无尽。打仗也是一样，实力固然重要，但由于种种具体条件的运用，促使事物的变化也可以是无穷的，这些是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众者胜乎？则投算（古代计数用的算筹）而战耳”（《客主人分》）。如果只认为人多就能打胜仗，那只要算一算谁的兵力多少就可以定胜负了。他反对这种看法。他在《积疏》篇里讲积疏、盈虚、径（小路、捷径）行（大道）、疾徐、众寡、佚劳六对矛盾的相互关系。“众胜寡”，自然这是一般的道理。“众寡相为变”，“毋以众当众，毋以寡当寡”，这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能使众寡起变化，运用得巧妙，以寡胜众，以弱胜强是可能的。

《孙膑兵法》带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不可能认识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明王”、“圣人”、“王者之将”，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这是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反映。

《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同在汉墓中被发现，对于解决长期以来关于两部书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很有帮助。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孙武是春秋时人，孙膑是战国时人，孙武有兵书13篇，即现存的《孙子兵法》，孙膑也有兵书传世。《汉书·艺文志》也有《齐孙子》（即《孙膑兵法》）的记载。但《隋书·经籍志》却不见著录，因而后人提出种种异议。比较流行的意见认为《孙子兵法》源出孙武，完成于孙膑，这就否定了《史记》、《汉书》记载的孙膑自己有兵法著作传世。两部孙氏兵书竹简的被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五、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周易》讲阴阳，《尚书·洪范》讲五行，原来是解释宇宙的哲学思想。"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尚书·洪范》）。这里说的五行是五种物质和这五种物质固有的性质，没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相结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天生五材，民并用之"，"五材"杜预注为"金、木、水、火、土"，完全是物质。《国语·郑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段话的意思是不同的二物（和）在一起才能发展，相同的东西（同）在一起就不能发展（不继），这五种物质合起来可以造成百物、万物，以至发生无穷的作用。这是关涉到宇宙构成的学说，还属于朴素的五行说，没有被唯心主义的宇宙观所歪曲。《礼记·月令》把五行说和宗教信仰系统地配合了。如《月令》把五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帝：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五音：角、徵、宫、商、羽，五味：酸、甘、苦、辛、咸，五色：赤、青、黄、白、黑等和五行相配合。

真正使五行学说唯心化了的还是从子思、孟子开始，他们把主观唯心主义和原始的五行说结合在一起。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这是近于五行的推算，此后五行说就变成自然和社会的演变法则。孟子以后的邹衍，扩大五行学说，成为阴阳五行家。

邹衍，又写作驺衍，齐人，生卒年代不可考，活动年代比孟子稍后。他曾为燕昭王师，游历过魏、赵、燕、秦等国。《汉书·艺文志》记载《邹子》49 篇，《邹子终始》56 篇，但他的著作已失传。我们从秦汉时他人的著作中才能了解邹衍的思想。他的学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天论；二是地理学说；三是阴阳五行的五德终始

学说。

邹衍依据当时的地理知识，称中国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外面又是大洲大海，他谈的不着边际，但也扩展了人们的空间概念。

邹衍的学说，著名的和影响很大的还是他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应同》有如下记载：

>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蚯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金、木、水、火、土"五气"就是"五德"，与天的青、赤、黄、白、黑五色的所谓"禨祥"相符应。"五气"相胜，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一气胜一气，循环往复。"五德"也循环往复，相代而兴。每一个朝代相当一个"德"，一切制度设施都要和这个"德"相应，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宗教迷信的神秘色彩赋予皇权神授。邹衍预言，代火者必将水，周德已经衰了，将有合于"水德"的帝王要统一中国，水德的征祥要出现了，看谁有水德吧。这正迎合了战国各国国君统一中国的需要。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邹衍的门徒进五德终始说，为秦始皇所采用。周是火德，"今秦变周，水德之时"（《史记·封禅书》）。水胜火，秦是水德，"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尚）黑"（《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代董仲舒把五德终始说更细致演化为"天人合一"的神学，经过唯物主义者王充的彻底批判，五德终始说才衰落下去。

六、“鼓盆而歌”的庄子

庄子，名周，宋国蒙人（今河南商丘附近），约生于公元前369年，死于公元前286年，他出身可能是没落贵族，曾在家乡做过管漆园的小官，没多久就归隐了。


庄　周

庄子的思想，保存在《庄子》一书中。《庄子》分“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过去传统的看法，认为“内篇”是庄子自己的著作，“外篇”、“杂篇”是他后学的著作。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间世》）。他把生死、贫富、饥渴、寒暑等，说成是命中注定的，要人民作自然的奴隶，作阶级压迫的奴隶。他说“天”“地”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被剥削阶级为什么那样贫困呢？也是命运的安排。他要人们不要去奔波，更不要斗争反抗，达到“坐忘”。忘掉一切，忘掉自己，忘掉外界。庄子的思想对劳动人民起了腐蚀麻痹的作用。

庄子反对社会进步，鼓吹愚昧。“绝圣弃知，大盗乃止”（《胠箧》）。没有了圣贤才智的人，大盗也没有了，社会也安宁了。因而主张社会回到“混沌”世界去，“同乎无知”（《马蹄》），“愚而朴”（《山木》），大家都不要有知识，都愚昧。

庄子还宣扬了虚无主义，他描绘了一种超脱人世的所谓“至人”、“真人”。这种人水火伤害不了他，活也无所谓，死也无所谓，随随便便的来，随随便便的去，没有忧患，没有利害烦恼，听便遨游太空，达到理想境界。他妻子死了，他敲起瓦盆唱歌：“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至乐》）。生死像是春夏秋冬更替一样，这就是庄子的“鼓盆而歌”，

表示了他对生死的无所谓。

庄子主张的“浑沌”世界，是比老子的“小国寡民”更为原始的社会。这里自然界全没有开发，树木杂草丛生，飞禽走兽成群，人与禽兽同居，与万物并存，“同乎无知”，“同乎无欲”，这是历史的大倒退。

庄子的哲学思想和老子一样，也以“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他发展了老子哲学的消极部分。“道”本身既是有情有实的，又是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道”是根本，天地还没有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终了，也不知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鬼神、上帝、天、地都是由“道”生出来的。“形非道不生”，自然界的万物也是“道”生出来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无始终，物有死生。”“道”是永恒的、绝对的、无变化的；万物是暂时的、相对的、有变化的。“道”是无所不在。庄子对“道”作了系统的阐述。

庄子的“道”和老子有不同的地方，老子的“道”是客体的，庄子的“道”是指人的主体精神。他认为人只要自以为精神上得“道”，就可以与“道”同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天地和万物与“我”是合而为一的东西，“道”既然存在于天地万物中，也就存在于“我”，“我”就是“道”，“道”就是“我”，世界就成为“我”的主观观念的产物。庄子的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庄子的认识论是相对主义，“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齐物论》）？彼也是此，此也是彼，是也是非，非也是是，果真是有是非呢？果真是无是非呢？庄子这样的说法，就是认为没有是非。这样，事物的性质、差别以及客观真理都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认为认识事物可以完全凭主观，只是看用什么观点。如说“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秋水》）。就是说，从大小不同的角度看，你看着是大，就

是大；你看着是小，就是小。在庄子看来，万物都是相对的，只有“道”才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庄子从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又走到极端怀疑论。有一个庄周梦为蝴蝶的著名故事，说庄周梦为蝴蝶，醒来仍是庄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究竟是庄周做梦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为庄周，都弄不清了。

庄子哲学是战国时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庄子》一书是一个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很大的影响。道家学派中庄子与老子齐名，并称“老庄”。庄子提出和论证了哲学上的一系列问题，开拓了人们的思路和眼界。不能认为庄子学说全是消极的，他有积极的思想，他认为万物是在变动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秋水》）。万物在急剧地变动，无时无刻都在变动，这是很辩证的思想。礼义法度应随时代而变，表现了庄子进步的历史观。

七、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又叫孙卿，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13年，死于公元前238年。荀子到过齐国稷下讲学，“最为老师”。晚年在楚任过兰陵令。著《荀子》一书。荀子是传经大师，汉代经师不管是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子。


荀子像

韩非说“儒分八派”，孟子、荀子是最重要的两派。荀子的政治思想是“礼治”，这是他属于儒家的基本特点。他把礼放在刑和法之上，认为治国主要靠礼义道德的教化，礼治的基本要求是维护“上下有序，贵贱有等”的封建秩序，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他说人是有欲望要求的，如何维持封建秩序呢？要有

“度量分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就会乱，“故制礼义以分之”，礼义就是这样因为需要而制定的。荀子说的礼包括很广泛的内容，在政治制度方面，“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智）愚能不能之分”（《荣辱》）。在社会思想方面他讲“群”的思想，“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分”就是“度量分界”，也就是等级秩序。他还提出了敬、孝、悌、慈、惠的封建伦理，荀子对后来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有相当的影响。

荀子既重“礼义”，也重“刑法”，他说“治之经，礼与刑”（《成相》），把礼与刑作为治国的根本。又把礼赋予法的含义：“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者也”（《劝学》）。还说“庆赏刑罚，欲必以信”（《议兵》）。可以看到荀子具有许多法家思想，他实是儒法杂糅的人物。

荀子主张人性恶，认为人本性“好利而恶害”（《富国》）。他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性恶》）。人为了满足这些欲望则必争，这就是性恶的原因。荀子认为人性恶是先天就有的，这是他的唯心主义。

不过荀子的人性恶又认为后天可以改造，“其善者伪也”（《性恶》）。荀子说的“伪”，是人为的意思，所以他说人能由原来的性恶改变成性善。他认为“礼义”、“法”、“刑”可以改变“性”，他说“涂（途）之人可以为禹”（《性恶》），普通的人也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这不是“性”完全改变了吗！荀子没有把性恶绝对化。

荀子的天道观是唯物主义的，这是他的光辉思想。对于自然界的变异，人们感到奇怪、害怕。荀子说凡是像日月食、风雨不调、怪星出现等自然现象，哪一代都有，“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上）。国家太平，即使自然界常有怪异出现，也无伤；国家险恶，即使这种现象一次也没有，也无益。这就批判了长期以来人们把政治的好坏附会

到灾异机祥上去的鬼神思想。

“天”是没有意志的，是自然现象，因此他反对迷信、巫祝、祈祷。荀子很强调人的力量，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这是一种可贵的无神论的世界观。我们知道，从殷周以来的古代世界存在浓厚的天命思想，“天”被说成是有意志的，是神，要求人们顺从、屈服于“天”，努力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求得吉祥福祐。而荀子阐述的天的思想，宣传了“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

不仅如此，荀子还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论》）。这就是说与其尊天的大而思慕它，不如把天当作物而畜养制服它；与其对天歌颂，不如掌握自然变化而利用它。这在当时很是难能可贵，确是战斗的唯物主义。

荀子的“天论”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他说“天生蒸（众多）民”（《荣辱》），“皇上隆赐，以示（给予）下民”（《赋》），这样“天”还是有意志的了。他把人事的终始说成为和天地一样的循环论，这些也暴露了他思想的矛盾。

荀子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人能够认识事物，是人的本性；事物又是可以被认识的。人怎样认识外界事物呢？他说：“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正名》）。荀子说的“征知”，意思是辨别、取舍、推理，“天官”是指眼、耳、鼻、舌、身五官。“薄其类”是接触事物。比较正确的处理了感觉与思维的关系。荀子还说：不要“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即是说不要因为片面性而模糊了本质、真理。荀子还强调了“知之不若行之”（《儒效》），知道了要去做。荀子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思想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荀子主张维护私有制，维护剥削和社会等级制度。主张“上

下有差”，“别贵贱”。把君臣关系说成是“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王制》），他的政治思想继承了儒家贵贱有等的理论。荀子的哲学思想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后来封建统治阶级能够接受，就不是偶然的了。

八、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

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是荀子的学生。他的著作有《韩非子》一书。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时代在不断前进、变化，不是停滞，不是倒退的。他认为圣人也不是循守一种东西不变的。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时代变了事物也变，事物不同了做法也要改变，这表明他的历史观是进步的。

韩非所处的战国时代，兼并战争很剧烈，这就要看谁有力量了。韩非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显学》）。谁力量大就能兼并谁。他着眼于“力”，即要富国强兵。在韩非看来，要富国强兵就要实行法治，要实行法治就要批判儒家的仁义。


韩 非

韩非提倡以法为本的法治，是法、术、势的结合，他总结了过去法家的经验教训，主要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他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法、术、势不可缺一。他指出商鞅在秦国行“法”，因为没有“术”，“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定法》），变法的果实落到了权臣的手里。申不害只讲“术”而没有“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定法》），弊病也很多。所以他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法和势都是关系到法治的成败问题。

韩非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定法》），就是以官府的宪令作为法治的依据，人人遵守。宪令不能违反，不能“去规矩而妄意度”。“法”，是规矩准绳，不能离开，不能任意行事。他主张大力宣传“法”，“法莫如显”，连“卑贱”的人都要知道“法”。他说，“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就是所谓“法不阿贵”，无论什么人不能犯“法”。为了行“法”，不惜设重刑，“上设重刑而奸尽止”（《六反》），韩非等法家很重视刑和赏，认为重刑能够杜绝犯“法”。

韩非说“术”是国君驾驭群臣的手段，是一种权术。“术不欲见”（《有度》），“术”是不能让人知道的。商鞅行法，数十年没有能够成就帝王的事业，“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定法》）。在韩非看来，没有掌握“术”，“法”也等于失败了。韩非的“术”，后来被统治阶级继承成为使用阴谋权术的手段。

韩非说的“势”是国君的最高权力，他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人主》）他说，暴君夏桀能够控制天下，因为是天子，“势重”；尧是普通人时，谁也不能管，因为“位卑”。

韩非强调权力要集中，“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物权》），“要”指中央集权，国君要紧紧掌握这种权力。他认为对于“势”运用得如何，关系到法治的成败。

韩非强调富国强兵，很注重推行耕战政策，认为这是必由之路。“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有事无事，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韩非在《五蠹》篇里把不从事耕战的游说之士、侍臣、学士、游侠、工商之民斥为社会的五种蠹虫，他严厉批判儒墨等言仁义而妨碍耕战的行为。韩非等法家对耕战的重视，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韩非的哲学思想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传统。他批判地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把“道”说成是自然界的本身和运动着的规律。他认为自然界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

“一存一亡，乍死乍生”，“不可谓常”。“万物”服从必然的总规律，“万理”体现不同事物的特殊规律。他对“道”和“理”关系的解释，类似我们今天说的万物各有特殊规律，所有特殊规律共同体现了普遍规律。

韩非反对天命鬼神，他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就是10个尧那样的“圣人”，也不能使农作物在冬天里长出一株穗来。韩非反对迷信鬼神，“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亡征》）。他认为迷信鬼神是国家将亡的一种征兆。

韩非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他说“物有常容”（《喻老》），事物有一定的内容和一定的表现形式，即有一定的自然常态。怎样去认识呢？“虚以静后”（《扬权》），即认识产生于对事物的观察研究以后。他在《解老》篇里批判了“前识者无缘而忘（妄）意度也”，即还没有接触事物就想当然得出认识的先验主义。

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维护地主阶级的等级、剥削制度。他歪曲事实说：“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显学》）他美化了地主阶级的剥削，污蔑了劳动人民。他还说：“贵贱不相逾，……治之至也。”（《有度》）封建等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极力为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唱赞歌。韩非还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忠孝》）这和儒家的思想没有什么两样。

秦王政（即秦始皇）看到韩非的书很有感慨，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九、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一书，是吕不韦的门客按照吕不韦的意旨所著的，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览、论、纪的下面又分许多小题目，共26卷，20余万言，是一部自成系统的杂家代表作。《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在“杂家者流”，说它“兼儒、墨，合名、法”，就是说

各家的学说兼而有之。

《吕氏春秋》想把各家的不同学说统一起来，他认为，“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意思是要取人之长，采取各家的长处。他还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说，天下没有纯白的狐狸，但有纯白的衣裘，这是从许多狐狸身上掇取的。

《吕氏春秋》在政治思想上有因袭儒家之处，它赞成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反对家天下，讴歌禅让。“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贵公》）《吕氏春秋》主张分封诸侯，它说“故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慎势》）。但是它又主张政治上的统一，它说“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一”是统一，是权力专一。这又是法家思想。它还说治国“无法则乱”（《察今》），这也明显是法家思想。它还把儒家的礼义与法家的赏罚相结合，“赏罚之柄……其所以加者义”（《义赏》）。它既取儒家，又取法家思想，把儒家法家的思想糅合在一起。这表现了法家的特点，但所要说明的问题是矛盾的。

《吕氏春秋》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上德》）这是把儒家“德”的政治思想与道家结合起来。道家是“非乐”的，儒家则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把“道”说成是音乐产生的本源，也把道家、儒家糅合在一起。

《吕氏春秋》在《孟冬纪》的下面，编入了《节葬》、《安死》两篇，这是企图把儒家的“孝亲”和墨家的“节葬”调和起来。

《吕氏春秋》对于阴阳家的《月令》很重视，它把“月令”作为十二纪的架子，12纪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月令》分“孟春之月”等12个月，即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孟、仲、季三月。

《吕氏春秋》的天道观基本遵循道家，认为“道”是天，是太

一，是自然，不是意志的人格神。《吕氏春秋》的主要倾向是不相信鬼神的，认为鬼神是无知者主观虚构的东西，因而卜筮等是不可信的，这里它吸收了无神论思想。

《吕氏春秋》采纳了许多家的学说，它所说的采纳各家之长，说不上是对各家学说批判地继承和总结，实际上只是按一定的意图把各家的学说编织起来。

不过，《吕氏春秋》在文化史上有相当高的价值，司马迁说它“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它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实。章学诚评论《吕氏春秋》说：“吕氏将为一代之典要。”（《文史通义·言公上》）如《上农》等4篇，就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农业史料。

第十章　科技、文艺与物质文化生活

一、天文、历法和数学

人类最先发展起来的科学，要算天文、历法和数学。恩格斯说：“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① 古代社会，我国在这些方面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对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甲骨文可以看到，商代对天文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刻，有非常完善的历法系统。到了周代，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天文历法更加发展了。据记载，当时中央政府设有掌管天文历法的专职官员；在一些诸侯国也有类似的专职官员。由于设有专职人员，加上他们勤于观测和推演，故取得了巨大成绩。比如，作为古代的恒星分区体系的二十八宿——它是我国古代天文家为了对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星）的运行及位置做更深入系统的观测，绕天一周选择二十八个星座作为观测的标志（也有称作二十八星或二十八舍的），确实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确定。1978 年，湖北隋县擂鼓墩 1 号墓出土一件漆衣箱，盖上朱绘有青龙白虎和用古文字写的二十八宿整套的具体宿名。这清楚证明了春秋时代以前，在天文观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也正因为那时已有如此高的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23 页。

平，所以，春秋时代能测得准确的“冬至”和“夏至”点，并能创造出包括朔、闰、节气三要素的当时世界上最完善而准确的历法。

战国时代通用的四分历，是春秋末年开始有的。这种历定岁实为365.25日，规定19年置7个闰月，1个朔望月（又叫太阴月或回归月）为29天半多（约等于29.53085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历法。当时天文历法能有这样的先进水平，和无数的天文学家的努力分不开的。

战国时代的天文家已经了解到岁星（即常说的木星）的位置是逐年移动的。岁星运动一个周期，大约是12年，这一发现有很大的意义。过去纪年的办法，都是以王公即位年次来纪年的。我们从甲骨文中看到，这种纪年办法，至少在商代后期就存在了，一直到春秋之际仍是这样。如《春秋》中所纪鲁国的年代，就是以某个国君即位为元年，往下是二年、三年、四年……死后，另一个国君即位又是元年、二年、三年、四年……这种方法往往出现一国君的死年，即前者的末年，又是后面新君即位的元年。战国时代，由于掌握了岁星的运行规律，就逐渐造出了新的纪年办法。

为了准确地计时，战国时还创造了一种在我国一直使用到明清时代的“滴漏”。这些成就，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十分先进的。

天文学和数学是分不开的。说到数学，自然想到《周髀算经》这部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数学经典著作。这部书主要就是讲原始的天文计算方法。书中有名的商高定理，即勾股玄定理，是数学上的基本定理，当时就是用它进行地下和天上的测量。《周髀算经》中保存有大量的战国、甚至春秋以前的有关数学的素材。这是许多科技史工作者共同的看法。

另外，在考古发现的战国货币上，有的可以见到一种与甲骨、金文中常见的传统数目字不尽相同的新记数符号。根据研究，这种符号，和后来一直沿用到阿拉伯数字传入以后民间仍然广泛用于记账的所谓算筹体号码是一致的。算筹体号码，分为表示个位、百

位、万位的纵式（𝍠 𝍡 𝍢 𝍣 𝍤 𝍥 𝍦 𝍧 𝍨）和表示十位、千位的横式（𝍩 𝍪 𝍫 𝍬 𝍭 𝍮 𝍯 𝍰 𝍱）两种。在运算和书写数目时，两者相间就构成一个需要的数字，如 1978 写成𝍩𝍨𝍯𝍧，如果遇到零就空一位表示。

这种算筹体号码，来源于运算工具算筹的使用。算筹，战国时代的实物已有发现。1954 年，在长沙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了一件竹箧，里面除藏有毛笔等书写工具外，还发现了竹筹。在距战国时代不远的西汉墓中，也出土有实物可供我们参考。1971 年 8 月，在陕西出土了西汉宣帝（前 73—前 49）年间的骨制算筹 30 多根。从这些实物得知，原来它是用若干小棍（骨或竹）做成的。在进行运算时，就可以摆成纵横两式进行加、减、乘、除以至乘方开方。战国时代的货币上既然已有那样的符号，说明至少在当时确已流行着算筹这种运算工具了。这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战国时代数学大大发展的表现。

这里还必须提到的是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墨子》一书。书中保存有大量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重要资料，其中有关数学方面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从前在这方面研究得很少。据近年来杨向奎先生的研究，发现《墨子》一书中有许多关于高等数学理论的论述。比如对“极限”的论述，《经说上》：“穷，或有前不容尺也”，“穷，或（域）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这里的“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极限”，“尺”就是线条。意思是说，当前面已经走到容不下一根线了，就是无穷小；而当所有的东西都能容下，则是无穷大，这就是数学上的“极限”概念。这已不是初等数学范围的问题，它是一种变数概念，属于高等数学的领域。

再比如关于切线的理论，墨家把“切”叫做“次”，说“次，无间（相切）而不相樱（相交）也”（相交就成了割线了），“次，无厚而后可”（《经说上》），即认为切线不是割线，而是接触的那一点。这个关于切线的定义既简单又明确。它也是高等数学中的切线理论。从这里不难看出，我国的数学成就，在战国初就已达到了

很高水平。它和天文学一样，在当时都处于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地位。

二、扁鹊与战国的医学成就

祖国的传统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说有关神农尝百草只是我们祖国医学起源的一种传说的话，那么，商代的医学则确实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水平。我们不仅可以从甲骨文中看出那时有了按照体表部位对疾病进行分类的概念，而且有了医官“小疾臣”。到周代，从西周到战国的800年间，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商代医学的传统，而且还有医学著述流传。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保存的《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医学著作，就是那时流传下来的。

战国时代，在我国医药卫生科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它是一个为我国传统的医药卫生科学的全面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时代。那时，不仅在医药卫生科学理论方面有许多突出的成就，而且出现了一批在理论和临床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成绩的医学家。神医扁鹊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扁鹊并不是他的本名。他本姓秦，名越人。据传他从一个叫长桑君的人那里得到了秘方。扁鹊特别擅长诊脉，还能洞见内腑五脏的症结，有起死回生的本领。当时人认为他和传说中黄帝时代的神医扁鹊差不多，故把他也叫作扁鹊。长期以来，说起扁鹊人们都很熟悉，反到把他的真实姓名忘记了。


扁　鹊

扁鹊的医术极为高明，拥有许多弟子，他经常带着他们在各国

巡回行医。有一次到了虢国（今陕西宝鸡一带），听说虢国太子死了。扁鹊与弟子到宫门询问，了解到太子得病的情况，知道太子刚死不到半日。扁鹊根据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认为太子一定还能救活。守宫门的人不相信他，说他的话只能骗孩子。虢国的国君知道了，忙把他请进宫中。扁鹊经过仔细的望、闻、问、切，确认虢太子不是真的死去，而是一种“尸蹷”（今通作厥），大致和现代医学上常说的“休克”差不多。扁鹊立即叫弟子子阳和子豹协助他用针砭进行急救。不一会儿，太子果然醒了过来。继续抢救后，太子能坐起来了。接着又开了汤剂，连服了20天，虢太子的病全好了。这件事传出后，人们都说他有起死回生之术。

有一次，扁鹊到了齐国，大致正是田齐桓侯午之时（前374—前357）。齐侯对他很客气。在召见时，扁鹊看见齐侯体内潜伏有病，就说：“君有疾，在腠（音凑）理（在表皮的意思），不治将深。”齐侯说：“寡人无疾。”等扁鹊走后，还对身边的人说，医生总希望别人生病好赚钱。5天以后，扁鹊又去见齐侯，说：“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齐侯还是不相信，心里还不高兴。又过了5天，扁鹊再见齐侯说：“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齐侯连听都不愿听。5天以后，扁鹊第四次见到齐侯，一句话不说便退了出来。齐侯派人问他为什么见了面不说一句话就走了？扁鹊说：“病在表皮用汤熨即可治，病在血脉用针石可以治，病在肠胃间服些酒药能行。现在齐侯的病已经进入了骨髓，没有药可治了。”不久，齐侯果然大病暴发。再派人找扁鹊，已找不到了，齐侯就死去了。

这两个故事，可能有所渲染，但也反映了扁鹊医术的精湛高明。

扁鹊对于内科、外科、五官科、妇科、小儿科都很在行。他在诊断和药物调剂等方面，也有许多创造发明。

在诊断上，扁鹊首创了切脉诊病法，为后来中医的望、闻、问、切的四诊法奠定了基础。在治疗和药物调剂上，他根据不同病情的需要运用和发展了针砭，为了更好地发挥药物的效力和便于服

用，他又把药配制成丸、散、膏、丹、汤剂或制成药酒。他根据各种病情，有时单独使用一种方法或一种药物，有时相互配合使用。

扁鹊不仅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还把自己的丰富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传授给他的弟子。据传，他还写有文字的东西流传下来。《汉书·艺文志》中有《扁鹊内经九卷》、《扁鹊俞柎方二十三卷》。这些挂有扁鹊名字的古代医学文献，有可能是后人根据扁鹊及其弟子们流传下来的医学资料编辑而成，不一定是他的手笔。但战国时代私人著书立说风行，各家都有自己的学说和著作传世，因此，也不排除扁鹊及其弟子们有著作传世。从文献和考古材料看，战国之际确有不少医学著作流传。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传世的我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它是我国长期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内容也比较完整，最能反映战国时代的医学水平。这部书，在理论上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作为指导思想，用阴阳这对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来解释人体内部的生理病变；在临床实践经验上，它对各种病症、药方、针砭技术、保健卫生等等都有深刻的论述。据《汉书·艺文志》讲，原书是 18 卷，其中《素问》9 卷，《针经》9 卷。唐代以后的传世本把《针经》改称《灵枢经》。这部古典医学名著中的不少论述，以现代医学科学成就去检验，也是正确的。如《灵枢经》中讲到关于人的肠胃时，说从人的咽喉以下到直肠的长度，就和当今人体解剖所得到的统计数字基本上一致。尤其是《素问》的《经脉别论》中关于人体体循环和肺循环的论述，更是了不起。当时不仅认识到心脏是血液循环中起主要作用的器官，而且认识到血液是“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的。

《黄帝内经》还有预防的理论，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书中强调应以预防为主，一个人如果病已深成，就好像口渴了才掘井一样，那就太晚了。

这种预防为主的医疗保健思想，到战国后期又有进一步发展，即注意从人们的日常衣食起居运动做起。这方面，突出的反映在成

书于战国末的《吕氏春秋》一书里。

在穿着上，《吕氏春秋》的《重己》篇认为“衣不燀热，燀热则理塞”。意思是说，衣服不能穿得过厚，过厚了太热，就要生病，造成所谓“理塞”，即脉理闭塞，血脉不通。衣服要穿得合适，能御寒就可以，用《吕氏春秋》的原话讲就是“其为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

在饮食方面，《吕氏春秋·数尽》提出“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味不众珍”，即不要追求美味的山珍海味、大肥大肉和浓烈的酒食，否则会伤害脾胃。所以书中提出了“肥肉厚酒”，“烂肠之食”，是有伤人体健康的。

在居住方面，《吕氏春秋》提出不能住得过于潮湿，也不能太干燥，否则对人体健康都没有好处。主张居住“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即住得要干湿适当。

人体的运动，对健康有直接的关系。《吕氏春秋·数尽》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头上的病）；处耳则为挶（jū）为聋；处目则为䁾为盲；处鼻则为鼽（chóu）为窒（鼻子不通气）；处腹则为张为疛（小腹的病）。”这就是说，人不运动，血脉就不流通，气血郁结在哪个部位，哪个部位就要有毛病。它把人体的运动比作流水，流水才不会腐臭；又比作门的转轴，经常转动才不会被虫蛀蚀。

由上不难看出，战国时代祖国的医药卫生科学确实取得了极为光辉的成就。

三、从墨家看战国科技

战国时代，科学技术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前面说过的以外，在力学、声学、光学、磁学诸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在长期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人们早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广泛运用

着各种物理学原理，发现了许许多多颇为有趣的物理现象。但对各种物理现象进行有意识的考察研究，作出各种科学的解释，并进一步加以推广和应用，却是比较晚的。就我们现有的可靠资料考察，多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事。而这方面取得成就最卓著的，当数墨家学派。

墨家学派是春秋末战国初的墨翟（宋人，后长期居鲁）创立的一个学派。墨家的创始人及其弟子，都是以刻苦耐劳，勇敢善战，勤于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而著称的。因此，墨家不仅在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这是先秦其他各家所不及的。

墨家有关科学技术的论述，主要保存在《墨经》中[①]这部书主要是战国时代墨家的门人后学编撰的。书中关于数学（前已论及）、力学、声学、光学等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科学成就，因此《墨经》不失为伟大的自然科学论著。下面就其力学、声学、光学方面的成就作一简要介绍。

力学方面。墨家给力学下了符合科学的定义，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奋是动的意思，这是从人的体力概念里引申出来的。《墨经》这里把人体叫作"刑"（形），把人体通过提、举、抛、投等，使运动转化的过程称之为"奋"。这句话的意思是：力，就是人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也就是说，是使物体由静止变为运动，凡是改变物体静止状态的，就叫力。这和现代物理学对力的解释是一致的。

墨家对于和力学有关的，如：运动与时空的关系，轮轴与斜面的受力，圆球的运动特点，水的浮力对浮体与排水的关系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而墨家有关杠杆平衡和"本"、"标"（墨家把杠杆的力臂叫作本，把重臂叫作标）之间的关系研究，比希腊学

---

① 《墨经》就是常见的《墨子》一书中的一部分，主要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有人说不包括后两篇。

者阿基米德（前287—前212）早一二百年。据研究，墨家有许多关于力学的概念，甚至和英国近代学者牛顿（1642—1727）有关力学的概念也是相符合的。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也可以在墨家的有关论述中找到。足见墨家对于力学方面的研究是多么深刻。

墨家在声学上的突出成就，是把声学原理运用到军事守备方面。据《墨子·备穴》篇记载，有一种后人称作“听瓮”的军事防守措施。做法是在城墙脚下每距几尺远挖上一个深坑，在坑里埋上一个大陶瓮，瓮口上蒙着皮革。然后挑选耳朵锐敏的人伏在瓮上监听。遇有敌人挖地道攻城的响声，就可以很快发觉。这时根据各个陶瓮的响度情形判定敌方挖掘的位置和方向，再从城里往外挖掘地道来迎击敌人。这是一种声学上共鸣共振的巧妙运用。

墨家在光学方面也有所研究。他们曾经做过小孔成像的实验，这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其做法是：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里，于朝阳的墙壁上凿一个小孔，人对着小孔站在房间外面，这时房间里相对的墙上就会出现一个倒立的人影。墨家不仅做了实验，而且第一个对光的直线传播作了科学的解释，认为光像射箭一样，是直线向前进行的。墨家还对凸面与凹面镜成像的各种情况进行过认真的实验研究。他们发现，把物体放在凸面镜前的任何地方，都只能得到比原物小的正立虚像。对于凹面镜则是：当物体放在球心之内，就得到正立像；距球心近的像大，距球心远的像就小。当物体在球心之外时，则得到的像就是倒立的；距球心近的像就大，远的像小。

古人把凹面镜称为“阳燧”或“镜燧”。《周礼》中有司烜氏，就是掌阳燧取火的。《考工记》还记载有关于用青铜制造镜燧的方法。可以肯定，这种镜燧至少在西周或春秋初就有制造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在河南陕县上村岭春秋早期的虢国墓中，出土过一件凹面镜，当时误以为某器物的盖子，其实它就是我国最早的阳燧实物。

镜燧，意思就是对着太阳取火的镜子。镜对太阳时，在焦点处可以用易燃物点着火。墨家把“焦点”称作“中燧”，当时已经明

确了焦点和球面镜的球心是有区别的。

我们从墨家有关物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某些方面还比较原始，解释也不甚准确，但也有不少和近代物理学上的有关实验结果相一致。

除墨家的有关文献中的许多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记录外，我们从其他有关文献中也可以清楚看到战国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成就。比如有关磁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据传说，黄帝时代就有了指南针，但那毕竟是传说。从可靠记录看，关于磁的指极性的发现和运用，还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事。我国古代，是把磁石的吸铁特性比做母子间的依恋关系，认为“石，铁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吕氏春秋·精通》)。所以汉代以前，我们看到文献上都把“磁石”写作“慈石”。有关磁石的记载，迄今为止最早见于文献的，是《管子·地数》的：“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而关于“慈石召铁”的记载，就是战国末年成书的《吕氏春秋》了。对磁石吸铁性的认识，是物理学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由于发现了磁石的特性，战国末年才有用以制作正方向定南北的“司南”这种我国最早的指南针。指南针的发明，是磁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又一巨大贡献，特别是航海事业的发展，指南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我们从战国时期有关文献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战国时代的科学技术是走在当时世界前列的。不少科学成就，在西方世界，差不多在一两千年后才取得。而我国却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达到了那样的高水平，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光荣。

四、长于讽喻、深于比兴的战国散文

清代学者章学诚（1738—1801)，在他的《文史通义》中，对战国文学有许多精辟的论述。“长于讽喻”和“深于比兴”两句，是他对战国散文特点的简要概括和评论。

战国时代，散文这朵艳丽的新花，出现了盛开的局面。不管是从叙事、记言，或是从说理、抒情等方面看，都已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程度。

战国的散文，一般可分为“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两大类。所谓“诸子散文”，是指当时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著述。所谓“历史散文”，是指当时根据官府典册的简单史实和佚文故事，经过作者加工编纂的一种既反映一定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又揭示有关人物性格特征的历史著作。这两种散文的特点，因人而异，各家的著述，自有其不同的特色。有的文章质朴，有的文章艳丽，有的说理精密，有的记述清显。但是，他们又都有着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普遍善于使用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作比喻，以代替抽象的议论和说理，从而把作者的思想、观点和要求等，都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同时还善于运用景物的描写，来激发人们的思想感情。这两大特点，使战国时代的散文显得生动活泼，具有浓烈的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尤其是那些诸子著作，虽然都是些理论性很强的作品，但读起来丝毫不觉得枯燥乏味。与春秋战国前那种缺少生气的官样文章相比，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境界。

战国时代的散文著作由于有那样的特点，也就更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哪怕是古代书写传抄困难，甚至经过秦代野蛮的火焚，流传到今天的仍然相当丰富。这些丰富的作品，我们这里不可能一一加以分析介绍，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只拿《庄子》和《战国策》为代表。前者可作为诸子散文的代表，后者可作为历史散文的代表。

《庄子》一书分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共 33 篇。照一般的看法，《内篇》7 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外篇》15 篇和《杂篇》11 篇，历来被认为是他的门人后学的著作。但文章的艺术风格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因此可以看作庄周或受其影响的作品。

《庄子》这部书的写作方法，据此书的《天下》篇所说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卮言”，用我们现

在的话说，就是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进行抽象的议论。“重言”，就是引用历史故事和古人的言论。“寓言”，就是一种讽喻性的小故事。这种文学形式也源于民间。古代人民为使自己的语言更生动，更富有说服力，往往运用生动的比喻来表达思想感情，起初只是三言两语，后来发展到有人物有情节的短小故事。这种故事具有比喻和象征的特点，是人们所特别喜爱的形式。我们在战国诸子的言论中随时可以见到，比如至今为人们所熟悉的《愚公移山》(《列子·汤问》)、《鲲鹏之变》、《混沌凿窍》（《庄子》的《逍遥游》、《应帝王》)、《刻舟求剑》（《吕氏春秋·察今》）以及《战国策·楚策》中的《狐假虎威》，等等，都是寓意深刻、艺术构思奇特的佳品。特别是庄周，可谓是古代的一位寓言大师。在《庄子》书中，“寓言”和“重言”，构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是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浓郁诗意的部分，例如《秋水》篇的开头一段：

>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sì）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作者一开始展现在读者眼前的生动画面是秋天发大水，所有支流都流向黄河，汇成荡荡洪水，涯岸旷阔。河中小洲遥远，隔水相望，分辨不清牛马。接着，画面上又出现了神话人物河伯。他见这样的大水，心喜自得，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但他顺流入海，望见了无边汪洋，从而领悟到了自己的不足，发现了自己的见闻狭隘，深感天地间的认识是没有穷尽的；就是孔子的知识也很有限，伯夷的“义”也不足称道。在这一段中，把神话寓言景物与人物内心活动

的描写熔化在一起，既有深刻的哲理，又富于诗情画意。

在庄子的笔下，有生命与无生命的，抽象的与具体的，都能使之成为有思想、有精神可以活跃在读者眼前的生动形象。《盗跖》中就把“无足”（不知足，贪婪）与“知和”（清廉，廉洁）这两种抽象概念，变成了相互争辩诘问的活的形象。这充分显示出庄子想象力之丰富，文字之生动活泼，确实有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中所说的真是“汪洋辟阖，仪态万千，晚周诸子之作，莫能比也”。无怪乎历代的诗人、文学家都深受其影响，学习他的风格和技巧。

历史散文，我国在很早以前便有了。《尚书》可算是最早的一部历史散文集，但文字简括古拙。其后有《春秋》、《国语》，也很简略。从文学上讲，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史学散文著作，流传至今的还是《左传》和《战国策》。《左传》的成书年代，目前尚有争论，我们这里只以《战国策》为代表谈谈。

《战国策》我们在首章已论及，这里从文学角度讲讲。《战国策》中所收录的文章，都长于铺陈，语言也十分生动，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是当时策士们的精心杰作，也是战国历史散文的代表作。

战国策士们善于辞令，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很深。《战国策》中不少文章十分出色地描绘了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表现了他们那种巧弄机锋和狡黠辩术。策士们又很善于分析形势，观察和把握不同对象的心理状态与思想情绪。他们善于灵机应变，见机而行，针对不同情况，选用不同的寓言、故事，充分运用比兴手法，陈述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们往往一席话，能把愁眉不展的听者，说得眉开眼笑；能把趾高气扬的听者，说得垂头丧气；能把盛怒不息的听者，说得心平气和；能把拒谏不纳的主人，说得言听计从。《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就是很好的例子。

当齐国要长安君作人质，方肯出兵援赵抗秦时，赵国大臣们只从国家利益出发力谏太后，没有考虑太后溺爱长安君，注重长

安君的利益，以及母亲舍不得子女离开身边远去的心情。结果大臣们劝谏失败，形成僵局，太后盛怒不止。触龙看透了太后的心思，入见太后从生活起居寒暄入手，打破了僵持局面，使“太后之色少解”。

触龙又略进一步，从自己爱儿子，由远及近，引导太后，使气氛更进一步缓和；太后又由怒气“少解”变为“笑”谈。到此，触龙再从太后对燕后与长安君的爱怜，说到父母不应当只从离别之情和眼前利益着想，而应替子女的长久利益考虑，使他们经受锻炼和培养，如此才是真正爱怜儿子。这样，触龙一席话既迎合了太后痛爱长安君的心情，也符合国家利益。最后使太后同意以长安君为质。

文章末尾还注意照应了前面。全文500多字，构成一篇艺术性很强的完美散文，使你读后，深感它不仅把这一历史事件交代得明明白白，而且把触龙这位老臣的善于言辞的声音动作都描绘出来了。

《战国策》一书中，还有许多叙事和描写人物形象的文章，使人读后犹如身临其境。像《燕策》中的荆轲刺秦王一场，写得极为扣人心弦，当“图穷而匕首见”时，一场紧张惊险的搏斗场面展开了。各种人物的心情、神态、举动都描写得极为生动，使我们好像亲眼看到这场斗争一样。

以《战国策》为代表的历史散文，标志着这种文体的文学作品已相当成熟。由于它有这样的巨大成就，所以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就深受其影响，他在《史记》写作过程中，吸收了《战国策》中的许多长处。以后不少文学家们，也都学习战国策士们的那种雄辩、富丽的文风。

总的来说，战国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的新境界，启迪了我国2000多年来的文风，影响是深刻的。当时的作品，2000多年来一直成为人们百读不厌的范文；特别是诸子散文，更是多彩多姿，不管是叙事、写景，刻

画人物，阐明哲理，或是从修辞到写作技巧诸方面看，都已超越前人而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

为什么战国散文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大变革，使当时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思想极为活跃的时代。当时，新兴封建阶级从巩固本阶级的利益需要出发，注意延揽人才。除了极端主义的法家认为“文乱法”，反对文学的自由发展外，一般的统治者都比较注重士人，提倡文学。特别是当时影响很大的儒家学派，和深受儒家影响的士大夫们对文学的发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们认为“人之于文学，犹玉之于琢磨也”（《荀子·大略》）。文学可以陶冶人们的心灵。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国的统治者也认识到文学之士活动的重要。所以不少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提倡文学，如齐威王（前378—前343）、齐宣王（前342—前324）之时设稷下之学；燕昭王（前311—前279）之时筑台于碣石宫；赵武灵王（前325—前299）之时有丛台和野台；楚国，前有章华后有兰台。就是法家占主导地位的秦国，在吕不韦时，也非常注重文学。吕不韦大聚宾客，使其各叙所闻成《吕氏春秋》，这部书不仅成为秦国文学作品的总汇，也是战国文学作品的总汇。各国统治者使天下文学之士得以集中，因而有机会相互交流思想，观摩砥砺，取长补短，使思想更加活跃，促使私人著书立说风行。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战国时代的散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五、《楚辞》和屈原

屈原的故乡楚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传说和近代考古都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带就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多民族聚居地。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类型，比黄河中下游地区虽然多样复杂，但又有着共同性，说明从那时起，这一地区内各民族之间相互的影响就很深，文化上的创造和交流就极为旺盛。

商周之际，虽然中原各国总是把楚视为蛮夷之地，但它的文化水平并不比中原各国低。和中原国家一样，楚国也有自己的国史和古代流传下来的丰富典籍。孟子曾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这就是说，楚国和素称发达的中原国家晋国和鲁国等国一样，是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记录的。《左传》中讲，楚国的史官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也告诉我们，楚国有着丰富的史籍保存并流传下来。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交往极为频繁，南北文化进一步得到交流。楚国更有机会吸收大量中原文化。公元前520年，东周王室内乱，周宗族有人带着大批典籍转移到了楚国。这不仅加强了中原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而且为楚国成为战国时代南方文化艺术的中心提供了条件。

独具一格的楚文化，就是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族人民长期丰富多彩的创造为基础，并接受了中原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后形成的。这也是战国时代的楚国，能成为新体文学《楚辞》的故乡，孕育出新的"骚体"的巨匠、楚辞的代表作家——伟大诗人屈原的历史渊源。

《楚辞》亦作《楚词》，原指楚人所作的诗歌。西汉以前就有了这个名称。汉武帝（前140—前87）时的会稽太守朱买臣就以善言《楚词》著称。后来流传的《楚辞》，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辑的，里面除了屈原、宋玉等战国时代楚国大诗人的作品外，也有西汉人模仿屈、宋等人的著作。不过，一般说的《楚辞》，主要还是指以屈原为代表的作品。因此，人们往往一提到《楚辞》就想到屈原。

《楚辞》有个显著的特点：在句中或句尾普遍带个"兮"字。据清代音韵学家考证，"兮"字的古音就念"啊"，和现代口语词一样。这种带兮字的诗体，原来并不是屈原首创。远在屈原以前，早可追溯到《诗经》里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汝、汉地区的一些



屈原像

作品，如《周南》、《召南》中的某些诗篇；晚的如春秋战国间的《接舆歌》（见《论语·微子》）、《楚人歌》（见《说苑·正谏》）等楚地民间歌谣。这些诗歌的句子里多带有“兮”字。可以说，它们就是《楚辞》的先驱。

屈原又叫屈平，是楚武王子瑕的后裔。瑕原食采邑于屈，因以为氏，故屈原也就称屈氏了，所以，屈原和楚国国君同姓（楚为熊姓）。屈原的生年尚有不同推测，大约生于公元前343—公元前339年间。公元前278年，楚国的国都被秦军攻破，屈原随同流亡的人民到了今长沙以北的汨罗江。在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下，强烈的爱国心，使他痛感不能苟活下去，于是在这年阴历五月初五日投江而死。据传后世五月初五“端阳节”划龙船、吃粽子就是为纪念屈原。

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文学上取得了极其光辉的成就，而且是一位具有远大抱负的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年轻时代就从事政治活动，20岁时就当了“左徒”（仅次于令尹的大官）。他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又善于外交辞令，因而曾深得楚怀王（前328—前299）的信任，常常参与机要，被委以重任。屈原对内主张任用贤能，厉行法制，使国富民强；对外主张联合齐国，对抗秦国。照当时的局势看，如果以秦国为首实行连横，天下就将统归于秦。但如果东方各国以楚为首实现合纵抗秦，楚就将成为天下统一的中心。屈原看到这点，并为此而努力，进而完成统一大业。公元前318年，东方六国合纵对抗秦国，推楚怀王为纵约长，当与屈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屈原的才能和对内对外的主张，受到以上官大夫为代表的旧贵族保守势力的妒忌和反对，他们在怀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怀王是个不辨忠奸、妄自尊大的昏庸之君。他听信谗言，疏远了屈原，并免去了屈原“左徒”的官职。于是，屈原不得不离开王廷，政治抱负也不能实现了。屈原非常悲愤。在他流落各地的过程中，眼看国势日衰，人民生活痛苦，而自己又无力救国救民，心里郁郁不乐。在这种沉重的心情下，屈原写出了伟大的诗篇——《离骚》。

《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品，全诗共有370多句，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在这篇诗中，屈原借助于神话传说和宇宙间奇丽的景象来抒发他的悲愤，倾吐自己的忠贞与抱负。它把事实的叙述、幽独的抒怀和丰富的幻想交织在一起，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密切结合的杰作。所以后人也就把楚国这种新体裁的文学称为“骚体”文学，也有因此称作“屈体”的。

除了《离骚》外，屈原的作品还有《九歌》、《天问》、《九章》等。

《九歌》共有11篇，包括凄婉的恋歌、悲壮的挽歌和庄严肃穆的祭歌。据研究，它是屈原根据春秋战国间流行于楚国民间的祭神的歌舞词加工提炼写成的。其中除《国殇》一篇是祭为国牺牲的将士外，还有祭祀山川河岳的《山鬼》、《河伯》、《湘君》、《湘夫人》；祭祀太阳神的《东君》；祭祀云神的《云中君》等篇。在这些篇章中，诗人以极为丰富的想象力，生动描绘了各种神的衣着服饰、住处、生活等情况。像《山鬼》这首诗，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若有人兮山之阿（深山岩谷间），被薜荔（一种香草，或说为木莲）兮带女萝（女萝是一种丝状的植物）。既含睇（笑眯眯的眼）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时而女神又出现在“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云飞扬的样子）兮而在下。”屈原把那女神出现在山谷间、云端下的情景，衣着装饰和秀丽含笑、身材窈窕，使

人爱羡的美貌姿态及其神灵行止的气氛，描写得极为生动形象，好像这位美丽的女神就在我们跟前浮动。

这些诗歌还是屈原早年的作品，但从中已可以看出，他在学习民歌和吸取民间文学营养以及写作技巧、艺术风格等方面，都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屈原的诗歌，在《楚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战国诗歌的顶峰。

屈原最奇特的诗篇还应算《天问》。它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从头至尾使用疑问语调，一口气提出了172个问题。为适应提问的需要，语句既变化多端，又基本保持四言一句，形式不呆板，语言流畅而自然。我们试举写天体的部分诗句，便可以体会到全诗的奇妙诗味。

“圜（huán）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天有九重，是谁营建度量的？这何等的大功又是谁开创的？）

斡（guǎn）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系在轴上的绳索，另一头在哪儿？天宫是怎样架起来的？撑天的八根柱子与什么地方相当？东南方为何损？）

九天之际，安方安属？隅隈多有，谁识其数？

（九重天怎样安放和连接？天的角落很多弯曲，谁知有多少？）

天何所沓（tà）？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天与地在哪儿会合？十二辰如何划分？日月依托在什么上面？众星又摆在什么上面？）

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太阳从汤谷出来，到蒙汜落下休息；从天亮到天黑，走了多少里程？）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即兔）在腹？

（月亮有何高德，能死而复生？月中的黑影是什么？是兔子

在它肚里么?)

……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为何把天门关闭天就黑了?天门打开天就亮了?东方未明,太阳又藏在哪里?)”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都是问话,但随着内容的变换,句型也错综变幻,读起来觉得十分流畅自然。

《天问》这篇长诗,涉及的内容极广,名为天问,实际上是天上人间、大地万物、历史传说、宗教信仰、人生观念等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充分显示出了诗人的渊博学识和大胆的怀疑精神。有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讲的,《天问》“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可以说,《天问》既是对历史、宗教的一种批判,也是勇于探索自然和追求真理的表现。它体现了战国时代人们冲破传统思想束缚的时代精神。

《天问》是史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天问》是哲理诗,蕴藏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天问》是科学诗,保存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它在我国文学、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楚辞》中的名篇《招魂》,有人认为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而作,也有人认为是屈原的学生为屈原招魂而作。谁作的我们暂时存疑。但是《招魂》却是《楚辞》中有影响的篇章,因此,这里也要谈到它。

《招魂》的最大特点,是大量吸收了楚国民间挽辞的丰富营养。我国民间长期流传着招魂的习俗,在山东南部(战国时代这里曾与楚地邻近,公元前256年楚灭鲁占有其地),还有类似的歌辞流行,据有关材料讲,在那里曾长期流行有“荡荡游魂,何处留存?或在庙宇,或在山林,天神地神,门神灶君,招魂还家,复

起精神”之类的民间招魂辞。春秋战国时代，在民间，尤其是南方的楚国，类似的招魂辞一定很多，招魂之风一定极盛。马王堆汉墓帛画帷幕上面挂着縠璧玉璜，这不正是《招魂》中的“挂曲琼些”（意思是悬挂着玉钩），“结琦璜些”（意思是帏帐皆用绮缟一类的细丝织物编着玉璜作装饰）所描绘的情况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楚辞在吸取民间歌词养料方面的某种痕迹。

屈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学习和运用楚地民间歌谣，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楚国的历史与现实生活进行再创作，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取得光辉成就，达到新的高峰的伟大诗人。他创立了中国文学的新体裁，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航道。屈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血肉的联系。他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养料加以提炼升华，写出来就会是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在艺术上和思想上，才可能是成功的。也正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屈原对我国文学的影响才那样巨大深远。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就有宋玉、唐勒、景差等大诗人。尤其是宋玉，成就最大，他和屈原并称屈宋。到汉代，学习楚辞的人更多，汉赋就是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总而言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学，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屈原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为世界各国人民传诵不息。

六、音乐艺术的繁荣

今天，人们一般都把有规律而动听的声音称为音乐，大致可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但在战国以前，音与乐是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礼记》中有一篇关于音乐的专文叫《乐记》，是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和他下面的儒生“采《周官》及诸子言乐者”作的（《汉书·艺文志》），里面保存了不少战国及其以前的音乐方面的重要材料。

《乐记》中对古代音乐下了一个定义，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遵循一定规律）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大意是说，当人们见景生情有所感动时就发出相应的声响，声响按一定规律变化，再与乐器演奏配合舞蹈动作，就是音乐。乐的内容，照《乐记》讲，包括"器"和"文"。说是："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所谓"钟鼓管磬"指的是古代主要的乐器名称；"羽籥干戚"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服装道具之类。据说"羽籥"是表演文舞的，"干戚"是跳武舞用的。"屈伸俯仰，缀兆舒疾"则是讲的舞蹈动作和姿态。由此不难看出，战国以前是把唱歌（包括诗词）、跳舞、奏乐等等都包括在我们现在讲的音乐中①。诗歌在古代都是可以演唱的。《诗经》是战国以前的诗歌集，里面分《风》、《雅》、《颂》。《风》就是古代各地的民歌；《雅》、《颂》则是王公贵族们在宴飨、祭祀等场合演唱的音乐舞蹈之词。战国时的《楚辞》，我们已知道，它是在楚国民间歌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可以演唱，而且有的还配合着舞蹈动作。据研究，屈原早年深得楚怀王信任时，他的作品常常在宫廷里演唱。可见，诗歌在战国时代及以前也是属于音乐的一部分。只是到了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艺术门类才更加细密繁复，舞蹈、诗歌才渐渐从音乐里分出来，音乐演变为主要指声乐和器乐，即唱歌和奏乐之类了。

我国幅员辽阔，从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除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外，各兄弟民族、各地区又形成了具有浓厚民族地方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反映在音乐上，我们可以从有关文献记录中看到战国时代各地音乐的大致情况。

北方以燕、赵为代表的音乐，似乎以悲壮慷慨闻名。如荆轲赴

---

① 中国古代的音乐是很广泛的，凡是能使人感到快乐的，如音乐、诗歌、绘画、雕刻，以至建筑造型艺术、仪仗、田游，肴馔等都可以涵盖（郭沫若《公孙龙子与其音乐理论》）。

秦在易水相别时，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据《淮南子》记载说"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据研究，此歌是很有北方地区音乐特点的。

秦地的音乐特色，据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讲是"击瓮扣缶，弹筝抚髀，而歌呼呜呜"，乃"真秦之声也"。

东方的音乐，与西北则大不相同。比如齐国是金石之音疏，而尚丝竹之声，故其音舒缓。大致是以轻音乐为主，或许有点软绵绵的味道。所以后来有人认为是秦汉间淫声之祖。

南方的楚国，更是有名的音乐舞蹈之邦。楚人唱歌，有其独特风格，形成有名的"楚声"。楚声在汉初仍然流行于淮河流域。因为"楚声"通行于南方，所以又叫"南音"。它的特点多用"些"字音为尾，故有"楚歌曰些"之说。我们看《楚辞》中《招魂》的句尾就多用"些"字。

战国时代各地音乐特点的形成，都有其历史渊源。据《吕氏春秋·音初篇》说，东音相传形成于夏代孔甲之时，南音则形成于夏禹之时，西音形成于殷河亶甲徙西河（即自嚣迁于相），后来秦穆公之时，大概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改造成为秦音。北音则和殷人关于玄鸟的传说有关。虽然，这些都是传说，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时代的音乐不仅在演唱艺术方面有了进步，而且已有人探索我国音乐的地方特色和形成的历史渊源，表明了战国时代音乐艺术有了新的发展。

音乐，作为人类精神文化财富的一部分，也和人类的物质财富一样，本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在战国以前，音乐为少数王公贵族所垄断。他们一方面把音乐作为自己享乐生活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把它神秘化，与旧的礼教结合起来。他们认为：乐"可以善民心"，乐行能"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因而是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种重要工具。民间有劳动群众自己的音乐，它反映了劳动群众的喜怒哀乐。在春秋以前，官府每年要派人采风，其中除部分作品被采风者收集改造献给统治者、作为考察民情的参

考外，真正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在群众中有广泛基础和影响的乐歌，是不被统治者所重视的，登不了大雅之堂。但是，战国时情况不同了，旧统治阶级从前用以麻痹人民的雅颂古乐已渐渐使人乏味，甚至新的统治者也不爱听了。《乐记》中记载有魏文侯与子夏的一段谈音乐的话，文侯就说，他听古乐就要打瞌睡，而“听郑卫之音，则不倦”。《孟子·梁惠王》篇中，记有梁惠王对孟子说的一段话，更是说得明白，梁惠王说他根本不爱好“先王之乐”而“好世俗之乐”。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那种空洞的歌功颂德的旧腔调——雅、颂已不受欢迎，而从前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世俗音乐，渐渐为新兴统治者所接受和喜爱。因此，战国时代民间音乐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都市的发展，市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也大大发展起来了。比如东方齐国的都城，据苏秦说：“临淄之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

在音乐舞蹈之邦的楚国，除了王公贵族们的宫廷音乐外，民间也流行着许许多多为民众所喜爱的乐曲。据宋玉答楚王问时讲，有人在郢都唱歌，开始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数千人”（或作“数万人”）；唱《阳阿薤（xiè）露》时（或作《阳阿采菱》）时，“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或作“数人”）。从宋玉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知道，春秋战国以来，楚国民间有许多流行歌曲。《下里巴人》大概是流行最广的民间歌曲，而《阳春白雪》之类的宫廷音乐，只有少数人才能唱。不过，也反映出战国时代的音乐艺术也和其他艺术那样，少数王公贵族所垄断的情况已经走向结束，高级的宫廷音乐也可以在街头唱了。

战国时代音乐艺术的发达情况，从当时乐器种类之多也看得出来。

当时乐器的种类极为繁多，见于记载，并有出土文物佐证的有：钟、磬、琴、瑟、笛、箫、笙、竽、筝、筑、钲、鼓、錞，等等。其中齐国的瑟、秦国的筝特别有名，而楚国的笙更是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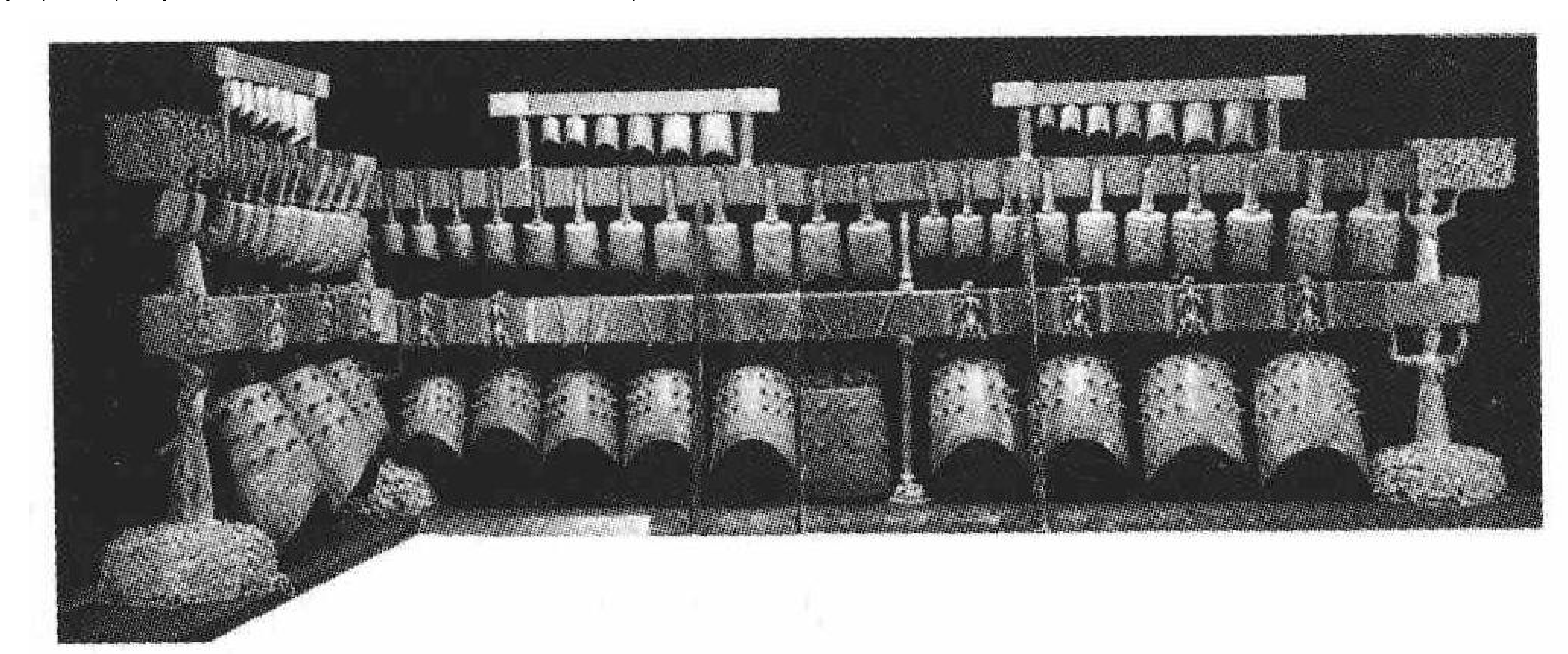
之冠。

这许许多多的乐器，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类型，如钟，可分为按大小音高次第排列悬挂组成的“编钟”和单独使用的“持钟”。磬，也可以分为编磬和单独用以按节拍的磬。琴、瑟又可以分为不同弦数和大小的若干类型。鼓也可分为建鼓、悬鼓等等。

历年来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不少战国乐器，差不多文献上有的，实物都发现过。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

1957 年 5 月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战国编钟。这是我国出土的第一套保存完好的编钟。出土时，钟的表面只有一层薄薄的黑色炭质，连一点锈蚀也没有。用手摸去表面一层，铜质光亮如新，好像不曾埋入土中似的。经实测，不仅有一定的音律，而且音质也很好，真是十分难得。

春秋战国之交[①]的随县曾侯乙大墓中的乐器。这座墓是 1978 年 3 月发现的。所出乐器达 120 多件，种类繁复，保存也较好。其中仅各种编钟就达 64 件之多，分 3 层 8 组悬挂在饰有彩绘的铜木结构架上。架高达 2.65 米，组成曲尺形，气势宏伟而壮观。用这架悬挂的编钟，仍然可以演奏出古今中外的各种乐曲。



曾侯乙编钟

与之相配合的还有编磬 1 架 3 组，共 32 件，以及鼓、琴、瑟、笛、笙、箫等等。鼓有悬鼓、带柄的双面鼓和竖立在铸有复杂纹饰铜座上的大建鼓。琴有五弦和十弦的。瑟也有不同弦数的，计 12

① 曾侯乙大墓的年代，据墓中出土铜器铭文推测在公元前 433 年或稍晚。我们把公元前 453 年三家分晋至公元前 403 年韩、赵、魏正式列为诸侯作为春秋战国之交，公元前 403 年作为战国正式的起始之年。

件之多。横吹的竹笛有两件，和现在的竹笛差不多，它是我国目前见到的最早实物。笙的种类有十二管、十四管、十八管的。箫和一般的单管直吹者不同，在曾侯乙墓中所出的是两件排箫。这种箫古人有时称作“籁”，它和古代壁画、石刻中的形象是一致的。据音乐工作者研究，这种排箫还与罗马尼亚舞台上演奏的一种叫做“Nay”的排箫相同。因此，有人认为这种流传至今的排箫，与我国古代的排箫形制和名称都一致，表明它们之间有某种渊源关系。

我们上面所举，虽然都是王公贵族们所有的乐器，但由此也充分地显示出：从春秋到战国，我国的音乐艺术是高度发达的。只可惜音乐是器止声消、口出即逝，我们不能听到当时的乐曲声，只能从出土的乐器和有关记载推想而知那时美妙动听的音乐了。

七、战国的绘画艺术

战国时期的绘画艺术已达到相当的高度，这一点不仅文献记载可供查考，而且还有不少绝妙佳品——考古发掘所获的帛画、铜器纹饰、漆彩绘等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据记载，战国时已有许多画家专门从事绘画艺术的创作。在当时王公贵族的宫室、庙堂里，梁柱上有图案，墙壁上有绘画，各种陈设器物也都有装饰图案。东汉顺帝时（126—144）作过侍中（皇帝左右伺应杂事的官员）的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讲，楚国王公贵族的庙堂里，都画有“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圣贤怪物行事”。这些为王公贵族们作画的，就是当时的画家。

又据韩非说：“客有为齐君画者，问之画孰难？曰：‘狗马最难。’孰易？曰：‘鬼魅最易。狗马人所知也，旦暮于前，不类之，故难。鬼魅无形，无形者不可见，故易。’”这是当时画家从绘画实践中深有体会的回答。

《说苑》中也讲了一个关于战国画家的故事。讲的是齐国国君修建九重台时，曾用巨资招募国内的画家为之作画。有一个名叫敬

君的人，家里很贫寒，一直在家学画，得到齐王招募画工的消息就去了。敬君到九重台作画后，很久没能回家，很想念自己的妻子，于是他就在自己前面画了一幅妻子笑眯眯的像。旁人见了后报告了齐王。齐王起了淫心，对敬君说，国中献的美女没有一个好的，愿以百万巨资换他的妻子，如果同意就好说，否则要杀掉敬君。这个故事除了说明王公贵族的荒淫无耻外，从中还可以看到，像敬君这样的画家有相当高的绘画水平。


龙凤仕女帛画

这两个小故事，充分反映出战国时代已有了专业的画家，他们在绘画实践和理论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下面我们再就考古所得的有关绘画艺术品看看战国绘画的艺术成就。

战国帛画发现的不多。其中有两幅最有名，一幅是《龙凤人物帛画》，一幅是《人物御龙帛画》。

《龙凤人物帛画》是1949年春在湖南长沙近郊战国墓中发现的。原来人们称作《夔凤人物帛画》或《妇女凤鸟图》，是一幅画在长30厘米，宽22.5厘米的平纹素绢上的画。郭沫若同志曾作《关于晚周帛画考察》，认为画中左上的独脚蛇状怪物是邪恶和死亡的象征，应是古代所谓的“夔”。右上为凤鸟，下为合十束腰妇女祈求凤鸟战胜邪恶势力。后来不少学者发表文章，有的提出了不同看法。近年来，经过对帛画的科学处理，使画面更为清晰，同时发现早期摹本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新的正确摹本可参见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插图十五）。从新摹本可以看出，左上角那条蛇状物是一条龙，身着束腰长裙的妇女脚下还有一弯月形状，过去的摹本漏掉了。由于旧本摹错了，根据它考察的主题思想当然也错了，这应该是一幅祈求飞龙和飞凤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迷信画。

从绘画艺术的角度看，帛画的艺术性还是很高的。它的构思比较巧妙，画家的想象力丰富；画的笔调显得古拙，但人体部位比例却把握得很准确。据文献讲楚妇女爱细腰，这幅画中妇女的装束符合当时楚国的风尚。由此可见，这幅帛画既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又有现实生活的写实，和后来发现的《人物御龙帛画》一样，技巧都是相当成熟的。


人物御龙帛画

《人物御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大致和8开大小版面差不多。画面正中为一身材修长的中年男子。头戴高冠，身着广袖长袂袍服，腰挂长剑，神态刚毅，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一条巨龙。这条龙的龙头高昂，身体平伏，尾巴上翘。尾上还站着一只圆睛长喙、昂首仰天的仙鹤。人的头顶上有舆盖，舆盖上三条飘带随风飘拂。龙身下有一条鱼。这奇特的画面，大致表示乘着飞龙升天的意思。这幅画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技巧相当成熟。画家使用单线勾勒，线条云流风动，潇洒熟练，丝毫也不呆板。画中人物——从原物可以看出——略施彩色，龙与鹤以及舆盖基本上用白描，而有的地方还施以金白粉彩。据美术工作者讲，用这种画法的作品，是目前发现的古代绘画中的第一幅。再从人物形象、画面布局、主题构思等等看，也都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特别是画家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时代精神，以及当时绘画艺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的高度统一的光辉成就。

战国的绘画成就，在当时的铜器、漆器等纹饰上更有充分的

反映。

铜器的纹饰，殷周以来就非常精美繁复，但图案多是比较板滞的几何纹、夔纹、云雷纹等等。春秋时代，少数铜器上出现了刻铸的人物、禽兽之类的写生画，但只刻有一个轮廓线条，显得很古拙。战国时的铜器纹饰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新的画法，更进一步产生了反映当时社会生活而具有真实性的作品。如河南汲县山彪镇所出的《水陆攻战图铜鉴》，辉县赵固镇所出《宴乐射猎纹铜鉴》以及在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嵌错铜壶上的演武宴乐采桑弋（yì）射和水陆攻战等图案花纹等等，都是很生动的写实作品。故宫博物院曾经收购过一批战国刻画铜器的残片，其中有一片刻有楼台，楼上有引弓而射的人物，另外还有驾车的御者，对尊而饮的人物以及飞鸟、走兽、植物、仙鹤之类，都是用细致的线条刻成的，形象栩栩如生，十分巧妙地表现了各种生物的姿态和动作。

这些铜器上的纹饰图案，都是用写实的手法，着重描绘人物和动物。笔法古拙纯熟，有明有暗有透视，使平板的花纹更具有立体感，形成了富有战国时期独具风格的铜器花纹艺术。同时，从这类铜器的刻画中，可以看到装饰花纹的发展，已由图案走向写实的趋向，从而为后世的写实绘画开了先河。

战国时代的漆器花纹，在绘画史上占有突出的一席。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南方，特别是两湖地区，曾发现了大量的战国漆器。这些漆器一般都饰以美丽的花纹，如彩绘的奁、箱、盒、杯、盘、棺椁、木俑、盾牌、马具等等。它们的图案结构既新颖又精彩，有的继承和发扬了商周以来的图案花纹特色，多数是战国特有的人与动物的活动写实画。

1952 年，在湖南长沙的战国墓中，曾出土过一件狩猎漆奁，上面有上下两层彩漆绘图画。画有手持长戟、用力刺杀野牛的猎人，猎人显得勇敢而动作敏捷；野牛低头扬角，俯身前扑，凶猛异常，在这危急时刻，牛后一人引弓将发。画中还有猎狗与野猪相峙搏斗的形象。所有这些情景，都描绘得活灵活现，非常生动形象，

极充分地显示了战国时绘画艺术的巨大成就。

八、吃、穿、住、行所反映的战国物质文化

吃穿住行，是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基本内容，从中可以窥见一个社会和时代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

吃 战国人的主要食物，可分为粮食、肉类、蔬菜、饮料、调味品等。

农业一章中已经提及，那时的粮食品种和现在差不多。其中北方大致以粟米为主，南方以稻米为主。从《战国策》中说的东周人要种稻，西周人不放水看，水稻在黄河流域也有所种植，但以南方为多，在江西发现战国最大的装米粮仓就说明了这点。

六畜（马、牛、羊、鸡、犬、豕）的养殖，是战国人肉食的主要来源。马主要用于服役。牛羊多在祭祀鬼神时才杀食。狗肉比猪肉可能还珍贵。春秋末越王奖励生育，生男的奖一犬二壶酒，生女的奖一豚（小猪）二壶酒，战国人可能也因袭此俗。鸡为农家普遍饲养。

蔬菜，战国及以前的文献中已有葵、藿、薤、葱、蒜、姜、葫芦、萝卜、蔓菁等一二十种，但有的可能是野菜，我们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其中葵藿可能是种植最多的，农家常代粮食吃。

酒、糖（主要是蜜）、酱、醯（即醋类）等饮料调味品战国时代都有了。其中酒的实物，在1974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中发现过两壶，出土时打开锈封严实的壶盖还香气扑鼻。其中一壶青翠透明，似现代的“竹叶青”名酒，一壶呈黛绿色，可见战国时代酿造技术是相当高了。

上述这些丰富多样的食物，当然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王公贵族和富有之家，不仅粮食吃的是精品，酒肉菜肴也样样皆有。王公们还有专门掌管饮食烹饪的属吏，对食物的吃法非常讲究。就粥来

说，王公贵族们吃的也不是我们常说的稀饭，他们所吃的粥是粮食加工成末，和肉、菜、调味品加水煮成的。王公贵族们的炊器餐具，也都是精美的青铜、金、银、玉、骨和漆器。考古工作者常常在一些战国墓葬中同时发现成套成组的鼎、镬、甗、鬲、簠、簋、豆、盘、垒、壶、尊、爵、斝、觚、盥、匜以及斗、勺、匕、叉等等，那都是当时王公贵族们祭祀、宴飨之时的特制炊器和餐具。镬是煮肉的，煮好后装入鼎内依次列于庭中，故有“列鼎而食”之说。那时没有桌子，饮宴吃饭都铺席于地上再摆陈食物，后世所谓“筵席”、“酒席”就是这样来的。列鼎中的肉盛入俎豆，按一定规矩放入席上供人食用。垒是储存酒的，尊、壶是放在席旁装酒的，饮用时用斗勺斟入爵、觚、觯内。煮饭用甗（即甑锅）或鬲（作稀饭用），做好后盛入簠，再移入席上供食用。食前食后要洗手抹嘴擦脸，所以还备有盥、匜等盛水的器物。当时人们除用手抓拿某些食物外，还有匕、叉、箸、勺等餐具。酒、菜、饭的先后食序，战国时代也和今天饮宴时一样。

王公贵族们吃的东西是十分丰盛的，孟子说他们是“食前方丈”（《孟子·尽心》），意思是吃的东西列于前方达一丈（约合今2米），看来并不完全是夸张之词。我们将当时王公贵族墓中所出成套餐具都陈列在一块，确实要放一大片。再从《礼记·曲礼上》讲的进食：“左殽（带骨的肉）右胾（zì，切成大块的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切细的肉）炙（烧肉）处外，醢（hǎi，肉酱）酱处内。葱渫（yè，葱的一种吃法）处末，酒浆处右。以脯脩（咸干肉）置者，左朐（qú，干肉的一种）右末”。请看，这样的摆放和吃法，不是和孟子说的“食前方丈”差不多么。

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当然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不用说吃法没有那么多讲究，往往粟米也难吃到，正如张仪说韩国情况那样：“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藿羹就是菜汤。要是遇到荒年，就连豆饭、菜羹也吃不上，只有“糟糠”当饭了。至于肉食、酒肴，一般人就更难吃上了。孟子的理想社会，也不过“鸡豚狗彘之畜，

无失其时”，七十老人方可以食到肉。

穿 包括头部、上身、下身和脚上穿的。头上戴的总称为冠，分别有弁、帽、冕、冠、巾等不同称呼。大致从西周以来就有这样的习俗：儿童头上只用一块布包着头顶，叫做巾。到20岁算是长大成人，这时要举行改变服装的礼仪，主要是头部的变化，所以叫“冠礼”。贵胄子弟从此开始戴冠，一般人的子弟成人时也有类似的仪式，但不能戴冠，只是改成一块葛巾盖着头上的发髻叫做帻，所以《吕氏春秋·上农》说：“庶人不冠弁。”贵族们戴的冠，不同等级和身份的人，有所不同。这在西周春秋以来都是等级森严的。就是同一等级和身份的，在不同场合也有不同的冠，如接待宾客、朝见君王等就不能戴皮制的，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当然，有的是根据需要决定的，打仗戴皮、铜、铁做的帽子，叫做胄（或称为兜鍪），战国时代的铜、铁胄曾多次被发现。1965年在河北易县出土过不少兵器和甲胄，其中的胄是用若干铁片连缀成的。我们从战国器物上的纹饰看到，猎手头上戴着兽头形帽子，如辉县琉璃阁出土的战国舞乐狩猎纹奁，里面有一持弓而射的猎手，头上所戴的就是兽形帽子，那大概是为了接近野兽。

上身穿的总称为衣。长的叫袍，短的叫襦，罩衣叫衫，有里曰“复”。复就是我们说的夹衣。在表和里之间填充有绵（当时没有棉花，只有丝绵）或乱麻、芦花等物的衣，是用以御寒的绵服。

战国时代中原人的衣服都是传统的右衽，只有丧服和死人才是左衽的。

不同等级和身份的人，不仅衣的质料不同，形制也有别。王公贵族和富有之家，穿的是锦、帛、缟、皮和精细的麻布。平常穿方领右衽大袖、腰以下特别肥大至脚胫的“深衣”，腰间（肋以下）系着有金玉作饰物的丝带。此外还有各种礼服，不同场合穿着不同。据载，春秋以来“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则衮冕”……这里说的衮，就是用五颜六色的丝线绣有花纹的高级丝绸衣服。夏天穿帛、缟或细麻布衣，冬天穿皮裘绵袍。穿裘毛在

外，面上再罩单衣，但为显示美丽，又故意袒开外衣露出裘的一部分。这种穿法形成一种制度，如果是"表裘"（不穿罩衣）或"袭裘"（全被掩盖）则"不得入公门"。那时以稀有的白狐裘为最珍贵，所以孟尝君献给秦王一件白狐裘，王妃也想要，只好让手下食客再偷回来转送。大贵族都以身穿白裘外套锦衣为荣耀。

短衣叫襦，又有长短之分。短襦大概和我们现在的衬衫差不多长。长襦一般齐膝盖，考古工作者曾在洛阳、山西长治等战国墓中发现过身着这种长襦的铜俑。这也说明襦不是王公贵族的衣服，而是广大劳动者的服装。

锦衣长衫狐裘绵袍，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不仅政治地位、经济条件不允许他们穿用，同时他们要终年参加生产劳动，哪里能穿呢！只有穿葛麻乱毛纺织的粗布短衣，战国人又叫褐。《孟子·滕文公》说的"许子衣褐"就是指的粗布衣服。许子还是一位士人，他们衣褐的话，劳动人民恐怕更难人人衣褐了。

战国人把下身穿的叫裳。汉人刘熙编的《释名》（又叫《逸雅》）说："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遮羞保护下身的意思。贴身的裳又叫裈（kūn），另外在两腿再穿上类似套裤的所谓袴。当时的劳动群众和未成年的儿童，都不衣裘裳和袍或衫，而穿襦裈。一般人大概只有七十老者方能衣帛，喜庆节日，才能把贵族老爷们平时穿的"深衣"作为礼服，当时称为"吉服"。

脚上穿的叫屦（jù），秦汉以后才叫履或鞋。一般以麻、葛、草等编织，也有皮的。劳动者和下层士人多穿没有装饰的草或麻葛做的。麻鞋的实物曾在湖南长沙出土过。王公贵族们穿皮的，或编织精美的麻葛鞋，并往往在前端或边沿饰有不同颜色的丝穗或皮条。和衣服一样，不同场合和季节配以不同的鞋，比如夏天穿葛或麻编的，冬天穿皮的，黑裳配黑色的屦。战国时代还有袜子，有布帛也有皮做的。那时都是席地而坐，进屋要把屦脱在门外。据说在战国以前参加隆重的宴会或朝会时，连袜子也得脱去，光着脚进屋。

住 战国时的居住条件远比从前进步。尤其是高大宽敞的楼台瓦房的建筑、中国建筑艺术中特有的斗栱都是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瓦从西周就有了，不过很粗糙，推测只在屋脊和房顶周围盖上瓦，用以压住茅草。春秋末至战国以来，考古发现的瓦片遗物已很多，先后在临淄齐故都、曲阜鲁故城、易县燕下都、邯郸赵城、咸阳的秦国都城遗址等许多地方，都多次发现过大量的板瓦、筒瓦及各种瓦当，不少都刻有美丽的花纹。从同时发现的房屋基址、烧制的刻花铺地砖、栏板，铸有花纹的铜铸建筑构件等物，结合有关文献，可以看到，战国时代的房屋建筑艺术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特别是王公贵族们的宫室庙寝，更是考究。孟子说王公贵族们的房屋都是“堂（指高的台基）高数仞（8 尺为仞，约合今天 1.6 米），榱（cuī）题（榱题指屋檐）数尺”。《战国策·赵策》讲董子经营晋阳修建宫室“皆以荻蒿苫楚墙之”，“皆以炼铜为柱础（zhì，柱础）”，可见当时的宫室墙壁、柱础都很坚固。从战国一些器物图案纹饰上，还能比较清楚地看到那时贵族的宫室建筑形象。50 年代，曾在山西长治市分水岭战国墓中发现过一件残铜鉴，内部有一座线刻建筑物的图画，可以看出它是建在高高台基上，屋顶为四阿式的楼房，一道道整齐的瓦纹清晰可见。屋脊上装饰有飞鸟，柱子粗大、光滑笔直，上有斗栱。楼台还有栏杆，屋檐伸得长长的，真可谓既富丽堂皇，又坚实牢固。1982 年在浙江绍兴曾出土过一件精致的战国铜质房屋模型，使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南方沿海一带的房屋造型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但其建筑艺术也是相当高的。

至于宫室内的陈设装饰，更是华丽。从《楚辞》有关篇章所描述的楚宫室寝庙看，都是雕梁画栋，门户、屋檐、房顶、墙壁都雕画着五颜六色的花纹，刻花的烧砖地面铺有编着精细花纹的席子，墙是平滑的石板嵌成的，房中摆有彩绘漆几案，立有彩色木雕的座屏。各种珍宝珠玉、翠鸟之羽都装饰在室内，还挂着饰有玉璜的精美罗绮帷帐……不难想见，当时其他六国

的王公贵族当也是这样。

至于一般老百姓的居住条件，虽然记载和实物已难见到，但恐怕只有低矮潮湿难避风雨的茅屋草舍，或许是茅屋草舍也没有。

行 陆行车辇，水行舟船，战国已为常见，遇水架桥也有了。

我国的车船早已有了，但战国时代种类多，制造技术高。车除用作战争工具外，还用作交通和运输工具。贵富人出门不是骑马，便是坐车乘辇。活着如此，死后还希望这样。考古工作者曾在辉县琉璃阁发掘出了战国大贵族的车马坑，埋车数达一二十辆。有大型小型之分，有的还发现了篷盖。有一辆箱长 1.9 米、宽 1.2 米的车，篷盖长 2.4 米、宽 1.5 米，根据出土实况看，篷盖有点像四阿式屋顶，顶有 1.5 米长的横梁，两扇梯形席子向左右披下，两端各盖三角形席子。战国的车子还在汲县三彪镇，信阳、长沙等许多地方发现过，车具发现更无计其数。从文献和考古材料看，当时的车子很讲究，车马都有繁复的装饰品。

船只也有作为战争工具的。战国不少器物上都有水陆攻战图可证。从《战国策·楚策》载张仪说的一舫（两船连体成方形的叫舫）可载 50 人，可见是不小的。1958 年还曾在江苏武进奄城发现过一只长达 11 米、宽近 1 米的独木舟。从附近出土有战国铜器的情况分析，这只独木舟可能也是属于战国时代的。河上除有船只行走外，战国时还有了桥梁。《史记·秦本纪》讲，公元前 257 年（秦昭王五十年），曾在蒲州的黄河上（今风陵渡）架设了一座大型浮桥，这是历史上横跨黄河的第一座桥。

远行除车船外，还得解决吃宿问题。据说商代已有政府开设的驿站以便传递公文信息。战国时不仅有政府开设的驿站客馆，还有了私人开设的客舍，以供远行客商食宿之便。

我们从战国人的吃、穿、住、行，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那是战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在生产提高的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的具体体现。

附录一 战国世系表

周

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赧王

秦

历共公——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献公——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始皇

魏

文侯——武侯——惠王——襄王——哀王——昭王——安釐王——景湣王——王子

赵

襄子——桓子——献侯——列侯——武公——敬侯——成侯——肃侯——武灵王——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幽缪王

韩

武子——景侯——列侯——文侯——哀侯——懿侯——昭侯——宣惠王——襄王——釐王——桓惠王——韩王安

楚

惠王——简王——声王——悼王——肃王——宣王——威王——怀王——顷襄王——考烈王——幽王——哀王——负刍

燕

成公——湣公——釐公——桓公——文公——易王——燕王——昭王——惠王——武成王——孝王——喜

田齐

齐康公——齐太公——田侯——田桓公——威王——宣王——湣王——襄王——齐王

附录二　战国大事年表

中国纪年	公元纪年	大　　事
周元王元年	前 476	有说战国从本年始。
周定王十六年	前 453	魏、赵、韩灭知伯，“三家分晋”。
周定王二十二年	前 447	楚灭蔡。
周定王二十四年	前 445	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改革。楚灭杞。
周定王二十五年	前 444	秦伐义渠，执其君。
周考王十年	前 431	楚灭莒。
周考王十一年	前 430	义渠伐秦，至渭水北岸。
周威烈王三年	前 423	韩伐郑，杀郑幽公。
周威烈王十年	前 416	晋幽公为“盗”所杀。
周威烈王十二年	前 414	越灭滕。
周威烈王十三年	前 413	越灭郯。
周威烈王十七年	前 409	秦命令百姓（官吏）开始带剑。
周威烈王十八年	前 408	赵烈侯进行改革。魏攻取秦河西地。
周威烈王二十年	前 406	魏灭中山。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 403	周威烈王命韩、赵、魏列为诸侯。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	前 402	楚声王为“盗”所杀。
周安王四年	前 398	郑杀相国子阳。
周安王六年	前 396	子阳之党杀郑繻公。
周安王七年	前 395	秦伐绵诸。

周安王十五年	前 387	田和和魏文侯在浊泽相会，请立为诸侯。
周安王十六年	前 386	田齐立为诸侯。赵迁都邯郸。
周安王二十年	前 382	卫攻取赵刚平。
周安王二十一年	前 381	楚悼王死，吴起被车裂。
周烈王元年	前 375	韩灭郑，韩迁都于郑。
周烈王七年	前 369	赵、韩迁晋惠公于屯留，晋绝祀。
周显王二年	前 367	西周威公死，公子根在东部争立，西周分裂为西周东周二小国。
周显王八年	前 361	魏迁都大梁。秦灭獂。
周显王十三年	前 356	秦商鞅下变法令。
周显王十四年	前 355	申不害在韩进行变革。
周显王十六年	前 353	魏、齐桂陵之战，齐胜魏。魏攻入赵都邯郸。
周显王十九年	前 350	商鞅第二次下变法令。秦迁都咸阳。
周显王二十五年	前 344	魏发起逢泽之会，魏称王。
周显王二十八年	前 341	齐、魏马陵之战，魏将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
周显王二十九年	前 340	秦擒魏公子卬、大破魏军。
周显王三十一年	前 338	秦败魏于岸门。秦孝公死，商鞅遭车裂。
周显王三十五年	前 334	魏、齐会徐州相王，魏尊齐为王。
周显王三十六年	前 333	楚攻齐徐州，败齐将申缚。
周显王三十九年	前 330	秦败魏于雕阴，擒魏将龙贾。魏献河西地予秦。
周显王四十年	前 329	秦攻取魏河东汾阴、皮氏及焦等地。
周显王四十一年	前 328	魏献上郡 15 县予秦。
周显王四十四年	前 325	秦自称王。
周显王四十六年	前 323	燕、赵、中山、魏、韩五国相王。

周慎靓王三年	前318	魏、赵、韩、楚、燕五国合纵攻秦，不胜而回。燕王哙让位相国子之。
周慎靓王五年	前316	秦并巴、蜀。
周赧王元年	前314	燕子之杀死将军市被、太子平。齐攻入燕都。秦攻义渠，取二十五城。
周赧王三年	前312	秦占楚汉中。
周赧王七年	前308	秦攻取韩宜阳。
周赧王八年	前307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
周赧王九年	前306	楚灭越。
周赧王十四年	前301	齐、魏、韩败楚，取宛、叶。楚国庄跻起义。
周赧王十六年	前299	楚怀王受骗入秦，被秦扣留。
周赧王十九年	前296	齐、魏、韩联军攻秦到函谷关，秦求和。赵灭中山。
周赧王二十二年	前293	秦与韩、魏伊阙之战，秦胜韩、魏，斩首24万。
周赧王二十七年	前288	齐、秦称帝，两个月去帝。
周赧王二十八年	前287	赵、魏、齐、楚、韩五国攻秦，停留于成皋。
周赧王二十九年	前286	齐灭宋。
周赧王三十一年	前284	燕、秦、赵、魏、韩、楚六国攻齐，燕军入临淄，并占领齐大片国土。
周赧王三十六年	前279	田单反攻，逐燕军出齐国。
周赧王三十七年	前278	秦攻入郢、楚迁都陈。屈原自沉于汨罗江。
周赧王四十二年	前273	秦国攻大梁，魏献南阳求和。
周赧王四十五年	前270	秦灭义渠。
周赧王四十六年	前269	秦、赵阏于之战，赵胜。
周赧王五十五年	前260	秦、赵长平之战，秦大胜，坑赵军40多万。

周赧王五十六年	前 259	秦军围邯郸。
周赧王五十八年	前 257	魏、楚救赵，邯郸解围。
周赧王五十九年	前 256	秦灭西周。周赧王卒。楚灭鲁。
秦昭王五十三年	前 254	魏灭卫。
秦昭王五十六年	前 251	燕军 60 万攻赵，为赵败，赵围燕都。
秦庄襄王元年	前 249	秦灭东周。
秦庄襄王三年	前 247	魏信陵君合五国攻秦。
秦始皇六年	前 241	赵庞煖率赵、魏、韩、燕、楚五国攻秦。
秦始皇九年	前 238	秦王平定嫪毐叛乱。
秦始皇十四年	前 233	韩非在秦被迫自杀。
秦始皇十五年	前 232	秦攻赵，为赵将李牧所败。
秦始皇十七年	前 230	秦灭韩。
秦始皇十九年	前 228	秦攻破赵，俘赵王。赵公子嘉出奔代，自立为代王。
秦始皇二十年	前 227	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未遂。
秦始皇二十一年	前 226	秦攻占燕都蓟，燕王喜迁都辽东。
秦始皇二十二年	前 225	秦灭魏。
秦始皇二十四年	前 223	秦灭楚。
秦始皇二十五年	前 222	秦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秦攻代，俘代王嘉，赵亡。
秦始皇二十六年	前 221	秦灭齐，秦统一中国。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战国史话
作者＝彭邦炯，谢齐著
页数＝250
SS号＝12436684
出版日期＝2009.10